苹果、微软、IBM、迪斯尼等世界500强企业管理层都在学习的超强领导法则！

心理学称霸世界2

PSYCHOLOGY 战争篇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肖如燕◎译

在群体之中，个体的意志会被湮没，独立思考能力也将丧失
群体精神将会取代个体精神！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庄　宁
封面设计：八牛·设计

心理学称霸世界²
PSYCHOLOGY 战争篇

《乌合之众》完美升级版！
如何全面有效地领导一切？怎样轻易掌控复杂的局面？

- 那些表面上持久不变的人格仅仅来源于持久不变的环境。由于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不同性格潜质，在不同环境的压力下以不同的形式表现。

- 心理感染这种现象可以促使个人放弃自身意志而根据周围众人的意志行事。它虽然对智力影响很小，但对情感影响很大，在它的暗示和操纵下，群体中众人的感觉和反应基本都是一样的。

- 历史证明，我们必须要经过漫长的屠杀和毁灭的过程，才能真正地明白，理性真理是可以战胜某个感性或神秘的本源幻想之源。





上架建议：社科经典
ISBN 978-7-5112-64
9 787511 264466
定价：32.00元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邓丽蓉◎译

心理学称霸世界2

PSYCHOLOGY 战争篇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学称霸世界 . 2, 战争篇 /（法）勒庞著 ; 肖如燕译 . --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 2014. 7
ISBN 978-7-5112-6446-6

Ⅰ. ①心… Ⅱ. ①勒…②肖… Ⅲ. ①心理学 Ⅳ. ① 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3834 号

心理学称霸世界 2. 战争篇

著　　者：（法）古斯塔夫·勒庞；肖如燕译

责任编辑：庄　宁　　　策　　划：博采雅集
封面设计：八牛设计　　　责任校对：张　翀
责任印制：曹　净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67022197（咨询），67078870（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gmcbs@gmw.cn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

印　　刷：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mm×1000mm1/16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17.5
版　　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6446-6

定　　价：32.00 元

自序：关于战争心理学的研究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不会只着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具体事件，只讨论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与发展过程中的心理学有关知识。由于受到很多的情绪影响，目前很少有人对此做出明确的解释，前人虽然创造了历史，但历史是由后人来编写的，只有经历了一定的时间沉淀，原本的历史才会在人们的暂时兴奋中浮出水面，并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历史只有对于逝者才是公正的，对于还在活着的人毫无公正可言。现在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情，背后都有着无形的力量在推动，因为隐藏在世间万物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无形的世界，我们的情感和信仰都会在那里被不断加工完善，所以，我会带领大家一起到那里进行深入研究。

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的和平处境被打破。许多国家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当时，很多欧洲国家都为战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同时又希望在政府层面上通过外交谈判来缓和矛盾，维护地区稳定。但是，结局并不乐观，经过一周短暂的谈判之后，战火还是燃烧起来了。

战争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其发生不因任何人的主观臆断决定，而是来自各种客观、深远的因素，这些因素一直在悄无声息地积累着，直到某天突然爆发。在这里面存在着一个规律，那就是：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发生的原因，这些原因总是呈代数式演变，而事件结果却往往成倍地扩大。

因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和行为都是其民族心理的产物，所以想要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必须追溯到战争爆发前的历史事实，尤其是对现代德国的心理变化研究。

战争，从一定层面上讲也是人心理力量的斗争。各种势力都会在战场上

进行着无形的较量——信念与信念、个人自由与集体约束、个人主导权对国家专政、国际条约与霸权主义、人道主义与武力精神……一直以来，武力至上这一老掉牙的理念在德国历史上占据着绝对地位。欧洲人挣扎了两千年想要替换这一理念，依然以失败告终。日耳曼人武力至上的理论取得成功使世界回到最暗无天日的时代——弱肉强食化身正义，弱者被无尽地欺凌，无用者被无情地抛弃，各个国家互相掠夺、征战。无辜百姓被肆意屠杀。但是，经过许多年时光的洗礼，人们渐渐忘了那段令人发指的年代，人们甚至开始相信，原始年代的野蛮习俗已经被现代文明一劳永逸地摧毁了。但是，这只能是一种幻觉，因为十几个世纪之后，人类依然有着其祖先们奴役世界的熊熊野心。

在德国，武力至上的思想以宗教的形式被德国人民所理解并推崇，正如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时期一样，日耳曼民族也产生了一种病态的集体幻觉，在他们看来，他们是一种更高等的种族，神的意志让他们征服世界并且改造世界。

一个民族膜拜的神明不仅体现了其物质需求和幻想，也会透露出他们仇恨和嫉妒的心理阴暗的一面。所以也就不难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意志精神，这些神秘主义势力曾在历史上占据着突出地位。为了使这一势力取得胜利，数百万人民生灵涂炭，人类文明毁于一旦，在这样大的代价下，最终出现了日不落帝国。

现代战争和古代宗教战争也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同样让人类产生幻觉，同样有矛盾产生，同样凶狠残忍。战争中没有任何理性。假如战争双方的统治者都有理性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战争发生。

任何以理性和逻辑来解释连锁的历史事件的行为都是徒劳无功的，就像人们尝试用纯粹的理性角度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一无所获一样。其起源和发展都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最理性、最睿智的人也不可能预见的。

那么，你可能会疑问，战争可以为我们提供哪些研究数据呢？

第一，我们可以了解到，德皇威廉二世作为一国国君二十多年来一直为

了其帝国的繁荣，而极力地维护和平，却突然放弃自己一直所坚持的东西，被卷入一场令其厌恶的战争中；第二，一个商贸与制造业飞速发展的国家，不仅不反对反而欣然参与到这个对其带来长久损害的血腥战争中；第三，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这场战争中，来自文明国度的“文明人”破坏了在先前战争中幸免于难的城市、教堂、艺术馆等人类文明——这么多的不可思议。试问，哪位预言家可以预见？

在这场不可预知的战争中，人们不禁疑问：是什么让德国人迸发出了如此强烈的狂暴情感，甚至连德国最权威的学者们也有此疑惑。因为这种心理已经远远地超越了理性，它像一场狂风暴雨一样席卷了整个国度。

与此同时，法国的许多行为也让人不可思议，这样一个随性、充满浪漫主义的国家，连续数月面临迫害和死亡威胁后，竟然变得果敢和顽强起来。除此之外，在这场战争中一些小的国家在战争中做出的牺牲也因此为历史所铭记。如比利时，在这场战争中，比利时的人民惨遭杀戮，城市被严重破坏。但它并未妥协，认输投降，而是毫不犹豫地挺起自身并不强壮的身躯捍卫其国家荣耀。所有的国家都未曾料想这样弱小的一个国家竟会如此顽强抵抗。

上面所说的种种事件，没有可以用理性来衡量其发生的可能性，因为任何一方的动机都是非理性的，那么，我们应该从何处研究这些事件的源头呢？

如果学者们仅仅在理性的逻辑下展开研究，会想当然地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理性的，一旦事物出现了非理性的状况时，他们就会十分沮丧，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理性和智力可以引导科学家开展研究、哲学家展开思考外，那些与智力无关的情感的、神秘主义、集体意识同样可以。这些因素都有着与理性主义大相径庭的逻辑。前者只能称得上是科学的基石，但绝不会成为历史的基石。后者并不能被人们轻易想到，因为它不属于正常人的逻辑。它们一直被埋藏在人们意识中的边缘地带。直到现在才刚刚被人们纳入研究领域。只是这些因素的作用力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所以学者们仍死搬硬套地将理性逻辑用来研究事件发生的原因，所以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未被揭开，

反而又被加入了许多虚构成分。

目前来说，尽管这些思想很重要，但由于是全新的课题，因此，在接下来我遇到这些问题时，我会通过结合具体事实来说明其作用。例如，在一项重大的历史事件——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在那场悲剧中，在革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想来推崇理性，但是，理性在革命年代发挥的作用要比任何时代都小。因为许多革命者的言行都与其自身想法相互矛盾。在这场闹剧中，革命者的神秘力量并不来自于他们所极力推崇的理性，而完全来自于其他方面。只有借助现代科学才能查明这些力量的本质。

与大革命时期一样，目前这场战争中所体现出的心理学问题同样复杂，假如我们找到了正确的规律，那么我们将可以解决现在所有国家错误观念的来源，也能解决许多正常人看来无法理解的事情——战争的起源、战争中的暴行、战争的结果等。

正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开启了新的时代，我们的生活习惯、情感、思想都开始发生巨变，就像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或许我们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人类的思想和准则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贵族政治，各国正在向着没有任何光明的未来走去。以前的政治与道德理念也有所颠覆，以前所有的理论学说也在逐渐消失——未来变得虚无缥缈，心理力量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演说家和作家们的幻想在事实面前都变得无力，在枪炮声中，一切言语的争辩都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虽然如此，法国必然能从战争的悲剧中获得重生，并且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因为，法国人民已经用他们在卫国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品质向我们证明，以往我们对法国的认识并不正确，法国不可能成为无政府的国家，法国年青一代所表现出的无畏与勇气是对我们极大的安慰。这些年轻人将在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年代书写他们宏伟壮丽的传奇故事。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如此巨大的变革和进步，和他们相比，荷马、查理曼时期的武士、术士们的功绩都显得黯然失色。

人们并没有预见到，像法国这样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那些来自完全不同阶级的人们能够达成完全一致的品性，他们放弃了自己在农田、作坊、政府、学校甚至王宫中宁静安逸的生活，迅速响应号召，投身于这场重大与非凡的冒险行动中，这些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真实地发生了。法国曾经认为这些人会对其造成威胁，在此时却拯救了这个国家。这在他们看来是先辈精神的复苏，虽然这种精神曾一度消失，但却从未消亡。在托比亚克、布汶等地，一旦听到祖国母亲的召唤，先辈的精神就会在这些英雄的后裔体内复活，从而投入到残酷的战争中去，并且还会发出英雄般的豪言壮语，豪情壮志，在历史中永垂不朽。“站起来再死！”——一个士兵在被敌军围困在壕沟时，对一个被敌人的机关枪炮火压制得站不起身的战友喊道。相同的情景若发生在古希腊，这将是一件被广泛流传的英雄事迹，这个士兵也将会被授予桂冠。

对一个认为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仅是行尸走肉地存在的人而言，如果能够为了一项崇高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因为衡量生命的价值并不是苟延残喘生存的天数，而是他的成就，那些为了祖国领土安全的捍卫者们，正在用他们的行动创造一个全新的法兰西王国，他们的肉体虽然死去，但却获得了永生，在万圣殿里接受着后人的供奉和膜拜，令后世赞扬，他们将永垂不朽。

序言：战争的两条战线

1915年秋天，古斯塔夫·勒庞完成了《战争心理学》一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经波及法国，法国人民也渐渐对战争特有的负担、节奏与艰辛习以为常。不管是平民还是士兵，都屈服于斯多葛主义那种屈从现实与放任自流的状态：有时候对迎接胜利怀揣希望，有时候眼看战争苦难继续。虽然法国人民对下一轮“大推进”将要带来的胜利与和平满怀期盼，不过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当年秋天，局势很是清晰——至少还有一个冬天才能摆脱战争。9月下旬，在香槟战区，法国又发起一轮新的攻势。然而，同阿图瓦与弗兰德斯的春季攻势一样，西线的僵局并未因此而打破，没有办法实现年内结束战争的企盼。虽然这样，法国人民的信念并未因香槟攻势失利的苦涩和失落而动摇。他们坚信：法国将不计代价夺取最终的胜利，并继续为之战斗！奋战到底的士兵们、出于道德义务为祖国奉献力量的平民们、为担当起引领全民的特殊使命的知识精英与道德权威们，都在寻找关于法国参战的合理解释。正是基于以上背景，勒庞撰写了《战争心理学》。

在刚开战的前几个月里，法国的作家学者们纷纷参与笔者称之为“知识运动”的宣传活动，进行公共演讲并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言论。他们在国际舆论战场上，和德国人展开激烈的交锋，反驳德国人自称对战争并无责任的言论；在对内及对中立国的宣传里，他们都详细地论述了法国必须战斗的原因以及会继续战斗，直到最终胜利的到来。

法国人在进行上述活动时，发现了两个问题，同时也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德国学者们为什么在开战头几周内表现奇怪：93名最杰

出的德国学者，为什么公然违抗众所周知的现实，抛出一份颠倒黑白的宣言？这分明与他们客观公正的学术作风大相径庭。在这份臭名昭著的《93 宣言》中，德国学者们全盘否认了德国一切罪行：蓄意挑起战争、侵犯比利时中立地位、残害无辜平民、违反国际法、故意无视既定公约等。这彻头彻尾的谎言激怒了法国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决心列出所有罪证，让一切针对德国的指控都变得不容辩驳。

因为《93 宣言》的出现让法国知识界开始考虑：这些世界知名的德国学者为何背弃学术声名抛弃真理，竟然开始捍卫谎言？同时，第二个问题继而被法国人发现：又如何解释法国在香槟攻势失败后处在空前的不利地位，反而体现出坚忍不拔的意志与非凡的决心？问题一让人心生疑惑，问题二却让人心生敬畏。在战争动员下，德国学者发表《93 宣言》的行为让人唾弃；面对战争，法军表现令人意外，但两者都令人深思。

古斯塔夫·勒庞的《战争心理学》，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同时，这些回答都是根据过去他已有著作中阐述的原则进行的。现在看来，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加入本就议论纷纷的公共讨论中，而是利用心理学规律更充分有力地解释德国学界为何这样癫狂、法国人为何这样充满斗志以期改变原来讨论的性质。勒庞坚信，只有通过心理学的研究才能解释集体行为的原因，所以否定了现存的一切解释，并认定它们是不准确的，并不具有说服力，同时没能认识到在政治家、知名学者和普通士兵的集体行为中，“那种感性、神秘、共同的力量”所扮演的角色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为弥补上述提及的不足，《战争心理学》在书中引入了心理学原理，同时也让勒庞本身的学术地位更加根深蒂固——某种程度上，当时的勒庞是被边缘化了。在1914 年以前，一直是笛卡尔主义与新康德理性主义学派占据学术界主导地位。勒庞一直试图在他的作品中表示集体行为是非理性（却是真实的）力量的产物这一观点，然而这与当时统领法国学术与教育界、并限制勒庞学术成就的理性主义思维是不相符合的。一名学者若要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成就学术名誉，

要么是通过在巴黎大学获取教职的方式，要么是获准加入法兰西学院的五个学院之一。勒庞在这两条前进道路上持续地受到阻碍。不管是在巴黎大学或是巴黎任何一所与之相当的教育机构，他都没能获得教职，也没能被选入法兰西科学院。逐渐地，出于对这种被学术界放逐与边缘化的处境的厌恶，他不得不加入法国知识界的大讨论中。所以，由此看来，《战争心理学》的出版，不但是针对国外的敌对势力，而且是反驳国内知识界的主导思想与个别人士。

粗略看来，《战争心理学》一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很多法国学者们写作出版的相关内容并无太多不同。本书中，勒庞经常不留情面地直接称德国人为禽兽，或许相较于同类作品流露出的反德倾向更加明显，不过也不算过于突出。实际上，当时法国学界的流行趋势就是反德，在勒庞的书中只不过形式更加多样化，抨击德国人的论据也更加繁多。在此书中，勒庞肯定了德国应该肩负起战争爆发的责任，对德国的战争暴行加以谴责，也对德国学者软弱且毫无原则的态度进行了批评，同时，对德国人服从政府权威时体现出的奴性和在欺凌弱小时暴露出的残暴加以深刻地刻画，这和当时很多同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作家的做法是相同的。勒庞还谈到，利用大学、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爱国社团，普鲁士加速了德国军事化进程。在法国人著作中普遍提出的一点，普鲁士王国寻求在德国全境和欧洲大陆占据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根本原因。

另外，勒庞还在书中提出了另一些看法：1914 年之前，德国的科学家们备受全世界尊重，但实际大多是派生与模仿的产物；尽管德国的教育那么严谨苛刻，但缺少自省是其一大弊端。勒庞相信这是德国更注重小节而缺乏全局观造成的。同时，是“组织性”帮助了德国在全球工业和技术制造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而不是聪明才智——在现代世界中，这一点很有用，毕竟是现代德国大量成功的原因，但是也不值得太过赞扬。

所以，虽然《战争心理学》一书中很多观点看似和法国其他学者相同，但是过程分析却很是不同。在一些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上，本书对其提出

质疑，而不仅仅是点头附和。假如读者细心的话，就能在书中看出勒庞认为1914年德国发起的战争并不是有意为之，同样，他不相信是理性计算让德国引发了战争，对德国哲学催生了泛德主义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这一观点亦不赞同。当然，同很多法国评论家相同，他从很多中立信息中搜寻证据来证明德国确实对比利时和法国平民犯下暴行。勒庞还敦促读者考虑到“心理传染”在当时的恶性影响来解释德国知识分子们的集体谎言。

很多法国学者在战争刚开始那几年都相信德国宣战的原因是其坚信自己有统治欧洲的权力。在领土扩张主义和自负情绪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德国最终不断推进前线并压迫邻国。德国在1914年的巴尔干冲突问题转化为世界大战的原因解释上，很多学者倾向于强调泛德主义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影响，像加布里埃尔·阿诺托（GabrielHanotaux）、列维·布吕尔（LucienLevy-Bruhl）和夏尔·安德勒（CharlesEndler）等法国学者。

在很多学者看来，德国的侵略性并不是近期的历史导致的，而是至少来源于一个世纪前的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哲学传统。显然，将战争归罪于泛德主义者及其政治盟友的投机主义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泛德主义的渊源根本不能深究这种解释。拉维斯（ErnestLavisse）、布特鲁（EmileBoutroux）和许多其他法国学者认为，泛德主义的创始人是费希特和黑格尔，而德国的侵略应该由泛德主义负责，所以，1914年爆发的战争应该由费希特和黑格尔负责，其哲学传统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

在勒庞看来，以上观点既不具备说服力，也没有充分理由。虽然德国应对战争负责，这一观点他是认同的，但他不认为1914年8月时德国的本意是希望战争爆发的。他承认，曾经他也因为爱国主义冲动，“和法国多数人一样认为德国在找借口向我们开战”，但是他因为现有证据的存在而予以重新检视：当他再度认真研究这些资料时，“突然灵光一现，得出以下结论：虽然德国无法避免地导致战争，但是战争真正爆发时却并不希望如此”。尽管勒庞知道明白这一点的人是少数，但是仍然毫不犹豫地指出：索邦大学的

教授们关于德国有意挑起战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当然，他自己也曾说过：“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是法国唯一持此观点的，直到最近我看了巴希（Victorbosch）的作品，才得知他也持同样观点。”

我们要相信德国的行为完全出于理性计算，才能相信德国是利用了1914年危机并故意挑起世界大战这一观点。在勒庞看来，此种观点是“现代最具灾难性的错误之一”。实际上，德国如果是理性的，就会选择和邻国和睦相处。因为在权衡利弊后，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要想更好地服务于德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此种方法才最靠谱。所以，参战的决定不是出于理性思考的，我们可以看到，战争让德国失去了之前市场的同时还让先前习惯其存在的民族开始反抗。勒庞看来，也许德国会出于理性考虑而停止战争，所以结论是这样的：德国的动机完全不是索邦大学的学者们所认为的，出于深思熟虑的理性考虑。

另外，德国的侵略根本源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勒庞也对此存疑。在看完如《战争心理学》一书后，读者便会发现勒庞曾在里面提到：在从黑格尔开始的德国传统哲学中确实有证据能证明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主义正当性的存在，但是勒庞经过一番分析后发现，他并不能认同哲学（无论是黑格尔的还是他人的）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是德国侵略精神的症状，而非根源。德国哲学家们在对军事力量的推崇中，也只是在学术上将已经确立的军国主义倾向正当化、合理化。勒庞是这么说的：“这些理论构建理性基础的任务已经由哲学家们开始承担，因为历史告诉过我们这些理论是非常有用的。”在提到黑格尔和尼采时，他承认是他们“激起了国人最不切实际的期许，特别是那种征服、屠杀和掠夺的天性”，然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如果不能支配这些天性，就只好予以赞美”。勒庞的观点是，思想并不产生行为，与此相反，行为来自“天性”，然后促进思想的发展。也许在德国军国主义的出现中，哲学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不是优先的和主要的因素。

若狂妄哲学和理性计算都不能够引发德国1914年的侵略行为，合理的解

释又在哪里？其中勒庞的想法是：战争并不是“任何一国刻意计算的结果——甚至不是德国，而是人类激情与情感超越理性计算的力量体现”，那些心理学理论，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先前著作中提到的那些理论，足以解释战争的起因和特征。尤其是他援用了集体行为的三大基本准则：非理性和集体冲动强于理性和个人冲动；人的行为更容易受到情绪推动，而并不是按照理性计算；神秘主义的信仰比理性主义的思想更为强大。的确，“神秘主义和理性……各自属于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这是因为神秘主义信仰是由于暗示或心理传染，却从来不是来自推理”。因此，想要解释国家在战争时期的行为，要是单单依靠理性，就会误解人们动机的本质。勒庞的思维更倾向于在“集体的、情感的和神秘主义的力量”中找到将欧洲拖入战争的解释和说法。

勒庞非常沉重、痛恨地指出情感因素对每一参战的国家都构成了一定的影响，因为他意识到了所有的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并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一些国家是由于职责、荣誉或者是骄傲，另一些则是由于种族、仇恨和过剩野心。例如，英国人民奋起反抗保卫比利时出于道德义务，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法国则是认为有必要捍卫受到侵害的东欧盟国和国际条约。与之相反，德、奥两国并不是出于如此高尚的情感因素，德国是出于对自身命运的非理性信仰，而奥地利则是出于对塞尔维亚的刻骨铭心的仇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任何国家的权衡之中理性均不占据任何地位。

引起七月冲突从而转变为欧洲战争的并不是理性，而是各国在心理上的短视。在一系列的外交交锋中，每个国家都暴露出心理洞察力不足的缺点。举一个例子，奥地利和德国没能看到将驱使俄国保卫塞尔维亚的心理因素，所以即使参战也完全相悖于俄国的最根本利益。德、奥还错误地断定英国将对比利时中立地位的破坏不闻不问，但是英国做出的一系列的反应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出于荣誉。勒庞认为，德国最糟糕的判断就是没能预见到英国全民对尊严的重视和对荣誉的在乎。

勒庞认为，最终将欧洲拖入战争的是德国对自身“上帝所赋予的优越性”

的神秘主义信仰，他将其特征定义为“热爱超自然力、热爱神秘、蔑视经验、相信上天的力量作用于世俗现象”。尽管心理误判和情感力量使各国的行为完全脱离、甚至违背了理性。但他认为：“导致德国最终发起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神秘主义。”德国的神秘主义已经有一些确立的内容：德国人经过上帝的精心挑选，注定以后将要统治整个欧洲。在19世纪时受到历史学家特赖奇克（Treitschke）和兰普希特（Lamprecht）的推崇，这一套信仰似乎已经得到证实——在德国工业的军事扩张和惊人发展。德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也鼓励人民群众相信上帝选了德国统治整个欧洲，因此德国人愿意忽视所有理性的个人利益，并且全力追求履行天赋使命的机会，就如同受到催眠一样。

在当代德国神秘主义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无论学术领袖还是政治家都不能免受影响。在勒庞看来，这明显体现在起草《93宣言》的那些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行为中。勒庞与许多法国学者一样，非常愤恨于这些德国学者狂热地、一致地不顾事实为德国的暴行找借口的错误行径。那些在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哲学理论中找到德国侵略原因的法国学者还认为，德国沙文主义的文化传统也解释了德国学者为何能够快速集结起来捍卫祖国。这种文化传统更强调服从而不是学术独立，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需要之上，并正当化一切不合法、不道德、不名誉的事物，最终导致《93宣言》的出台。勒庞却直接否认了上述观点，并基于心理原则给出解释。他承认宣言的签署者“在某些情况下深负名望”，但也毫不犹豫地指出这些人“展现出最奇怪的推理缺陷与对他国心理的全然无知”。勒庞如此解释《93宣言》现象：“德国人（关于战争起因）的看法反映出，基于暗示和心理传染的信仰丝毫不受论证的影响……即使是最高智力都不能阻止一个人成为这种信仰的奴隶。”勒庞在《93宣言》中证实了他很早以前即在书中指出“当置身于集体影响中，即使是最睿智的人都会失去一切判断力”，如果不是这样，又该如何理解为何那么多颇有成就的学者能够全然不顾事实，抛弃一切独立判断力，力争德军并未犯下任何暴行呢？

关于德军暴行的争论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也在激烈进行。布莱斯委员在英国议会用耸人听闻的细节报告了德军的罪行，这些故事过程如此可怕，甚至导致一部分读者认为其是否真实可信。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通过重新研究这些事实，终于找出一切原因和证据，来探寻德国评论家们为何承认针对平民的行为并非“暴行”。约翰·霍恩等人得到了证明，关于针对德军的许多指控都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同时德国对此的否认也并不是没有任何根据和理由的。德军的士兵们因为真心相信平民大多不是无辜的旁观者，所以他们一致认为对平民的行为正当。平民往往是游击队或士兵伪装而成的，这是普法战争的经验教训告诉他们的。所以，在 1914 年 8 月行军经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时，德军并非因为他们是残暴的野兽才杀死了许多乡村牧师和村民的，而是认为这些平民对他们的生命构成威胁。

上面的这些分析是基于战争期间备受关注的一些材料：从被俘或阵亡的德军士兵处收集的日记和战地手记。法国学者们因为受到《93 宣言》的刺激为质疑德国人对种种事实的否认而成立了一个战争资料研究委员会，并极力证明：那些在法国、英国、比利时流传的关于德军暴行的故事虽然可怕，但却是真实的。这一问题，有两本宣传册。第一本题为《德国的战争理论与实践》发表于 1915 年，其中关于德军暴行的这些资料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或许清楚这些证据不够中立，在之后又发表了事实证据来自德国方面，主要是 1914 年 9 月间被俘或阵亡的德军士兵日记的宣传册《德国人之暴行》。德军确实焚烧了村落、屠杀了平民、处决了战俘并残酷对待妇女儿童是这些自证其罪的材料所反映的。德国学者对于这些证据坚称德军未犯任何暴行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因为“德方很难否认自己士兵所述事实”，勒庞从德军士兵的日记中引用了一些事例，关于德军暴行的材料很多都来自以上手册，以直接反驳德方对此的否认。就此而言，勒庞希望基于非本土的资料来源建立论据的可信度

和公正性研究方法与许多其他法国评论家一样。在整本书中，勒庞便以彰显法国学术态度的客观和公正，将很大论述重点都放在与法国毫无关联也不具偏袒性的资料来源上。此外，关于德军行为是否暴行的争论他也希望基于以往作品中提出的心理学规律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畸变，此次争论正好给他提供了这一机会。

勒庞引用其有关民族性格是内在与不变的理论，来说明德军为何如此轻视关于士兵行为准则的既有规定。他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提出国民性格是“构成种族天性的无意识因素”的产物。与许多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也相信在同一国家中成长的所有个人，在某些方面基本相似，是由于负载了同样的历史，受到同样理念的激励。尽管任何国家中，“种族天性”不能被完全忽视：“即便在智力和学识上最不相同的人也拥有非常相似的天性、激情和感觉。”尽管个人可能由于教育与成长方式不同、家庭影响不同而彼此大不相同。

勒庞认为种族“纯洁性”不过是荒谬的虚构概念，这个关于“种族特征”的概念与20世纪其他种族主义者不同。虽然如此，他坚称人的个性具有“相当固定的心理内核”，也是由若干遗传而来的核心因素组合而成的。以德国人为例，虐待、残忍、蔑视文明的行为深深地根植于其集体心理之中。勒庞认为，德国仅仅是因为德国人未能完全驯服自身原始的、残忍的天性，所以在对比利时的入侵“在各个方面都与公元头几个世纪中的事件相似”，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认为文明的进步能够通过开发我们的智力来转变我们的情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此类事情从未发生过。社会约束，这仅仅是伪装并不能隐藏一些民族的野蛮本性，这些本性会随着约束的小事而重现。”勒庞否定了多数学者的乐观倡议：德法将在战后出于对国际准则的共同尊重而建立持久、和平的关系。因为他坚信德国人永远都是“法兰西民族与法国文明不共戴天的敌人”。

***

除了对以上德军暴行与德国学者的谬论感到震惊之外，让人更加惊讶于

法国士兵们所表现出的刚毅与勇气。法国知识界嘲笑过去法军反对共和的倾向，经历过 1871 年惨败之后的阴影，害怕法国会因为自负而堕落，如今却为全民面对战争爆发所显现的决心而震惊。倾向于从宗教角度寻找原因的评论家们认为，自 1914 年 8 月起，一场“奇迹”已经改变了法国。但是所有人都一致同意，在面对战争挑战时，法国士兵们展现出一种在和平年代从未出现的精神活力。

法国的社会评论家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最后几个年头中，常用出生率下降，或离婚率上升等事例来证明法国确实正在走向衰落，哀叹现代社会的道德腐败并以此来鼓励生育者们，他们纷纷哀叹：已婚夫妇为了舒适生活而选择不要孩子，以便在蓬勃发展的消费社会中满足种种私欲。他们忽视了国家需要，因为一国只有当人口持续增长时，才能承担自我防卫的职能。还有许多评论家认为，法国公民也对彼此之间的责任与义务漠不关心。爱德华•毕瑞森（EdwardBerenson）指出，在战争爆发之前几年中，不断攀升的离婚率被视为当代法国道德败坏、不负责任、社会腐朽的一大症状，从而成了引起全国警觉的话题。

关于法国的道德败坏问题，勒庞本人是非常关心的。虽然鼓励生育者们关于“国家实力完全基于人口出生率”的这一主张他并不赞同，但是和很多保守派评论家相同，他也认为法国国力即将衰弱。1895 年，他曾写道：“我们无望地看到，当今这代人所受教育的结果——大量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们由学校培养出，未来法国衰落的道路已经铺就。”然而，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抛弃奢华与安逸的生活，投身于危险和贫困之中，像古代最威武的勇士一般奋勇战斗”又该怎么解释呢？

就这问题而言，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勒庞给予了解释。在受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个人主义教育的一代人为什么能够抛弃自我放纵和物质享受，积极响应号召参战？就此，他引用了《乌合之众》中阐述过的三大原理：环境决定论、心理感染和集体的遗传（或种族）特性。

20年前，此书还未开始写的时候，勒庞就已经说过："各种潜在性格构成了心理，因为环境的突然变化这些因素会得以显现。"人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战争时期，这条规律变得特别突出——当时的新环境，让国民先前潜伏的性格特点浮现而出。在勒庞看来，"一场漫长的战争有能力改变我们精神生活的平衡"，所以，结论是这样的：在战争中，一个个体的性格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其可能做出使身边人甚至本人都感到震惊的举动"。既然个人会因为环境因素而变化，同理，国家也是。法国在1914年的表现显然符合这一论点：抛弃了反教权政治、国际主义的倾向以及自我放纵的习惯，竟然拥抱政治信仰、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很是可怕，但似乎也证明了勒庞的结论：稳定不变的人格仅仅源于稳定不变的环境……在不同环境的压力下，每个人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潜在性格特征都会以不同方式表现。

仅凭环境因素这一点，还不能对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心理转型有个合理解释。同样重要的还有"心理感染"因素。在勒庞看来，心理感染是"个人依照周围众人的意志行事"，同时，他认为这也是士兵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仅靠心理感染这一点，强大的集体凝聚力就此产生，这是军事行动的必备要素。不管是兵营中、训练场，还是前线战壕里，"集体精神"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士兵们，演变成"根据集体而不是个人的意志去感觉、思考和形成观点"。

这一说法本身也体现出，"心理感染"有时也可能是消极的。也曾经让德国的知识分子界误入歧途从而严重误导德国士兵们。同样的，法国军队也深受其影响。从前线的信息来源中，勒庞也找到了相应证据，确认心理感染因素也影响了法国士兵们的勇气。虽然这样，但是勒庞认为：士兵们在心理感染与天赋秉性结合时能够发扬出前所未有的英雄主义精神。

虽然出于保守与审慎的态度，勒庞对群体因"极易过度反应"而感到不安，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黑暗危险的力量可能为其所有，但是也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和最崇高的美德存在于其中。实际上，他们"甚至可能比孤

立的个人更倾向于展现这些美德”。在得到恰当引导和足够的激励下，“克制、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等精神可以由此展现。所以，在有关群体的分析上，勒庞相信，群体能影响个人甚至改造其性格——而且这改造也是正面的。集体中的个人极有可能受光荣、名誉和爱国主义等情感追求所影响，甚至足以驱使他为之奉献生命……强大的无私奉献精神常常由集体主义本身激发。数百万人在 1914 年离开家庭和日常生活，成为法国军队这庞大集体的成员的事实就能充分地证实这一论点。

在勒庞看来，“战争和革命”这一不稳定的历史作用力会取消那些在世界和平和国家稳定时期约束个人的“禁令”。德军最原始的野蛮天性从这些禁令释放出来，开始肆意放任。如果是战争的缘故，让德军士兵从社会禁令中解放，那么法国和英国士兵为什么没有产生相同结果呢？勒庞在解释法国士兵没有成为一个危险的群体却成就了一个英雄的群体时，又一次引用民族性格理论。由于不同国家的公民都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套不同的核心信仰，所以相同刺激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士兵倾向于恐吓平民，而法国与英国士兵则不太采取这种行为的原因了。英法士兵“受到了社会约束的长期影响，以至于他们的感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稳定”，这与德国是有所不同的。勒庞估计，要使野蛮天性被成功遏制，需要经过社会长达几个世纪的对自我约束的培育。

也许英国读者会对这一解释感到满意，但是对于法国而言呢？具有革命与起义狂暴历史的法国，在公民中培育出所谓的“社会稳定性”是基本不可能的事情——这被勒庞视作文明行为的必要前提。我们从最近的历史中可以看出，法国都不具备内部稳定性和自律性。实际上，在 1914 年的时候不会有国家比法国的历史更为动荡和缺少约束力。勒庞也研究过 1789 年的大革命，了解到本民族倾向于绕开社会约束并放纵追求“原始的野蛮”。他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用环境决定论解释了国民议会（1792—1995）的野蛮属性：解释了在国民议会中由于革命带来的“环境突变”导致最野蛮的成员中竟有原

本非常温和的人——在普通情况下，他们是平和、高尚的公证员或法官。他也在《战争心理学》一书中指出革命主义的其他方式：由非理性、神秘主义和暴力激发的泛德主义激进表现。理性不是产生革命追求的原因，而是由那些“与智力毫无关系的情感的、神秘主义的、集体的力量”所塑造。在勒庞看来，虽然“这场悲剧（法国大革命）的主角总在试图寻求理性”，然而“操纵着演员的秘密力量却来自于理性主义之外的其他源头。”

法、德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很多相似的地方。1914 年，德军总参谋部在发动战争时，运用了 100 多年前拿破仑在 1796 年进攻意大利时运用过的战术，首先下令军队调离近期攻占的地区。除此之外，两国还有别的相似之处，勒庞在承认它们的基础上还予以强调。在他看来，士兵个人对平民的行为不是德国暴行，德国的暴行在于“之前便确定的作战手段的结果……是基于恐怖”。如果在一个法国人面前提及“恐怖”一词，会不可避免地联想到罗伯斯庇尔、雅各宾主义和种种 1793—1794 年间的惨剧。勒庞非常清楚这一点，因为他是这么定义“恐怖”一词的：为君主和革命者所使用的技术手段——目的是震慑敌人并令其迅速投降。

所以，勒庞在运用国民性格理论解释法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时，便无可避免地产生内部逻辑矛盾。因为其论证的核心有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他一方面认为德国人和法国人同样容易受到心理感染和环境变化的影响，对战争爆发做出不同反应的原因是继承了截然不同的集体性格造成的——德国人嗜血、残忍、放纵，而法国人爱国、自制、稳定。但是，他也承认，1793—1794 年期间，法国也出现了和 1914 年德军犯下的相同的恐怖行径。

另外，虽然勒庞一直在强调德国和法国是截然不同的，德国总是不理智地渴望占据统治地位，法国却代表着文明与秩序。虽然这样，他还是用事例证明法国军队的先辈们曾和德军一样，暴力、嗜血并缺乏理智。综上所述，法国人在 1914 年表现出的荣誉感、勇气和正派还是不能用勒庞的集体行为理论来解释。

所以，读者会在《战争心理学》中发现，1914年的德国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法国被勒庞拿来做了隐晦的对比。勒庞并不是唯一用了此种方法的人，许多学者都在战争期间采用了相似方法。这些各种各样的形式到底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呢？尽管勒庞对保皇派的反革命倾向持中立态度，但是共和派的政治理念却留下了许多恶果。他担心，一旦战后开始流行“民主社会主义”，法国必定灭亡：“像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海牙公约和其他一切可能改变国际关系的理念，这些大而化之的广义概念，从未起到过任何影响。”虽然他对于宣称理念都已“永久破产”时非常自信，但对共和派知名学者们希望在战后将其恢复这一事实也极其了解。阿方斯·奥拉德（AlphonseAulard）和维克多·巴希（Victorbosch）在1915年基于康德哲学上提出，战后的法、德两国能够达成和解，同时建立长久的和平。而在勒庞看来，康德基于国际合作的永久和平论不过是无稽之谈，于是将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划向了德方阵营。所以，当他将雅各宾派和德国知识分子看作一丘之貉时，他是隐晦地把将自己视作革命后代的法国学者们同时诋毁。

虽然在这本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在帮助我们理解勒庞这一点上非常重要。乍看之下，似乎这本书仅仅概括了其他学者早已论述过的主题，然而，实际上它是在试图颠覆而不是附和当时所谓的“正统”看法。不仅是对法国众多权威学者们提出质疑，勒庞更是指出他们的政治原则与某些讨厌的德国做法非常雷同。他还批评那些更为保守的人：这些人的爱国主义，致使其失去了学术上的进取心。所以，勒庞的朋友们拒绝在战后帮助其入选法兰西学院的任一委员会也不足为奇。虽然《战争心理学》一书中的观点为其赢得了一些追随者，但是他的对手也因其中含蓄的指责而反增不减。勒庞并未在20世纪初统领法国学术文化的理性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潮的战斗中赢得胜利。

玛莎·汉娜（MarthaHanna）

目 录
Contents

卷一当前必须研究的心理学原理

卷二现代德国的发展历程

卷三引发战争的起因

卷四关于战争的近因

卷五战争方面的心理因素

卷六德国在作战时用到的心理战术

卷七未知变量对战争的影响

卷一

当前必须研究的心理学原理

战争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其发生不因任何人的主观臆断决定，而是来自各种客观、深远的因素，这些因素一直在悄无声息地积累着，直到某天突然爆发。在这里面存在着一个规律，那就是：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发生的原因，这些原因总是呈代数式演变，而事件结果却往往成倍地扩大。

第一章情感的、集体的、神秘主义的力量在国家生命中所发挥的作用

1. 生命周期

假使我们只从表面上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只看到各个国家的军队和武器是多么的先进，一部分人可能会认为，从正常的思维逻辑也解释得通，如果我们仅仅从战争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结论倒也没错。但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一个隐藏起来的事实：战争双方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意识还受到了更为高级的思想的影响。

无可厚非，在战争中武器确实影响着结果，但真正起决定因素的却是心理因素。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正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有心理素质超高的人才能够承受战场上那样残忍的画面。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一件战争武器的背后，都有着幕后的操纵者，这才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幕后操纵者的本质，我打算简要地陈述下之前提到过的心理学原理。（作者写过《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群体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真理的生命》《人类进化心理学法则》等——这些书的合集被称为“时代格言”，涵盖了作者提过的所有心理学原理。）

我们还没有看到隐藏在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所以很难解释清楚。但是事件仍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一切作用力包括生理、心理都独立地发生着作用，这种作用还符合一种正常思维的特殊形式——所有的现象都有连续性。

生理逻辑调控有机生命的周期和维持生命的必要欲望，心理逻辑影响人的主观意识，神秘主义逻辑给人以神秘宗教思想，集体逻辑改变社会风气与道德走向，智力逻辑则影响人们在科学领域的不断探索。所以，每一种逻辑都有自己的作用对象，以上所说的逻辑都只有通过相互掺杂才能合理地解释事物发展的本质。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再寻找合理的解释办法。

所有生命的根源都有自己的有机周期，这一点对于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的细胞都适用，所以我们的活动方式也有着相似之处。尤其是在悲与喜——所有两大极端的感情之下。

由于心理逻辑包含着许多感情及主观因素，所以上面所说的同一性不甚明显但是所有生物的情感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家畜也有着爱恨情仇、勇敢、胆小、付出等。

人和动物只有在理性的逻辑思维下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所以只有理性逻辑才能站在科学的肩膀上，其他逻辑都不甚明显。但是理性逻辑对个人与各民族之间的影响却并不适用。因为这种关系并不是理性所能解释的，它掺杂了太多的情感因素和神秘主义。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解释一个国家的看似不合理性逻辑的行为方式。

2. 心理力量与智力力量

性格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它受感情和心理因素的遗传与发展影响。尽管我们的理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万事万物，但是我们的行为更多地受性格的影响，正如“细节决定成败，性格决定未来”，智力是我们的思考方式，性格却决定着我们的行动。同样道理，国家也有着自己的性格，并且其形成和发展与理性毫无瓜葛。正如一位名人——马蒙将军所说的：“当理智统治性格时，人总是在改变观点、方案和行动路线，因为大智慧总在时时从不同视角审视问题。”

感情的发展独立于意识之外，所以没有人能够确定自己的性格，并使其

一如既往、永远不变。通过战争起源的不同观点可以知道：往往情感因素起着决定因素，连理性因素都变得不甚重要，这听起来很荒谬，但事实就是如此——理性和情感是两个独立的逻辑形式，它们并不相互影响，一种感情可以影响另一种感情，但却影响不了理性。

时至今日，哲学家们并未就感性和理性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得出确切的结论。在布特鲁看来，感性主导着法国人的逻辑，而德国则是受理性主导。我对此并不表示赞同，我认为这种以偏概全的结论并不正确，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都不可能逃出人的范畴。德国人也可能会受自己的感情影响。他们也同样会有着凡人都有的感情，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残忍和善良同样是一种感情，同属于人类的感情世界。

情感对历史产生这种大的影响，它从不同的角度赋予我们人的思想，并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意识，或者说是集体意识。这种意识都会受到情感、心理的影响。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看待同一个问题上可能会有差异，也就不难理解其间会发生种种矛盾，这些矛盾经过长久的积累，于是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冲突中，情感上的仇恨表现得更为强烈，就连理性也望尘莫及，更不用说其他的因素了。这正好验证了希波克拉底曾说过的一句话——Duobusdoloribussimulobortisvehementiorobscuraalterum（当两种痛苦同时产生时，其中相对更加剧烈的痛苦会令人忘却另一种痛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法国内部还存在着尖锐的政治斗争和宗教矛盾这些足够棘手的问题，当他们受到外界力量的威胁时，就毫不犹豫地放下了内部矛盾，枪口一致向外。英国也是一样，当时英格兰和爱尔兰正处于内战时期，但是受到来自德国的威胁后，所有的政党和人民就团结起来，共同捍卫祖国的尊严。就连俄国也是如此，受到外敌侵略时，俄国的革命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再次转变为对沙皇的忠诚。如此之多的现象足够说明在其背后都有着相同的心理学原理。尽管历史不容假设，但假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能够了解

到这种心理的存在，就不会认为英、法、俄的内部矛盾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上面我们所说的较强的情感可以抑制稍弱的情感，只适用于同一类别的情感。例如一种强烈的仇恨可以忽略较弱的，但却能允许另一种情感的存在，甚至因此变得更加强烈。例如，我们会因为德国侵略者的残暴行为而增加对其的仇恨程度，也会由于比利时抵抗侵略的顽强程度而更加同情它。当这两者遇到一起时，我们会同样加深这两种感情。

3. 集体力量

当一个人置身于人群中时，他的心理和独自一人是绝不相同的。因为群体和个人是两个层面的，两者不可能等同。正如细胞与个体的关系一样。

个人的思想可能会受理性的影响，但群体却不会，群体只会受到集体所特有的集体逻辑的主导，群体的智慧往往会不如个人的，但是情感可能会比个人强烈。因为处于群体中的个体虽然可能没有感恩之类的特定感情，但是却会有奉献主义、利他精神、英雄主义等个人所难以达到的感情，在群体中，普通个人的力量往往会得到加强，但优秀个体的力量却会削弱，就像是平均分配了一样。

群体的情感虽然得到了加强，但却会变得变化无常。甚至会发生极端互换，可能会由仇恨急速地转变为崇拜。所以说群体的感情更难以把握，因此常常只运用希望这一凝固剂。群体的情感往往还会受到神秘主义的侵袭，所以我们会常常看到神化领袖这一迂腐的手段。除此之外，心理感染也对集体起作用，因为集体的理性往往更弱的缘故，心理感染就有了可乘之机。

集体同样会有幻觉，一旦这种幻觉控制了集体，便会迅速地占据真理般的权威地位。我们也可以从当前战争中的许多事例看到这一原理所起到的作用。

集体观念虽然有着极大的力量，但只有极少数是自发的，因为群体是一个无形的有机体，它不能自发行动。只要有一位领袖出现，并且用尽办法，

如断言、声望、感染甚至是蛊惑的方法影响群体。当然这里的方法都归属于情感逻辑的范畴。但是，并不一定必须要高谈阔论、慷慨激昂才会起效。信仰和既有的感情也可能会在一些经过预热的环境中发生作用。当然，领袖或者其替代物往往会成为公众舆论的起始点。所以一个群体必须要一位领袖来创建和引导公共舆论，在民族冲突和战争中也是如此。

虽然如此，大多数的学者还是忽略了这一原理。列维·布吕尔（M. LevyBruhl）曾在其关于战争的起源一书中做出以下总结：

“在危机与冲突的历史剧中，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演员正是爱默生所称的‘代表人’——这些人是集体意志的独立体现，其言行代表了无名大众的意愿和激情所在。”

列维·布吕尔（M. LevyBruhl）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德国几乎所有历史学家的支持，并且还得到了法国学术圈的认同。这个观点是建立在一项事实之上的：可能会有那么一刻，群体地位会超过其领袖的地位，继而领袖被其自己所创立的群体赶下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果继续深究的话，不难发现，群体观念常常起源于个人的主观意识。

可以看出，这条原理不但在宗教发展的早期阶段适用，在重大的政治危机和世界大战面前也同样适用。

能够创造集体情感和普遍观念，并且能够予以维持，是统治艺术的前提。现如今，再不会出现一个强大到能够公开对抗公共舆论的独裁者。但问题是，公共舆论很容易受到不良势力的引导。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也曾认识到公共舆论的重要性和威胁，于是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笼络人心。德国直到现在都还能调动国民感情，从而引导公共舆论走向，使得德国的媒体、学者们纷纷响应国家意志，煽风点火，将寻常的冲突升级为国家间的战争，从而实现其自身目的。现在，不再单单是某一位君主或者团体间的事，而是上升到一个国家的高度。但是，政府只有将国民群体的好战情绪激发至最高点，完全凌驾于公民意识之上，才能熟练地操纵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

国家的议会院也同样有着群体的共同特征：易激怒、智力水平下降、人云亦云，盲目崇拜领袖等。但正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决定了一个大国的命运。通过众多的实例说明：这种议会的集体专制比起个人独裁，或某一团体专制又有着其自身的优势，因为议会要通过商讨才能决定某一法案是否通过，又因为其不愿承受更多的批评而回避了许多错误的决定。这一点俄国人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在多次遭受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后，他们创立了国家杜马，用来作为国家决策的最终机构。

在太平盛世，一个国内的各个群体可以轻易地被国家的优秀学术势力主导，但是在战争或革命时期却不可以。因为，在战争时期个体对群体的影响力变得非常强大，强大到可以将整个国家置于混乱之中，并会使国民的心理发生变化，出现一种新的心理思考方式。

4. 国民的心理

相比个人心理的短暂存在，种族心理是永恒存在的，并且不会顷刻间崩溃，国民心理——或者说是种族心理——并不是很快形成的，而是通过长期积累形成的。文明国家历史的形成是由其国民的心理塑造形成的。国民心理的发展使一个国家走向文明。

国民心理逐渐稳定后，就会与个人和群体的不稳定心理发生对抗，限制后者的情感波动，国民心理就是通过这种作用增强其国家实力的。

透过目前的战争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国民心理，可以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在重大历史事件上，思想与行动保持高度的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国人民在战争爆发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抛弃个人利益和安逸，并心甘情愿地为祖国做出牺牲，正是因为他们的种族心理远远高出了个人的心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战场上，生者之间的厮杀并不是最激烈的，而是取决于交战双方的祖先所遗留下来的民族心理。

接下来，我不再赘述种族心理的形成过程，尽管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得出

过许多荒谬的结论，但是如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是历史的产物，当多个种族——例如现在的普鲁士人——长期处于同样的生活环境中，有着同样的利益和威胁联系起来时，国家就会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除此之外，语言和宗教信仰也是联系一个国家的更为重要的纽带。

每一个种族都会在不同的生存阶段体现出特定的制度、道德准则、信仰等。相反，也必定会排斥一些其他事物，例如，一个国家绝不会直接接受另一种文明，而必须先将其同化。

这正好验证了我之前所说的观点：每个人都受着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个体心理，它主导了我们的日常行为方式；另一个是遗传心理，它主要作用于重大的事件上，尤其是涉及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因为每个人都有着自私心理，所以个体的心理往往会表现出自私的一面。但遗传心理则是关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利益，所以它也会自然而然地指引个人为集体做出牺牲。

5. 神秘力量

在宗教和哲学中，“神秘主义”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义。这个词会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使用者而表现出不同的内涵。总的来说，神秘主义有着以下基本特征：有着神秘的不确定因素、常常热衷于超自然的现象、不在乎经验教训、认为世俗现象的背后有着更高级的作用力。

长久以来，神秘主义曾在人类历史上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古时候，即使有的国家已经达到了历史文明的鼎盛时期，但他们却依然未能意识到自然界中的一些普遍规律。依然认为是神主导这一切：众神各司其职，分别掌管着自己的领域。

不同时代，神秘主义的表现形式也不相同，但是因为宗教服务于政治和社会的原因，神秘主义的信徒们对封建迷信的追随和对神明的狂热信仰都同政治领域中的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有着类似的表现。

神秘主义有着自身的法则，它的逻辑和情感逻辑或理性逻辑有着巨大的差别。情感逻辑和神秘主义逻辑的共性并不多，其中有一个就是任何没有通过理性论证的断言，在任何情况下神秘主义和理性都存在于完全无关的领域。因为神秘主义信仰不是由科学推理论证而来的，而是源于心理感染或建议。这种信仰不可能被理性所创造，相反会被其摧毁。神秘主义常常会伪装成绝对的真理出现，总是会有着看似完全合理的证据，让人无法反驳。想要理解这一伪装的假定并非难事。

在神秘主义思想里，理性论证和物质需求都不再起作用，在其思想下，任何人类的情感都不复存在。这一点我在另一本作品中用了著名的事例做了说明。神秘主义者往往会打着信仰的借口来消灭人类的情感。因此我们会常常看到各式各样的在宗教、政治、社会领域的殉道者。

神秘主义常常通过心理感染和信仰强化，最后以一种集体形式出现。神秘主义能为一个国家提供最充分的理由，促使其自认为被上帝赋予了征服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天职。这一点，古时的犹太人、中世纪的阿拉伯人与今天的德国人都已证明。

没人能够完全确定自己可以摆脱神秘主义的影响，即使是神智最清醒的人遇到了骚动和混乱的社会时，其精神世界也会被颠覆受到干扰。在那时，所有现实都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也包括人类本身的理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神秘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萌芽和演变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科学常常会轻视神秘主义的力量，但其却往往成为人类行动的主导者，如果我们将人类世界出现以来所有冲突的根本原因一一列举出来，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神秘主义在其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

人类世界的重大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可以分为三类：心理的、生理的、神秘主义的。

心理因素包括仇恨、贪婪等各种各样的感情，正是这些感情将许多国家带入交战状态，并摧毁了多个文明；在生理因素中，在古代，日耳曼游牧部

落曾一度因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以至于原有森林已无法为其提供足够的生存资源而陷入饥饿与匮乏的时期；神秘主义也有其自身的表现方式：例如为了传播宗教信仰，阿拉伯人进军罗马帝国，同样是在宗教趋势下的十字军东征，等等。正是由于神秘主义的存在，欧洲持续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宗教迫害和战争，并且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人类活动动机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就是神秘主义，正是神秘主义创造了许多加速历史进程的幻觉，并影响这一个庞大帝国的兴衰与生死存亡。正是它为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神秘主义在现在仍然有着作用力，并且当今人类受到了比以往历史上都更加深刻的奴役。神秘主义依然在政治、宗教、社会领域发挥着作用，就连理性的作用也常常被埋没起来。

现在，欧洲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无情的战场上戛然而止，无数幸福美满的家庭因此家破人亡，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些国家自认为受到了神的指使，让他们担负起改造时机的重任。也有的国家妄想通过战争取得世界的主导地位，这一切都是神秘主义在作祟。

第二章多种形态的人格

1. 人格的稳定性和多变性

在以前，心理学认为人的灵魂是同类又有区别的元素，但是在现在看来，这一观点并不正确，在早期理论中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现在看来不过是虚构的而已。真实存在的人并不是这样的，不管是最普通的人，或者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代表了许多元素的集合，在这种集合的作用下，便会产生“自我主义”。只要环境不发生巨大改变，这种已经形成并确立的“自我主义”就不会发生改变。

所以说，只有环境持久不变，人格才会一如既往。一旦环境发生改变，个人心理的构成元素也会遭到颠覆，从而又开始建立一个新的集合和人格。

在革命战争时期，这种人格转变时有发生，这一点我已在先前提过。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通过当前的战争看到这种现象。但是，若要了解人格的本质及其在短时间的构成过程，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充满恐怖阴影的战争已经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鲜活的例子，即使是平常最温和的人也会在战争中变得热衷于杀戮。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没有人能够预见德国知识分子会在战争中表现出如此无耻的行径，同样也不会预见法国人会在战争中表现出如此优秀的品质。

人格的转变在战争中随处可见，我会在本书其他章节中详细描述几个非常突出的事例，在这里，我们先暂时引用英国著名作家吉卜林在探访战争前线后所说的一席话：

“我们自认为很了解一位老朋友，但是当这位老朋友受到了至高的挑战时，我们就会发现在他身上会发生一种可以超越所有知识和信仰的转变。他能够勇往直前地顽强拼搏，甚至可以达到我们所不能企及的高度。他仍然是原来的他，但他在各个方面都变得伟大起来，对英国来说，这位老朋友就是法国，如今，法国已经挖掘出了在其灵魂深处埋藏许久的能量。”

现如今，人格永恒不变的学说仍然盛行，虽然如此，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人们在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或地位发生转变后，其行为和观念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但是，既然他们已经变得不再是原来的自己，那么他们还有所谓的修正自身行为吗？

“自我”是极其脆弱的，即使是没有任何足以改变人格的事件发生时。“自我”很容易受到重大波动的影响——幸福会使它膨胀，悲伤会使它沮丧，疾病会使它受伤。长年累月，我们的人格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文明就会通过施加各种制约并不断限制其偏差，使得这种波动不会变得失控。如果没有诸多不容侵犯的规矩、法律、风俗施加制约，那么人类便很难保持人格稳定，社会生活也很难实现，没有一个文明能够无拘无束地存在。这也说明了文明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通过战争与革命这些大量的事例了解到，在法律这一文明的保护伞缺失的情况下，人性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德国在这场战争中所犯下的野蛮暴行，得到了全世界的注视，并且震惊了全世界。这个有着高度智力水平和文明的国家，随着战争的爆发，原来一直受到社会秩序约束的野蛮天性暴露无遗，并且变本加厉地释放出来。当然这些只是个例，并非所有参战国都是如此，因为有些国家的国民受到长久的社会约束与规制，其情感状态已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定，不会发生巨大的波动。

在遗传作用下的国民情感越趋于稳定，其原始的野蛮秉性就越没有必要受到社会约束的抑制，因为在那时，自我约束已经完全可以替代法律的约束作用，当然，很少有国家能够达到这种稳定的程度。即使是如此，社会约束

也有其不可缺失的地位，因为毕竟会存在一些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的人，他们的心理状态是极其不稳定的，也很难受到其他作用力的影响。就像尘埃一样飘忽不定，任意一种作用力都会在其身上发挥巨大的作用。永远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

2. 自觉与不自觉意志

由意识所感知的现象仅仅是我们未知的内在精神投影，但在这些现象中我们却可以看到许多最重要的行为诱因。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些诱因，我们引出了“意志”这一概念，意志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唯一经过心理学家验证的自觉意志，另一种则是不自觉的意志，尽管这一意志并未得到广泛承认，但其影响却是显著的。

所谓自由意志就是自由投射和客观讨论，而在不自觉意志中，无意识投射给我们的便是其自身。当触及我们的自觉意识时，所有结论都已成形，除却少数的结论并不得到认可，其他的都能为人所接受。

不自觉意志反映了我们的种种需求、欲望和期待，包括我们的种族、群体与环境。它会潜移默化地扩大为各种暗示和冲动。一直在潜意识下引领我们，甚至还会住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大多数的人们，其行为意识完全是由不自觉的意识所操纵的。只有在其言行完全不一致时，他们才能意识到这一点。

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国民心理往往会趋于稳定，能在最大程度上促使人们的行为向着有利于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的方向发展。这里面既有自觉意识，也有不自觉意识，虽然说每一个个体心理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但也都会有其自身的思考方式，行为也会略有差别。

有许多充分的事例可以证明这一命题，在这里我将仅仅引用来自英国《泰晤士报》政论编辑司迪德（H. W. Steed）的关于英国人心理观察的结论——他的语言表达可能和我有所不同，但理论都是一致的：

“英国人不信任思想、排斥逻辑等，总是会受其直觉影响——一种在他们看来比理性更加重要的东西，生命本身就由能量组成，生命本身就不合逻辑，这些能量都源自于心理学家所说的‘意识门槛’之下，向来都是盲目的……在英国，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人们表达的思想与其行动形成鲜明的对比，英国人生活在一种连他们自身都不自知的状态中。英国人的心理由两大区域构成，一部分主管着思想，另一部分主管着被分隔起来的基本冲动，两者毫无联系。在日常安宁的生活中，一个英国人的言行毫无可能会透露出个人或国家在危急存亡关头的表现。只有在战争时期，他才能表现出自己的真性情，做出令人惊讶的举动。”

所以说，无意识在所谓的“自发行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这种意识很难为人所发觉。不自觉意志常常有着长久的渊源，但也可能会出自习俗、风尚、瞬间感情或我们所属的社会群体，往往我们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受着它的影响。

3. 意志变化

不管是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意志，都有着变化无常的范围。因为意志是不受约束的，它会因为一些特定的因素刺激而发生变化，同样也会受到享乐、奢华等因素的抑制。

假如一个国家中人人意志消沉，推卸责任。那么这个国家也就离衰落不远了，就像罗马，就是因为丧失了国家意志，所以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战争的背后也存在着意志的斗争，所以说意志也会在国际冲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如马恩河战役。

一场战役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哪一方的意志更能持续。在马恩河战役中，正当法军打算撤退时，敌军右翼提前撤退了；在伊瑟战役中，敌军在阵亡15万人后便决定撤退，但若其再多支撑一小段时间，便能获得胜利。有法军将领说：“如果德军再多坚守阵地一刻钟，他们就可能全面突破我们的战线。”

类似情况在决定南锡命运的考伦战役中也有发生。据马勒泰尔将军报告，1914年9月7日，314军指挥官接到撤退命令，尽管他本人并不同意，但不得不服从军令状。正当他准备撤军时，敌人撤退了。如此多的显著事实都已表明，意志总是会在战争的最后关头发挥着重要作用。

领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为群体赋予不自觉意志——诸如那些伟大的将领、国家元首或宗教创始人。这种不自觉意志越能协调于国民的祖传情感取向，就越能取得成功。所有的著名将领都具备强化士兵意志的本领，正是由于激发了群体意志，他们才能率领诸多战役取得胜利。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具有在无形之中通过话语、行为和手势来控制对方的思想本领。

强大意志所激发的个人能力向来都令人惊讶。不用说身边的例子，只需举出黎塞留的事例——克莱孟梭已对此作了总结：

“当黎塞留攻占马翁港时，他震惊地看到，士兵们在面临枪林弹雨时呈现出不可思议的勇气。他对这一切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为了找到答案，他下令在次日再次进攻同一防御工事——当然，这次已没有守卫工事的抵抗力量。但是，这一次实验徒劳无果。法军士兵发现没有抵抗，便不能发挥此前的勇气和意志。他们需要最难以克服的障碍，才能最大限度地展示他们的英勇。”

以此可证明，往往意志所发挥的力量比信仰都更加强大。

卷二

现代德国的发展历程

作为首先提出国家绝对权利理论的学者之一，在黑格尔看来，强权是历史的决定力量，国家地位应处于绝对地位，应被当作上帝来崇拜。这些理念在德国各所大学之内流通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在更大的范围内被普及，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第一章德国的崛起和发展

1. 不得不提的普鲁士历史

要想获取对一个国家的了解，哪怕是最肤浅的了解，都首先要研究其国民个体和社会心理的形成，以及其感受和思想信仰，这是因为政治生活也只是其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的演进有着众多的因素，当今人们似乎只在乎其经济因素。实际上，由于受种族、环境、系统、个体与机体的行为等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经济因素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因此，尽管一个国家的历史极端复杂，难以确定其重要性，当然如果这是一个新兴的国家，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比如说——普鲁士。现代德国的前身就是普鲁士，要理解它，就必须首先了解到这场战争爆发的心态之源。

虽然说普鲁士统一德国还不到五十年，但很多人都认为，德意志自公元之初就已产生。法兰克人、撒克逊人、斯瓦比亚人以及奥地利人都曾经轮流将德国若干地区整合到其治下，霍恩施陶芬家族更是在12世纪就建立了一个延续很久的强大帝国。

不幸的是这些常识最后的结果都一样，以失败而告终。如今的普鲁士能够将统一维持多久，现在谁也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但就现在看来，普鲁士的统治应该可以持续得更久一些，因为普鲁士对德国的影响较之任何先前者都更为深远。普鲁士只用了不到五十年时间就使整个德国对其产生认同，人们甚至要质疑冯•比洛（前任德国首相）在其一本著作中担忧“德国会反抗

普鲁士统治”的论调是否正确。

关于德国人在普鲁士统治下的心态，我在另一章中有详细描述，在这里我们只简单地介绍下现在德国的领土是如何确定下来的。

古代普鲁士的心态同其他民族一样，他们由于先天生存条件的原因，数百年地陷入为了争夺领土的战争之中，自然在他们的骨子里就有一种源自征服的原始欲望。

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普鲁士并不能称得上国家，其边界因不断地吞并而缓慢扩张，逐渐吸纳了许多源自不同背景的族群。数百年来孜孜不倦地试图扩张，但是却又不止一次地给自身造成严重的倒退。在 1640 年，经历了长达 30 年战争期间，这个国家已经被摧毁到了破败不堪、一片狼藉的地步，以至于有些地区的常住人口还不到原来的一半，更严重的像普伦茨劳这样的城市，人口从 6000 锐减到了 600。在此期间，普鲁士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常住人口，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成了邻邦随进随出的驿站。所幸，南特敕令的废除将成千上万的异见人士驱逐出了法国，这些都是充沛的劳动力资源，普鲁士国王更是英明地从中吸引了两万多人到其旗下，正是借着这股移民，普鲁士才因祸得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景象。

由于这些新移民的到来，勃兰登堡增加了许多崭新的工业及农业技术，他们在勃兰登堡兴建了农场，并开设了大量的玻璃厂和钟表厂。就连柏林这个曾经仅有 6000 人口的肮脏不堪的小镇，大街上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然而，在这些新移民的付出下，柏林竟然成为了一个繁荣城市。在普鲁士，法国移民迅速繁衍生息，一百年后，法国裔人口在普鲁士的 250 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 600 万之多。直到今天，仍有大量将自己的姓名改为德语的法裔普鲁士人。

在普鲁士的疆域，其国王是拥有至高地位的统治者。在现代德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在哲学家眼中，国家都被视作至高无上的存在。理应建立自己的法律和道德，而人民的职责就是无条件服从。弗莱德里希一世曾经明确下令，禁止臣民做出任何论证与反驳政府的举动，然而普鲁士的臣民做梦都

不曾想起这种事，所以这根本毫无必要。

普鲁士统治的根本原则是不断地扩充其领土面积，常常会不惜牺牲一切代价，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时的普鲁士政府也是通过宣扬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来作为其侵略行为的理由，而且并未遭遇到像当今政府所面临的种种困难，这对于一个民族构成十分复杂的国家来说是基本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回到当时那个年代，普鲁士君主的意志已经远远超越了民族优越性理论，并且取而代之。

为了实现普鲁士历代君王的梦想，其君主都会将其主要资源倾注在军队上。全民兵役制早在1733年就被列入了法律。例如，在弗莱德里希·威廉一世继位当年，普鲁士军队的编制为38000人，而在1739年他去世后，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83000人。而当时的法国军队有160000人，奥地利只有100000人。在这支庞大军队的支持下，威廉一世的继任者弗莱德里希大帝得以建立了一个大国，在他的带领下，普鲁士吞并了西里西亚和波兰的部分地区，使得其领土面积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之多。普鲁士一直维持这一盛况直到另一位伟人的诞生——拿破仑，在拿破仑时代，普鲁士呕心沥血建立的王国才被摧毁。但是，这种分裂也仅仅维持了短暂的时间：在莱比锡和滑铁卢，普鲁士一雪耶拿会战失利之耻；1815年更是将莱茵河流域各州收入囊中，其中包括诸如科隆、美因茨、特里尔等著名的城市；随后的萨多瓦战役和色当战役的胜利使普鲁士再一次达到了辉煌的高度，至此，普鲁士将所有德国城邦都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由一个小王国一跃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

普鲁士随着实力的上升，德意志民族的自豪感也逐渐膨胀起来，以至于最后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口中的“特权种族”，上帝赋予了他们这个最伟大的民族重塑世界的使命。

我们可以从以上的概括看出，在普鲁士民族的骨子里有着征服世界的野心，只有通过征服世界，才能彰显其自身的伟大之处。所以说，欧洲各国应该早就看出普鲁士的本来面目，这一点确实令人难以想象。当然，法国国王

依然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对普鲁士的高度警惕，甚至曾在黎塞留时期阻挠过德国统一的企图。然而从伏尔泰时代至今，普鲁士在法国极受欢迎——哲学家和作家将普鲁士称为“自由的力量”，丹东将普鲁士看作“天然的盟友”，因为普鲁士和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一样，同样得到了外界的同情。就连米什莱也说过：“由于上天的恩赐，我们将可能见证一个强大辉煌的德国。”来表明自己十分支持普鲁士并且希望德国的统一。

法国直到萨多瓦战役之前都保持着对普鲁士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任。就连法国一位最具影响力的作家都曾写道：“从逻辑上，法兰西是跟普鲁士站在一起的。”另有一份大报甚至宣称：“德国的统一是大革命的胜利，支持普鲁士是对终极正义的追求。”通过这些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已经失去了理智。

2. 帝国战略崭露头角好战情绪死灰复燃

普鲁士统一德国后，帝国首相俾斯麦开始构建自己的一套战略。他一心想通过维持和平的境地来使分裂的德国国内保持完整，确保德国盟友的支持是他战略的核心，以此来防止法国趁机对其发生报复行动。他一直相信法国可能实施报复，并且经常在国会演讲中提到这一点。下面是摘自他演讲的片段，据此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他的本质意图：

“法国一旦占领了梅斯、图勒以及凡尔登这三座城市，德国的边境便会面临严重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对此遗忘了，而我今日旧事重提只是因为历史的关联。因为我们已经拥有梅斯了，也无意夺回图勒或凡尔登。但是，由于边界问题，每一代德国人都被迫将战争的利刃指向法兰西。那么，现在这场与法国的边界之争已经尘埃落定了吗，抑或是没有？这个问题恐怕在场的诸君都无法回答。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在根本上转变两国关系的定位，并改变我们对边界问题的态度，因此我只能与诸君分享个人的意见，那就是，这场边界之争并未结束。”

俾斯麦在其掌权期间，一直致力于保持和平的环境，这与当今德国皇帝刚开始的政策是一致的。在他的努力下，德意志帝国团结如一、经济极其繁荣。德国的商船船队日渐扩大，航程覆盖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当时的世界，只有英国可以与之匹敌。这就很容易理解英国为何成为其竞争对手，德国也日益对英国产生厌恶。

当法国的国力被宗教和政治的纷争大大削弱后，俾斯麦再也没有因为法国的威胁而夜不能寐、焦虑不堪，这主要是因为复仇的旧观念不复存在。但是，德国与法国仍然存在着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因为法国与英国结成了盟友，而德国早晚要与死敌英国发生一场大战。

起初的德国在俾斯麦的统领下，将战争视为德国必须尽力避免的危险，而当德国国内贸易和制造业开始发展壮大时，德国要想树立世界霸权就必须通过战争这一有效途径，于是德国人民开始期望战争。当时，德国各军队派系、爱国团体、媒体以及大学为了激起公众舆论并为战争做准备，联合发起了一场运动，为了引起国会对于早期敌对行为的忧虑，德国政府倾尽全力支持这场运动，从而得以通过增加税收的法案来增加军费开支，发展壮大军事力量。

3. 德国作家的征服策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战场的舆论准备很大程度上是拜冯•伯恩哈迪将军所赐。这种说法似乎又有些夸张了，因为在当时大部分的德国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爱国主义团体，他们具有强大的力量。在此我们引述其作品中的若干片段，这些作品罗列了德国舆论的共识，相信大家可以从其中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下面是伯恩哈迪著作中第十章的主要观点摘录（由于德语原版在这本书付梓时尚无处获得，故我在此使用英文版）：

“国家运行时所需考虑的唯一因素只有武力，除此之外国家可以无视一

切规则，除非可以从中获利。”

“难道我们可以容忍一个人口只有区区4000万的手下败将（此处指法国）对德国的扩张计划指手画脚吗？”

“我们要粉碎三国协约、羞辱法国并树立德国应有的威信，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

“现在正处于独立状态的中欧国家必须被并入德国……直到我们与英国交战，我们的外交政策才不算是失败。”

“宣战的时机必须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独立意志，同时必须要让我们的敌人措手不及。”

“不仅是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要随时做好战争准备，我们的外交政策也要随时做好准备。”

在有关国际仲裁的一章中，伯恩哈迪则试图说明向仲裁员提出法律问题的困难性：

“大国间解决争端应该靠实力，而不是靠正义……对正义的理解见仁见智，而正义概念的本身也会随着不同个体和国家而产生不同变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正义标准、愿景和野心，而这些都是由其历史和民族个性形成的……没有人可以说清，究竟哪一种正义才是正当的。”

“不可能制定出一套可以规制国家之间差异的成文法……每个行业、每个国家对荣誉感都有自己的独特理解……普遍仲裁条约必然对富有雄心的新兴国家产生特别大的危害，德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它尚未达到政治和国家发展的最高峰……由于普遍仲裁条约，所有需要改变疆界的国家行为都会受到阻止，强国也会受到限制而不能发展，只有衰退中的国家才会因为这样的仲裁条约受益。”

“人们不能把个人道德的概念套用于国家之上，国家的道德是基于其本身的，必须符合国家特点且取决于其国家性质与国家目的，正如个人道德必

须建立于个人的性格及其对社会的责任之上。”

“强权是国家的本质，软弱是国家的罪过。”

“如果一个国家不断膨胀的人口要求其不断扩张权力，那么不寻求这种扩张是不道德的……国家绝不能允许自己受到条约义务的约束，那会危及或者至少不利于国家的存续。”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其中的理念与欧洲文明数世纪来的理念差别相当悬殊，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马基雅维利时代、意大利君主们所遵从的原则的影子。（伯恩哈迪的理论招致了许多国家的不满，就连他自己也十分吃惊——虽然他只是复述了在德国普遍存在的观念，但是很显然那些国家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于是他很乐意接受采访，借此来消除人们对他的误解和诋毁。但由于他的论调十分明确，使其他人很难再找到其他角度来看待。）

伯恩哈迪的观点并非与人们的思想大相径庭，他本身也不是那种超然古怪、无人附和的人，各种学者也曾反复引用他的观点。以下是被1914年9月的《记者》杂志转载的从一本书名为《假如我是君王》的作品中摘录出来的片段：

“既然德国的地位最高，自然就有权享有一切。德国应该以铁血手腕摧毁阻挡本国扩张的一切事物。我们必须摧毁英国，也必须摧毁法国，这样才能夺取它们的殖民地，以及在必要时夺取它们的领土，以换取我们的安全；至于荷兰、比利时这样的小国，必须受到德国高高在上的监护；更不用提俄国，其将会被轻易征服，而德俄的边界地区将统统成为德国的殖民地。”

作为俾斯麦的拥护者之一，海尔·舍尔的以下言论清楚地表明了德国的政策：

“有思想、有见识的人应该把‘坦诚是最好的政策’这样的陈词滥调扔到儿童启蒙读物中去。从来就没有普遍意义上的诚实，将来也不会有。政治家必须毫不在乎自己对敌手是否不坦诚或不公平，而应当毫不迟疑地完成自

己的任务。”

从一开始，普鲁士就将对弱国发自内心的蔑视作为其政治理念的本质特征之一，普鲁士甚至拒绝承认弱国的存在权。下面是前任比利时驻柏林公使巴郎·贝恩斯讲述的他与德国外交大臣的部分对话：

“他（德国外交大臣）认为只有大国才有殖民的权利以及权力。他向我吐露了内心真实想法：如果欧洲发生变化，只会对最强大的国家们有利，那些小国将不可能获得先前许诺的独立，最终必将灭亡或为大国所吞并。”

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作家大肆推广这些言论，使德国人民日渐开始出现幻想：他们将统治世界。他们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是其他民族无法战胜的。最终，所有的刺激带来的后果就是，德国好战派的势力在国内日渐强大起来。

4. 德国的政治演进

普鲁士统一德国后，德国的历史也发生了变化，对于其历史和愿望，做总结如下。

普鲁士创立了这个由征服塑造而成的现代德国，这个国家靠着征服获得了兴旺繁荣，日益兴旺发达。经过 1870 年的战争后，普鲁士使各个邦国获得统一，于是将其自身的联邦政治加之于各个邦国之上。

制造并传播特定感情，并使其集体化是政治心理学的主要原则之一。因为情感是控制国民意识的有力武器，如果能够操纵情感，便能控制国民的意志，如能维持国民情绪稳定持久，就能成功重塑国民心理。

普鲁士利用其大学教育、历史学家、哲学家、爱国社团以及军事制度等条件，用了不到 50 年时间成功地改造了德国人的心理。历史学家们说服德国人民相信，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任何民族都无法与之相比；哲学家们鼓吹强权主义，在强权面前，公理只能是一种幻想；政治学家们宣扬，德国将使世界统一；军事教育尤甚，渐渐奴役了德国人民的意志。在这么多的

因素下，德国渐渐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在其他国家日益强盛的同时，德国越来越需要强大的陆军与海军来支撑其发展，这不仅是为在各个地区宣示德国的政策，更是为了应对战争的突然到来。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还大肆宣扬其他国家极度的嫉妒和敌视德国，并且已经严重威胁到其生存。

英国是德国最为畏惧的敌人，德国政府为了激起民众对英国的愤怒与敌视，驱使德国学者们宣称英国是德国最大的敌人，英国的存在会严重影响其发展。德国海军甚至急急忙忙地组建了一支舰队，想要击败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从而打垮英国。

当公众热情越来越容易被激起后，公众的这股热情便表现出相对的力量，很快便成为难以制服的强大生命，变得难以控制。因此德国政府很快发现，公众热情再也不受约束，各个激进党派已经形成，并开始着手将国家推向战争的深渊。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个国家走向向外扩张的道路，在公众热切的渴望下，战争的导火索一触即发。

第二章德国哲学家眼中的国家定义以及历史阐释

1. 德国国家概念的起源

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向来至关重要。但是，仅有少数大国具备这样的能力，能够在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建立一种难得的、令人满意的平衡状态。古时候，尤其是在东方，人们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将所有权力集中于君主一身，实行君主专制的独裁统治。

普鲁士只有采取绝对专制的统治，才能达到统治众多种族和吞并邻国领土的目的。在普鲁士的历任君主看来，一切在国家权力面前都显得微乎其微，国家意志应处于绝对的地位，可以凌驾于道德与法律之上，国家义务就是通过征服不断扩大自身统治，而国家是否需要遵守条约仅仅根据自身利益考虑。因此，普鲁士君主一贯完全认同这样的观点：战争没有正义不正义之说，成王败寇，只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可以说是正义的。

虽然多数普鲁士君主并没有明确声称以上信条，但他们却是完全按照这一理论做事的，并由此塑造了德国的历史。就连德国哲学家也参与进来，为这些信条构建理论基础。所以我们看到，黑格尔和费希特等知名思想家首先提出的就是“国家”的概念，然后特赖奇克、尼采、拉森、伯恩哈迪在此基础上发展并推广了这一哲学原理。

作为首先提出国家绝对权利理论的学者之一，在黑格尔看来，强权是历史的决定力量，国家地位应处于绝对地位，应被当作上帝来崇拜。这些理念在德国各所大学之内流通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在更大的范围内被普及，

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德国哲学中，有部分理论宣称：普鲁士代表的是上帝意志，高于一切国家，可以不受道德法规的控制，有绝对的权力征服弱国。当然，这些理论受到普鲁士政府的支持并鼓励其大肆宣扬。德国哲学家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支持者，试图将这些理论与罗马时期的理论加以联系，以证明无论在共和国还是帝国体制下，国家都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并拥有绝对权力。以此来隐含在上述理论中暗含着的侵略思想，他们还曾力图证明德意志帝国延续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思想。事实上，德国关于国家的观念与罗马没有半点关系，却与亚洲国家有着几分相似之处。

从上述的有关国家的哲学理论，可以看到普鲁士全部体制和历史的渊源，不仅是因为这些哲学理论形成了其框架与内涵，更因为这些实践已经深入人心，激励着德国人的行动。

2. 被国家吸收的个人

这种国家观念在德国形成后，于是导致国家的权力凌驾于个人之上。这种现象已经在德国出现——不仅是在普鲁士，更是在整个帝国之内。一切由国家供应，同时也管理着一切。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能令人无法忍受国家的官僚体制，在德国却是普遍现象。这是因为，德国人民体内有一种内在的服从性，或者说是奴性，并且早已对这些严苛的军事体制习以为常。在黑格尔的理论看来，国家具有神性，人人都应该自愿服从这种神的意志。诺瓦利斯甚至说过："打个比方说，国家是一个神明的化身，法庭、戏院、政府等公共场所便是其身体器官。"

在德国哲学家看来，国家的这种神性只要受到人民的服从，就不必在乎是否符合理性。这是因为国家地位至高无上，它似乎已经远远超越了一切赞美和批评。当然更不用说，在德国也不会有人想到要批评国家，因为在普鲁士的统治制度下，德国人民已经变得无比热爱自己的国家，如今他们更加希

望将整个德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

就在与德国邻近的法国，情况则恰恰相反，法国更多的是将国家视作与固溶体本身完全分离的实体。他们或许偶尔会利用国家来获得某些好处或庇护自身的软弱，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会将其视为敌人。相反，德国人却将国家视作全种族的集体化身，是一种神的意志，如果要反对国家，与国家抗争，那便是在和自己作对。

不论是什么外界因素，在德国，国家的地位都是至高无上的，德国人的灵魂中深深根植着对国家的崇拜，统治者根本不用费丝毫的力气便能够确保人民对国家的绝对服从。在法国和英国，人民不会愿意被约束，热切渴望自由。而德国人却热爱服从，热爱集体。德国对专制具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一旦获取机会，便会实施专制统治。

在德国，普通士兵的地位更加低下，完全被视为国家的奴隶，这在 1891 年德皇在波茨坦的征兵演讲中有明确反映："你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属于我。如果我命令你们向你们的父母开枪……你们必须一言不发地遵照我的命令。"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德国的专制思想是多么的深入人心，试想除了德国之外，不会再有第二个国家的统治者敢说出这种话。

正是因为德国人的服从性，普鲁士的统治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在法国，人民常常会违反各种不合理的制度规则，在德国却总是会得到严格遵守。例如，在德国就绝不会发生像巴黎的阿斯托利亚酒店事件：这座酒店的建筑商非常清楚，在法国违反法规是家常便饭，并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因此该酒店的建筑高度远远超过了有关规定的值。尽管塞纳辖区、巴黎市政委员会和国务院从 1907 年起不断向这家酒店下发禁令，但这家酒店却依旧我行我素。

仅从这个事件就可以看出，法国政府不仅毫无威信，并且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来确保其规章制度受到尊重与遵守。若相同的事情发生在德国，结果将会在 24 小时之内将超出建筑标准的楼层拆去，或者就是不可能会建造超出建筑标准的建筑。

从德国的一些学者在战争期间发表的若干作品可以反映出当时的公共舆论，当然这不可能完全准确，但是仍然可以说明一些情况，并值得引起人们关注。这里，我摘录了奥斯特瓦尔德教授的以下言论：

“由于强大的组织能力，德国达到了高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文明水平。在我们的敌人中，俄国还处于游牧阶段，法国和英国刚刚到达我们所谓‘个人主义’的发展阶段，比我们落后了50多年。除此之外，德国高度发达的制度和组织性也决定了我们今天的至高地位。你或许会问我德国想要什么。好吧，德国想要接管欧洲，因为欧洲向来缺乏组织与管理。德国想要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想要实现集体力量的理念。”

某些主张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迎合这一宣言，但更多的学者则未必会表示赞同——因为在他们看来，许多重大发现与进步都不是集体的工作成果而只属于少数优秀者。

当然集体也有其优越性，在需要团队协作的情况之下，集体的优越性便体现出来了。这时候对德国人就显得极为有利，因为他们的纪律性和群体性使得集体合作变得简单，而个人英雄主义则不甚容易。但是这也有其弊端，集体完全剥夺了德国人的个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想要审问德军战俘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因为德军军官和士兵的思想都已经被灌输了同一种精神，这一点给审讯人员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印象。

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以一种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仿佛化身为一种宗教信仰。这一点柏林大学的爱德华·迈尔教授曾对德、英两国人关于国家的理念做出过如下比较：

“事实上，我们在此探讨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国家理念，它们也在经历着你死我活的激烈较量……英国与德国不仅在关于国家的理念上存在分歧，更因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有关自由的思想。对于英国人而言，自由意味着个人享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无限权利，不受国家、多数人意志或公共舆论等任何

干涉。对于德国人而言，自由则意味着对集体利益和国家目标的服从。”

“英国人将国家视为施加强制力的工具，主张国家的权利和需求应当尽可能有限地影响个人。而德国人则将国家视作民族宏伟目标的体现形式，主张国家权力应当覆盖全民生活，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员，都应将国家禁令视为自身意志的体现。个人只有无条件履行义务与服从国家，才能称得上是高贵和有尊严的。因此，德国人将全民兵役制视为自由国家的基石和最高体现，而英国人则将之视为最令人憎恶的事物，称其是一种有悖自由理念的专制强迫手段。”(1915 年 3 月，《科学评论》)

——上述言论已经明确地向表示，德国会在胜利之后，给欧洲强加一个怎样的制度，就像它已经强加给阿尔萨斯的一样。

某些人可能会选择消极被动服从指令，也可以认为这种服从体现了“其自身自由意志”。这就好比是让一位古代奴隶相信，迫使他在黑暗的工厂里干活也是出于自由意志。

一个国家要使其国民服从，必须先要经过几代军队化的管理模式。所以说不会有哪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能够接受德国的制度，因为在他们认为，国家是为了个人而存在的，而不是个人为了国家的存在。并且他们只会对自由和独立埋单，被动服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有人曾经客观地指出，德国哲学家构想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法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之间也有着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更多的是强调实用性，并且充斥着征服的欲望；后者则更在乎理论，尽管有着明显的权威主义倾向，却又道貌岸然地宣扬和平主义——当然，他们和平与博爱的对象显然不是那些曾经受到无情迫害的阶级。

3. 德国人的武力崇拜

通过上面对德国的了解，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德国对于军事的极度渴

求。普鲁士不需要任何方面的经验就会知道军事的重要性，因为普鲁士本身就是靠武力建立的，也真是靠着武力才发展到如今的壮大。

为了给通过武力获得的结果以合理的理由，德国学者制造了这样一个理论，武力对历史起着决定因素，并将战争的胜败作为强者的统一标准。

于是，武力被推到了一个至高的地位，连同情和怜悯这样的感情都不再需要——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始终强调，只要武力允许便可以为所欲为、横行霸道。耶林，德国的一位著名法学家曾说过："征服者的权力即法律"。就连尼采也曾说过："道德仅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相互义务。至于那些低等或外来的对象，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用任何方式予以对待。对强者而言，怜悯是最大的危险。"

对于以上宗旨是如何被人们所适用，人道又是如何被残酷地摒弃的。我会在另一章中提及德军总参谋部的作战指令时，向读者说明。

明显可以看出，普鲁士的思想已经远远背离人类的思想，离人类文明越来越远。在名义上德国还算是基督教国家，但原来《圣经》里圣明的耶稣已经变得和欧丁神一样野蛮残忍，征服和杀戮变成了唯一的目的。这种变异的基督教已经面目全非，将《圣经》道德全盘否定——在尼采看来，《圣经》中所主张的道德是"奴隶的道德"，温顺、仁爱、慈悲都被视为软弱的表现。权力来自武力，所以，只有武力强大的国家才有权利统治他国，并且没有任何义务来表示其友好和善良。在当时，威廉二世的这句话在德国整个知识界都被推崇备至："我们不需要慈悲为怀"。这也就不难理解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犯下的种种冷酷暴行。

德军的武力确实为其国家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并且令德国变得强大，德国人民看到这些后，自然开始变得崇拜武力。此后，德国还出现了不断鼓吹德国人是优秀种族，肩负征服世界使命的新的理论学派。在德国人眼中，这次战争就是新时期的十字军东征，一切可能反抗德国的国家都将受到惩罚。德国征服者们不仅残酷地剥夺其他国家的财富，还试图妄想用自己的思想主

宰其附属国。

人的天性自然难以改变，所以说最好顺应它们并激发它们。德国哲学家们巧妙地运用这一原则，激发了人民对于征服、屠杀、掠夺的天然渴望。

4. 宗教与国家的关系

国家和宗教往往都是两大独立的势力，就连最绝对的君主政体也不例外，虽然有的时候两者可能意见不合，却很少会有一方完全受制于另一方的局面。但是，普鲁士政府为了取得国家的绝对权力，其创建者们绝不会容忍任何可以与国家抗衡宗教势力的存在。事实上，德国人民向来都很淡化宗教信仰这种世俗势力，宗教和政治根本不会产生冲突。但在1870年战争之后，当普鲁士统治了德国全境后，却发现全国有2500万天主教徒和4000万新教教徒。神通广大的俾斯麦使尽浑身解数，却也无法解决其中的难题，他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最终不得不妥协。虽然如此，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还是日益激化，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矛盾暂时消失，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因如此，德国在长时间内由于教派之间的分歧难以实现完全统一。

2500万天主教徒在德意志政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政府是帝国的基石，却仍然受到国会的制约，国会可以在税收等问题上否决政府决策。这使得政府略显被动，正是靠着天主教会在国会建立的中央党与一些反对派团体结盟而占据的多数席位，给政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控制了多数媒体，甚至有时还不听政府的使唤。1909年，他们的投票甚至导致当时的德国总理冯•比洛的辞职。

天主教党派在政府圈子内自然不怎么受欢迎。事实上，在一次国会演说中，某国务大臣甚至曾将其称为“帝国有机体中的脓疮”。但是，庞大的天主教势力根本不需要任何外部支援，就可以与普鲁士政府对抗。普鲁士和新教教会都认为德意志帝国唯一的首脑就是普鲁士国王；而天主教会则承认两个首脑——皇帝和教皇，而且后者的位阶要高于前者，因为其是上帝在世间的代

言人。新教不愿妥协天主教，因为在他们认为德国的强大正是来自新教精神，这一观点许多历史学家也表示赞同。我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引用特赖奇克的著述就此予以说明。

综上所述，德国的薄弱之处就在于宗教的二元对立。

5. 德国理论学者眼中的国家和法律

对于一些不熟悉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人可能会认为，我对他们的观点有些夸大其词了——从黑格尔到特赖奇克，再到伯恩哈迪，这些人的观点好像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我还将在本书另外部分引用上述学者们的一些学说加以说明。在这里我选取了一本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版的书，柏林大学教授拉森的著作，这里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这本书其中一些内容也已为《泰晤士报》所刊载：

“在国家之间，仅仅存在战争，因为冲突是国际关系的规则与本质，友谊不过是意外和特例。”

“只要人们还具有自由意志，仅靠强制便能确保法律的实施……”

“国家之间没有法律。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一国认可法律，便意味着承认自身的软弱，并降至经允许才能存在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根本没有能力行使国家的基本职能。”

“国家的存在与其国力有关，一个小国根本无权存在。国家之间的唯一法律便是强者的法律。”

“不管存在任何条约，弱国都是强国的猎物，强国可凭借自身能力和愿望对弱国为所欲为。只要这种情况合理，便可以称之为道德的。”

“如果我们把国家看成有智力的人，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爆发的冲突只能由武力解决……为了避免战争，必须首先压制国家本身。”

“……未对战争做好准备标志着一国在物质和道德上的双重衰落。”

“……无论一国在学术、道德或物质领域取得何种进步，终究都将是徒劳的，它将成为其他国家‘文明的肥料’，除非能够捍卫自身和取得的成果。”

“征服的战争和防御的战争同样具有正义性。反对为征服而战是愚蠢的行为，征服这一目标本身便是唯一有趣之处。”

“战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却绝不可能出于某一理念，因为这将意味着对国家生命所有健全基础的颠覆。”

“民族国家能在最高形式上实现了种族文明，这只能通过摧毁其他国家得以实施。”

“独立并不是所有国家固有的权利，必须经过艰辛与劳苦获得……”

“对于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若其文明并不利于国家的集中化和军事化，就必须服从于另一个拥有高度发达的政治军事体制的野蛮国家……”

“在不同文明之间，只存在冲突与仇恨。”

“对于他国事务的干涉是一国的权利，其唯一限制便是他国的国力。”

“弱国往往习惯自我欺骗，认为那些保证他们可怜存在的条约不可侵犯，但是只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才是唯一保证。”

“有人谈论所谓的民族权利。但是，允许一个民族或其部分自己决定某些国际问题——例如，该民族应当属于哪个国家——便如同任由一家之中的孩子投票选择谁是他们的父亲。所谓民族权利，不过是法国人最无聊的幻想。”

对于一些公开宣称以上信条的国家，权利主张在没有武力的支持下是行不通的。对于权力与权力的比较以及抽象权利的美好之处，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还是留给学者们去探讨吧。普通人掌握一些自我防卫的方法要比理论可靠得多。

仅仅主张权利在武力面前是毫无用处的，历史上确实出现过许多传教士违背君主意志而取得过权力的控制权。因为他们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言人，所以尽管他们手下没有士兵，却手握重权。

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时德国的理论无疑是一种历史倒退，我们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君主专制统治下的法律条约形同虚设，可以肆意违反，只要靠武力就可以解决一切不服从的势力。目前，德国国内的巨大矛盾表现在军事制度和工商业发展严重脱节，仿佛两者并不处于同一个时代。一个被强权主义所毒害的德国记者说，德国胜利之后，就可以不用对任何国家履行义务。这不禁使人们惊出一身冷汗，德国是不需要履行任何义务，因为不会有国家会愿意和它相互往来。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正是德国的上述理论导致其最终野蛮入侵比利时。正如莫姆森所说：

“请注意，这个国家（德国）曾经兼具军事实力和文化实力，如今文化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完全军事化的国家。”

正是由于德国扭曲的人格思想，欧洲在长达 45 年的时间中一直处于紧张的备战状态，战争最终还是一触即发。

第三章德国的经济发展历程

1. 繁荣的德国工商业

在历史上，为了自身富足，一个贫穷的国家而向邻国开战是很常见的事情，普鲁士王国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但是，一个经过拓展海外贸易而早已变得富强的国家，并且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抵御任何外来侵略，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贸然发起一场无论胜负都毫无收益的战争的。但是，德国这样做了，这就是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本质上的不同。

德国仅仅繁荣了不到25年时间，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人口增长迅速，贸易、商业等经济水平显著提高。照这样的发展速度，其经济成就将在不久的将来超越英国花费了100年之久所达到的水平，然而就在这时，德国却发动了战争。

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资料中清楚地了解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工商业发展的繁荣景象。

1888—1914年，德国由4800万人口上升至近7000万，其国家财富从100亿英镑增至148.8亿英镑。

下面是1915年4月的《国家苏醒》杂志刊登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国家财富的统计结果。

1. 私人资产，包括不动产与个人财产——88亿英镑

2. 城市资产——20亿英镑

3. 农村资产——20 亿英镑

4. 私有采矿企业资产——2.4 亿英镑

5. 海外投资与所持外国抵押价值总额——10 亿英镑

6. 国有矿产、国家机构、公共建筑、港口、运河——6 亿英镑

7. 流通账单、银圆、货币——2.4 亿英镑

以上便得出了 148.8 亿英镑的总额。另据估计，德国的年度税收为 1.6 亿英镑。

德国的商业触角伸到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尽管属于德国自己的殖民地并不多，但是它的贸易市场已经遍及整个世界。德国在走向军事化大国的同时，其工业化的发展也在数年之内迅速壮大，并有了赶英超美的趋势。

煤矿的发现，大大地推动了德国工业的发展，据统计，德国的煤矿产量在 1870 年仅有 2600 万吨，而 1913 年就已达到 1. 09 亿吨。同是 1913 年的法国，煤矿产量还不到 4100 万吨。（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德国通过军事扩张所得到的领土上获得的）

英国走向富强的道路正是因为煤炭的开采，所以说，德国必然也将因为煤矿业的繁荣兴旺而走向富强，德国对煤炭资源的占有除了满足自身需要外，还可用于对外出口。相反，法国却不得不依赖进口部分煤炭满足自身需要。

如果要正确理解上文中数字所代表的财富，则必须知道其中的含义。目前全世界正在经历的工业发展阶段中，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决定了它的财富。到目前为止，这种生产力还是靠人类的手工劳动力这一唯一来源，直到蒸汽机发明后，煤炭的燃烧才将人类的双手解放出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又一途径。

众多试验表明，一台蒸汽机烧煤完成，只需耗费 1. 5 磅煤炭，就相当于一个劳动者在 8 小时的工作日内每秒劳动做功 43. 2 尺磅所完成的任务。如果按一年工作 300 天来计算，一年需要消耗 0. 2 吨煤炭。也就是说，5 个人的劳动力才能抵得上一吨煤的工作量，一百万吨煤炭就相当于 500 万人工作。也

就是说德国每年生产 1.9 亿吨煤，其提供的机械劳动力相当于 9.5 亿名工人。更何况人的行为要比机械不稳定得多。

此外，煤炭也十分廉价，60 万英镑就可以买到 100 万吨煤炭。而如果我们按每天给每个工人的工资是 4 便士的话，500 万工人的工资总额将高达 3 亿英镑。（这些数据可能看起来有些夸张，但事实就是如此）所以，煤炭可以增加劳动力，弥补劳动力的缺失。此外，煤矿多要远远好于人口多，比如，5000 名矿工一年能开采出 100 万吨煤，而这 100 万吨煤又能够完成相当于 500 万名工人的劳动量。

现代所有的军工产品，从榴弹炮到巨大的军舰，都体现出了煤炭转化为能量的巨大威力。可以说一个国家煤炭的拥有量，就决定了其可以拥有多少的工厂、铁路、军舰、火药和大炮。

德国近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无疑就是其巨大的煤炭产量，也是其国内经济和国际活动的基础。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德国开始轻视农业，越来越重视工业的发展。德国生产的产品由于过剩的煤炭产量与劳动力而变得极具竞争力，所以德国产品的出口量大幅增加，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建立并扩张。比如，克虏伯旗下有 10 万工人，曼内斯曼有 1.5 万人，巴登钢铁有 8000 人，拜耳也有近 8000 人。大多数企业都在许多国家建立分支机构以投机取巧、避税减税。美国默克公司达姆斯达特分公司基地建在德国，所用配方多为法国提供，在伦敦有附属机构，生产场所则坐落于巴黎附近的蒙特涅。他们参照的是就是这一事例。

这些企业有着非常巧妙的机构设置。拿拜耳来看，拜耳有 14 名经理，手下管理着 650 多名技术工人（包括机械工、电工等）、304 名药剂师、67 名工程师、8 名医师、4 名律师。工厂车间十分庞大，仅照明电灯就有 3 万盏，每天产出产品 30 车。

德国先进的生产工艺令其在各个工业领域都非常出色，例如制造实验室设备、摄影镜头等等，在这些方面法国制造商都不可同日而语。

德国工业发展的成功导致其不断对外出口，于是就需要开拓更大的新市场。这些都间接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德国在工业世界初来乍到，处处受到以英国为首的竞争对手的排斥打压和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自然将英国列为其头号敌人，德国在不久的将来便会对其开战。

当然，这种工业过度扩张也给德国带来了危机。据德国著名金融家海尔法里耶估计，德国每年有 20 亿英镑的税收，国民财富总值达 160 亿英镑。可能这些数字有些夸大，我们甚至有些难以接受。但是这些数字隐含着什么意思呢？——它们表示，德国制造业的生产力过于强大，生产过剩，已远远超过国内消费能力，因此必须寻找大量的海外市场。一旦海外市场出现问题，数百万德国工人将会失业。因为 7000 万德国人口中，还在依靠农业生存的仅有 1500 万人。因此，德国产品的销售能力决定了其制造业的繁荣和分配利润，一旦销售出现问题，德国将断绝收入来源。所以，德国不得不尽力扩大海外市场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被成功冲昏头脑的制造业不停地向外进行扩张。于 1883 年成立的德国电气公司，初始资产仅有 500 万马克，到现在已达到 2 亿 4000 万。显然，只有一刻也不停止地生产，才能在如此庞大的资本总额基础上获得分红。

以上种种表明，德国对其竞争对手为何会如此警惕，又为何对英国如此痛恨。

2. 德国繁荣的原因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近年来主要由于发掘了国内丰富的煤矿资源而变得繁荣起来。但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其他原因——有真实的，也有假想的。其中一个假想的原因就是：德国的经济成就是 1870 年军事胜利的结果——经常会出现这一错误观点，并且也常常被否认。最近，阿弗内尔通过一篇文章又反驳了这一观点，他十分轻易地就证明了国家财富与统治地位之间相互独立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并不能促进其商业发展。诸如

美国、荷兰、瑞士这些非常富裕的国家根本不具备军事实力。如果说德国由于法国在1871年的2亿英镑赔款而变得富强，这更是无稽之谈，因为仅仅在以军备维持的45年武装和平期间，德国已经花费了超过24亿英镑。此外，德国的整体实力在1870年战争之后的8～10年间并不突出，事实上全欧洲的工商业发展都因为那场战争放缓而不是加速。

德国工业繁荣有许多真正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其树立纪律、秩序的军事化教育以及杰出的职业技术教育。这两者从一定程度上讲有着相似之处，因为工厂和军营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两者之间可以很轻松地过渡。

就连德国人自己也承认其受到军营生活的影响，曾有一位经济学家这样说："正是由于德国军队的纪律精神，我们才得以实现经济发展，由此引发英国对我们无比嫉恨……军事制度是我国劳动阶级的学校。"

在我看来，只有德国人才能容忍那些僵硬严苛的军事制度所要求的纪律和规则。但是，他们到底是怎样利用这些？又到底利用了什么方式来发展工商业的呢？

我已在我的前几部作品中（《社会心理学》、《政治心理学》）解释了后一个问题，并解释了卡特尔的功能以及德国在商业上是如何入侵其他国家的。一位博学的经济学家——米利奥德（M. Millioud）也曾在1915年4月刊的《日内瓦学报》上发表同一主题的学术文刊。他得出的结论和我的十分相似，但是由于他是中立国学者，更能客观地说明问题，因此下面我将主要选摘一些他的观点。

德国日渐明显的扩张趋势是由米利奥德首先指出的，尤其是德国在比利时等国家之内设立了众多便于进行各种直接与间接贸易的商行和代理处。

卡特尔制度非常强大，不仅通过制造商对人员进行组织管理，更是通过设立办公室来调控价格、从中获取收益并分配收益，于是德国制造商可以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货物，将竞争者击垮。米利奥德通过一个例子说明，德国冶金产业的钢筋销售价格在其本国国内为130马克一吨，到瑞士降为120

马克一吨，不可思议的是到了意大利比成本价还低了 20 马克仅为 75 马克。

这种削价销售的方式，再加上长达 12 ～ 18 个月的信贷周期，德国企业在各个国家都有其确定的庞大客户群，并且没有了竞争对手。最终，他们便可通过贸易垄断而随意制定市场价格。德国政府则作为客户和后盾，全力支持其制造业的发展，同时政府还制定了有利于本国企业的有差别关税制度，进一步促进其出口贸易额的增加。

以上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德国银行业为工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德国银行通过吸取大量国内存款和通过从法国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方法大量融资，随后将这些资金用于国内各种工业生产活动所需。如果这些资金仍然不能满足需要，还可以发行股票，这意味着难以转让的商业票据代替了银行的现金储备。

当然这里避免不了会有一些缺陷和风险，使得一些金融机构因此崩溃。另外，由于巨额资本之上的分红要求，只能通过不断提高产量来解决，受此制约德国的工业产出要比国内市场需求高出许多，所以不得不通过开拓更多海外市场的方法来调控价格、管理产品供给。但是，开拓海外市场并非易事，德国遭遇了很多竞争对手，尤其是英国，它的贸易增长达到了德国的水平。

由此，米利奥德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德国人感觉在各方面都受到威胁，但是其实没有一国真正想要威胁他们。德国人宣称为了捍卫自身存在而斗争，这完全没错，因为德国的制造业、金融业和政治早已将其推上经济征服的征程之上，再无回头路可走了。但是他们的所为却给自身带来麻烦，虽然还没遭遇失败，他们却清楚地看到胜利正在离他们远去。随后，德国人便面临这一问题：是否应该坐等失败——坐等贸易停滞、贷款蒸发、全国萧条、民众暴怒？德国人一定自问过，目前局势的演变是否会迟早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如果德国能够先发制人取得胜利，该不该抓住时机？无论如何，正如马克西米兰•哈登所说：胜利者才有资格谈权利。”

我始终相信，德国终有一天会因为上面所说的经济原因发动战争，因为德国学者已就此强调了许多遍，所以这一点不用做任何怀疑。但是，战争的必要性貌似还不够充分，现在开战还不是时候，不过开战只是时间问题。有报道称：

“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汉堡—美国蒸汽轮船公司的主席、德皇最亲近的顾问之一巴林（HerrBallin）发出了极具预见性的警告，值得引起法国所有媒体的关注。巴林沉痛地指出，德国的海外市场正在全面萎缩，甚至可能完全消失——那将意味着德国市场的全面崩溃和几百万工人的失业。开战之前，柏林已有10万名失业工人，制造商想以8%的利息进行贷款都已变得非常困难。一言以蔽之，德国再怎么加紧努力，都难以承受海外市场萎缩的严重后果。”

所以说，虽然现在我们看到的德国很繁荣，但是，此刻正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所笼罩。

3. 德国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商业扩张

面临着种种困难阻碍，德国依然保持着稳定的经济繁荣发展，并且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德国在世界上的商业竞争不仅给其带来了巨大的金钱利益。从一定程度上讲，在工商业的入侵甚至可以与军事占领一样，能够帮助一国征服另一个国家。就目前德国来看，这一理论开始在许多国家变成现实，如比利时、俄国和法国。德国的工商业已经达到了全面入侵的程度，占领了许多地区。例如，德国人垄断了蓝色海岸地区从圣哈法尔到意大利边境的所有大酒店。德国人也掌握了大量的法国制造企业，如药剂、光学设备、化学品、洗染用品等。不仅如此，德国还利用其企业组织、商业手段、技术教育和劳动力等多方面的优势不断地打击排斥法国制造商。根据统计，在法国德国企业已有12000家，照这样下去，再等20年，德国人根本不用费一兵一卒就会成为法国真正的统治者了。

在意大利和俄国也发生着同样的现象，在那里，德国人控制了多数银行和制造企业。并且，德国人也对英国开始商业入侵，虽然相较于其他国家，程度要小得多。由此可见，德国正在对全世界的商业进行迅速入侵，这一任务若不是由于战争的突然爆发，入侵将在不久便能圆满完成。事实上，德国正在一步步地将俄国同化，其实俄国已经警觉地指出了这一点。1915 年 9 月 12 日的《日内瓦日报》就此刊载了国家杜马开会时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德国在俄国的经济扩张与渗透比在其他任何国家程度都要更深，当战争爆发时，德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俄国政府向来懒散，代表们根本不介意是按马克还是按卢布领取津贴，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德国的渗透，更别提德国在俄国设立的各种公立或私立的代理机构。俄国的银行大多数都为德国所有，商行也是，采矿业也是，许多大型制造企业更是如此。至于那些叶卡捷琳娜二世 150 年前在俄国乡村地区设立的德国殖民地，更是完全没有失去德国民族特色，那里的人们完全不说俄语，呈独立族群存在，而且恰恰分布在俄国的战略要冲和通讯主干道沿线。在过去几年间，这些德国殖民地与泛德主义组织的关系变得愈发密切，目前其行为更是引人怀疑。德国对俄国统治者的影响也越来越令人警觉，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和奥地利甚至对俄国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如果将一国为谋取利益而对另一国进行剥削定义为殖民地，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法国、比利时、俄国都是德国的殖民地。

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德国人对欧洲的商业侵略并不满足，于是将其触角逐渐伸向了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扩张。这种扩张的程度甚至促进了德国语言与文明的传播。

身处日本的法国教授贝勒索特（Bellesort）在战争爆发时写道：

"在离开 15 年之后，我又回到日本，抵达后注意到的第一个变化便使我感到恶心——德国在日本几乎完全取代了法国的地位。尽管英国在该国的影响力基本不变，但是我们丧失的，全都让德国人得到了。

“此前，我们的军事院校、教材、教学方法和语言都受到高度推崇，但是如今无处不在的却是德国的教授、教材、军队、语言和科学。在东京的法律院校中，只有100名学生选修法国教授的课，其余1000名都在德国教授的课堂里。在24名赴欧洲留学的学生中，19名都是去往柏林，其余5名虽然赴巴黎就学，却最终还是居住在德国。在大学中，如果俄国人获得一席教职，那便意味着法国人减少了一席教职，而不可能是德国人。此外，当日本谈论欧洲医学和欧洲音乐时，他们所指的完全都是德国的医学和音乐。”

在贝勒索特看来，德国的成功是由于在日本大量发行报纸、评论并设立各种机构。同时，他也批评了当时统治法国的狂热民主党人所犯的严重错误，正是民主党人的宗教迫害使得法国在日本的传教机构被德国人完全取代，后者不仅在东京成立了一所大学，更使得日本媒体做出如是评论：“自此以后，远东的天主教徒将全部受到德国皇帝的庇护。”

在日本的法国天主教会学校中仅有就学名额800个，并且还将法语设置成了必修课程。但是，由于在法国本土民主党人对天主教会的镇压，这些学校不得不停止录取任何学生，学校几乎倒闭。

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日本，德国领先、法国落后的现象也出现在很多其他地区。贝勒索特指出：

“在过去20年中，无论我去到任何地方——美国也好、远东也好、欧洲也好，我总是能遇见无礼、可恶、虚伪的德国人。德国不仅并不满足于利用我们的失误——当然它有权力这样做，而且熟练地篡改我们的历史，伪造我们的产品。所到各处，我都听见德国人公开宣扬或刻意暗示法国正在衰落。德国的教授、商人、外交官和海外移民全都一样，不仅无视事实，还为自己的不公正和不诚实寻找借口。我个人只有资格就日本的情况发言：我们在该国曾经享有如此的荣耀与威信，我们甚至占据了道德权威，但在15年后重返日本之际，我却发现这一切都遭到了德国的窃取与剥夺。我从未发现，竟有一个国家会如此孜孜不倦地采取各种手段针对我们，并一项接着一项地剥夺

我们的权利。”

“我刚一离开法国，便意识到1870年的战争其实还在世界各个角落持续进行着，我们还在不断退却、不断让步，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无论发生什么，都比这种缓慢地分崩离析要好。”

像这样的现象到处可以看到。1915年3月1日的《巴黎评论》在刊文上发表声明称德国正在政治干涉波斯的内政，德国利用其外交与商业手段不断在该国炮制混乱并制造分裂主义的阴谋。

德国的商业扩张尽管已经延续到世界范围内，却仍然不感到满足，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太阳般的中心地位”，德国还猖狂地宣布禁止其他国家扩大殖民地，并且已经做好打击任何试图扩大殖民地的国家的准备——例如法国在摩洛哥。但是，根据德国在非洲的经历，不管其做出多大的牺牲，甚至曾经付出了血的代价、血流成河，却始终没有能够使殖民地变得繁荣兴旺。这是因为，德国扮演的是商人的角色，或许能够获得全世界的认可，但其一旦成为主宰者，就只能收到厌恶与反抗。

第四章现代的德国心理

1. 现代德国心理起源

现代德国的心理是人为产物，其形成历时不超过50年。因为其最早只能追溯到普鲁士统一德国。在兴起的普鲁士时期，构成该国家的并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不同种族，他们存在许多拥有共同特征。事实上，许多不同人种的混合构成了现代德国——斯拉夫人，凯尔特人，蒙古人，巴登、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和撒克逊人，等等。（在很早以前人类学家就已经确定了德国现有居民的起源，并阐述了它的构成。普鲁士人起源于斯拉夫——梅克伦堡人、勃兰登堡人、波美拉尼亚人都是种族融合的结果，甚至还有些俄罗斯血统，前者有着典型的金发长头型，而后者发色则较暗。在荷兰、巴拉丁领地、阿尔萨斯、德属瑞士等地散布着古代日耳曼人的真正后裔。）但是，由于政治的统一性，德国形成一种奇异的心理，虽然这种心理并没有能使得现代德国形成民族融合，但是他们拥有着相同的期盼。由于德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深深的景仰征服者，因此新的统治者很容易就获取了认同，非常轻易地完成了同化过程。这点在历史上就有证明，当年拿破仑进入柏林时，普鲁士诸位王公贵族甚至为了向法军索要佣金而变得卑躬屈膝，就连拿破仑也深深厌恶这种可耻行为，他于是在给达乌元帅的信中写道：“这些人在稍有得意时便傲慢自大，在失意时却又是如此可鄙。”

由于德国本身的历史原因，德国人对至高权力渐渐发展出一种宗教式崇拜——在长达几个世纪中，他们一直被不同统治者主宰，长期被一种严苛的

态度对待。看看他们的历史，就能很容易理解德国人为何长久以来都缺少一种鲜明的个性。只有召唤起国民的所有爱国热情，德国学者们才能够向其灌输大量的同质化观念。如果他们要获得成功，编造历史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这一点就像是某个爬上贵族阶层的暴发户需要重新撰写家谱一样。

曾经有德国学者提出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理论：古代德国游牧部落曾通过对欧洲的侵略与对罗马文明的破坏确实改造了世界。而实际上，在这些部落中，他们毫无文明传统，更谈不上教化，还需要长达几百年才可能建立一个合格的文明。在《罗马史》中杜卢伊（M.Duruy）写道："400 年来，这个掠夺成性的民族都是世界的灾祸之源……"图尔斯的宗教领袖也指出："德国人对誓言毫无敬畏，对征服对象毫无同情，对妇女、儿童和弱者也毫无信义。"

不仅如此，德国历史学家们也无耻地提到，在中世纪，德国曾向世界贡献了许多艺术和文学瑰宝。而事实上，从现代学者们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哥特式建筑作为代表中世纪最美的形象实际上源自于法国，它是中世纪人们的一种抒情艺术形式，这种形式出自有关帕西法尔、特里斯坦、伊索尔特等人的神话传说。还有，封建制度和骑士制度也都不是源自德国，德国只是模仿，谈不上任何创新。就算到现在为止，德国的建筑还是效仿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宫廷的建筑风格。

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德国人秉性中的服从是其哲学的基础，也是其模仿精神的基础，只要了解了德国人的这一性格特征，很容易就能明白德国是怎样改造其国民心理的。

2. 一般特征的德国心理

如果要探究一个国家的国民心理，只细究特例是不够的，需要的是着眼于一般性，因为虽然所有国家都有着共同特征，但是差别依然是存在的。国家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各个省份也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弗莱芒人、布列塔尼人、勃艮第人、马赛人他们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还有，不同职业的人也有

着特有心理——工人、牧师、法官、公务员都大不相同。但是，就像动物学中的普遍现象，除了差别还有普遍特征的存在。例如，不同品种的狗，样貌可能差别很大，但确实是同一物种，因为他们的相似性要比差异性强烈得多。

当今德国人的一般共性，除了团结意识、对权威的服从，还有着强烈的集体优越感——或许后者是因为德国人只从某个角度片面地看待问题，因此不明白其他国家的国民心理。这点我们可以透过历史看到，在战争爆发前，德国外交家们多次体现了其无知的一面。

在德国，这种虚荣心不仅在普通国民中具有，就连知识阶层也充斥着这种思想。甚至有些学者开始对德国人的民族优越性发起了专题研究。

由于在德国人的心理中有着奴性与服从的一面，弗雷德里克大帝曾经说过，他已经厌倦了对一群奴隶的统治。但是，统治者根本不需要做出这种抱怨，因为德国人正是由于其统治的权威才变成了愿意相信一切的奴隶。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德国入侵比利时，告诉德国人说是因为比利时背弃了自身的中立地位，德国必须给予惩罚，德国人对此深信不疑。同样，他们也相信是因为法国的军用飞机炸毁了德国的一条铁路，德国才被迫对法国宣战的。竟然没有一个德国人对这些说法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德国人除了信任统治者之外，对专家学者也深信不疑。他们告诉德国人，其祖先是日耳曼人，蓝眼睛、长头型的。但实际上，这只是学者们持续不断的意向罢了——原先的普鲁士存在更多的并不是日耳曼人，而是斯拉夫人。

对于德国人最普遍的心理特征，应该是野蛮、不绅士、缺乏骑士精神——从普通民众到知识阶层都是这样。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没有什么能够比战争期间从德国战俘处缴获的笔记更能清楚揭示这一点了。其中一位负责翻译部分材料的法军上校说：

“我希望，我们缴获的这一大批德国信函有一天能被发表。这些信函的作者范围甚广，有中产阶级、商人、教授，还有艺术家。他们充分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德国的社会环境和各个阶级的思想。

“从这些信函中，我们看到，德国人是如何冷血，如何在不断破坏中满足其‘艺术天性’，又是如何赤裸裸地暴露其愚蠢与残暴的。我们看到了掠夺者的贪婪、虐待狂的病态残忍。我们还看到，这些人竟然在战争哲学中寻求杀戮的借口，煽动军队洗劫村庄、戕害妇孺。这就是德国人，我们的官兵目睹了一切。”

《泰晤士报》就曾经刊登过一篇这样的文章——《一个德国中尉的思考》，在文章中，作者对于屠杀、掠夺、纵火、强奸等暴行大力鼓励，并希望战争在“堆积如山的尸体和流成海的泪水中”继续进行。他说：

“文明应该从堆积如山的尸体、流成海的泪水和垂死之人的痛苦中树立起自身的神殿吗？——是的，当然应该。如果一个国家有权征服他国，那么其威力便是至高道德法则，所有被征服者都必须对其低头。对于那些被征服者，只有表示同情了！”

这个丧心病狂的作者后来在伊普尔被俘获，所以我们了解到了他本人的一些具体情况。他是海瑟勒(Haeseler)元帅的追随者，曾经在一所大学里任教，教历史，他还说自己和海瑟勒的观点如何如何相同。总之，我们从这些人的言论中得以准确地了解了德国军人和许多学者的心理与思想。

在战争期间到访德国的中立国国民，都对德国知识阶层的残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伊贝罗（M. IbanezdeIbero）——一个西班牙人就是其中一位见证者，他在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

“在德国的知识分子之中，我发现了有关战争最激进、最顽固的想法。在我看来，相比之下，政治家和金融家们的观点要温和得多，大学教授们却常常顽固不化，完全误解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中，他们的思想似乎受到严重误导……他们的思想一点也不复杂，他们有时可能怨恨、有时可能狡诈，但却缺乏心理学知识。”

从这篇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国人对于拉丁国家高度重视的文明与礼节表示完全鄙视，德国人将人性中温和与仁慈的一面视为软弱无力的同义词。

为了美化其残忍，德国人还声称自己不欠任何国家善意或怜悯，因为是上帝选中德国来将其自身意志强加于别国。因此，威廉二世才说了那句话：“在我看来，人道与慈悲到了孚曰山脉这一侧便该消失了。”

德国人除了野蛮残忍外，还显得没有教养和圆滑性，这一点也给了外国人深刻的印象。众所周知，德国皇帝是怎样对待离开柏林的法国大使的，康朋（即法国大使）本人亲口讲述，他被关进了一列由警察看守的像牢房一样的火车，在整个长达26小时的旅程中没有任何食物供应，还被索要了5000金法郎的“过路费”。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当时俄国的皇太后也在德国，也遭遇了这样的待遇。而与此恰恰相反的是，法国对待德国大使却是礼遇有加，用豪华列车送其回国。

只有去过外国的德国人才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缺乏教养。在1914年10月31日的《日内瓦日报》上可以看到，哥廷根大学的博伊特教授（W. Voight）在一次演讲中称：“因为有教养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是更加古老文明的产物，所以通常他们比普通德国人更为优秀。”

德国人很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报纸和书籍就是借着这一点对其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在战争期间，德国人可以不假思索地接受任何荒谬的宣传，简直表现得臭名昭著。其实早在很久以前，德国人的这种易受暗示性的心理就已有所体现。在歌德和席勒的年代里，仅仅《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就导致了许多人的自杀，《强盗》也激励了许多德国学生向往生活在森林里。就算是现在，德皇威廉二世也常常幻想着自己是穿上铮亮铠甲的中世纪骑士。

德国人希望与他人保持一致的心理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受着易受暗示的特质影响，与此不同的是英国人更加倾向于独立思考，表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

撒谎也是德国人最令人厌恶的缺陷之一，这貌似还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早在公元纪元开端，彼得克特（VelleiusPaterculus）便写下：“非常可怕的是，日耳曼人的性格混杂了残忍和狡诈，他们是天生谎话连篇的民族。”

上面的论述中，我仅仅对德国心理的若干层面做了研究，并没有提到帮

助德国人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要素。对于这点，我将在以下章节中予以说明。

3. 影响现代德国心理的普鲁士军事制度

莱布尼兹曾经说过，教育可以在100年之内使一个民族的心理发生改变。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除了教育之外，军事制度也发挥着重要的因素。

就连德国人自己也承认，军事制度使德国人的心理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在普鲁士，所有健全男子都必须经历军营生活——刚开始是两年，然后在固定的时间间隔，于是这个民族便会养成了精确、纪律和服从等终身的习惯。关于德国的军事教育，最根本的就是恐惧这一心理因素，通过弗雷德里克大帝的下列言论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你看到的所有这些人，若每一个人单独存在，都会怨恨我。但是他们一旦形成队伍，并意识到长官正手持棍棒立在他们身后，便会开始在我面前颤抖。他们不仅将畏惧我，还将奋力保护我。更加不同寻常的是，只要我一声号令，他们便会积极地投身炮火，毫不犹豫地为我献出生命。尽管他们不知究竟为何战争，却坚定地相信自己必须为我而死。如要问我是如何获得这一成果的，棍棒的力量是第一位的。”

德国军队向来使用的一项传统就是棍棒和皮鞭。早在一百多年前，参加拉施塔特会议的一位德国骑士就指出：“每天早晨，我都会被巴登军团的长官们体罚士兵的声响吵醒。”

尽管遭到了德国报纸不下数百次的批评，这种严酷的军事制度也没有一丝的放松。在德国被普鲁士统一后，这种军事制度便普及到境内所有士兵，不但没有减弱，甚至变本加厉。于是，在这种军事制度的鞭策下，年轻的德国士兵认识到了秩序、纪律、规则、服从的必要性。一旦他们触犯了每一个规范都会受到无情的责罚，经过长期的训练，德国士兵很快便对长官产生了绝对服从。

德国士兵在战争期间也同样受到了这种严苛军事制度的折磨。一篇1915

年 4 月 23 日的《每周时报》曾报道，有人看到士兵们因为犯了一点小错误而被绑在树上，并且被抽打长达数个小时。

《泰晤士报》曾详细报道了 1915 年 6 月 11 日德国国会开展了一个长达 5 个小时的辩论，是关于前线军官虐待士兵的。各方代表都声称他们收到了数百份关于这类问题的抗议。

《泰晤士报》就此评论："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手段似乎很对德国人的脾气……必须指出，他们的存在、生活、行动都遵循着军事制度，而欺凌和暴力是这种军事制度中不可避免的部分，摧毁了个性并统一塑造了人的身心。实际上，德国战争机器的力量正是在于，这种军事制度已获默许并已存在多年。"

根据长久以来人类对动物的驯服就可以认识到，对于鞭子的系统运用将有多少收获成果，现代德国的许多成就也正是如此。许多德国人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终其一生都不时回头看看自己身后的鞭子，因为这条鞭子使他们记住自己的职责、义务。不仅如此，这条鞭子也促使德国发展出了一种令文明国家十分震惊的关于权利与权力的理念。一个遭受了长官肆意鞭打的士兵会发现仅仅靠权力就可以剥夺并占有权利。于是，两者在他眼中便没有了区别。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民族在经历这种训练后确实获得某些成就，德国人渐渐适应了这种服从了几个世纪的制度。换作第二个民族，则绝对不会忍受这种军事制度——当然黑人奴隶和一些亚洲部落就不在考虑范围内了。

在德国军队中，军官因其在军队中的权力而受到极大的尊重，甚至还会幻想自身从出生就优越于其他人，所以除了军纪以外，不用遵守任何法律。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事例：一位德军上校仅仅是认为他们没有给予自己足够尊重，就私自将 30 多名平民和一位法官监禁了 24 小时。当他被带上军事法庭后，军事法庭一致同意将其无罪释放，而且还受到了皇储的祝贺。同样是这种事情，若发生在英国，他肯定会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被送上绞架。

从一定程度上讲，德国军官就是海盗，他们除了自身职业外对任何事物都非常无知，业余爱好也只有赌博和酗酒。因此，其心理貌似是继承了中世

纪那些酗酒、粗野、四处掠夺的骑兵。

4．教育对现代德国心理形成的影响

德国的教育和其军事制度一样影响着现代德国的心理——虽然其重要性不如军事制度那样明显。德国为了满足现代工业社会的需求将其基础教育至高等教育都做出了调整。职业技术教育在德国很发达，德国有很多职业学校，包括烹饪在内。德国的技术教育和其他高等科学教育都有一条成规——劳动的细化分工。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那就是高度关注局部细节而忽视整体。这一准则不仅在学术研究领域适用，同样也适用于各类实验操作。

克洛斯特（M.Croiset）曾这样评价德国学者：

“他们几乎把所有心思都花在校对手稿、编目、整理参考文献等所有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了，这使得那些更加智慧、灵活的人们对此深恶痛绝。”

我们不应该用贬义的态度来看上述问题。这是因为，这个方法能够为不聪明的人做研究提供途径，从而对一个民族整体来说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种劳动分工在科学和工业实验室同样存在，因此为技术领域的许多实际成果也做出了贡献。即使是最优秀的科学家也会将其研究，分工成非常精细的领域，比如说细菌学家欧立希（Ehrlich）的一个赫赫有名的操作方法：

“在确定最终配方之前，他首先需要许多药剂师为其准备许多类用砒处理过的化合物。这项工作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因为任务非常繁重且非常麻烦，对每一种化合物都需要先做化学分析。”

就连现代工业对于这种细化分工的制度也非常需要。奥斯特瓦尔德错误地认为只有德国人才掌握这一方法，英国和美国通过对德国的挑战证明了除了这点其他方法也可以奏效。有分工就会有组织，有组织就可能会有进步，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罗马正是由此变得繁荣昌盛，而其他从来没有组织性的国家，像土耳其等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始终没能获得任何长久的成果。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没有欧洲人的帮助，这些国家连修建公路和铁路的能力

都没有。

但是，德国人同样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他们相信只有国家才能发挥组织作用。毋庸置疑，德国确实成功实行了僵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这大部分是靠其已实现的高度军事化，由此国民才能够对于最严格细致的规范与管理迅速适应。但是，这显然不是一种最好的制度。事实上英国和美国也同样非常成功，但它们并没有使用这种制度，相反是完全不同的制度——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人主动性，将政府干涉降至最低限度。

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家社会主义与个人主动性是两个完全不可调和的概念，不可能相互转换。关于选择哪一种，完全取决于不同民族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状态，不同的民族选择也不同。

5. 宗教对现代德国心理形成的影响

与军事制度相比，普鲁士的宗教对现代德国心理产生的影响就显得很微不足道，我本来不打算提及。但是，为了佐证我已经在之前作品中提出的观点，我还是决定对宗教问题做一下探讨。有人认为，如果宗教信仰相同，各个国家就可以保持一致，这种观点非常错误，因为在适用某一宗教之前，所有国家都已经事先依照自身心理将宗教进行了转化，也就是说这个宗教已经不是原来地道的宗教了。

由于各民族心理构成的不同，所以说即使是同一宗教或者同一本宗教经典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听起来很有趣。例如，在英国新教信仰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德国却无人问津。新教信仰通过解读《圣经》在英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圣经》对于新教而言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宗教经典，对其教义的绝对服从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基础。对英国人来说，解读《圣经》的意义和影响都非常大，因为这种自由解释与英国人的独立精神非常吻合，于是注定了英国宗教将会崛起，使英国人能为自己真正的情感表达找到渠道。所以不久后，《圣经》中的耶和华便成了英国人眼中的上帝。

另一方面，由于德国人认为基督教的神明有些过于仁慈，于是就将其赋予了更多野蛮、粗暴的特点——遗弃弱小者，而只保佑强者。德国哲学家对此篡改视为正常，因为他们知道，并不是神明改变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内在灵魂，因为神明产生于信仰者怎么看待他们。

关于基督教在现代德国的发展历程，上面这个观点用得很广泛。德国将一些关于慈善、温和、保护受压迫者的福音派理念（尼采斥之为“奴隶道德观”）与一些完全不属于基督教教义的精神如武力、野蛮、征服等综合在一起，从另外一个角度——心理学看来，这确实很难得。因为神秘主义的逻辑可以不受限制，因此虽然德国的政治理念与宗教理念完全相悖，却可以相互融合。

在德国就连神学家也支持上面所提到的两类理念的融合，而法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同样是政治和宗教的融合，德国政府可以得到宗教支持，却给法国带来了很多问题，因为一个国家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更好地发展，如果一个国家内部总是存在相互敌对的势力相互克制，那么这个国家的实力将会受到很大限制。

德国的新教教会也并不是个充满爱心的天使。在平常时期，新教势力不能给天主教会造成威胁，因为后者足够庞大，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但是到了战争时期，新教便找到了发泄其宗教仇恨的机会。所以，他们并没有任何理由地处决了大量天主教士，并且毁坏了许多天主教堂的建筑。

6. 现代德国心理的统一性：强调集体主义而缺乏个性

上面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德国人的心理，都是在普鲁士的铁腕统治下形成的。它们成功地磨灭了德国人的个性，使其变成一种集体心理。

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心理上能够达到如此的高度统一。在之前我也说过，如果一个人有机会审问一位德国战俘，那么他一定会因其思想言行的一致而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一定会认同下面的一篇《洛桑报》记者评论：

“我绝对不相信，德国民众竟然能在心理上达到完全统一——有人可能会说，这几千个人似乎都在用同一个头脑思考。达到这种程度，到底是可喜还是可悲？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心理感染的现象，还是战争宣传教育的产物？尽管这些德国人感情不同、智力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其个性似乎都完全消失了。在德国，没有任何‘个人’，只有民族、社会组织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

目前，德国人拥有着勇气、主动性、决断力等优秀的集体品质。如果德国人想要开展行动，就必须融入工会、企业或社团等集体性的组织。即使一个独立的德国人也依然是个集体。在研究科学的最高领域中，德国人也是完全集体化的工作，越是一些精细学科的论文，越是交给许多人共同完成——比如对眼科的研究文章。

只有记住了德国人心理的集体性，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会出现 93 名德国学者联合签署那份臭名昭著的宣言。在这份宣言中，包含了许多需要用心理学深究的内容，也体现出了由于集体心理而造成的智力欠缺，这一点在未来一定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另外，我很久以前在作品中指出的事实也在这份文件中得到了证实：当集体发挥作用时，就连最睿智的人也会丧失一切判断力。当用集体的角度进行观察活动时，一切不容置疑、清楚无误的事实证据都会被集体视而不见。

所谓的《93 宣言》就是为德国的残忍杀戮、劫掠进行辩护。下面是这份宣言的一个片段：

“我们并没有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事实证明，是法国和英国决定破坏其中立地位。比利时是与英法签订了协议的，如果我们不先发制人，将会带来自杀性的损失。

“我们的士兵既没有伤害任何比利时公民，也没有毁坏他们的财产，除了某些迫不得已的情况。

“我们的军队并没有向鲁汶发泄怒火，他们不得不轰炸这座城市的部分

地区，只是为了向这些地区的部分敌军和暴乱分子复仇。”

上面所说的对事实的否定，我们没有必要做任何争论，因为这些事实都已在官方文件中得到证实。现在，可能这份宣言的起草者们也已经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他们中许多人将感到懊悔不已。但是我可以肯定，没有多少人能像马克西米兰·哈登（MaximilianHarden）一样有勇气写出下面的言论：

“我们不要再费力为德国所做的一切找借口了，停止对敌人的侮辱与攻击吧！战争并没有违背我们的意志，也不是突然被强加给我们的。我们想要战争，我们不得不发动战争。我们不接受欧洲的审判，是因为我们不承认其管辖权与合法性，我们将用自身武力在欧洲建立新的法律。德国参与这场战争，是因为我们需要在世界上争取更多生存空间与更大的产品市场。”

7. 为何德国能在心理上迅速适应现代世界工业发展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保持持续发展进步。经历一个时期的发展和繁荣之后，肯定会陷入衰落甚至灭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逃脱。有的国家被彻底摧毁，连首都的遗址都难寻踪迹，只有现代人在考古时才被发现，如特洛伊、尼尼微和巴比伦等。

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这些兴衰周期的发展。我必须指出，动物世界“适者生存”的主导法则在人类社会同样适用，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所有生物都必须做出调整来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只有做到这点的物种才可以继续进化发展，一成不变则会逐渐灭亡。

每一个气候变化都会引起动植物的进化发生转变，同理，每一个经济、政治、宗教、社会变化也将会促使国家与民族心理发生特定改变。但是，对于环境变化的不同，各国适应能力也并不相同。即使在某一环境中最有优势的素质也可能在另一环境中失去作用。

在今天，科技与工业的快速发展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使得德国人的某些原来毫不起眼的品质变得突然重要起来。细化劳动分工对

于现代生活高效实际的要求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一个民族具备耐心、规范、专注等品质是必不可少的，可能这些品质对于那些过于机灵或充满幻想的民族非常不易，但德国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些，这都要归功于德国人无情的军事制度和其天性。

这些品质在19世纪初还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到了现代社会却显得尤其重要。工业发展在19世纪初还处于早期阶段，科学发展也没有今天这样迅速，急需像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这样的科学家来奠定基础。但是现在的世界却不再需要这样的科学巨匠，因为他们的地位已被广大的劳动者群体所取代，通过细化分工的方式，这些劳动者将整个巨大的物理世界分割成了无数的小块。在德国的实验室中有着成千上万的专家在进行最精细、最具实用性、最具营销价值的研究。冯•比洛曾经给出这样的评价："自从1870年起，德国已遍地全是商人了。"

这些专家都曾经为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却不明白许多一般性法则。所有德国的科学家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达尔文、巴斯德、贝尔纳等具有天生哲学精神的学者。德国的实验室也从未产出电话、飞机、汽车、无线电等现代发明。但是，即使存在这么多的不足，德国的虚荣心却可以弥补一切，使得一些学者对历史做出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解读——知名学者在撰写有关化学和细菌学的书籍时，只字未提拉瓦锡或巴斯德。张伯伦宣称，但丁、伦勃朗、帕斯卡尔、莱辛等人都是德国人。

尽管德国人很少有新的思想产生，但却总能将世界先进思想理念系统化地应用在自己身上来取得进步——不仅在科学领域是这样，就连哲学领域也是如此。在德国统一之前，未被普鲁士军事化的小国宗法制度时，德国曾出现过大哲学家和大思想家。德国统一后，却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物：例如尼采的作品虽然广为传播，却只是在重复早期德国历史学家宣扬武力崇拜的观点而已。

不管怎样，我必须指出德国人已经成功地适应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尽管他们昨天还微不足道，今天就可以向全世界昭示其勃勃野心。

取得成功后，德国人自然要总结并列出其成功的因素。由于制造业、贸易和军事是德国的最大优势，所以德国宣称自己在这些领域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德国提出了许多优越性的表现，其中有三个价值标准可能是他国无法接受的。第一就是其军事奴役的军国主义精神；第二就是其动物的本能——这也是德国人毫不节制地生育繁衍的原因所在；第三就是其群体精神，由于这种精神的存在，德国人才会奴性地服从一切国家强加给他们的思想。

未来是否会有国家遵循德国人的标准，对于这一点尚不能明确。大量生产酸菜、香肠、铁器、啤酒和各种杂物并将这些东西销售到世界各国，同时又用大炮确保没有国家同其竞争。这难道就是人类的理想吗？

未来各国的命运会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一旦普鲁士军事制度得到蔓延，自由将被遗忘在角落，人道主义将被长期束缚，人类的未来也会变得一片黑暗。

卷三

引发战争的起因

德国人认为，英国和法国希望战争，并一直在准备发动战争；而法国人也坚持认为是对方最先挑起争端，并发动战争。既然这样，我们不妨先不讨论引起战争的近因，先把它放在一边，先来探讨另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原本和平的欧洲陷入战争？

第一章引起战争的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

1. 战争的假象原因与真正原因

能引起战争的原因有很多，不仅有远因，也有近因。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在此次章节，我将就此向大家一一讲解。

引起的战争的原因并不简单，不仅有真实的，也有假想的，而且假想的原因并不是完全无用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举动也有刺激作用。我经常认为，对于人类动机的理性价值，哲学家不需要过多的研究。原因是，大多数历史都是人类假想出来的，假如将关于假想和理性的较量全部抹掉，历史就会变成一个空壳。

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很多，在这其中，有持续了半个世纪的，也有仅七天就爆发的，就这点而言，我有两个疑惑：一是到底有哪些原因持续积累了几十年？二是在外交会谈中，在那一周，爆发战争到底如了谁的愿？要解开这两个疑惑并不简单，原因是，对于战争的原因，双方说法不一致。德国人认为，英国和法国希望战争，并一直在准备发动战争；而法国人也坚持认为是对方最先挑起争端，并发动战争。既然这样，我们不妨先不讨论引起战争的近因，先把它放在一边，先来探讨另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原本和平的欧洲陷入战争？

2. 德国人口过剩导致战争的猜想

关于人口过剩曾经有一种说法——因为德国人口过剩而使得德国不得不向法国宣战，但这是耸人听闻，并不可信，原因是，想把自然法则应用到人类社会上，这完全是不可能的——而普鲁士学者正是这种想法的始作俑者，他们经常用。伯恩哈迪（Bernhardi）在做研究时，特别喜欢将自己的研究与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的理论联系起来，搞得很有基础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得出的结论却经常与预期的不同。虽然动物的世界有可能会处于自然的完全统治之下，但想让自然法则应用于人类社会，这一点完全是异想天开，根本无法达到，因为人类有很强的反抗自然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马尔萨斯的理论：全部的生物都倾向于过度的自我繁殖，当然人类也包括在内，但物种数量的不断增多以及伴随着生存资源的不断减少，所以这两点就制约了生物的过度繁殖。举个例子，瘟疫和战争会让物种死亡，从而使种群数量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在一个地方，农业和工业不断地发展，那么这个地方将来容纳的居民一定比现在多，但是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有一些人的生活变得越发艰难，当他们感觉到这一点时，他们不是离开这座城市，就是侵略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众多民族在其发展中都经历过，例如之前的德国和今天的日本。

虽然德国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德国人口将要过剩是导致德国不得不参与战争的原因。但是，这种说法只需简单的证明就知道是不对的，现在的德国人口并不过剩。以下节选自伯恩哈迪的著作《现代战争论》《VomheutigenKriege》第一卷中的内容：

“就当前世界的走向来看，我们若想保证国家的未来，那我们一定要做的就是发动战争。

“与法国相比，当前德国有6700万人，而法国仅4000万人而已，这么说，

德国以相同的国土疆域养活着更多的人。不仅如此，德国人口还在不断增加，以每年 100 万人的速度。在未来，德国的多余劳动力必然会越来越多。所以，不是希望人口因为生存困难向海外移民，就是需要扩大领土面积，创造殖民地，从而使过剩的人口能够有工作，有物质基础。

"根据现今世界的政治势力的分布分析，我国如果想要扩张领地，所要做的不是发动战争，从他国手中抢夺殖民地，就是与他国结交。但是，这并不简单，若我国在欧洲的地位低，以上都只是空谈。因为我国的外交政策没有再上升的余地了，唯有战争才可以达到我国的目的——对更强大的国家政策宣示。我们完全无法承受这些压力和负担。"

而且，一些德国学者也坚信这种说法是对的。伯恩哈迪还认为：

"面对人口的不断增加，我国的国土面积太小。所以，扩大国土面积是必需的，而对于那些人口逐渐减少的国家，他们并没有完全利用所有的土地，所以我国将取代他们利用那些土地。法国就是这些国家中的一员，所以面对我国的取代，他们应开心才对。"

假设以上的说法是对的，那么照理来说，德国人口的迁移应该继续下去，并不断增长。但实际却不是这样的，德国人口的迁移不但没增多，竟然每年在锐减，而且英国人口的迁移也高于德国：德国的情况并不如先前预想的那样，相反的，德国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每年，德国必须从意大利、克罗地亚和其他国家引进众多的劳动人员，从事德国的收割和采矿的工作。

德国的人口还在增多，现在差不多有 7000 万人，而且还没达到人口的迁移的程度。从世界人口分布看，德国人口根本没有达到密集国家的程度，以下是世界各国的人口密度列表：

国家每平方公里居民人数

法国 74

德国 120

意大利 121

日本 139

英国 144

荷兰 182

比利时 254

我们现在大可以暂时以德国学者的视角考虑：统计数据展示的事实虽然与他们的说法根本不同，尽管我们勉强这样认为。但是，发动战争对德国有利这一点实在让人不解。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德国控制了许多国家，而且德国又已凭借廉价商品占据了世界市场，借此拥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度，在很多地区。就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了，德国也不可能获得那些战败国家的友好对待。所以说，没有一点可以证明是人口过剩导致德国发动战争的。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强大是因为人口增多的说法同样是不对的。虽然在法国这种说法被大家普遍接受。虽然我早已遭到贝迪永（Dr.Bertillon）博士的呵斥，但我依然坚决不认同这种理论：假设强大国力是凭借国家人口众多就可以达到的，那这么说，世界强国前列早就应该有中国和俄国了。但实际上，在日俄战争中，俄国不仅输得狼狈不堪，而且在如今的这场战争中也连连失败。

人口的多少并不是决定国家实力强大与否的最主要因素，而是军火、财富和交通。若能够提供无限的武器弹药，即使是一支5000人的军队，也能顺利地被调遣至任何地方，一定可以战胜一支交通阻塞、弹药缺少，但人数众多的军队——俄国军队的弱点正是这样。

而法国呢，虽然近年来的人口没有增长，但是人口素质却有所提升。就我而言，更喜欢自己生活在像希腊那样的小国家，而不愿意生活在像波斯那样的大国，虽然小国人口少，却能最大地实现人生的价值。在我看来，我更愿意是那一小部分被上帝选中的人——即使人数不多，却是少许人才。但是，普通人的增长以及威胁世界是少许人才所阻止不了的。即使现实中是这样，

小国家也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反抗侵略者的入侵，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很遗憾，我还发现一些学者居然信奉数字，而且，科尔森（M.Colson）——法国最权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也是这样认为的。让人有这种脱离真实的想法的正是唯数字论：在一个工厂中制造商品，在另一个工厂中制造炮弹，然后用炮弹确保商品的正常流通和出售——这才应当是人们一直以来的目的。然而，如果这就是人类全部的思想，那么人类的生存动力将会很快丧失。

3. 商业扩张与领土占领的欲望

那些军事实力不断强大的国家，对于它们而言，扩张与征服的想法是肯定会有的，那种想法也很正常。随着一国实力的强大，对于那些先前仅仅是贸易对象的国家，它们就想要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态度就自然会有所改变。如果这些国家不愿承认其野心与骄傲就是扩张欲望的缘由，就理所当然地以物质为借口。以德国做一个例子，拓展贸易市场的需要——就成了德国学者们的借口。同此前提出的人口过剩假说一样，这一借口同样荒唐。因为我已提到过，在夜以继日地对外扩张中，德国早已建立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即便是这样，多数法国学者却认为爆发战争的原因之一是德国需要开发海外贸易市场，和德国学者持一样的看法。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托（M.Hanotaux）也是这样认为的，以下是他的言论：

“对于德国想要发动战争有很多的原因，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想必大家都知道——扩张海外贸易市场，以保障劳动力的利用和商品的正常流通，给予德国民众基本的生活保障。我将它命名叫‘饱腹政策’。就是因为这个政策，德国人开始了对外的殖民扩张，就像一群吃不饱饭的狼一样。”

在索邦大学的列维·布吕尔（LevyBruhl）教授的另一部相关作品中，他也阐述了相似的观点：

“英国、法国和荷兰这些国家，它们拥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并能够保

障商品在市场上的正常流通。相比之下，德国就不是这样，没有那么多的殖民地，所以德国对此很是愤怒，从而间接地使它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德国还自己问自己，即使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却保证不了拥有市场和商品流通，那么这种力量有什么作用？”

总结以上引述言论所包含的观点：当前战争的一大原因是德国对拓展海外贸易市场的欲望——这真是当今最大的荒谬言论之一，甚至令我诧异的是，竟然还会有人认同。实际上，要否定这种观点很容易，只需略略一扫贸易往来的统计数字：海外殖民地绝对不是法国与英国的最大贸易对象，而是那些大国，那些它们从没想过要征服的大国；即便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全部被德国收归己有，与法国、英国与俄国之间的贸易，获取的商业利润，是任何贸易往来所不及的。难道在这些事实证据面前，德国还要称在自己战前，需要开拓更多海外商品市场吗？德国的商品能够不受到任何阻碍地进入所有国家。

既然德国已经能不费任何代价，并且不用一枪一弹地占领了市场，那现在又何必再发动战争呢？

《政治心理学》是我的另一本作品，在这本书中，我早已在题为“殖民的新形式”一章中说道：到现今为止，德国是怎样将本国政府的问题与损失转嫁到别处去的，又是怎样剥削、入侵其他国家的——以德国在蓝色海岸长达 125 英里的殖民地为例。让我们来回答这一假设：假如英法两国在战争中败给了德国，那么，这两国与德国之间的商贸往来会有所增加吗？答案是不会。而且英、法两国与德国的商贸往来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还会相应减少，原因是，德国的胜利意味着英、法两国的战败与贫困。

为此，我必须再次强调，开拓海外市场绝对不是德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动机，

因为这些市场早已被占据了。如果人们不经大脑思考就认同了上述的荒唐观点，并放任它四处传播，这一问题根本不会在本章中被提及。

4. 列强间的扩张比赛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说，德国想要爆发战争是为了殖民地，不仅仅是开拓贸易市场那么简单，而是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在海外殖民地建立海军基地，用来补给德国舰队。

德国借摩洛哥危机向世界展现了其野心，同时也发现欧洲各国其实并不担心他们的殖民地被他国入侵。世界的主要殖民地早已被瓜分了，所以德国就必须通过暴力手段获取新的殖民地，鉴于德国早已建立了一支规模庞大、实力超群的海军部队，所以，这对德国来说太容易不过了。

但是，使德国大为恼火的是，德国的殖民野心在阿加迪尔事件中遭到法国与英国的阻挠。它们认为，这只是德国在寻找时机和借口罢了，但必然无法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其野心。在俾斯麦所犯下的为数不多的错误中，其中的一个错误是：让德国在殖民竞赛中错失先机。推动法国采取殖民政策原本是俾斯麦的计划，进而在英法两国之间引入战火，而德国从中获利。这个方法不但没实现，而且使德国丧失了殖民优势。虽然英、法两国并未刀兵相见，却令法国与德国产生了利益冲突。但是，俾斯麦所处年代限制了他的主张，由于当时德国海军还没来得及发展壮大，所以，实际上，法国的殖民政策发展与德国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俾斯麦不可能想到的。

德国是为了摩洛哥参战的这一观点，我并不认同。因为德国更着眼于近期目标，它的扩张野心更大。我曾经在另一本书中说道，由于德国需要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作为其海军军港，所以德国发动战争是早晚的事。

即使安特卫普的归属问题不能断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原因，但德国的首要目标之一确实是安特卫普。对此仍存疑虑的读者不妨读一读下面这封信——德国于 1915 年 4 月 17 日写给美国的公开信，当时，德国的前殖民政策部长邓伯格（HerrDernburg）受政府委派前往美国，向美国公众阐述德国参战的原因，力图以此扭转美国公众对德国的印象：

“德国西面的贸易要道是德国唯一的海上通道，正是这条海上通道能够

保障德国的贸易，但是比利时拥有其控制权，所以，德国若想夺取这一支配权，德国向西侵略就是必然的。但是英国一直处在保证比利时的政治地位，这抢走了德国的天然优势。所以，我们要侵略比利时。”

德国不仅幻想占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而且还觊觎着法国的阿尔萨斯。所以，我便一直主张着一种说法，在比利时沦陷后——这将会是一场耗时很长的战争。

5. 政治上的失误

一些遥远的政治事件多多少少都影响着当下的战争——至少追溯至丹麦被普鲁士的占领。欧洲各国在当时并未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场军事征服，之后，由于各国的放任，普鲁士占领了奥地利。假如全部都归因于这些人的政治盲目，想必这也不能令人信服。这算是当时欧洲政治家们犯的一个重大错误了。

我不能花费太多篇幅在此处细说这段历史，只能简单地谈谈在1870年英、俄外交官犯下的一些错误，这其中英国内阁的无知算是最严重的错误——有一项提议被他们拒绝了，而这一提议原本是能够阻止德国被普鲁士占领的。在很多年前，我已经发表的作品中，早已指出过这一错误的结果，此处仅简单说说：

英国现在如果凭借增加税收，以指望扩大舰队来应对德国的挑战，那都是因为在40年前英国的统治者们未能预见到一切。英国由于私利，在普法战争之后，使成立欧洲代表会议、联合遏制德国的提议被拒绝了，那么，历史将大大改写。从俾斯麦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上，他曾经日夜担心这样一个会议真正召集起来。

英国和俄国的政治家如今肯定都悔恨不已，为他们前任们的错误，俄国显然不会忘记（M.Hanotaux）某天说的话：在1870年，俄国通过对奥地利施压，阻止奥地利参战的手段帮助德国战胜了法国。

当然，为历史的错误添上浓重一笔的还有柏林会议。柏林会议造成了巴

尔干的复杂局势，并引起了战争。

然而，我要在此重申的是，这些问题都是我无意探讨的，因为我们在讨论政治心理学错误导致的后果时，仍然有机会继续这些问题。

第二章种族间的怨恨

1. 民族怨恨的原因——不同的民族心理

由来已久的巴尔干各国的种族仇恨也是当时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在我们进一步深究其影响之前，我们需要详细讲述这类种族仇恨的起因。

正如我们之后所见到的种族仇恨，随着利益冲突可能会进一步深化，但这还并不是其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隐藏得很深。不同种族具有不同的心理渊源，对同一刺激的反应不同，对同一现象的印象不同，那么，彼此之间的情感与行为也就迥然不同，所以最终无法彼此理解，无法达成共鸣。

就知识领域内的技术或科学问题而言，当然，各国国民容易达成共识。但是，当面对其他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例如政治、社会、宗教等诸多问题时，他们则容易被情感的、神秘主义的、集体的冲动思想所摆布，他们都无法理解彼此的感受，无论谁的智力水平多高。由于他们的多数观念都源于周围环境对潜意识的暗示，而种族性格的基本组成部分正是这种潜意识，所以无法相互理解。

种族不同的人不仅无法相互理解，更是难以接受他人观点竟然与己方观点不一致。如果希望完全理解他人，就必须先听得懂对方的观点——不同种族之间还有着语言上的沟通障碍。所以说，不同种族无法相互理解，这并不奇怪。

形成各种种族的情感差异的原因很多，即使处于同一语言环境中，但种族的差异仍然无法掩饰。因为，即使人们可能说着相同的语言，同样的话，交流没有障碍，但在头脑中唤起的意象却不同。说话者不同的心理变化导致

话语中蕴含的意思也不同，只有含义明确、指向清楚的词语——具体词语——才具有确定、普遍、客观的意思。而抽象词汇的含义就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了，例如像灵魂、自然、自由等主观的词语，每个人根据自己身处的环境任意加以解释。

但是，即便缺乏相互理解，在国际交流中，国家之间也可能会为维护共同利益制定条约，或形成友好关系。然而，保持一定距离会有效长久地维系友好关系，稳定国民情感，防止产生冲突。原因是，不同国家拥有的理性可能相同，但具有的情感是完全不同的。

2. 宗教与物质利益矛盾产生的民族怨恨

宗教与物质利益冲突产生的力量是非常强的，足以在国内挑起仇恨战争。所以，各国国民之间原本就存在的天然仇恨更可能被加深。

关于宗教分歧引发仇恨的事例，我根本不必赘述，原因是，以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为由引发的暴力事件数以千计，充斥着整个人类的历史。所以，这个话题跳过，在此处，我们只探讨由物质利益冲突所引发的种族仇恨。

这其中有一个例子，德国人对英国人的仇恨。这两个民族的亲缘关系很近，但是，因为在世界一些地区中的贸易竞争，两个民族却成为死敌。德国为了建成并装备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花费大量资金投入，以便与英国人在军事上对抗；英国也被德国的许多报纸描述成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消灭的敌人。不仅在德国平民中普遍滋生这种仇恨，而且也在德国学者圈中蔓延——可参见柏林大学教授爱德华·迈尔（EduardMeyer）的以下言论：

“众所周知，英国和德国是死敌，那么在未来，英德两国之间的矛盾会不断激化，变成对立与仇恨。英国不希望德国存在，想要消灭它，这一点想必大家都有了解。尽管两国对外是和平的，但这一矛盾仍然存在。想要解决这个矛盾，想必只能依赖后代了。”（《科学 Scientia》，1915 年 3 月 1 日）

德国对英国的仇恨是种族感情的完全对立，而不仅仅是竞争对手间的仇

恨。德国人坚信不疑地认为自己的民族是至高无上的，从而认为英国国力与财富增长是不公平、不能容忍的，并对英国称霸全球很恼火。英国接连地被德国作家们和哲学家们批判为全人类的敌人，现在不过是在炫耀自身实力，在未来，德国必将打败英国。

海德堡大学的勒纳（Lenard）博士——《93宣言》的签署者之一，在他写的一本小手册中引用了 M. Hovelaque 的言论：

“英国是虚伪的，我们要消灭它。只有它不存在了，我们才能与之相处。这个强盗，我们要与它斗争到底，不只是为保护祖国的荣誉不被伤害，民众得以生存，而是再一次的十字军东征，这是确保诚实与正直存在的方法。”(Re-vuedeParis，《巴黎评论》,1915 年 3 月 4 日)

我们可以从以上两位学者——至少其中一位非常著名——的言论中推断出，英国引起了德国普通学者们的愤怒。但是，并不仅仅是英国，这种愤怒还涉及其他国家，宗教信徒对异教徒的仇恨大概就是如此。以下是在美国发行的德国报纸的选摘，从中可见此类宣传的言论：

“只要我们征服了敌人并占据其土地，在我国强大的军事铁蹄下，无论是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还是其他任何劣等民族，都不敢有任何异议，否则就会灭亡。将来，我们会建造美丽的教堂与神庙，供奉德国皇帝和我们其他的伟大祖先——劣等民族的覆灭就是他们的功劳。

“哦！上帝！我们感谢您！让天资聪慧的德国皇帝来执行这个使命，达尔文也说过（我们伟大的德国学者开创了这一理论，他一定是借鉴了这个说法）：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德国人就是适者。因此，德国人高喊：让一切腐朽覆灭吧！德国人是最高贵的种族！”（转载于《泰晤士报》，1915 年 6 月 29 日）

这就是德国人对其他种族的看法。德国人对邻国人一无所知，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智慧的学者，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中。在德国，学者们的理论完全主导着德国的世界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外交政策的短

视就是这种狭隘无知导致的。

3. 政治引导下的民族怨恨

一个种族的政治制度是由其心理决定的，至少决定何种政治制度更倾向于被一个种族接受。德国人迅速地接纳了普鲁士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点显而易见，德国人再也想不到任何其他可能实行的制度，他们已经如此习惯这种制度。而且，德国人还想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这种制度。相比之下，德国领导的集体意识主导德国民众的意识，而英国和美国则与之相反，他们的意识是个体意识，属于集体的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

德国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那么在欧洲，随着军事独裁占据最高地位，自由将不再存在。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的这句话恰恰道出我的心声：

“（如果德国控制了欧洲）我宁可去死，也不甘心存活下去。”

显而易见，不同的政治理念，在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足以造成彼此拥有不可调和的仇恨。

4. 在政治矛盾中民族怨恨的位置

种族问题长期持续地影响着国家之间的政治生活，并且在日后还将如此；但是，“民族”一词应当用“种族”替换，即使“种族”的意思并不与人种有关。“民族”一词一贯被政治家们运用，用在因种族、宗教、语言、风俗等凝聚而成的群体上。

“民族”慢慢地成为现代政治团体的主要纲领，并被有关均势的旧学说所代替（尽管后者也并不可靠，但却相对没那么危险）。尽管它的概念根基还不是很牢固。

也许，未来的欧洲政治很难会稳定下来。因为，虽然各民族同在一个君主国的管辖下，但各民族间仍具有极端差异，万一有朝一日独立了，刀兵相

见在所难免。奥匈帝国就是这些国家中的典型代表，该国在不同时期根据人种、宗教、语言、风俗习惯在内部划分了许多民族，国家从未实现本国民族团结。该国有 1200 万德国人，1000 万马扎尔人，650 万捷克人，500 万波兰人，350 万乌克兰人，400 万拉丁裔（罗马尼亚与意大利）混血人，等等。德裔和匈牙利裔多年来始终有冲突，但是，现在为了遏制国内其他种族，竟达成和解，联手抵制。

这些民族一定会随着奥地利战败而相继瓦解。特兰西瓦尼亚、达尔马提亚、加利西亚、黑塞哥维那、匈牙利和其余地区将各自建立小国，从帝国中分裂出去。同质性在这些小国眼里完全是个陌生词，因为它们彼此没有丝毫的关系，只是自成一体的种族集合而已。

类似的民族混杂现象在巴尔干诸国都见怪不怪，在这些国家里，民族被独立划分，依其宗教、语言、愿望等。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地区，这些罗马尼亚统治下的民族可以根据《巴黎评论》刊载的统计数据看出：

“特兰西瓦尼亚有罗马尼亚人 154 万、捷克人 56 万、匈牙利人 38 万、日耳曼人 23.4 万以及其他族裔 5.4 万；而布科维纳的人口统计数字说明，该地区有罗马尼亚人 20.8 万、俄罗斯人 9.1 万、乌克兰人 26.8 万、日耳曼人 5 万、波兰人 2.5 万和大约 8000 名的匈牙利人。”

从之前我提到过的事实可知，这种混杂的人口构成非常危险：民族间的仇恨很深，兵戎相见在所难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巴尔干诸国是因为受着土耳其的统治才和平共处的。但是，一旦他们脱离土耳其统治，他们会向对方发动战争，虽然他们并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从盟友变成敌人的事件很多，塞尔维亚与希腊就是如此。

尽最大力度地侵占邻国土地、杀戮邻国国民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想法。保加利亚觊觎着马其顿全境和塞尔维亚的部分地区，塞尔维亚则对波斯尼亚全境和保加利亚部分领土虎视眈眈，占领特兰西瓦尼亚和比萨拉比亚才是罗马尼亚真正的想法，而希腊则希望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其他小亚细亚沿岸

国家都归为它的统治之下。以下是瑞士一家报纸的言论：

“这些国家消除不了积累已久的怨气，更无法和平地在同一地方生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并在自己的风俗习惯下生活。适者生存，在所难免，布加勒斯特条约划拨至希腊与塞尔维亚的马其顿地区，就是一个例子。”

类似的事也曾发生过，就在奥地利境内辖区的300万罗马尼亚人身上：

“罗马尼亚人被看成是民族威胁，而且遭到了暴力。在他们身上，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平等是不存在的。法律不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他们不能集会和结社，因为报纸而被禁止，报纸编辑们不是被罚款，就是承受几个月的牢狱之苦。”

巴尔干诸国因为地区主导权而发动战争，但它们什么都没得到。巴尔干的很多民众已经开始后悔，后悔脱离了土耳其的统治。因为统治者都会对其统治的地区各国完全干涉，包括社会生活，都会采用最残忍的手段实施其行政制度。

以往的外交尽量不去改变近东地区既有的种族格局，以免触及日益严峻的种族问题，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但是，一切努力都消失殆尽，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之前的种族问题都再次爆发，时间、传统等种种因素已经完全没有掌控的能力。

许多恐怖的冲突还会爆发，因为所有仇恨与对立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些彼此仇恨的民族一旦受到限制，便将不停反抗。而一旦拥有过多自由，便会向对方发起进攻。

第三章德国的扩张姿态与报复心理

1. 德国的扩张姿态

德国如何战胜所有对手、发展经济，并在全球多个地区扩展势力范围，这一点我早已在上文阐述过了。德国国民的性格和心理在物质的持续发展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本国的贸易霸主地位提高，军事能力增长时，就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种族。

在德国作家和学者的吹嘘作用下，集体虚荣心飞速增长，最终打破了一切界限。德国全体国民相信自己是上帝派来管理世界的。

我也曾引用过——来自于柏林大学的教授拉森（Lasson）对这种思想做了一个总结：

“陌生人就是敌人，除非有反例证明……我们在道德和智力上都优于他人，我们是无与伦比的……上帝与我们同在。”

想要称霸世界的想法是不受限制的，直到张伯伦（HerrChamberlain）——当今的一位德国作家说出了如下言论：

“德语是世界上最高贵的语言，现在或在将来，我们应将其推广至全世界。而且，德国人都应让外国人说德语，这是每个德国人的义务，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直到德语遍及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就像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样，铁蹄所到之处即是完全胜利……一定要告诫人类：不说德语的人就是卑劣的！德语一定要成为世界最多人讲的语言！”

德国的集体虚荣在战前的许多年就一直在酝酿，虽然并未达到这种程度；

但是，德国在外交上的跋扈、好斗的姿态渐渐显露了出来。连法国的和平主义者都意识到要下定决心，捍卫法国在世界的地位。以至于事情到了任何人都无法容忍的地步时，德国收到了法国的宣战书。

实际上，在外交上，德国跋扈的姿态并不足以让人无法忍耐。德国人的行为在法国人眼里是羞耻的。德国的政治家们一再地威胁法国，更有甚者，德皇演说的挑衅性越发强烈，建议本国“保持火药干燥”“磨利刺刀”。法国就尽可能地做出退让，但德国的态度在摩洛哥、巴尔干局势，甚至在奥地利吞并黑塞哥维那的事件中都体现出——依然强横。引用以下来自中立国人士的观点说明我虽为法国人，但观点客观属实：

“德国的行为越来越具威胁性，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在各方面夺取发言权的姿态也越来越强硬。与此同时，法国却表现得越来越审慎，倾向于做出最大让步，尽量避免与对手发生冲突。事实上，在不持偏见的旁观者眼中，法国为了避免让人怀疑其有野心或侵略意图，甚至牺牲了许多合法利益。

“对于法国的种种做法，各国持有不同的态度。支持者感到不解，甚至认为法国的地位日渐下降。而爱好和平的人们却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德国不会仅仅满足于法国的忍让，相反的，德国会更加傲慢，以至于让法国无法再忍，从而发动战争。所以，很多小国家为此很是担心，担心德国会入侵他们的国家，影响他们的独立。原因是，再没有可以与德国抗衡的国家了。

“德国的喜爱战争和种族情怀让法国人厌恶至极，这一点让人无法忘怀，所以，旁观者们就会忍不住问道：难道德国是故意这样做的？这样做不仅可以‘检验’法国，还可以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或是让法国人为此蒙羞。在1913年，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瑞士《洛桑报》,1915年3月24日）

以上的说法句句属实，无半点虚假。在过去几年，世人已清楚地认识到了法德的关系：除非法国甘心对德国委曲求全，使自己国家的地位在文明之

中降到最低，否则，必须战争。除此之外，即便可以拖延战争的爆发，和平也是短暂的，无论德国皇帝对和平多么喜爱，对外宣战也避免不了。因为，如果他想顶住国内压力，就必须这样做，保证自己完全掌握对德国军队——这支已经足够壮大、意志至高无上的军队的领导权。

在数以千计的资料下，德国人的无比自负完全表现出来。法国人被迫恢复了三年制兵役，在德国准备战争的情况下，德国国会的一名议员为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法国正在挑战日耳曼人的尊严，我们坚决反抗。"法国仅有 4000 万人，德国很多军人和平民都认为法国无力与德国竞争。而实际上，德国从摩洛哥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就以为对待法国可以随心所欲——法国承受住了。

2. 报复理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间接原因还包括：德国认为 1870 年战争让法国怀恨在心——德国人心中一直存在这种恐惧。

我们熟知的是，俾斯麦一开始并不赞成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但由于国内沉重的军方压力，他必须下令侵占这两个地区。他好像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一般，这一行动带来的实际利益并不多，远不及耗费的军备物资。德国的治理方法如果温和一些，不至于那么苛刻，必定会获得人民的信任，阿尔萨斯也不会被法国列入战阵序列当中——毕竟其早已被德国化了。显然，德国这么做是不可能的，尽管这种制度德国人毫不反对，但是德国的军事制度让人无法容忍，更何况是向来喜好独立的阿尔萨斯人了。

当今这代法国人早已不在意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事了。尽管德国媒体屡次暗示，但只是政府一直在寻找借口，想不断扩大军备力量，并不断地重复，德国群众终于被领导者成功说服了：自始至终，为了宣战，法国只是在寻找理由而已，任何可用的理由被利用，都会在第一时间导致法国对德国开战。

由于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的影响，法德关系依旧存有很多的问题，尽管

法国的政治家们对这种复仇思想几乎放弃了。然而，我被法国驻德大使告知，与法国发展友好关系经常是德皇所希望发生的。但是，在这位皇帝的领导下，粗野、好斗一直是德国的外交风格，无论是在其他地区和任何问题上，即使是在摩洛哥，无法改变。

战争的重要远因之一自然是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问题，但是只有间接影响而已。为了挑起德国人民对法国的仇恨，这一事件一直被利用，导致德国的军事力量显著增强。假使这一背景不存在，德国的战备就不会如此快速地发展，就不会在短短时间内逼得法国开战。

第四章神秘主义对引起战争的作用

1. 神秘主义在战争中的影响

所有国家都受到了神秘主义的影响，不论其是文明，还是野蛮。原因是，神秘主义具有更加强大的影响力，这是理性所不具有的。

古时候，受到神秘主义的驱使，迦太基人曾将其子女献祭给摩洛神，因迷信，在美国的印第安部落人的眼里，剥下战俘头皮是光荣的。穆斯林也是如此，只是为了传播安拉真主的荣光，而对一个庞大帝国发起进攻。同样，为了将其种族置于最高地位，如今，不少的繁华都市都毁在德国人的手下。

由于这种神秘主义没有任何的理论依据作为支撑，导致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诱惑力，若有朝一日人们的理想不再那么感性，就不会做出为其献身等类似的事。或许，理性并不具那么大的威力，能够蛊惑大众，但完全有能力控制一个崇尚科学的学者。

一个理想若想出现，披着神秘主义的外衣，那必须经历很多阶段——当我们研究德国是如何形成“统治世界”的神秘主义理想的，我们就会了解这一点。一开始，围绕这一理想的是哪些因素，就会在我们的调查中显示。历史的成因不是单一的，每一个成因都会产生一系列的次级影响，最初，该原因造成了这些影响，之后，转为原因本身，往复循环。

作为德国最终宣战的决定性原因——神秘主义，在德国的一段时间内，毫无地位，只些许影响了一些小圈子。神秘主义真正影响到德国的社会各阶级是到了宣战的时候，这时，少数人的梦想才被全国的共同理想所取代。

2. 称霸思想的来源——民族主义

连中国人和土耳其人也认为其民族是至高无上的，更何况大多数民族都这么想——一种种族的虚荣。这种刺激可能有用，但同样不幸的是：有时候，那些自认为优秀的民族往往会被蛊惑，而且，为了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他们还会动用军队，发动战争。

过去的30年中，读者在德国出版的许多著作中了解到，最认为自己民族高于其他民族的只有德国，历来都是如此，或许，能够与之较量的只有圣经时期的犹太人和穆罕默德时期的阿拉伯人了。德国全民认为自己是上帝挑选出来征服世界的，肩负改造世界的神圣使命的人，这大概就是这种想法的主要原因。

两位历史学家——特赖奇克（Treitschke）和兰普莱希特（Lamprecht）全力地宣称以上的思想，之后，随之也涌现了大批学者，例如张伯伦之流的学者们。在他们的著作中，此类观点到处都是，集体心理均衡状态的崩溃被最大限度地显现，在本世纪，这是最集体疯狂的事了。

在特赖奇克看来，历史是在神的操纵之下发展的，而不是人，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也是没有这种能力的。所以，这种做法是为了捍卫新教教义。德国人认为，他们一定会征服并主宰整个世界，由于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开端——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使这个民族变得强大了起来。

在这些学者中，只有特赖奇克的一些观点还有些道理，没像其他人的说法那么幼稚、自大：

“行动不能左右国家的命脉，但思想却可以。行动在没有思想的引导下就如同没有一样没有结果。国家命运会伴随着宗教和政治理念的改变而转变。”

因为特赖奇克表达了德国精神的最高愿望，因此，他取得了成功，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这种愿望是在普鲁士军事制度下形成的，并不是新教主义。

基于神学理论，特赖奇克论证了德国的优越性，而更为唯物主义的是兰普莱希特的观点。但是，无论如何，后者与前者都是为了验证一个事实，德

国民族改造世界是天经地义，老天注定的。兰普莱希特认为自我的主宰是人类，而不是神，在他看来，神的旨意一说就是谬论，落后的信仰——天主教与新教注定会被某种信仰所取代。

在兰普莱希特看来，一国历史的经济发展最为重要，而且，他认为德国的工业进步是值得称赞的。同时，他还认为，国家间根本就不存在和平的竞争，当一方强大起来，有足够的能力强加给另一方想法，国家间就会产生矛盾，并越积越深，最后战争就会发生。（此处需指出，这是德国最流行的思想之一。）

不用怀疑，与其他学者一样，兰普莱希特也信奉国家社会主义。他们希望政府全面干预国家，希望一切行动——包括战争都有政府主导。在他们看来，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与过剩的事物是没用的废物，应当舍弃。这与纳粹的伦理体系如出一辙。

德国学者们究竟是怎样在国民之中煽动野心的，这一点，在兰普莱希特提出的征服方案中我们得以了解。在他看来，德国应该对不易征服的国家发起进攻，例如像瑞士、荷兰、比利时；对于智利、巴西等国，应渐渐地将其德国化，采用建立学校、银行、工厂来达到此目的；尽管，像俄国、意大利等其他国家，不会在短时间就屈服于德国，但通过以上做法，他们的德国化依然在所难免——总的来说，在未来，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将被德国所统治。

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内容，许多学者们都这么认为。更讽刺的是，由吉泽布莱希特（Giesebrecht）的言论我们可知，这种想法还存在天真的意味：

“德国是至高无上的，能够称霸世界的，因为德国是上帝的宠儿。所以，德国对邻国的做法是应该的，就像睿智的人对待愚人一样地教导。”

其他学者们纷纷赞扬这种观点，他们也只是为了取悦大众而已。其中，休斯顿·张伯伦（HoustonChamberlain）最为著名，据此，他撰写了长篇巨著（《十九世纪的基础》DieGrundlagendesneunzehntenJahrhunderts）——有传言说，不菲的创作经费都是德皇个人支出的。这本书不是原创，但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德国民众的骄傲和虚荣心，得到各方好评。用吹嘘拍马的语气，

他再度申明德国种族的高贵，不满之前的侵略：

“在扩张战争中，德国留下了余党，并没有完全将其他民族消灭。以至于后来的民族混杂……”

以这位作者的思维方式，所有日耳曼部落没被罗马人烧死在树林里或淹死在沼泽中，只死了几十万人而已，这种做法太不该了。假如日耳曼人全部消失了，中世纪就不会存在，今天的世界文明也大不同于昨天。

根据上文引用的言论可知，任由这种心理的发展，德国宣战在所难免。这场战争会推延，却不会被阻止，因此，到底是哪位德皇发动的战争再追究起来已没有意义。

3. 称霸世界的原因——经济与军事

之前，种族优越性不过是理想主义者幻想出来的，仅在理论层面说得通，但是，随着德国军事和工业的发展，德国已经脱离了理论的束缚，所以，德国要实现这个幻想已久的梦——称霸世界。

在1871年时，德国军队也就只有40.1万人而已，在这之后，人数逐渐增加到81.5万，海军舰队的装备也不断改善，现已可以与英军抗衡。

德国军力的大幅度增长为霸权主义奠定了基础，随后这种野心就扩展到了全国——自战争以来，德国外交家和宣传家的各种言论中处处体现着这种野心。

分割比利时，占领英国在刚果的殖民地，占领法国边境，占领波罗的海沿岸，等等。（他没提到吞并意大利和西班牙，应该只是忘记了这两国。）这是恩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在1914年11月16日提出的。作为一个崇尚和平的人，他的野心只是捣毁英国舰队、让欧洲其他国家丧失全部陆军力量，不及前者。

尽管设想迥异，但都认为，那些“没有价值的存在”的小国应由德国管理。

因为传统的备战方法太过迟缓，在为《巴登报》撰写的文章中，一个名

叫菲罗特（Vierordt）的教授发表了原创的想法：屠杀数以千计的德国的敌人才是当务之急。在占领的土地上，道德高尚的德国人世代生存，将占领的土地变成净土。

更有趣的是，作者们的心理在文章中完全体现——希望欧洲彻底消失。毋庸置疑，把欧洲未惨遭战火洗礼的地区开发成大型工厂，用暴力强迫奴仆辛苦劳作，服务于全体德国人，特别是众多学者们，这是奥斯特瓦尔德的追随者们所希望的。

4. 德国神秘主义最后的呈现

德国的霸权思想是由何种作用力引起的，而什么样的物质基础造就了这种作用力。想必根据上文，读者对此已有所了解了。在很多读者看来，德国野心中的神秘主义是不能理解的，原因是，有现实基础为这虚幻的理想作支撑。在一篇重要评论中，科斯特勒夫（Kostyleff）说道，他不认为现代德国民众的心理是受神秘主义的影响。甚至，他怀疑，在当下的环境中，神秘主义信仰的普遍性是否还存在。

对于我们所说的神秘主义的概念，我很担心他还并不了解，同持相同观点的许多人一样。神秘主义的含义我已在上文中解释过了，就神秘主义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这一点，想必我的读者们也早已烂熟于心，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虽然到今天为止，有很多人对神秘主义的重要性尚没有完全地认可，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的作用被很多作家所知晓，例如，关于德国神秘主义研究，法国作家切弗里隆（M. Chevrillon）在其作品中有以下言论：

“上帝的宠儿——这就是德国自古以来的傲慢、神秘主义的全民思想，这种民族力量会对世界造成损害，也许威胁性更强。原因是，德国宣传着这种学说，而且，德国也有这样的野心和军事实力。

“‘德国是上帝选中的圣人，代表着上帝无限的特权；上帝进入德国的

灵魂，给予德国新的生命……’德国全国媒体民众都沉浸在这种狂妄的思想之中，在他们看来，德国的扩张就是国家进步的道路，而基督教对此有所约束，他们要力求完美。

“生命的意义就是不断地进步，而不是探求善良与真理——这就是他们眼中的目标。所以，对其他民族的入侵、抢夺、仇恨、摧毁都是应该的，一定要做的。”

由此，我们看到了神秘主义对人思想的引导。虽然压制人类的原始本能是整个文明进程的主要任务，但这种原始本能却被德国哲学重新唤醒，被推崇，人们也对此感兴趣。武力在德国人看来可以超越一切，宽容与怜悯不值一提。没有一个高贵的种族会愿意生存在普遍原则之下。与德国斗争，就是违反天意，违背上帝，对这样的民族罪孽深重，多么残酷的惩戒都不为过。

虽然，这些观点一直都是理论而已，没有现实基础，但德国群众却渐渐地被德国学者的这种想法所迷惑，成为屠杀和破坏的根本原因，使文明世界被恐惧笼罩。以下是意大利学者帕雷蒂（SignorPareti）的相关言论：

“德国人对于本身的文化和责任深信不疑，他们相信是上帝赋予他们权力来称霸世界的，认为自己的民族是至高无上、高于一切的，所以才引发战争。特别是在基督教和形而上学意义上，这种战争是合乎情理的。敌人已经不单单是敌人了，更是异端，是对德国神圣文明的极大不尊重者，他们的思想和做法都与上帝的旨意相悖。因此，仅仅占领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完全消灭才行。在德国对比利时进行征战时，比利时的反抗就是十恶不赦的罪过。所以，他们身为罪人，必将会遭到正义的审判。”

5. 在战争初期心理作用对此造成的影响

根据本书中提到有关战争远因章节的内容，读者应该注意到我们从未提及与理性有关的因素，只探讨了生理、心理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原因是，对

于当前的战争，或是历史上的多数战争而言，理性对其毫无影响。可能有人说，作战过程或许需要理性一点，但这并不是引起战争的原因。理性并不能主宰战争，它只是神秘主义和心理冲动产物下的奴隶罢了。

如果我的读者对理性有着深入的了解，进而对于我所陈述的事实不能马上理解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回忆战争的起因是有必要的。回忆时，也许会对我得出的结论有所理解。至此，我将对激发各国军队士气的心理因素进行探讨，例如像情感的、集体的和神秘主义的动机，而不再探讨经济因素、理性因素了：

1. 奥地利

对于促使参战的奥地利的情感力量，主要是对塞尔维亚人的强烈种族仇恨。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人利用了欧洲的和平努力，在其强大邻国中进行煽动挑衅，进而将矛头指向了奥地利，致使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FrancisFerdinand）——奥地利的皇位继承人遭刺杀。所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这个小国恨之入骨，国内公共舆论纷纷指责塞尔维亚，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最终，一种渴望战争的强大集体作用力被激发出来。

2. 俄国

因为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俄国的自尊心受伤，仇恨积聚。表现出来的情感力量就是这种形式。除此之外，俄国还担心，塞尔维亚会受到攻击，俄国若失去了塞尔维亚，就意味着俄国在斯拉夫人中将没有了发言权。

3. 法国

荣誉感是法国主要情感力的构成，虽然，在法国看来，盟国的境遇与之无关，但出于荣誉感，法国必须与它们联手。抛开这点不说，覆盖全国的集体情感也对法国产生了影响：德国的目中无人让法国不能继续忍受。

4. 英国

在保卫比利时的初期，英国是出于情感动机，而之后是为了道德义务，原因是，在英国的条约之下，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得以保证。此外，英国也害

怕强敌德国可能会入侵安特卫普，到那时，英国贸易通道会被切断。

5. 德国

自始至终，德国的动机都只是在情感层面上而已，总之，德国希望显示霸权威力，想要再次羞辱俄国，并让其臣服，就像数年前的一件事——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一旦宣布战争，就一定会爆发出那些神秘主义因素——酝酿战争的神秘主义因素——德国想要称霸世界是产生神秘主义因素的原因。

之前，我已经陈述了理性因素对战争的引发是毫无影响的。在这一事实中，德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理性逻辑是用来避免战争的，若能对人们的意志有所作用，战争就不会爆发。而事实上，有好多靠战争无法得来的好处，远不及工商业发展、国民向世界各国流动渗透带来的利益多——这是非常肯定的事实，不用一再地说明了。德国最终还是被神秘主义作用力彻底主导，所以，从理性方面探究德国以前不想发动战争这件事是毫无意义的。（在另一本书中，我已经说明神秘主义能在各种层面完全凌驾于理性之上，此处也可以再加入德国的事例。）

至此，我们不再研究战争的远因，因为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结论早已很明确了，所以，对读者而言，在其他章节中继续探讨战争的近因是不必要的，多余的。

德国人一直认为，这场战争的爆发在所难免，我们继续探讨这场战争——为什么在这一时间点爆发，这些事都没有必要。但是，就心理学角度而言，情感的结合、升华及其在特定时刻对战争的催化作用却是最有趣的。亲眼见到那些和平爱好者和外交家们的奋力挣扎，努力挣脱使他们陷入可怕战争的强大力量，这一点最令人动容。或许，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见证人类行为受潜在意识支配的绝佳机会。

卷四

关于战争的近因

因为一系列心理学错误，德国和奥地利阴差阳错地卷入了这场战争。一方面，德国原本以为法国、英国、俄国不会介入战争，但其判断失误。当俄国不在其威胁下停止脚步，反而开始动员战争，德国开始担心俄国会在战备上抢占先机。另一方面，在坚信英国保持中立的情况下，德国应军方建议要求俄国解除战备状态。在俄国拒绝该要求后，德国不可避免地对俄国发起战争。

第一章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和外交谈判周

1. 来自于外交文件的心理教训

目前唯一可供参考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只有各国大使向本国政府提交的报告书。它们分别叫作蓝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已经被编成一系列出版物。

蓝皮书与英国有关，上面基本上都是英国驻外大使与其外交大臣的通信。该书首先由英国政府发行了英文版，后又发行法文版。接着又在巴黎出版了另一个版本的法文版，此版本仅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与前一版有所差异。

黄皮书则囊括了法国政府各方面的外交资料。此书发行了两个版本，一是法国国家印刷局发行的法文版，二是在《泰晤士报》上刊登的英文版，内容上做了一些增补。

另外，比利时发行的灰皮书和德国发行的白皮书并没提供多少资料，以及俄国的橙皮书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消息。所以，本书中引用的内容大部分来源于蓝皮书和黄皮书。这些资料不但说明了情感和神秘主义冲动完全凌驾于理性之上，而且展现出政府非常容易违背其初始意图决策，在研究心理学价值上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为一系列心理学错误，德国和奥地利阴差阳错地卷入了这场战争。一方面，德国原本以为法国、英国、俄国不会介入战争，但其判断失误。当俄国不在其威胁下停止脚步，反而开始动员战争，德国开始担心俄国会在战备上抢占先机。另一方面，在坚信英国保持中立的情况下，德国应军方建议要

求俄国解除战备状态。在俄国拒绝该要求后，德国不可避免地对俄国发起战争。

虽然我仅用上述一小段话概括事态发展，但其情况却要复杂得多。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人不能在仅仅一天内下定决心或者形成固定的想法。读者们将在本章节和下一章节中看到，英国在下定决心介入战争之前是如何犹豫不决以及不知所措，即使它当初打定主意远离纠纷，而德国皇帝又是如何罔顾自身利益，一步步发动战争的。

我们需要花费一点点注意力在官方文件上读到这些内容。然而，官方文件的表述如此模糊，以至于经常隐藏主要观点于次要事件中。所以，我认为选取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片段是很有必要的。为了这一目的，我将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文件摘要的归类。比如英国的犹豫不决、奥地利的毫不退让、奥地利认为俄国将保持中立的错误观点等。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探讨过战争的远因，外交谈判周的文件资料并不包含这一点。所以，如果不看其他内容，只单看这一部分，也许会对战争的真实原因断章取义。这些资料仅仅显示了各国外交上的努力——若要防止水溢出，就要阻止水滴继续落入杯中。但这里重要的，不是谁往杯子里倒了最后一滴水，而是谁一直在慢慢地往杯子里倒水。

各国的外交工作时间不长，短短一周的时间，但是仅仅这一周，世界历史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假如一名作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只有外交书信本身，而没有其他资料的话，也许会认为没有人想发动战争。实际上，的确没有人真心要发动战争，人人都害怕战争的爆发。虽然这样，战争还是爆发了，同时证明：在面对令公众狂热的棘手问题，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同样是手足无措。签订了战争宣言的国家里，4 个国家有 3 个君王是独裁主义者，主宰大陆与大海。不过，君主们的意志也由命运操纵着，不受他们自己控制，即使是他们拥有的专制权力，也丝毫不起作用——命运这东西，被古人称作诸神与人类的共同主宰。

我先简单梳理下外交谈判周期间的一些事件，再来谈谈外交信件中收集

到的信息。

2. 外交谈判周

1914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1 日，即外交谈判周，其终结于一场必定能改变欧洲板块的战争。可以说，这一周在历史上也算极其富有戏剧性。

以下，是这一周中每天发生的事件的简要摘录：

7 月 23 日，星期四。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各国均已得知。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督促塞尔维亚接受其派遣的联合代表团，进行“镇压可能破坏奥匈帝国领土完整性的后续活动”。

7 月 24 日，星期五。俄国要求，奥地利需在最后通牒中延长对塞尔维亚的时间限制。德国驻法大使宣布，希望塞尔维亚将冲突限制在本国境内。

7 月 25 日，星期六。奥地利拒绝了俄国对塞尔维亚时间限制延长的要求。英国提议，要与德国和意大利一起在奥地利和俄国间调解。英国声明会站在中立立场，德国以此为信。

7 月 26 日，星期日。俄国为支持塞尔维亚，并同时要求德国配合其对奥地利采取干涉政策。奥地利国内下令进行局部活动。

7 月 27 日，星期一。按蓝皮书所述，德国基本同意四国在奥地利和俄国间进行调节。但据橙皮书所述，德国驻法大使“坚持主张排除一切调停或协商的可能性”。

7 月 28 日，星期二。奥地利对塞尔维亚进行全面宣战。德国对其表示支持。俄国要求英国作为中间人进行调解。

7 月 29 日，星期三。德国建议俄、奥重新开启对话，疑似偏向于和平的解决方案。由于奥方无视外交协商努力而发动国内动员，俄方也下令在奥地利边境发起局部动员。德国警告称，若俄方不停止战争准备，德方也将发起战备动员。俄方称其尚不明确奥地利的态度，因此不能同意德方要求。

7 月 30 日，星期四。俄国发出声明，要是奥地利能证明自己对塞尔维亚

发出战争是为了欧洲利益，俄国可以停止战争准备。

德国驻俄大使眼见战争不可避免，恳请俄国提供任何一份可供参考的提案，由驻俄使馆发电报给德国。

7 月 31 日，星期五。俄、奥重新开启对话，奥地利接受了英国的基本调停方案。同时，德国发出声明，俄国的战争准备使德国不得不采取相同方法。

8 月 1 日，星期六。德国对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在 12 小时内放弃战争准备。奥地利宣布，同意接受欧洲对奥塞冲突调节。

俄国试图避免战争开始，发出声明称若能确保塞尔维亚独立性与领土完整性，就罢休。

然而为时已晚，当日下午七点，德国对俄宣战。

8 月 3 日，星期一。德国对法宣战。

下面，我将对以上事件进行研究，特别是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心理学原因。

3. 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怨恨和开战决心及谈判期的强硬态度

奥匈帝国是采用双君主立宪制的，遇刺的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是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奥地利将斐迪南遇刺事件归咎于塞尔维亚的阴谋，对其长期怀有怨恨情绪，后来，以明显无法接受的措辞发了一份最后通牒给塞尔维亚。其中一条重要要求称：塞尔维亚必须“接受奥匈政府派遣的联合代表团，以在该国镇压针对奥匈帝国领土完整性的破坏活动”。

各国在得知这是最后通牒时便知这只是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的借口罢了。

1914 年 7 月 23 日，法国外交大臣得知：

“根据法国驻维也纳大使所收集的情报，奥匈帝国的首要意图是向塞尔维亚进一步施压，同时八个军团保持随时待命。”

7 月 24 日，法国驻俄大使提醒国内注意以下事实：

“最后通牒中给出的期限非常短，如若协约国想对奥地利进行约束，会

使这一举动变得极其困难。”

不管怎样，外交家们没有对奥地利抱任何幻想。7 月 24 日，英国驻奥大使写道：

“今天上午，俄国临时代办会见奥外交大臣，同时表示，按照其个人观点，不但难以接受奥方最后通牒的起草形式，而且其异于寻常的措辞专横得令人反感。奥外交大臣则回应道，已接受上级命令，如果塞尔维亚在明天下午四点之前不能完全接受奥方主张，奥军将不会撤出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政府惊恐万状，于是称将答应奥地利一切要求。然而奥地利并不为所动，对于这一点我们可参见英国驻德使馆临时代办 7 月 25 日提交给国内政府的报告，里面涉及其与德国国务卿的会晤结果：

“国务卿表示不清楚奥匈帝国因何事蓄势待发。不过他承认奥匈帝国希望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给塞尔维亚一点教训。”

法国驻维也纳大使在 7 月 25 日报告本国政府：

“……奥地利政府已下定决心对塞尔维亚大辱特辱，所以，它不会接受任何国家的干预，直到保证行动确实执行并让塞尔维亚受到教训为止。”

对于奥方的态度和意图，全部的驻奥大使都保有相同观点。7 月 27 日，英国驻奥大使写道：

“我和其他国家的驻奥大使进行交谈，我们都意识到相同的一点——奥方已经起草的这份声明，显然不可避免地将发动战争。”

奥方为了给自己强硬决不让步的举措挂名，其发布了一下声明：

“塞尔维亚长时间对奥匈帝国心怀叵测，妄想分裂南斯拉夫，以期联合组成斯尔维亚大国。塞尔维亚国内，全部的宣传媒介一直在各种不一样的场合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以此目标吹嘘。当这一问题严重至此，不得不爆发了此次危机。”

面对奥地利如此强硬的态度，塞尔维亚也日渐不安，在最后表示同意奥地利提出的所有条件。在 7 月 28 日给本国的电报中，英国驻意大利大使这样写道：

“今天上午，我与塞尔维亚驻意大利办事处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谈话，塞方表示，如果奥方能对照会内容中的第五、第六条有关干预形式进行解释说明的话，塞方也许能接受整个照会。”

不过，奥方政府依旧持强硬态度。7 月 28 日，英国驻奥大使电话报告英国政府：

“从俄国大使处获悉，俄国对奥方政府的提议——俄国外交部长和奥地利驻俄大使商讨可以解决奥、塞问题的方案，但这一提案被奥方一口回绝。”

因为奥地利决不妥协的态度，英国外交使臣在 7 月 29 日的照会中做了以下说明：

“根据来自维也纳和柏林的消息，我方相信奥地利不会接受无论何种形式的调停。”

7 月 29 日，奥地利在已向外界昭告行动方案之后，并无耐心等待任何外交谈判，决定对塞宣战。7 月 29 日英国驻君士坦丁堡临时代办的急件中反映了奥地利在这一过程中抱有的急切开战的心情。

急件中写道：

“我以为，奥地利的开展计划绝不仅仅是对塞尔维亚进行占领性惩罚。奥地利大使曾经对我表示，希腊管制下的萨洛尼卡经济状况很糟糕。他也提到过希望对塞尔维亚辖制不甚满意的伊斯兰人能对奥军提供帮助。”

如果和塞尔维亚这样的小国家相比，奥地利的兵力已经足矣，几乎可以判断奥军能完胜塞尔维亚。然而奥军似乎还不甚满意，不顾一切地发起了全国总动员——法国驻奥大使在 7 月 31 日的信件中如是写道：

“今天早上，奥地利政府向全国发出指令，所有 19 岁至 24 岁的男性都将进入军事动员状态。”

4. 德奥对俄军的看法

在盟友国德国的支持下，为什么奥地利要采取这样强硬甚至不近人情的

态度？为什么参战目的看起来如此不可理解，奥地利还要参加这样关乎存亡的战争？

其实影响奥地利判断的是一个很简单的心理因素。奥方和德方相信这一点，与此利益息息相关的俄国不会出面干预。因为在数年前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的时候，俄国仅采取了抗议的方式，并未进行任何举动。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当年的波斯尼亚远远重要于今天的塞尔维亚，因此，俄国肯定不会有所举动。

以上观点即引发战争的重要近因之一，如果奥地利能预见到会有国家对塞尔维亚提供军事帮助，那么它的态度可能会缓和很多。

读者可以从以下的官方文件中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各国对不同国家保有中立地位的看法：

“1914 年 7 月 15 日，法国驻奥大使写道：“维也纳部分报纸认为，在欧洲的各项事务中，法、俄两国没有根本的发言权，因此也不会进行军事干预。正因如此，还有德国对奥方的支持，奥地利政府就自以为能随意入侵塞尔维亚了。”

法国驻德大使也在 7 月 25 日时提出了相似的看法：

“比利时的外交部部长对于奥、塞的战事问题很是关切。他觉得，现在各个国家都为自己内部问题焦头烂额——俄国和英国自己国内问题严重，法国国内也因军事制度烦不胜烦。因此，奥地利和德国要好好把握此次机会。”

7 月 26 日，英国驻奥大使在向国内报告的文件中提到：

“我和德国大使交谈，关于俄方是否会出于公众舆论的压迫，或是对民族利益的关心而干涉奥、塞问题。德方表示，俄方外交大使个人性格可能会成为其决定的因素——他觉得，俄方外交大使不会草率决定，原因是他的决定会成为影响与俄国利益相关的更多边境问题的因素。俄国和瑞典、波兰、罗马尼亚、波斯等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另外，他表示，法国因自己国内问题尚未解决应该不会参与此次战争。”

英国外交大臣也提到了一样的内容，7 月 27 日，英国外交大臣在给英国驻俄大使的电报显示：

“有消息称，德国和奥地利认为，如果奥地利答应保持塞尔维亚领土完整性，俄国就会袖手旁观而无所作为。”

7 月 28 日，英国驻德大使的报告中表示：

“今天，奥地利大使表示，几乎不可能爆发大的战争，原因是俄国没有立场也没有任何实力应战。我认为还有很多人持有相同观点。”

7 月 29 日，英国驻意大利大使在报告中表示：

“……他（此处指意大利外交部部长）补充称，似乎很难让德国相信俄国对塞、奥问题的认真态度。但是德国一直担心英国会与俄国、法国相联手，一直希望能与英国友好相处。”

7 月 29 日，法国驻意大利大使也表示：

“……奥方和德方一直相信俄国不会进行干预。”

同样的是，英国驻奥大使也表示：

“7 月 24 日，德国大使表示俄国不会参战。”

5. 德奥对英国立场的理解

从上文中我们能看出，德奥相信俄、法不会对奥、塞问题进行干预，也认为英国会站在中立立场看待这一问题。实际是，他们都错了。7 月 25 日，英国驻俄大使发出的电报中写道：“——遗憾的是，德国怎么会以为我国会站在中立立场。”

7 月 27 日，英国外交大臣在另一份加急文件中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俄国大使表示，德奥的外交官们一直以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国都将无所作为。”

同一天，法国驻英临时代办处表示：“一旦爆发战争，德国和奥地利大使都坚信英国会保持中立立场。”

因为比利时领土被侵犯，所以英国加入了战争。然而，在英国的确加入战争的基础上，德国还在妄想英国能保持中立。

第二章英国一开始时的反战情绪

1. 英国强烈排斥战争，一开始拒绝战时支援法国

考虑周到的人很少会轻易改变决定，特别是当他们需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本来立场，接受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时。所以，心理学家对此很有兴趣：在短短几天内，英国外交大使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心理变化以至于做出后面那样的决定，虽然踌躇再三，还是决定参加战争。

之前的外交文件只能体现事情发展过程中某些特殊事件的时间点，但是没办法完全表现出英国外交大臣、英国议会以及英国人民对这一系列事件变化的转折过程。冯·比洛（vonBulow）亲王指出，德国在政治与心理上都非常缺少考虑，如果不是这样，德国就不应该这样残酷地伤害英国人民的感情。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官方文件是如何评价的吧。

7月20日，英国大臣在信件中是这样清晰地表示对英国介入战争的看法：

“我厌恶任何国家之间的战争，诸国若因塞尔维亚卷入战争，我都会对此异常厌恶。”

还有一点，大多数人都错误地看待了英国，其没有义务要对法国的任何书面条约或者口头条约负有责任。原因如下，1912年，法国大使用尽所有办法，也没能从英国外交大臣那获得任何进展，英国大臣曾回信道，英国无论如何也不会介入冲突。

所以，7月23日，英国外交大臣写道：

“假使奥地利、法国、俄国、德国欧洲四强参战，那么，就我观点而言，

这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不但是对贸易产生影响，也会引起欧洲信贷与工业的全面崩溃。面对现在的工业强国而言，这表示这些情况可能会比1848年时更加糟糕。无论谁能成为最后的赢家，都将损失惨重。”

英国驻各国的外交代表们肯定会得到上级领导的指令，要求他们保持沉默与保留的态度。7月24日，英国驻俄大使写给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的信中，表达了自己与法国驻俄大使谈话内容，同时表示以下内容：

“我认为，英国政府是没有理由宣布将对俄国和法国无条件提供武力支持的。英国在塞尔维亚并无任何直接利益，英国公众也不会支持为该国参战。”

7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对此信件是这样答复的：

“我个人觉得，英国公众既不可能、也不应当支持英国为塞尔维亚问题介入战争。”

7月29日，英国对于法国大使要求英方承诺提供支援的恳请，是这样回复的：

“目前，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两国的冲突中，本国并不认为需要采取立场。如果这次冲突演变为奥地利和俄国的矛盾，本国也没有必要介入此次冲突。这涉及德国人和斯拉夫人围绕巴尔干统治权的斗争问题，对此，英国应该贯彻一贯的原则：我国将力图避开因巴尔干问题介入战争。”

即使后来法国总统亲自出面，英国政府仍然坚持拒绝给予法国任何援助。7月30日，英国驻法大使写道：

“法国总统坚持认为，各国和平与否最终掌握在英国手中。如果英国政府声明，一旦法德由于当前奥、塞矛盾爆发冲突，英国将站在法国这边，战争便不会爆发——因为德国若听到这一声明，势必将立即改变态度。

“我向总统解释，英国将很难做出上述声明。但是他仍然表示，为了维护和平，他必须坚持这一主张。”

对于加入战争，英国坚决反对。如果从法国总统和英国国王书信往来中看，我们的历史学家可能很难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德国坚信英国将会参战。8

月 1 日，德国对俄宣战之日（德国于第二天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当天，英国国王在回复法国总统的信件中措辞严谨，但内容表达模糊不清。以下内容引自该书信：

“为了替列强最后能通过和平谈判尽量争取时间，同时尽可能想出能延迟军事行动的任何方案，我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调和俄国和英国。如果说到我国的态度，这可以向您保证，我们一定会以自由坦率的态度，就任何有关双方利益的事项与贵国进行沟通。”

2. 英国为避免欧洲爆发战事而努力

爱德华·格雷为了避免战争的爆发，尽其所能地在各国之间平息争端——有些是其个人努力达到的，有些则是通过外交大臣的努力。一开始，他认为建议塞尔维亚接受奥方最后通牒是最好的解决方法。7 月 24 日，他写道：

“假如想在最后期限内阻止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方法只有让塞尔维亚无条件接受其提出的任何条件，但这不可能做到。因此，眼下唯一的方法是，塞方先不完全拒绝德方要求，只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力显得服从——我已经督促德方外交大臣要求奥方减缓军事行动步伐。”

很多大使都对别国做出相似表示，尤其是德国。7 月 29 日，英国驻俄大使在文件中写道：

“德国大使向我提出请求，让我对英国外交部提出有利于局面缓和的建议。我同他说，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做这项工作，如今是时候让德国驻奥地利大使发挥这种制约的能量了。同时，我清楚地向德国大使表示，因为俄国的格外热切，一旦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发起攻击，必将引发一场大战。”

关于英国政府协商解决问题的提案并未受到重视，英国外交大臣于 7 月 29 日宣布，其已经做好接受任何建议的准备：

“我督促德国政府提供有效的方案以期联合四国的力量共同发挥作用，来阻止奥地利和俄国之间引发战争，此提案法国已接受，意大利也表示赞同。”

英国大臣对于此事件一直满怀希望，即使奥地利已对塞尔维亚宣战之时，他仍在 8 月 1 日的文件中写道：

“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能在开战前赢得一些缓冲时间，或许还是能和平共处的。俄国政府同我说，奥地利同意和俄国协商，也同意由俄国提出的基础调解提案。”

然而，现在都太迟了！

3. 德国对英国在战争爆发时所负责任的看法

通过之前的资料，我们可以明确看出英国是多么厌恶战争。然而，德国人却一直未真正弄清这一点。实际上，只要引用德国首相在国会上发表的演说，就能证明：情感与神秘主义的因素究竟是如何使明白无误的事实变得软弱无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1915 年 8 月底，德国首相发表的这场演说显得很奇怪，反映了德国民众一向普遍心理——完全接受政府部门告知的一切，同时觉得自己的观点正确无比。如果没有上面我所提到的心理因素，德国首相的这一行为也许很难让人理解。不过他肯定不是刻意歪曲事实，因为历史会记录所有的一切，他知道这一点。

他的演讲中包含了以下主张：

“敌人的全部阴谋旨在归因于我们的战争野心，然而又号称爱好和平，但是这一切阴谋都将在真正事实面前崩溃瓦解——显而易见的，一旦我们同英国达成真正维护和平的协议，我们就能避免这场试图摧毁世界的战争。”

为了达到描黑英国的目的，他甚至还说：

“在摩洛哥问题上，英国几次三番查收我国与法国的谈判，试图向世人显示它统治世界的野心，这对世界和平将造成极大的威胁。”

假如首相能冷静、理智地面对这些事情，也许他能在最后如是说：“实际上，正是德国意图统治世界，正在威胁世界和平。”也就是在此时此刻，法国才明白，现在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战争了。

第三章有关英国国内心理的变化

1. 英国政府的心理演变

我们可以从前文中看出，英国政府是怎样尽全力避免被卷入塞尔维亚冲突，又是怎样为了欧洲和平而全力付出。所以，在本篇中，我们将仔细探讨，如此热爱和平的英国人是怎样在短短一周内转变，继而选择支持战争。

这个转变的原因，来自德国方面的错误心理。我们可以从外交官的报告中看出这一点，德国相信：英国在爱尔兰遭受严重危机，并且不期望牵涉进一场不管怎样都无利益可言的战争。所以，德国要加快步伐以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使得针对英国，以上才是切实可行的办法。正因如此，缺乏判断力的德国最终招来了力量强大的敌人。

既然开始探讨英国立场变化的前因后果，那么，让我们先来看看英国外交大使吧。7 月 31 日，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 • 格雷犹豫不决地写道：

“我已经同法国大使交谈过了，我们对是否介入战争态度还不确定。同时，我还对他说，我们当下没办法做出任何承诺，不过一旦事态发生新的转变，我们将会慎重考虑的。”

随后，法国大使想要说明英国的决定会对德国产生怎样的影响。格雷的态度变得愈加坚定，但是仍然不肯做出任何承诺。7 月 31 日，他写道：

“法国驻英国大使，康朋（Cambon）今天提到一份今早来自法国驻德大使的电报，电报内容已出示给亚瑟 • 尼克尔森（英国外交次长），里面提到：德国对英国是否介入战争的犹豫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鼓励。假如英方明

确提出支持俄国和法国，德国就不得不考虑下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对康朋表示，现在，英国内阁已经做了决定：就目前而言，英国不会做出任何承诺。虽然我们应该将这一决定交予议会审议，但是却不能提前向议会表露任何态度。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和民众都没有觉得我国在此事上有任何条约或义务束缚着我们。不过，随着事态发展到一定地步，政府和议会也许会认为有适当的理由进行干预。我不能断言——也许比利时的中立立场，是决定我们态度的重要因素。

“康朋又一次复述了他的问题：假如德国开始向法国挑起战争，英国的态度将会如何。我说，我只能给你这样的回答：如果就目前形势而言，我国不会介入战争。”

德国外交大臣也不能就比利时中立立场做出任何承诺，8月1日，爱德华·格雷写道：

“今天，我同德国大使交谈，英国对德国政府就比利时中立立场的态度回复感到非常遗憾，只因英国是非常看重比利时的中立立场。假如德国可以像法国一样明确表态，德国不会伤害比利时的中立立场，那么英国对于此事的不安和压力就会很大程度上地减轻。假如作战双方，一方尊重比利时的中立立场，另一方却对其侵害有加，那么英国民众将会产生强烈反应。”

显然，英方态度已经开始动摇了，原本“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的态度开始转变了。8月2日，一封法国驻英大使向本国汇报的函件显示：

“今天上午，结束英国内阁会议之后，格雷先生给了我下面这份备忘录——‘经授权，本人做出以下承诺：假如德国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或北海，同时攻击法国海岸或者舰队，英国舰队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给予其全部保护。必须说明的一点是，本承诺的前提是本国内阁决策在获得议会通过之后；另外，在德国采取上述行动之前，本承诺不得视为任何对英国政府的约束力。’”

不过，这只是刚刚开始，原因是这只是保证英国舰队对法国舰队的保护，并不是英国对德国宣布开战。假如英国仅仅限于此，也许德国就能克制住自

已对法国海岸和舰队发动进攻，以免遭到英国报复。然而，英方心理正在历经一系列的变化，8 月 4 日，根据国内指令，英国驻比利时大使向比利时政府致信：

“我受命通知贵国政府：假使德国对你方施压，迫使你脱离中立立场，我方政府希望你方能尽一切努力反抗，我方政府将对此提供支援。如果必要的话，英方会联合法国和俄国，与其形成联合支持比利时对抗德国的武力侵害。同时确保将来比利时能保持独立以及中立立场。”

至此，英国已经无法回头。法国驻英大使在 8 月 4 日发给政府的电报中写道：

“刚刚格雷先生同我交谈过，他表示，今天首相会在下议院宣布：英国要求德国收回对比利时的最后通牒，同时要求在明天之前做出答复。”

原本德国以为英国会保持中立立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显得非常震惊。德军已入驻比利时，几乎没办法撤回军队了。德国首相在得知此事之后的悲哀和尴尬在英国驻德大使的报告中可见一斑：

“我观察到，首相显得非常激动，他立马发表自己的意见，讲了大概有 20 分钟。他说，英国政府的方案简直非常可怕——仅仅是为了‘中立’，这个词在真正打仗时根本毫无意义，仅仅为了这一纸契书，就对如此友好亲近的国家开战。因为这一行为，他对两国友好所做的一切苦心都白费了，他过去推行的一切政策都付诸东流了。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可理喻，就像两个殊死搏斗的对手在战斗之时，在背后给了其中一个致命一击。他觉得，英国要对将来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负有责任。

“我对此强烈反对，我说，既然德国首相本人如此希望我能明白，进攻比利时并破坏他们的中立立场对德国而言关系甚大，那么我也希望他们能明白，这个事情对英国名誉而言也是关系甚大的，如果比利时被入侵，英国就必须要郑重宣布，将尽自己一切力量捍卫比利时的中立立场。这一庄严承诺需要我们实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将来英国的诺言还有谁会相信……当我

要离开会场时，德国首相又对我说，英国加入敌对阵营的行为严重打击了德国，因为德国政府一直在和英国合作俄、奥和平这一工作，直到最后一刻。我也和他们说，眼看英德两国空前的友好关系突然破裂，这对大家而言是个悲剧。”

德国和英国关系破裂的原因是两国面对是非对错的完全不同的认识，以上戏剧化的对话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而且我只选取了其中一小部分。以上两个人的谈话表明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彼此的话。因为中立国立场这一事件对其中一个有重大意义，对另一个却根本没有意义。

2. 英国公共舆论看待战争的态度

从上文可以看出，英国外交大使主张的和平主义是怎么在短短几天内迅速转变的。不过，他们的新观点需要通过国王和议会，如果没有后二者的同意，英国是没有办法宣布参战的。

外交大臣转变想法的缘由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过那些爱好和平又对外交政策不甚了解的普通平民是怎么接受的呢？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英国很多事情都取决于民意。所以，内阁大臣们开始了一连串的公开演讲以取得民众支持，同时，媒体也开始了大肆报道。

要说服全国百姓因为一个不甚了解的巴尔干小国——几乎没人听说过的国家而介入战争，并且没有任何说明，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想要成功完成这项任务，就要对英国民众心理了解颇深。英国政府最后是怎么完成任务的呢？他们并没有告诉他们的人民参与战争之后能获得多大的利益，只是提醒他们这关乎国家荣誉和尊严——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只有信守承诺，才能获得相应的尊敬。

14 世纪以来，英国的政策将一直支持处于英伦三岛和中欧的国家。为了保证这项政策被实行，英国签订了条约以确保比利时中立立场。“如果我们允许比利时中立国地位被侵犯，我们将会世代蒙羞。”劳埃德·乔治（LloydGeorge）如是说道。

对此，下面我将提供部分英国内阁成员在公开场合的演讲内容。

阿斯奎斯（Asquith）先生在1914年9月4日演说时说：

“你们说说，让这个世界说说：如果我们卑鄙无耻，我们去恐吓、去算计、去忽略荣誉和责任、去欺骗世界、去背叛朋友时，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尊严荣誉可言？

“当我们遭受承诺和伟大任务的挑战时，假如我们一味忍让而不尽力去加以阻止，假如我们的国家只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那么我们已然成为帮凶，我们也会在不久的将来从历史上消失。”

1914年9月19日，劳埃德·乔治在演讲中这样说道：

“相信在这个大厅里，不会再有人比我更不情愿介入一场战争了，就是这样一种态度始终贯彻了我的政治人生。在这个大厅之外，任何人都没有我那么确定，除非抛弃我国的荣耀和尊严，不然无法避免这场战争……

“国家荣耀与尊严是不可忽视的，任何没有了荣耀与尊严的国家都注定灭亡。我们有责任保卫孱弱的邻国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性的自由。”

然后，劳埃德·乔治表谈到普鲁士既已签署、后又出于一己私利撕毁条约的事，他表示，国家的性命正由对这“一纸条约”的尊重所决定。

“实际上，这张纸条是一种汇票，帮助国家这一载满珍贵货物的商船从一边驶向另一边。那么，推动商船前行的动力是什么？——商人的荣誉。因此，我们所说的条约，其实质是国际政治的通货。”

德国和英国缘何会产生分歧？正因为双方对国家荣誉理解不同。就像劳埃德乔治说的：

“德国人能理解很多开战的缘由，不管是复仇、征服，还是掠夺领土，但是却不能理解我们开战的理由，一个国家愿意赌上资源、势力、儿童的生命和其国家存亡来保护一个需要它防卫的小国。”

3. 比利时受到的侵略与破坏影响了英国民意和志愿军招募

群体很少受到理性论证的控制，却常常受到情感或者神秘主义的影响。英国民众绝对赞成参战，这不但因为比利时受到入侵，而且比利时的城市受到野蛮损毁、古迹被焚烧、人民被屠杀，还因为德国入侵比利时这样不信守承诺的行为强烈地刺激了英国民众的情感。

就算在德国打算抛弃承诺的那天早上，德国驻比利时大使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尊重比利时的中立立场。比利时外交大臣于 8 月 2 日会见德国驻比公使的记录如下：

“直到现在，德国驻比大使还未收到与我们进行任何官方沟通的命令，不过单从他个人态度而说，我们相信德国还有相当的理由让我们保持信任。

“我同他说，由于此前的种种谈话，我们对德国足够多的了解还是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其对比利时的态度。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需要补充一句，我们要对发表正式声明加大重视力度，假如德国可以对支持比利时的中立立场发出声明，比利时会对此表示很高兴并且非常感激。”

但是，就在同一天，晚上七点，正是这位德国大使递交了一份终极通牒，要比利时同意德国军队在其领土上自由通行。

在看到这种严重的抛弃自我承诺的行为后，就可以理解外交家们之间为什么要带着对彼此最大的怀疑来检验相互间的言论，也应该对普通人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得比国家之间更加可靠而感到庆幸。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引发战争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各国政府之间的相互不信任。

从以上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是怎样残暴地入侵比利时并残忍地杀害其普通百姓的。这些遭到摧残的黎民百姓纷纷逃往国外，这让所有的中立国——就连起初站在德国立场的瑞士——都开始反对德国。各国都抱着对其巨大的同情心接受了这些难民。《日内瓦日报》报道称：

“日内瓦人民在看到德国对比利时犯下的难以接受的暴行后，纷纷对难民给予帮助，这是值得我们赞赏、感动的精神。在上个星期里，每天都有可

怜的佛兰芒人和瓦隆人来到日内瓦，德国人焚毁、洗劫、掠夺了他们的家园。所有人都在为他们提供住所和收留老幼妇孺而努力，他们被迫离开家园，有的在逃难过程中失去亲人。他们正在经受可怕的不幸，难言的苦痛。”

德国的目的是按照原定计划，恐吓别国民众并对其抵抗进行抵御。然而，德国又犯了一个心理学上的错误。因为没有镇压住抵御行动，结果激起了英国政府以及其民众的激愤，同时引发500万普通英国民众主动加入军队的行动。

回想德国首相在侵犯比利时发表的声明，就有一条德国历史学家普遍主张的原则——“需求面前无法律。”

第四章外交谈判中，德、奥、俄、法各自发挥的作用

1. 为避免战争，俄国和法国所做的努力

俄国同法国一样，也没有准备好人和战备措施。当时，俄国正在修建铁路系统，但是没有任何实际成果获得。所以，战争并不是任何一国期许的。我再次重申，正是奥地利坚信没有国家会介入冲突，以至于采取了这样强硬的态度。

从一开始，奥地利毫不妥协的态度就已经将俄国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俄国数年前为了避免战争，从而允许波斯尼亚被奥地利占领。现在，如果再一次面对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而坐视不理，在巴尔干地区，俄国必将再无威望。但是，俄国依旧再三妥协，直到俄国再也无法忍受德国最终的行为。

开始外交谈判之后，对于调停的态度，俄国尤为积极。7 月 25 日，英国驻俄大使的文件中表示：

“俄国认为塞尔维亚可能会提议由各国仲裁此问题。假如塞尔维亚确实提请各国介入，俄国会把问题留给英、法、德、意而迅速回避。”

对于这一问题，这位大使似乎理解得非常清晰、甚至近乎先知。因为他还提到：

“实际上，奥地利的行为是针对俄国的，其目的是将巴尔干地区的现状颠覆，同时实现在该地区的自身霸权主义。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M.Sazonoff)认为，德国并不是真正想要发动战争。然而，其实是英国决定了德国的态度。假如我们能坚定地站在法国同俄国的那条战线上，就不会爆发战争；假如我

们现在不联合法、俄，最终，我们必定会陷入战争，届时给予我们血流成河的欧洲。”

以上这段话，其预测是极其准确的。英国对法、俄没有做出明确的承诺，让德国相信英国将保持中立立场。另有一段文字在同上一封文件里，清楚地解释了俄国的意愿与动机：

“俄国外交大臣向我表示，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并在巴尔干占据主导地位是不可能会被俄国允许的。假如，因为有法国的支持俄国会感到放心一点，继而积极投入战争之中。他又一次向我保证，他希望冲突不要继续升级了。然而，除非德国能够制约奥地利，不然形势会变得很不乐观。”

然而，如此积极的表态俄国未能继续保持。很快，俄国重归最讨好妥协的路线。法国驻俄大使在 7 月 25 日发回的电报称：

“俄皇将在明天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萨佐诺夫已经表现出了最大克制的努力。他同我说：‘任何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事情，我们和英国尽力避免一切。我认为，就算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我们也应该继续谈判。”

这种让步态度，7 月 26 日，法国驻意大利大使的函件中也有所提及：

“昨天，萨佐诺夫告诉意大利驻俄大使，俄国正在动用所有外交手段，希望能阻止冲突爆发。俄国仍然希望，奥地利可以听从各国调解来采取较为和缓的态度。就算这样，俄国绝不可能对塞尔维亚被摧毁而坐视不理。”

7 月 26 日，法国驻俄大使在函件中再次描述了俄国的缓和态度：

“为获得最终的和平解决方案，俄国外交大臣还在不懈地努力争取着。他同我说：‘我随时准备前往谈判直到最后一刻。’”

俄国政府也一样，急切地想要阻止战争，甚至表示出愿意考虑做出任何妥协的态度。7 月 27 日，俄国外交大臣写道：

“假如没有办法和奥地利政府直接交换意见，我愿意接受英国的提议，或是任何有助于解决冲突的此类方案。”

然而，非常不幸，因为俄国的这些退让行为导致奥地利坚信俄国将保持

中立，同时也根据这些行为相信对塞尔维亚宣战没有任何风险。俄国对于奥地利的这一决策，开始下令进行局部动员。7 月 28 日，俄国向本国驻德大使发出指示：

“由于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宣战，本政府将于明天（29 日）宣布在敖德萨、基辅、莫斯科、喀山的军事区发起军事动员。请明确告知德国政府，俄国对德国绝无半点战争意图。”

虽然到了那样的地步，俄国还是没有对维持和平的希望有所放弃。俄外交大臣在当日发出了以下电报：

“奥地利的宣战将俄、奥直接进行沟通的可能性完全排除。目前，英国急需采取行动着手开始调停，以期来中止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除非暂停军事行动，不然只能一路拖延事态发展，留下充分时间给奥地利来摧毁塞尔维亚。”

经上级指令，俄国驻奥大使再次提出对奥交涉。但是也失败了，具体内容我们可以从他 7 月 28 日的函件中看出：

“奥地利刚才表示，虽然与原来意愿背道而驰，但是他们也只能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他们不会参与任何有关照会措辞的谈判，也不愿退出。奥地利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CountBerchtold）说，公众因为冲突的加剧而变得如此激动，因此就算现在政府想采取其他解决方案，也没有办法进行。另外，因为塞尔维亚本身没有足够真诚的态度表现出来，就更别提了。”

就算是这样，俄国政府还是没有放弃，29 日，法国驻俄大使发回国内的电报称：

“可以确定的是，为了维护和平，俄国政府必将会同意法国与英国的任何提议。实际上，我相信，英国大使也正在向国内汇报相同推断。”

然而，不幸的是，奥地利政府的态度却是越来越强硬。眼见形势逐日恶化，俄国外交大使将希望寄托于英国的干预。他在 7 月 29 日向俄国驻英大使发去电报：

“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做的只有依靠英国政府，任其采取任何其认为可行的行动。”

起初，德国似乎犹豫不决，考虑再三，此刻，似乎也决定参战。法国驻俄大使在 7 月 30 日报告回国的电报中写道：

“今天下午，萨佐诺夫表示，他相信德国不会明确向奥地利表示要求和平立场。尼古拉斯二世（俄国沙皇）也有相同的观点，因为他私下和德皇威廉二世通过一些书信。另外，俄国总参谋部和海军部都获悉——德国陆军与海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这让我们都非常不安。

“萨佐诺夫还说，虽然这样，但是俄国不会停止调停。他同我说：‘我会争取谈判至最后一刻。’”

类似的努力，俄国沙皇也尽力去做了。7 月 31 日，法国大使发回国内的报告中也体现了这一点。俄国外交大使对法国大使说过的一段话记录如下：

“因为沙皇极其希望能阻止战争，所以我将以他的名义提出一项全新的提议给你：‘假如奥地利能意识到奥、塞冲突早就超越了两国的范围，牵涉到整个欧洲的利益。希望宣布撤回最后通牒中有损塞尔维亚主权的内容，俄国就会停止一切军事动员。’”

可惜的是，现在已经为时太晚，奥地利没有做出任何退让。英国驻俄大使在 7 月 31 日报告回国内的电报称：

“俄国已经下令，进行全国总动员，这是由俄国驻奥大使发回的报告决定的。报告中表示，奥方不会向各国的干预表示妥协，正在调集军队向塞尔维亚和俄国出发。俄国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德国也正在积极准备军事动员，假如让德国占得先机，俄国将不能承受。”

我们应当记住这句话流露出的怀疑情绪，不能让“德国占得先机”。正是这一种怀疑的情绪，导致了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

这位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最后不得不将维持和平的希望全盘放弃。他曾在一次谈话中表示了自己的无助，8 月 1 日，法国驻俄大使发回国内的电

报中写道：

“萨佐诺夫表示，他现在因为之前一直拼命阻止一场战争而心力交瘁。对于任何提议，他一直持开放的立场——四国协商的提议，英国和意大利调停的提议，奥地利与俄国直接对话的提议，等等，他都一一接受过。然而，他的这些努力，都因德、奥的拒绝并开始侵略行为而付诸东流。”

也许，有人会说，也许俄国不试图介入奥、塞冲突之间，这次战争就有可能避免。既然俄国能容忍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为什么就不能容忍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占领呢？这是关乎俄国民族情感与声望的事情，不身处其中，我们没有资格探讨。然而，作为旁观者的我们能够相信的是，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占领，将极大地损害俄国的名誉和利益，这将意味着，俄国因为避免自身受到损害而将欧洲陷入一场可怕的战争中。8月1日，俄国的态度清晰地反映在英国驻俄大使发回国内的电报中：

“德国显然无法忍受奥地利占领塞尔维亚，就像英国不能忍受荷兰依附德国相同。”

2. 德国对保持冲突局部化的期望以至于在最后关头仍对挑起全面战争犹豫再三

人类行为的真实原因，很难做出百分百的判断，因为很多时候就连做出动作的那些本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

很多公开资料显示，德国其实并不希望开战，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做了不得不开战的决定——在另一章节中我会解释这一原因。很明显的，德国不愿意调停奥地利毫不妥协的态度。因为德国相信英、法、俄三个协约国不会干涉其中。通过三国的不作为，德国希望借此机会不冒风险地狠狠羞辱俄国，就像之前，德国帮助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一样。了解了德国的这一如意算盘，我们也能轻易理解以下内容：为何德国会受命倡议各国驻外大使，保证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冲突维持在局部内。

7月22日，英国驻德国临时代办处这样写道：

“昨晚，我同德国外交大臣会见……他坚持认为，外界不应该介入到奥、塞的谈判中来，这一问题仅限于二者之间自己解决。”

这一提倡，德国也向法国提出。法国外交大臣在7月24日写道：

“德国大使曾体恤我，要特别注意他召回中的最后两段。他表示这最后两段包含了整份文件中最重要的部分。以下是我记录下来的：

“‘德国政府强调，有关奥、塞双方的问题，应该在奥、塞双方范围内解决，严格避免其他各国直接介入双方当事者中。德国迫切希望，该冲突能在局部内保持，因为对于任何一方干涉，他都不能保证会因不同条约义务而产生不可预料的结果。’”

德国政府当时似乎非常希望能控制冲突的局势。英国驻德临时代办处提到了以下内容，同德国外交大臣的对话：

“德国外交大臣表示，他已经向俄国政府解释了本国不希望爆发全面战争的愿望，同时正在全力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假如奥、俄关系将变得危险，那么德国会立即接受四国联合调停方案。”

俄国不进行干预，德国似乎对此迫切希望。7月27日，法国外交大臣写给各国大使的函件中也能看出：

“对于法、俄处于维护和平的目的而介入，德国大使在今天下午向我传达了他的看法。他说，俄国已经接到奥地利的通知，奥地利不会因希望扩张领土而破坏塞尔维亚领土的完整性。确保本国的安宁和秩序才是奥地利唯一的目标。是否能避免战争取决于俄国。同法国一样，德国也同样渴望和平，同时迫切希望法国能利用自身影响力尽量缓解俄国的愤怒。”

同样，英国也采取了这一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在7月27日写道：

“原则上，德国同意接受四国提出的奥、塞冲突的调停方案。但是，德国仍然保留作为盟友对奥地利提供战时援助的权利。德国还要求，英国要用

自身影响力说服俄国，保持冲突的局部化来维持欧洲和平。”

即使德国要求英法实施干预俄国，德方仍然认为不应由外国解决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的矛盾，7 月 27 日，英国驻德大使发回国内的电报称：

“德国外交家认为，英国建议的协商方案和一个仲裁庭并无两样。在他看来，除非奥地利和俄国主动提出，不然各国不应该受召参与。所以，虽然德国很希望和他国一起就共同维护和平而努力，但他还是不能同意英方提议。”

然而，无论任何，奥地利也不愿意受到他国影响。7 月 28 日，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发回的电报称：

“奥地利外交大使态度冷静又坚定，他表示不会磋商任何有关塞尔维亚发出照会的事情。今天，奥方即将宣战，众所周知，因为奥皇和他自己温和的个性，能确保这是一场正义的、不可避免的战争，必须直接解决当事双方的问题。”

虽然这样，似乎德国政府还是期望和平相处的，7 月 28 日，英国驻德大使发回的电报内容：

“我于今晚受邀拜见了德国首相。他表示希望我告知英国国内，正如德国和英国在上一场欧洲冲突中成功做到的那样，德国非常希望能维持和平。此前他不认为英国有关多国的提议能行之有效，所以未能接受。在他看来，这种协商和由其余四国组成的最高法院等同，审判当事双方。所以德国未曾接受这个提议，但这并不代表德国会强烈反对有效的合作形式。德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试图推动俄、奥之间直接地友好地进行有关情况的谈判。”

不幸的是，德国很快做出的可怕决定没让这些良好意图维持太久。法国驻俄大使在 29 日报告给本国的电报内称：

“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收到德国大使的通知称，假如俄国不能停止国内动员准备，德国就会下令进行全军动员。萨佐诺夫这样回答，俄国进行战备有以下原因：一是源于奥方态度顽固并且丝毫不妥协；二是因为早在此前

奥地利早已开始了三个军团的动员。因为德方传达上述信息时态度强硬，俄国政府下令今晚增加13个军团的动员，以期对抗奥地利军队。”

就算这样，德国对待战争的态度仍然犹豫再三。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在7月30日时写道：

“法国大使得到来自柏林方面的消息称，德国驻奥大使受命对奥匈政府提出严正交涉，以对奥方企图挑起欧洲战争的谋划进行抗议。然而遗憾的是，这位德国大使不可能全心全意为和平进行请愿，因为他本人对奥地利普遍存在的极端仇俄仇塞情感非常认同。”

关于在奥地利方面德国应该做出的努力，我们可以在外交文件中找到痕迹。1915年，在开战一年之后，以下信息才被德国首相提交给国会：

“我发了电报给我国驻维也纳大使：‘因为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已经陷入战争状况了，所以我们继续要求奥地利与塞尔维亚进行谈判也徒劳无益；不过奥地利完全拒绝和塞尔维亚交换看法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作为盟友，我们当然愿意履行应尽的义务，然而如果因奥地利忽视我们的建议而使我们卷入全面战争的话，我们也是不会同意的。’……完全是因为后来俄国开始全面动员而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

这些理由显然不完全真实，并且出现得太迟了。有人曾对此有绝妙的描述：假如政府的陈述全部都是事实，就不会有外交的存在了。

然而，在外交谈判期间，德国所做的种种声明难道仅仅是为了拖延时间吗？德国驻俄大使显然不是这么想的，7月30日，英国驻俄大使在电报中写道：

“今晨两点，德国驻俄大使又拜见了俄外交大使萨佐诺夫，因为现在他已经因为战争无法避免而显得崩溃了。他向萨佐诺夫请求，给予一些建议，以期作为最后一线阻止战争爆发的希望，好让他发电报回国内。对此，萨佐诺夫起草了以下内容提交给他：

“‘假如，奥地利承认欧洲他国的利益会因其与塞尔维亚的冲突而受影响，同时，能主动宣布会将有损塞尔维亚王权的条款从最后通牒中删去，俄国会

做出停止一切战备活动的承诺。’”

然而，外交家们的预期总是赶不上事态发展速度。就在现在，德国国内全面动员的消息纷纷在报纸上出现。7 月 30 日，法国驻德大使的文件中写道：

“昨晚，德皇主持召开了军方会议决定全面动员。此刻我们才终于明白，为什么各国用尽各种方法（英国宣布保留自由行动的所有权利；俄国沙皇与德皇的书信往来）研究出的解决方案最终难以实施。”

最后决定的时刻很快到来，以至于这僵局并未持续太久。法国驻俄大使在 8 月 2 日向本国政府致电宣告：

“昨天晚上 7 点 10 分，本国宣战声明已由德国大使向萨佐诺夫传达，大使已在今晚离开了圣彼得堡。”

德国驻法大使在 8 月 3 日写给法国外交大臣的声明中表达了以下观点：

“经德国政府和军方确定，德国领土已在法国军队实施的公开敌对行为中遭受破坏。我得此通知，德国认为，由于贵国的侵略行为，导致了此次开战。”

当然，这些完全是虚假的借口。因为在法国做好准备之前，德国必须刻不容缓地征服法国，因此需要假借一切借口向法国宣战。

第五章大众心理影响了战争的起因

1. 民意是重中之重

即使是君主，也无法对抗当代的民意力量。缓慢产生的民意，为不自觉民意打下基础——通常，这比当局的自觉意志重要得多。

民意在当前战争的起源中不算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民意的影响力的确存在。在众多国家中，所有外交官们都极其重视民意的问题，特别是奥地利。而和塞尔维亚冲突事件中，与其利益最不相关的国家——英国，其政府更是注重民意。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之前曾提醒过，构建感情是政治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且最后由一种传播手段演化成集体心理。德国统治者通过这种手段使得德国民众非常痛恨敌对国家，同时让他们相信：德国遭到了英国和俄国的背叛，并且深受其害。在德国 7000 万人口中，也许没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可能需要 50 年以后，等到下代人或者下下代人才能还原真相。

针对英、法的集体偏见，想要在德国人中成功激起的话，不但需要个人强大的意志力，而且需要极其有力的宣传工具——实际上，需要媒体、爱国社团、出版界与学术界的长期合作来确保获得预期效果。而报纸就是其中最具权威的领导者，因为它向来是拥有断言、重复、暗示、声望这一切能够影响群体心理的现成武器。

尽管德国政府非常渴望维护和平，但是却大力支持以上系列宣传活动。因为有效的宣传可以让政府借口收取更高的税收，来供应扩大军队规模之需。

德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通过提高德军的威望，来使得其他国家不敢反抗，从而不使用战争手段也能建立自己的霸权主义。经验显示，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因为集体观念的膨胀可以导致巨大的威力以至于其创造者都无法把握。

媒体可能在形成民意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力量。一旦德国想为陆海军扩军增加新的税收时，在政府和军工厂的资助下，媒体便开始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宣称法国将要对德国复仇正在准备进攻。

实际上，民意的力量更强于君主的威慑力，虽然我们常常不能意识到这点。如果民意开始做出确切的自我表示，没有人可以抗衡其强大的力量。

起初，德国对中立国的国内感情不屑一顾。然而，当全世界都在反对其入侵比利时这一行为时，民意的力量开始让德国畏惧。德国试图在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美国等许多国家收购或创办报纸来挽回民心。德国同对待其他方案一样，使尽浑身解数、坚持不懈地进行这一构思。然而因为心理学知识的极度缺失，德国人没有把握好群众的感情和心理。他们使用了大量的夸张陈述最终导致读者对其的所有信任都消失殆尽。

2. 德国人中的主战派

法国人从来没得到过德国人的喜欢，其古老的历史也一直为德国人所嫉妒。由于最近的种种事情，这种嫉恨心理变得尤为严重，特别是摩洛哥事件。德国媒体在激起民众公愤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其在暗中巧妙地操纵了这一切。

黄皮书中准确地反映了德国人的心态，以下是摘录：

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德国人因为去年的事件感到自尊受伤同时对法国人充满仇视。对德国人而言，1911 年 11 月 4 日的条约是极大的挫折。

在德国的每个地区、每个团体，都一致认为是法国夺走了德国在摩洛哥的份额，同时怀恨在心。

德国似乎在一两年前就已经准备好要征服世界。他们的工业、贸易、领

土都在迅速扩张，似乎自以为无比强大并且无人能敌……所以，我们法国这个四千万人口的国家被他们视作劣等民族。

在德国，有很多人是主战派的追随者，当然，还有很多人主张和平。黄皮书中的另一份文件显示：

对于最近可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德国公众有两派意见。一派是主和派——的确有势力在德国主张和平。

基于阶级地位、学识道德、个人利益和特定主张等，主战派们又再次被分为几类，不过他们组成了一个大的整体意见，同时推动战争酝酿的缓慢进行。

渴望战争的人认为，当前环境下是无法避免战争的，战争的硝烟迟早会蔓延到德国来；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人口过剩、生产过剩、市场贸易需求等引出的经济原因导致了战争的必然爆发；除此之外，是一些社会原因——这些分歧的存在也许本身具有预警或是延迟德国国内社会党派和民主党派的兴起。

还有一些人对国家未来没有信心，认为现在对法国是个好机遇，因此要加快战争的步伐。还有所谓的"俾斯麦主义"——如果确实能这么说的话——从而变得好战，不得不跟法国人谈判让他们感到羞耻。明明有很多决定筹码握在他们手上，但是他们却要在从来不占据优势的谈判桌和会议桌上用权利、道理来束缚自己，这显然是不能心甘情愿的。

还有一些人对革命后的法国怀有一种神秘主义的仇恨，所以他们也渴望战争。

最后，还有一些譬如希望扩张市场的军火制造商、期望在未来战争赔款中投机的银行家们主战派，因为他们对战争带来的巨大商机感兴趣。

除了培养一些杰出的学者之外，德国的大学还发展了一套战争理论。通过统计学计算，经济学家们证明德国需要成为一个殖民与商业大国来和工业产出相匹配。很多人都渴望将德国特有的思想感情推向世界，包括一些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宣传家等，同时代替法国成为世界最高文化的代表。

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普遍接受：即将爆发的这场战争是属于法国和

德国的。

上述报告中的所有信息几乎都很确切，不过最后一句中谈到的“属于法国和德国的战争”，我不太认同这一观点。实际上，在德国人心里，对英国怀着极深的恐惧和仇视，与英国人的敌对情绪远甚于法国。可以明确的是，德国会在未来某天和英国开战，但是，和这不同的是，德国对法国绝对不是对抗。理由如下：德国和英国是竞争关系，但是法国和德国是贸易合作关系，对于竞争者人们会给予残酷的手段，但是对合作者却态度温顺。法国和英国越来越被德国的贸易占领，甚至已成为德国最好的市场，同时越来越多的财富正源源不断地滚进德国的制造业和商业。假如和法国开战确实能带来更多的利益，法国早就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惜代价抓住许多逝去的机会了。

英国是德国唯一害怕的对手，在全球各个地区，到处都充斥着德国与英国的竞争，德国对英国这个强敌的仇恨也在日益剧增。不过，德国尚和英国勉强和平共处的原因是，德国觉得自己的实力还比不上英国。然而，德国无比热切地想要组建一支可以与英国抗衡的舰队，因为德国只有通过征服英国，才能占领安特卫普，才能达到掌控世界主要贸易路线这一目的。

然而，为了履行上述目的的舰队在宣战之际尚未组建完成，所以对德国而言，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事态的快速发展让德国措手不及。所以，当时的德国是不希望开战的，是当时各种复杂情况综合在一起导致了战争最后的爆发。

3. 外交谈判期间与宣战时刻的感受，各交战国国内人民的感受

在英国和法国看来，无法避免战争潜在的威胁和爆发，这是必须面对的灾难。然而，很多外交资料显示，部分国家却不这么认为，特别是很多对此事不甚关心的国家。

德国好像很欢迎战争，至少德国媒体看起来是这样。7 月 10 日，法国驻巴伐利亚代表这样写道：

“日前，德国公众对政府的一切政策都将给予支持，包括一些面向战争方向的策略。因为过去两年中近东发生的一些事件，让公众相信战争是解决不断恶化政治经济问题的一项手段，而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还有以下这份文件，法国外交大使在7月26日发出的电报：

“一种被称为沙文主义的风潮在柏林爆发，法国驻德大使康朋看来，如果俄国采取第一个军事行动，德国会立即做出回应，而不是等任何借口再向我们发起攻击。”

不过，事情也的确是这样。然而，德国的宣战，在社会上引起的是愤怒多于喜悦。我从康朋处知晓，在他和使馆随行人员归国途中，路经每一个车站之时，得到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德国旅人粗暴的羞辱。

外交谈判期间以及之后的阶段，奥地利的百姓——至少是日耳曼人们，看起来都很支持战争，因为奥地利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有着即使血流成河也难以消除的种族仇恨。

英国驻维也纳大使这样写道：

“奥地利民众好像无法理解，拥有如此正义姿态的奥地利怎么可能由任何国家成为其阻碍。在奥地利民众看来，其他国家所做的任何纯粹的政策或是关乎国家威望的举动，都一律被看作萨拉热窝事件的后续复仇行为。”

法国外交大使向各驻外大使发出电报：

“目前，能做出的最为积极的猜测是：维也纳内阁正因感觉自身行为比国内新闻界和军方落后，而试图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恐吓手段令塞尔维亚做出最大让步。奥方必须借助德国的支持来达到这个目的。”

我摘录的一些英国驻奥大使的文件中，都特别指出了对于像塞尔维亚宣战事件，奥民众的狂热态度：

就与塞尔维亚未来的战事而言，这个国家已经全体陷入了狂热状态，假若延迟或者阻止战争，民众将会感到无比失望……晚间，当维也纳得知，塞尔维亚的回复遭到拒绝、奥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已代表政府向贝尔格莱德表示

断绝关系这一消息后陷入了狂欢，人们纷纷欢唱爱国歌曲上街游行至深夜。

……显然，在奥地利看来，除了征服或是被征服，和塞尔维亚之间就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了。

奥地利对塞尔维亚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也由此可见一斑。另一封来自英国驻奥大使的函件摘录如下：

奥匈帝国已经决心和塞尔维亚开战，在他们看来，自己是举足轻重的大国，不用参考任何来自他方的调节建议，决心一定要惩罚塞尔维亚。

此外，要获取俄国国内民意的相关信息十分困难，俄国民众对奥地利很少了解，甚至闻所未闻，官方报纸上仅有政府授权的官方资料。所以，所谓的民意，在俄国可能仅仅限于学者、知识分子等高层人士的意见。和此相关的外交文件也是少之又少，下面是我能搜集到的全部相关内容：

7 月 23 日，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在信件中提到，奥地利在照会中规定时限"可能激发俄国国内的公共舆论"。

7 月 26 日，法国外交大臣在信件中提及："根据俄国的民意，不管是政治上还是道义上，俄国都不可能对塞尔维亚遭受入侵坐视不理。"

来自 7 月 27 日法国驻德大使的文件："一股能够卷起一切的民意狂潮将在俄国涌起。"

然而，上面的内容都只是猜测，因为这些不清楚的结论都只是远距离的推测，我们可以对此有很多种讨论结果，但是都无法准确反映俄国民众对此的态度。

我们更加了解战争爆发后的事情。在宣战时表现出巨大的热忱，往往是那些根本不知道为何参战的无辜牺牲者们。一名目击者如实记录了俄国农民的情况：

带着不可思议的热情，俄国农民奔赴前线，同时也被上层社会——不管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所羡慕及欢送……

……突然从俄国民众灵魂深处释放出战争的美德和力量——它们本来永

远不会被唤醒，如果不是这次机会。

通常，农民们认为在他们一生中只要喝酒就好了，但是情况却并不是这样。战争似乎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生活意义，真正的目标似乎存在于死亡之中。将躯体献于神圣的祭坛之上，就是俄国人对参战的所有意义。

当我们看到，俄国士兵冲向敌人，他们冲上前去拥抱死亡的荣耀，我们感受到了其非凡的勇气中体现着先烈的精神力量。

第六章奥、德、俄三国君主意志的作用

1. 奥皇的意志和主导奥地利政策的心理因素

我们引用了直到宣战之前的枯燥文件，但这些没有给我们提供有关战争近因的满意解释。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探究促成战争的人们的心理。在重大事件中，如战争，国家元首通常被认为有巨大的影响力，虽然他们没有，即使有，也非常有限。当然，他们的自觉意识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他们也在潜意识中遵从着集体所创造的不自觉意识。在某种情况下，这种意识可能变得重要，以至于抑制了“动机平衡”。

即使天堂有独裁者，但人间不会存在，因为人都受到意志之上的各种因素主宰，拿破仑就很认同这句话。历史表示，君主们经常违背个人意识或自觉意识行事。例如，法国和普鲁士国王在 1870 年都不希望战争爆发，却都无法阻止，只好顺其自然。

位列战国元首第一的奥地利皇帝，即使他在长期统治中四处征战，但一直渴望和平。由于年事已高，他不能过多参与战争爆发前的外交谈判。或许由于他那些平庸的大臣和平庸的继承人，以及他国内臣民对塞尔维亚的深刻憎恶，他才同意了武装冲突，因为别人告诉他这只会局限于塞尔维亚和奥地利之间。

此外，他对和平的热爱不是出于善良，而是出于对困难的恐惧。在他统治的起初阶段，他多次展示过极端严酷的一面。例如，在他继位不久之后，匈牙利爆发了起义。他就下令将起义分子处以绞刑或斩首，将其财产没收，

并将这些人幸存的家属公开处以鞭刑。甚至有年届八旬的老年人。

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战争，是多种心理主导因素共同作用的，其中最显著的有两个，一是对威望的渴求，二是对俄国的怀疑。促成了最后通牒的产生和奥地利及其他国家的全国动员。

在大使们的外交函件中发现，威望对奥地利非常重要。例如，英国驻意大利大使在 7 月 23 日的函件中写道：

“今早我与奥外交大臣举行会见，他宣称奥匈政府不能再推迟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了，也拒绝塞尔维亚复照中提出的一切谈判要求。事关奥匈帝国的威望，冲突将不可避免。”

奥地利深深怀疑俄国或者其他国家介入，会庇护塞尔维亚，因此在德国的支持下对塞尔维亚闪电宣战。这是为了避免欧洲各国形成类似仲裁庭的协商机制，否则奥地利要接受各国的审判，并费力解释自身的行为和动机。但是，尽管奥地利希望对塞尔维亚施以惩罚，但不想挑起欧洲全面战争。因此，在一场战争即将开始时，奥军的态度变得缓和了。8 月 1 日法国外交大臣写给各驻外代表的信函：

“奥地利大使求见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宣布奥政府愿意就对塞尔维亚最后通牒的实质内容进行磋商，萨佐诺夫对此表示满意，建议磋商最好在伦敦举行，并有各国参与。”

英国外交大臣也在 8 月 1 日写道：

“我已得到最可靠的消息：奥地利已告知德国，尽管俄国的动员已经改变目前局势，但是奥政府充分赞赏英国为维护和平所做的努力，愿意考虑我国的调停提议。这一提议的结果自然便是：奥对塞军事行动从现在起还将持续，但英国必须敦促俄国停止对奥军事动员。”

但是德国在最后一刻介入冲突。英国驻维也纳大使报告国内：

“随着冲突焦点转移到德国与俄国之间，圣彼得堡和维也纳的对话就此中断。德国在 7 月 31 日介入，并向俄国和法国分别发去最后通牒，丝毫未留

协商的余地。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3日又向法国宣战。如果德国能够推迟数日再做此举动，欧洲很可能不会陷入此后的灾难中。”

2. 俄国沙皇的意志和主导俄国政策的心理因素

俄国沙皇是当代权力最大的独裁者，同时也作为世上最显著的例子证明君主总是不得不违背自身意愿行事。因为在整个统治过程中，他总是不免被迫去做一些完全不情愿的事。

沙皇是怀有理想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在刚继位时，他希望带来世界和平。尽管如此，在他统治期间，俄国经历了最频繁、最持久、最血腥的几场战争——日俄战争、俄国内战，还有与德、奥的战争。

当今君主是自身意志以上各种意志的集合体。他的权力完全由各种意志组成，并受这些意志操控。无论这些意志是如何改变其表现形式，都会对他产生影响。现代政治的全部艺术便体现于此，这种艺术可以引领事件的发展，却无法创造事件。

在外交资料中，人们可以看到沙皇是多么反对战争，并且为阻止战争做了很多努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了参战。

就像同期主导奥地利政策的心理因素一样，沙皇的行为也同样受其限制——渴望威望，怀疑强大的邻国。所以，他同样相信俄、奥之间的战争不能避免。

俄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巴尔干小国的创始人——原先，这些小国是被土耳其人统治的，所以在俄国看来，自己有义务和责任保护这些国家不受外族侵犯。假如俄国允许奥地利对这些小国实行吞并，其实俄国本身并没有遭受多大的损失。然而，就向之前所说，一个外国人是很难理解这些事关国家尊严的问题的。对于一个像塞尔维亚这样的小国而言，完全用不上奥地利这样的军事动员。所以这只能是针对俄国的，奥方一是对俄国心存疑虑，二是不能承受俄国的突然袭击。

奥方的快速动员，引起了俄国对此的匆匆回应，也由此加速了战争的爆发。外交文件中也体现了沙皇政府匆忙行动的原因：

7 月 29 日，英国驻俄大使这样写道：“如果不是俄国认真备战的态度，也许奥地利真的会认为俄国渴望和平而相信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7 月 29 日，法国驻俄大使这样写道：“经俄军总参谋长证实，奥方正在就加利西亚前线事态进行加速战备和国内动员。今晚，俄方将下达对奥开展的 13 个军团的动员命令。”

除了因为对奥方的不信任而发起动员外，俄国没有表现出一点斗争的态度。俄国为了维护和平，其在最后一刻宣布，俄方会就奥方对塞尔维亚独立的尊重而选择停手，如果奥方能做得到的话。8 月 1 日，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德国大使表示，俄国会在奥地利保证尊重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与独立性之后停手。他还说，对于奥地利，德国无意进攻。他会在今天再次向奥外交大臣提出，假如奥方对于这点拒绝做出让步的话，就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次，俄国将会誓死抗争。”

3. 德皇的意志和主导德皇意志的因素

人们一直试图刻画德皇的心理。而现在，我只是探讨那些可能在最后一刻导致其宣战的因素。

德皇无疑是个爱好和平的人，除却其为了避免来自任何国家的攻击而加强军事准备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 25 年统治的事实中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解决了可能将本国卷入战争的复杂问题。对此，法国驻德大使没有任何异议，甚至还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我们必须保持火药干燥’，这句话概括了德皇正在努力熟悉和接受的一种他先前排斥的思想，他常常说这句话。”

威廉二世是极其冲动、自私、虔诚的，常常认为是上帝选派自己为代表的，

也常常做这样的主张。他曾在宣战时向士兵们做了以下演讲：

“请你们记住，是上帝选择了德国人民。我——你们的皇帝身上已经接收到了来自上帝的精神。他的武器、他的宝剑、他的副手就是我。不服从我的人，让他们都去受苦受难吧！让懦弱者和怀疑者们都去死吧！”

对于以上演讲，劳埃德·乔治如此评论：

“这种事从没在穆罕默德时代以后发生过。或许，疯狂向来很恼人，时而也会变得异常危险。当一国元首身上显现这一特质，同时变成一国之政策时，必须将其完全铲除。”

或许，这还不算太疯狂，但的确是神秘主义精神的发作。我们应该注意到，虽然德皇非常热爱和平，暗示总是采用威胁手段解决问题，也许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战争思想是如何在德皇脑海中产生的。他常说，要保持宝剑锋利、火药干燥，他前往摩洛哥、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等地宣扬，要依照个人承诺，履行保护职责，并常常发表威胁性演说。他认为德国的强大军队是他最强大有力的后盾，他希望感到畏惧，他在欧洲舞台上的领袖地位不用征战即可确保。

在多年的统治中，他获得了想要的一切，所以可以说这制度还不算太差。在摩洛哥时，他击败了法国。在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他迫使俄国保持沉默而无所作为。

他的威胁在迄今为止的事件中一直都很成功，所以当这在塞尔维亚事件中不曾奏效时，他几乎不敢相信。我曾摘录的那些德国外交报告，让这位皇帝觉得：英国国内还处在爱尔兰威胁中，其战备状况也完全不如德国，而法国和英国是绝对不会参战的。基于这些原因，德皇是绝对不会同意召开各国会议的。因为一旦召开，这次会议必然会像以往一样，没有办法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来阻止奥地利因斐迪南大公的遇刺而向塞尔维亚复仇。

如果德皇热爱和平并且对参战并无任何兴趣。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其最终决定宣战？

首先，我要解释的是，看起来像是最终导致做出决策的军事原因。为了

了解到这类原因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证明，对于德皇与俄皇而言，军事动员日期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因为战争最后开始的根本因素和决定性因素正源于此。根据法国大使和英国大使的函件，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各国对彼此间都缺乏信任，担忧对方的战争动员，担忧对方占得先机。最终不惜发起一场真正的战争，只是为了消除这些担忧。

奥地利开始后，俄国立即开始效仿其军事动员。7 月 31 日，法国驻俄大使在报告中写道：

“奥地利已经在过去的 6 天里，发动了全国动员。德国，也已经开始了秘密而持续的军事动员。所以，为了不冒险让奥地利占得任何先机，俄国也已经开始了军事动员。”

在与德国首相会谈之后，7 月 31 日，英国驻德大使在报告中写道：

“德国首相说，因为俄国对奥地利备战的开始，他的工作——为维也纳和平与缓和局势的努力——受到了严重损害……然而，他不能在其他国家都加速做预防准备的时候对本国不加准备。一旦俄国现在针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他也不会无动于衷。他想让我知道，德国政府极有可能在最近——或许就是今天——做出很大的动作，实际上，他正打算向德皇做出请示。

“首相还提到，当他获悉，俄国正在俄德边境加强战备，沙皇还以老朋友的名义给德皇写信，请求其加强在维也纳的调停工作，同时，德国同意了这一请求。”

关于自身加速军事动员，俄国也提供了充分的理由。8 月 1 日，英国驻法大使写道：

“根据可靠消息称，是因为奥地利下了全面总动员的命令，俄国才开始总动员。假如所有国家都愿意解除动员，那么，俄国政府也会同意这么做。”

因为对俄国动员的极度害怕，导致德国在 7 月 31 日发出了对俄国的最后通牒。很显然，俄国无法接受其在最后通牒中的内容，其中对俄国提出了要求其在 12 小时内解除动员。直至 8 月 1 日，德国对俄宣战。

德皇曾在发展到这一步事态之前，其个人急切呼吁沙皇停止动员。这表现了他维护和平的真诚愿望，也证明了他恐惧俄国的军事动员。在下文中，我将节选一些文件片段摘录。首先，7 月 28 日，来自德皇给俄皇的信函，其中最重要的段落引用如下：

“我已经获悉，奥地利进军塞尔维亚在贵国所引起的反应了。就如同斐迪南的遇刺事件，正是塞尔维亚多年肆无忌惮的煽动导致了悲剧。我并不讳言，抵抗公共舆论的压力对您和您的政府而言是很困难的。我一直谨记，这么多年我们之间真诚的友谊。我正在为了说服奥匈帝国与俄国达成谅解而竭尽全力。我需要您的协助来移除未来可能出现的困难。”

在回信中，俄国沙皇对德皇的调停工作表示了感谢。7 月 29 日，俄国沙皇又一次发出电报表示：

“俄国做出的任何军事行动，只要被奥地利视作威胁，都会引发你我正力图避免的灾难。这样，我们的调停工作就会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德皇于 7 月 30 日子夜一点再次发出电报：

“我国大使已受命提请贵国政府注意，我也在上份电报中告知过您，贵国的军事动员可能会造成巨大危险和严重后果。奥匈军队的动员仅限于局部，仅仅是针对塞尔维亚的。假如按您的电报以及贵国文件所说，俄国发起的动员是针对奥匈帝国的，那么，将会损害您的授权与请求之下进行的、我的调停工作，这必然走向失败。现在，由您决定是战还是和。”

7 月 30 日，沙皇于下午 1：20 回电：

“我方已于 5 天前决定了目前的军事措施，这个预防手段是针对奥地利的军事战备。我真切地希望，您的调停工作不会因为这些措施而受到阻隔，我对您的工作是非常珍惜的。”

德皇在 7 月 31 日下午做了最后的努力：

“原先，是我承担了贵国政府和奥匈政府的调停工作。然而，谈判还在进行之时，您的军队却已开始针对我国盟——奥匈军队进行武装动员。正因

如此，就像前面我提醒过的，我几乎难以进行我的调停工作。即使这样，我还在坚持努力。

“刚才，可靠消息来报，我国东部边境已经布满了贵国军队的部署。我国不得不采取类似防御手段来对安全负责。

“我已经竭尽全力维护和平，我也没有任何责任，需要承担目前这场在威胁整个文明世界的灾难。

“就算是此时此刻，您手中仍然把握着决定权。俄国的荣誉和权威从来不曾受到威胁。最好的方法是，俄国耐心等待我的调停结果。”

沙皇并没有答复这封电报。7 月 31 日，德国向俄国发出的 12 小时内解除动员的正式通牒意味着正式宣战。

宣战之后，从德皇对待法国大使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其不同寻常的粗鲁与暴躁表现了他不是一个因奸计得逞而扬扬得意的人。确实，德皇并不希望看到爆发战争。我已经提到过，在回国途中，法国外交官们遭受了粗暴的待遇——他们不得不待在紧闭的火车车厢中 26 小时不吃不喝，并且被迫支付了 5000 金法郎（最终收款人因为羞愧而将钱返还回来）。

一心维护和平的德国皇帝此刻异常生气，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阻止战争了。通过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系列非常友好的通信后，德国会向俄国发出一份措辞强硬的最后通牒。那么，这位君主如此急躁的动机，到底从何而来呢？为什么他在最后一刻失去耐心，最终决定宣战？

可以明确的是，德皇害怕留下太多的准备时间给未来对手。在理解迅速动员对德国的意义之后，我们就能理解这种说法了。按照德军总参谋部掌握的情况，法军的动员时间是 20 天，俄军则需要近两个月。如果按照德军正常的动员速度，便能够首先摧毁法军，然后再撤回来进攻俄国。然而，这一方案会因为俄国利用外交谈判尽力拖延时间加强动员而彻底失败。届时，德国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敌人，而是两个。德皇发出最后通牒的原因，也正来源于此。

4. 各种影响德皇不自觉意志的因素

德皇的不自觉意志受了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理性动机。同时，德皇也因此做出了自觉的决定。必须要考虑的事实是：渐渐地，这位热爱和平的皇帝在军方变得不受待见，而同时，他好战的儿子，正在军中日益提升其威望。曾经有三四次，德国军方一度想要开战，特别在爆发摩洛哥事件之时，然而都未成功。德国统治世界的愿望，在反德主义者们的不断煽动下似乎也变得容易实现了。然而，过了几年之后，是否会变得更苦难也未知可否——俄国在那时应该已经把落后的铁路系统修建完善。综合这几样因素，德皇的最终决策终于呈现。

鉴于总结本章节，我需要又一次提出，不管是德国对奥地利的鼓励，还是奥地利毫不妥协的态度，主要都因为奥方以下这一错误认识——俄国、法国、英国都不会参战。这一错误认识在那关键一周内一直围绕在所有的外交谈判中。因为这些缺乏远见的领袖们，其所做的错误判断导致数百万人牺牲，摧毁了多座繁华城市，呈现欧洲大陆上一片焦土。

第七章结论：到底是谁想要发动战争?

1. 总结一系列导致战争的事件缘由

以我个人观点来看，战争开始之前的事情已经陈述得很明白了，可以不用特地再对这些内容进行总结了。虽然这样，但是我还想对此做个小小的总结，用来概括理清一些事实，因为单从官方资料中研究事实实在是枯燥乏味。

除却导致开战的众多远因，单从奥地利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开始说起——塞尔维亚煽动引发的事件。

奥地利在其王储遇刺身亡后，下定决心报仇，又想在巴尔干提升威望。因为奥地利在巴尔干战争时期遭遇了一系列反抗与忤逆事件。所以，奥地利向塞方发出了一份难以接受的最后通牒，一旦遭到塞方拒绝，奥地利就可以趁机对塞开战。同时，因德国承诺对奥给予支持帮助，且根据外交报告分析，俄国和法国因自身疲软以及内部纠纷只能保持中立立场，因此奥地利在这件事情上看不到任何风险。俄国曾经在波斯尼亚事件上给予让步，这次也不例外。英国内部正在遭受爱尔兰威胁，同样不会愿意介入一个与其利益不相关的事情里。

奥地利无比希望能吞灭塞尔维亚，假若这个计划能顺利实施，奥地利不仅能增加其领土，还能在斯拉夫人面前树立威望。至于德国，虽然没有获得实际利益，但却同样可以获得重要的道德威望。德国又一次将自身意志强加于欧洲诸国之上，同时利用自身壮大的力量给世界留下霸权印象。当然，最重要的是，德国不需任何付出，只要坚持阻挠其他各国介入奥、塞冲突即可。

实际上，这就是德、奥的企图心理。然而在这些精心策划实施过程中，两国外交家们却忽略了某些因素，有关情感的、神秘主义的、集体的，所有历史事件都无法逃避的这些因素，这些因素也完全脱离理性的逻辑顺序。在它们面前，也许预测和结论都严丝密合，但结果却大相径庭。举个例子，俄国这次碰到的情况与上次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因为俄国顾及颜面，既然已经遭受过一次彻底的侮辱了，那么这次就不会再轻易放过了。

一个心理学错误导致了战争的开始。因为预设前提就不对——以为俄国会屈从、也没有其他国家会加以干涉，紧接着一连串悲剧继而发生。为了达到恐吓俄国致其退缩的目的，奥地利和德国在与俄国阻止战争的继续提出的谈判中，表现得相当傲慢。在德、奥再一次确认不用担心会引发全面战争时，态度变得更加恶劣，直到奥地利最后以为可以对塞尔维亚安全发起攻击了。奥地利外交家们认为此举非常明智，但实际愚不可及。因为一旦各国发起干涉，奥地利将没有办法退路。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各国最终还是打算出手了。

在德国和奥地利——特别是奥地利，最终发现正是他们自己的强势态度将欧洲整体推向战争之时，态度开始变得收敛而试图力挽狂澜，但事态已经发展得无法挽回。德皇写给俄国沙皇的紧急电报也只是徒劳，主动将事态发展至此的人最终却被形势所困。

宣战之前，到了十一点，既想保持自尊又想树立威望的心态——目前为止的第一动机——渐渐在两国之间消散，产生了新的感情，它叫作怀疑。

就是怀疑在加速各方军备准备，好对敌人出奇制胜。在一场战争中，速度是胜利的重要因素。

奥地利开始武装动员以备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不但是为显示自己的决心，也是为了恐吓俄国。奥地利非常清楚，塞尔维亚这样的小国，其国力早已在前两场战争中透支完毕，而凭自己的常备军足以完胜。

所以，俄国也完全可以认为奥地利是在针对自己发动军事动员，继而开始动员自己军备，来准备应战。

德国不想任何国家赢得自己，于是发了一份专横的照会给俄国，要求俄国解除动员并借此一探俄国究竟。虽然俄国的动员显得稍过鲁莽，但沙皇绝对不可能听从德皇粗暴的命令。于是双方谁也不听从谁，彼此也无法退让一步来妥协，最终只能走向战争这一条道路。

虽然法国真心渴求和平共处，但也无法不跟从盟友的队伍。

英国虽然强烈希望不卷入战争，但因为错误的心理也不得不介入战争。德国参谋长坚信英国会对德国的入侵行为不予理会，所以将神圣的战时条约抛之度外，坚定不移地对比利时发起进攻。这一错误战略早已应该受到谴责，因为此时英国又加入了其敌对队伍中，也不会给德国带来任何益处。假如德国直接取道卢森堡而不入侵比利时，也不会在烈日中耽搁两周，就能更快地逼近巴黎。

所以，我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想象，假如各国在谈判时多一点耐心，就能避免战争的引发，看起来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过，按照战争的远因来看，我们无法彻底阻止战争的引发，至多推迟战争的开始的时间。因为有太多矛盾存在于德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迄今为止，欧洲维护和平所采取的手段是武力解决，这种方式的代价太大，不可能长此以往。

2. 这一问题要怎样回答：到底是谁想要发动战争？

我曾在上一章节中提出：就“究竟是谁想要战争”这一问题，毫不夸张的回答是“没有人想要”。实际上，的确没有人想要战争。虽然如此，德皇最终还是宣布开战。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他其实也并不想发动这场战争。

在仔细研究众多资料之前，同很多法国人一样，我也认为是德国在找各种借口以期向我们发动战争。黄皮书收录的文件中，一位知名学者表达了这一观点，还有两位索邦大学的教授也在一篇论文中提出相同观点——他们呕心沥血的文章依照很多历史学方法，并且正是用“谁想要战争”为标题。

然而，虽然起初我也抱着相同的看法，但是现在某些因素却让我对此产

生怀疑并且犹豫再三。也许在未来不可避免英、德之间的战争，但是我疑惑的是：法、俄战争究竟能给德国带来多大好处？当时法、俄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德国的开放程度日益加大，那么德国为什么还要开战呢？何况假使德国真要开战，原本还有很多更好的时机——前文中我已提到，日本打败俄国且其内部陷入革命混乱的时候，俄国根本没有任何自我防卫的能力，那才是攻打俄国最好的时机。

后来随着对资料的深入研究，我发现并得出这一结论：虽然德国不断加强其战略装备，同时外交态度也非常强硬，但直到真正爆发战争之时，德国并不希望得到这一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认为我是法国唯一持此观点的人。但是，另一些认真研究过历史材料的人最终也为这些证据说服。索邦大学教授维克多·巴希（M. VictorBasch）在《1914年之战》一书中写道："是的，德国人想要和平，想带来和平，想要一个德国式的和平，想要各国投降而形成的和平。德国并非不惜一切代价渴望战争，尤其不希望主动挑起战争。"）

即使没有这些我引用的外交资料，但对我而言，还有很多心理学事实可以证明以上结论。

首先，最后一刻德皇向沙皇发去电报请求俄国停止行动，并称俄国这一行为会使德国不得不开始动员。德皇甚至提醒沙皇要记得他曾在祖父临终前所发的有关俄德友好的誓言。假如德皇真的准备开战，完全没有必要发出以上言论。所以可以看出这些电报内容可能是真诚的——第一封电报发于爆发战争的前三天，可以确认的是，即使在这么迫在眉睫的时候，德国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参战，还在尽力阻止战争的爆发。

我觉得这封电报是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明。另外，德国驻俄大使的一番充满绝望的攻击性言论也极具说明性——英国大使在一份文件中提到：

"眼看无法避免战争，他（德国驻俄大使）看起来好像就要崩溃了。他向萨佐诺夫请求能否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让他能发回德国国内，来作为最后一线希望。"

可以明显看出，这个态度不应该来自于一个经政府指令要发动全面战争的大使所有。实际上，德国外交大臣在和英国大使的某次交谈中也表现过相似感情。这不太可能是勾结一气装出来的绝望，因为他们身处高位又相隔甚远。所以，他们早就没有必要伪装。

那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德皇并不想发动战争。可是，宣布开战的的确是德皇本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已在上一章节中给出明确的答案。德皇最担心的是怕德国行动太晚、谈判不成功给予俄国充足的时间进行动员准备，所以改变了军方制定的快速进攻策略。其实奥地利已经开始显示出妥协的态度了，假如德皇能少些疑虑，就可以多些耐心了。不过在最后一刻，周围环境和身边的人还是影响了德皇的判断。

所以，关于“谁想要战争”这一问题的答案也许是“没有人”；但对另一问题“战争的近因是什么”，答案只能是“三国皇帝的互相怀疑”。三者之中疑心最大的莫过于德国皇帝，所以他也应该被认为该对战争负有主要责任，毕竟的确是他最终下定决心宣布开战的。

德国沙皇还应该对鲁汶、兰斯、伊普尔等城市遭遇的屠杀和破坏负责，如果没有他对各德军将领的允许，他们是断断不敢作此行动的。这些都会成为德皇的难以抹去的污点。

在本书中，我花费了数章的篇幅来研究心理学相关问题。因为心理学可以反映人类不同情感碰撞所产生的原因，同时也能看出这些情感的事情发展。虽然教授学者们都很关心战争的缘由，然而这一问题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战争是由种种不可预料的形势所导致的，无论是谁引发了战争的最后爆发，结果都一样。

上面大部分来自于公众的看法。公众不会花费精力去仔细研究究竟是德、俄、奥哪一方想要引发战争，也不会因为外交文件细枝末节的稍微差池而陷入其中，所以反而能看得更清楚。公众发现，德国在耍同样的伎俩，想要将

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做法重现。法国在公共场合大声呼喊：“我们不能让相同情形再度重现！”人民发现无法避免战争的开始，于是纷纷自告奋勇。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的自我看法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德国一直借自己强大实力四处欺横，战争的爆发只是迟早的问题。所以，法国也没必要因为暂时的和平而继续受辱。

第八章德国和各国国内关于战争原因的看法

1. 关于战争观点的心理因素

就某些德国学者而言，战争起因的缘由和表现出来的整体激烈情绪着实令人讶异。

我将在以下的章节中就一些著名学者的突出表现加以提及。如果能参考我的《观点和信念（LesOpinionsetlesCroyances）》一书，相信读者对这些观点的起源更能理解。我在书中提到：那些源自集体、情感、神秘主义的信仰与理论证完全不搭边，个人心理源于集体心理的作用。

该书中的某些原则都能在某些现象中有所呈现，我也试图努力说明其中的部分原则。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欧洲战争如此之快地成了那些原则的鲜活证明。

现在，我会谈到德国国内人民对战争起因的看法。这些看法很能说明问题：说理对于基于暗示和心理感染的信仰完全不起作用；就算拥有最高超的智慧，也无法对一个深受信仰主宰的某个人有所动摇。

表达这些观点的方式很是激烈——这些特征正是表明了某种新信仰，研究心理学是宝贵的资料。实际上，我们非常惊讶于德国知名哲学家冯特（Wundt）竟然大肆谩骂其他国家，污蔑他们为强盗和杀人犯。

不仅是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人，都对这种野蛮暴怒的行为印象深刻。来自克里斯迪亚纳大学的戈拉乌教授虽然身处中立国，但是他也在一场演说中对德国如此卓越的思想家因战争变得不可理喻而表示震惊。在我多年前总结

的集体心理规律说明，由他引用如下：即使是最明智的人，在集体心理的包围下也会丧失理智。他以知名哲学家欧肯（Eucken）教授的为例，告诉我们德国是为了履行复兴人类的使命而参战——“我们不仅是为自己，而是为全人类福祉而战。”

上文中，我引用了哲学家冯特（Wundt）的言论，不过下面这段内容更加直截了当：

德国向敌人发起的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一场正义和神圣的战争。而法、俄、英所发起的战争根本不能称之为战争。

我们敌国的战争并不可与我们发起的战争相提并论。实际上，战争之所以称为战争，是由于有其自身权利和法则约束。敌国的攻击充其量只是一群厚颜无耻的强盗的手段，而不是正大光明的公开斗争。

戈拉乌认为，一旦发生这种集体疯狂病症，没有多少德国学者可以脱离其中。

2. 德国外交家们的看法

自从开战以来，德国外交家们就一直在努力试图证明，虽然是德国政府对外宣战，但战争的真正制造者并不是德国。

我曾在上文中摘录过一段来自德国总理的演讲内容。下面是来自于1914年12月1日他的演说内容：

“英国政府无动于衷，坐观这场战争的爆发。因为英国人以为在其他协约国的参与下，德国就会在世界市场上深受重创。所以，欧洲和世界陷入大战，应该由英俄负起责任。”

显然，德国总理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他说希望英国能压制住德国。但从我搜集的其他情况来看，事实并非如此，英国极度恐惧战争，想要尽全力避免开战。

在和德国政治相关的著作中，前任总理冯比洛将英国政策中极端不具侵

略性的一部分很好地刻画了出来：

“英国在通过海军法和启动造船业后，这十年期间本可以无所顾忌地在海上实施扩张，从而使德国的海上发展完全被遏制。但是英国并没有这么干，英国不想开战，所以我们才能抓到海上部分主导权的机会。”

在战争起源和侵犯比利时中立地位的原因问题上，德国首相甚至毫不犹豫地以伪造资料来证明其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一些德国人在洗劫比利时之时，发现 1906 年、1912 年期间英国与比利时军事代表的谈话资料，其中提到了一旦比利时受到袭击，英国将对其提供保护措施。后来，德国总理在关于此次报告的谈话中却故意淡化了这些内容，并故意将“谈话”一词译作“协议”。自然，比利时的外交代表对此很有异议，同时呼吁所有人注意德国的这一丑行。

这种行为是很危险的，因为损害名誉是非常严重的，何况撒了一个谎，就需要制造无数个谎言来圆谎。

3. 来自德国权威媒体和学者们的看法

德国外交家也许没有完全准确地陈述事实，但至少他们陈述的内容中还有一部分是准确的，远远好于德国的学者们——后者已经完全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智力思考了。现在，这些著名的研究专家走出研究室，面向全新的问题研究时，他们的论证能力突然奇怪地大打折扣，同时居然对他国心理表现得完全不知所谓。很多怪异的言论由此发表，以下是部分摘录：

“首先，俄国驻法大使被他们所攻击，称他们是战争的铺路人，最终的战争爆发就是由他们引起。随后，英国国王、首相、外交大臣以及俄国沙皇等都遭到他们的谴责……读者若想找到证明材料，请参见 10 月 2 日的《新自由报》和 3 日的《法兰克福日报》。后者刊载的文章题为《协约国的阴谋》，非常能够说明问题，但却仍不及他们在保加利亚刊发的一篇类似文章，那篇文章声称整个事件都是英国、法国、俄国政府早在巴尔干战争时期就已谋划好的。”

慕尼黑大学教授布伦塔诺（L. Brentano）也发布了古里古怪的言论。他表示，法国是为了避免1870年之耻重演而开战的，并从而建立新的王朝。下面是部分节选自其文章的内容：

“法国的反动派不愿看到复仇思想减弱——巴黎人已经开始期盼君主政治的复兴，许多人认为战争将为法国带来想要的一切。在过去数年间，《费加罗报》和《高卢报》刊载的文章和巴黎小餐馆中的歌曲都足以证明：法国——或者至少是巴黎——已经为君主政体和战争做好充分准备了。”

和同时代许多人一样，柏林大学教授爱德华·迈尔（EduardMeyer）并没有多少自我观点，他也在重点集中谴责和攻击英国人：

“从上至下，所有德国人都已意识到，我们共同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英国，正是其逼迫我们殊死搏斗，也正是其自私地将其他国家拖入战场，原因无二，只是想让我国失去作为一个国家的单独存在。

“……无可非议，是英国政府蓄意挑起战争的。

“……他们也许会更加高兴，如果能将战争爆发的时间加以延迟的话，这便是爱德华·格雷使尽全力要召集协商会议的目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协约国就会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准备军需，更大的羞辱就会降临到德、奥身上……俄国开始动员后，德国才发出最后通牒，英国计划因此被搅乱。如果德国不愿意被打个落花流水或是被形势牵着鼻子走，就该由我们开始行动了。”

这位作者可能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不是太过熟悉，你看他发表的以下结论：

“我们问心无愧，因为德国对征服策略从来不感兴趣，也不可能非法侵犯别国，包括比利时。”

像施罗德先生这样的大制造商、大实业家，也对以上观点加以认同。1915年1月31日，他在面对德国工程师社团的演说中说：“这场战争是英国的阴谋，我们就此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证据。”

1915年3月26日《日内瓦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德国毫无根据地单方面指责英国顽固的态度令中立国印象颇深：

“当英国在德国报纸中被完全描述成战争的煽动者时，作者一定以为他们的读者失去了记忆或者思考的能力。我们可以说，英国政府在1914年8月期间是世界上最致力于和平的政府，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正致力于海上裁军法案的通过。”

4. 关于德国军方的看法

即使很多德国军方人士都认为是英国煽动爆发了此次战争，但是还是有少部分人相信是俄国的快速动员导致了战争的引发。

以下是摘自于1915年1月25日的《日内瓦日报》，对德军总参谋长冯·法尔肯海恩（vonFalkenhayn）将军访谈的片段：

“这场战争不是我方主动挑起的，也不是任何军队派系引发的，而是俄国的军事动员造成的。我们面对这样的军事动员也无能为力，只能加强自身准备。我国皇帝和驻圣彼得堡大使都建议并提醒过俄国，假如俄国开始动员，那么我们也会下令开始动员，同时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保障我国自身安危。但是虽然如此，俄国还是在谈判的同时发起了动员。”

同多数同胞一样，现任德军参谋长冯·默特克将军也将所有原因归罪给英国。

《泰晤士报》1915年1月23日的一份来自德国报社对冯·默特克将军的采访中表明，他完全否认德国向俄国发动战争：

“假如的确是我们想要发动战争，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趁日俄战争之时俄国危机之际呢？又或者是在英国困于布尔战争时呢？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英国会参战对我们提出反对，因为其利益正与爆发冲突相符合。英国只是拿比利时做借口罢了，其实际已筹划很久……可以肯定的是，德皇将因为这场战争而遭到重大打击。”

5. 德国公共民众的看法

除了灌输给德国民众的观点，其他大多数德国民众都毫无自我观点，包括中产阶级在内。因为德国人拥有极强的纪律性和尊重权威性，所以几乎没有人会发表与政府声明不同的个人观点，因此要从民意中寻找分歧几乎是不可能的。德国拥有七千万的民众，其中很少有人相信战争不是出自英国邪恶的阴谋，而是为了颠覆德国。也正是这种心理作祟，当德国媒体积极公布宣战声明后，公众给予狂热的态度来响应。很多电报从来不承认败仗，只带来胜利的消息——从没有提起过马恩河战役，只是略带提及为“影响德军进军巴黎的战略原因”。12 月上旬，一个瑞士人来访问德国，描述了当时参战的德国民众心理：

“全部的德国民众都相信胜利终将属于德国，德军拥有战无不胜的力量，并且德国拥有纯洁神圣的参战动机。虽然所有民主国家都鼓励创新精神、推进个性观念、发掘个人潜能，然而德国人的统治却给予公众一种集体情感，来自高层的影响才能使这种情感被唤起。

“由于德国人这种奇怪的心理原因，那么他们盲目跟从统治者的观点并以此视作真理般的存在这一行为就不难被理解了。因此，如果一个德国人声称只有德国陈述了事实、协约国发表的全是谎言时，如果一个德国人主张德国由于比利时与英国有密约而有权侵犯比利时中立立场时，他全部都是真诚的。并且他无法被任何反面证据所说服。因为他觉得伟大的德国永远不会错误，撒谎的都是其他国家。”

宗教信徒的所有心理特征都可以在德国人的表现中一一发现。

很多新闻机构都在战争期间接到了持续引领德国公众舆论的指令，其中饱受争议的沃尔夫社也在其中。公众怀着宗教般的虔诚心态接受了最虚假的报道，比如：德军士兵的眼睛被年轻的比利时姑娘活生生挖出；牧师们在负责看管德军伤员，等等。

沃尔夫社源源不断地报道这些耸人听闻的新闻。《法兰西报》在 1914 年

10 月 18 日发表了一份沃尔夫社发给一个南美小国的电报，以下是节选内容：

“昨晚的伦敦，被一大队德军飞机所包围，德军士兵入侵英国王宫并将其国王活捉。国王被俘后，立即用 1 亿金马克赎回自己的自由身。”

这种论述仅仅是留给那些原始国家的，因为他们头脑简单的人民很容易上当受骗。报道的作者们在这些事件中无所顾忌地发挥着天花乱坠的想象能力，如下所示，一家驻君士坦丁堡的德国新闻机构，在土耳其报纸上发表：

“据阿姆斯特丹传来的无线电报消息，假如土耳其愿意不派出强大的舰队攻击伦敦，英国政府将送两千头驼满金子的毛驴给土耳其。”

6. 中立国民众的看法

关于战争的起因，对于不同国籍的作者，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德国军方的影响力、协约国的阴谋、德国王储的自大、法国的复仇愿望、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奥地利的野心……就算这样，很多自主作者还是无法下定论，只提供了和著名历史学家费雷罗相似的观点：

“在本次战争中，还无法解决关于目前文明世界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责任问题。”

费雷罗觉得，也许是“德国的宣传机器和主战派在国内营造氛围，导致政府无法再继续做出不明确的姿态。”

普遍来说，战争起因的看法不是来自于理智决定，而是情感或神秘主义倾向所影响。天主教徒们——至少是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们——开始是支持德国的，当时普遍观点是这样。我们可以从 1915 年 1 月 19 日 M. Dudon 发表的宗教评论文章看出这一点：

在战争打响第一声枪声的时候，他们虔诚期望赢得德国的胜利，这是上天对德国第一个辉煌军事胜利的期许。德国理应得到这些，虔诚的德皇、正直的德国人民、施行善行的德国天主教徒和正统忠诚的奥地利，德国理应得到这一切。假如德国没有赢得胜利，未来的欧洲该怎么办呢？假如欧洲最终

由信奉新教的英国、推崇分裂主义的俄国和鼓吹革命主义的法国这三者掌握，欧洲该怎么办呢？

要么上帝想让西方乃至全世界被世俗邪恶所包围，不然德国一定会胜利。因为只要德国获胜，也会带来社会、政治与宗教的正统秩序的胜利。

不过，战争的确改变了很多事情。少数法国天主教徒一度认为战争是对国家的惩罚，然而不久就改变这一观点，他们甚至亲自上场，表现了勇敢的一面。

卷五

战争方面的心理因素

战争势必会对个人、政治与社会发展起到强有力的促进作用，因为它会把武器、战略、人道主义概念、权利观念、风俗习惯影响及改变——总之，影响甚至改变一切。与此同时，战争依然会产生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对人类生存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第一章战争手法的改变

1. 现代战争中无法预测的新元素

这里我并不想对现代战争最新的且无法预测的形式做过多的探讨。但是，既然我将着重讨论心理因素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就必然少不了简单地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背景状况。

战争势必会对个人、政治与社会发展起到强有力的促进作用，因为它会把武器、战略、人道主义概念、权利观念、风俗习惯影响及改变——总之，影响甚至改变一切。与此同时，战争依然会产生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对人类生存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在对一些特定变化分别探究之前，我会首先对它们做整体解析，以此讲明地上与地下、海面上与海面下以及空中的战争是怎样受这些变化影响的。

以往几十万人的军队人数变成如今的几百万人、有限空间的战场范围扩大到现在的几百英里，这些正是现代陆地战争的首要特征。

顺着冗长的战线，战士们在泥沼中造壕沟，拼生死。然而后方安全的指挥部里将领们只需打个电话，下个命令，再无其他多余的举动。

先前的那些射程、瞄准度、杀伤力都极低的枪支现在早已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射程远、威力大，甚至能在几日之内便把看似坚不可摧的要塞完全摧毁的加农炮。

同时，海上战争也在不断发展，其发生的变化依然神速。潜水艇在战争初期已被开始使用，它可以对造价达 300 万英镑的巨型军舰在几分钟内发出

致命打击，甚至让其不敢轻易驶出港口。

除陆、海战争以外，绝对还少不了空战——攻击力量暂未得到有力验证的飞机因为其能大量地跨越边境，所以在未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也会是不容小觑的。

以往的战争形式中，从恺撒到拿破仑，将领远方遥控，其个人的主导能力统筹大局，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在路易十六和拿破仑时代，曾有一幅画这样描述着：眼前的士兵们在奋力厮杀，远处的高地上，将军们坐镇指挥。

如果是在现代，呈现的便会是不一样的场景：几十万军队全部出击，画面中却无一人踪迹，士兵、枪炮、战壕全在某个看不到的地方。

但是，也不乏目光敏锐善于观察的朋友，他们会看到一些人影忽闪忽现——他们不时地从背景中出现、静静地爬过田间野地、急速跃起窜入战壕。

当我们看到正在指挥着这支庞大隐形军队的将领本人时，可能看到的是他正在慢慢地、悄无声息地走出画面。他以接收和发送电报或电话信息的方式，把极其重要的战略部署——下令把大部队通过火车等方式送至即将攻打或防守的地域。

最终，假如我们这位一路寻觅的朋友想要挖出所有军队的最高将领，或许得踏上一段很远很远的路途。在马恩河战役的整个战火中，也就是自 1914 年 9 月 5 日至 25 日，其将军及其副手们都始终在一个距离战场 120 英里的地方指挥着。

除了在俄国和波兰发生过大型战役外，以往毕其功于一役的作战方式如今已被数以百计、陆陆续续的小规模遭遇战所替代。但是，尽管是小型战役，仍有很多很多人的生命为了夺取那么点战争中的小小优势而星云殆尽。

以上我所讲的算得上是一些变化，除此之外，这场战争带来的很多出其不意还是让大家大为惊叹。比如，所有军校在战争之前都会讲授：为了避免士兵的严重损耗，步兵应当分批地以开放队形前进。但是这场战争自始至终，德国却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大规模进攻的突击形式。在沙勒罗伊德国军队用

这种出人意料的方法大大地挫伤了法方军队的士气，在那时是相当成功的。但是在伊瑟战役当中，德军采用这种方法将军队完全暴露在了英法两军之间，变成了集中的打击目标，15万人在短短几日之内便化为了炮中灰。

总的来讲，对德军的战术法军将领毫无研究。鉴于对法国战备的整体考虑，1915年8月9日马勒泰尔将军（GeneralMalleterre）写道：

“即便是在最近几年，当法国逐渐从好战转向和平主义，并最终清楚看到德国的威胁时，法国军方仍然懈怠地认为东部防线牢不可破，法军有能力通过阿尔萨斯与洛林发起迅速反击。

“但是，德国在1914年8月迅速策划、组织并实施了作战方案，打得法军措手不及。正因如此，当法军首次接触敌人并发现暴露于来源不明的炮火之下时，感到非常震惊。德国攻势的惊人之处在于，在发动步兵之前，先用密集的火炮攻势将法国本就脆弱的防线置于瘫痪。我所知道的都是我的亲眼所见，我将永远记住法军在敌人枪林弹雨中坚守与撤退的日子，也将永远记住由于法军根本不能将战线向前推进一步而愤怒万分。

“……德军于1870年和1914年发起的两次攻势都体现了战略、人数与物质上的强大优势。”

不难看出，除某些尚不可知的特定的心理因素影响外，德国人的确预料到了战争中的所有情况。

接下来我会详细地讨论一些现代战争中不可不谈的技术转变。

2. 现代战术、战线拉长、攻击与防御

从战术方面来讲，由于以前战争的大面积部署在现在只是意味着发动前线攻击和包围敌人，所以先前因为供给困难而非常复杂的现代战争已很大程度地简单化。大批军队的调度与部署、武器弹药与食物衣物的补给供应是如今的难题。所以铁路尤其重要，运输系统比对方先进的作战方只凭此项便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可以击败人数多的敌人——俄国的战败就是实例。德国人

把一大队军团调至敌人的侧翼，突袭他们、包围他们，随后俘获很多战俘和枪炮——使用铁路系统把军队调度到先前预定的位置，并用简单的战术打败敌人。弗雷德里克大帝很久以前说过：“如果发动突袭，一支三万人的军队能够打败十万人的军队。”

即使如此，法军将领们甚至在战争早期深信德军无法抵制俄国的入侵。但是正好相反的是，德国是战胜的一方。就算俄国胜利，由于他们的交通系统不够先进，他们也没办法从其老巢向前攻进很远距离。假如德军撤退，他们也一定会把通往境内的交通系统摧毁，所以就算俄国攻打德国，也无法在其境内深入。

现代战争是很大空间的一系列遭遇战，很难产生决定性后果。当前战线的延长肯定违反了以往完全聚集兵力的原则，并避开了“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

除此之外，战壕的使用很大地转变了以往关于攻守的概念。

依心理学角度来讲，防守的一方明显没有进攻一方的大优势。防守方毫无知觉地被从天而降的攻击打醒，显然处在劣势地位。从拿破仑时代起，全部军事教科书都提到了这一原则，除此之外，其也是德军的基本教条：

弗雷德里克大帝对路易十五致信称：“‘即使人数不占优势，也最好主动占据进攻地位’‘敌人在遭遇袭击时常常自乱阵脚，正好提供可乘之机。’”弗雷德里克大帝通过主动进攻赢得了许多战役，这是因为他的敌人们常常拘泥于旧时兵法的僵硬形式与准则，防守十分无力，不能采取有效的反击手段；拿破仑的许多胜利也是由于对手的战略战术有许多破绽，在冯•莫特克（vonMoltke）时代，包围敌人的原则也很成功，因为敌人并未找到有效的反制措施。

战壕的出现其实并没有把进攻一方的优势打消，将领们几乎不会下令大举进攻敌方战壕，除了涉及重要军事行动的时候。我提起过一个实例：由于德军欲占领加莱并袭击法军侧翼，于是贸然进攻法军的战壕，结果在短短几

天内 15 万人的生命白白地牺牲了。

即使这样，守方并不是绝对的拥有这种优势。因为如果攻的一方有充足的弹药供给，就能变被动为优势。1915 年 6 月俄军总参谋长在《军队公报》中写道：

“总体说来，我们在进攻中的损失并没有防守时大，因为防守需要顶着敌人的重重火力。比如，当我们进攻某一个村庄时，我们缴获了一架机关枪，俘获 629 名奥地利战俘，其中包括 19 名军官，而我们自己只有 50 名伤亡。”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与拿破仑的将领不同，德军的成功将领大多是经验丰富的老人。巴伐利亚的利奥波德、兴登堡（他已在统领第四军团时退休）、麦肯森等都已年逾七旬，冯·海瑟勒（vonHaeseler）元帅甚至已经 80 岁高龄。他们都已准备退休，便于把职位让给年轻的军官，可是后来又被召回了。拿破仑时代，年轻人可以打败有经验的老将领，而现在的情形却恰恰相反，得出的结论显而易见：现在的很多东西跟以前已完全不同，确保成功的资质也大不相同。以前优秀的东西当然还需要，但是需要更多的冷静思考。

3. 现代战争里的要塞与战壕

我们关于要塞的概念如今已经完全被现代战争所改变。此处预见性的问题已不存在，因为仅靠经验就可判断：假如像南锡一样的开放城市有临时战壕在其周围保卫，就能抵御围城军队的进攻。可是，被安特卫普等地认为的坚不可摧的要塞在仅仅几日内就沦陷了。由于没有一座工事能够抵御甚至很短的时间，所以这场战争将毫无疑问地标志着永久防御工事的终结。在 8 月 29 日查尔蒙特（Charlemont）的要塞受到来自 7.5 英里之外的攻击，三天之内便沦陷了，守军的子弹在这期间甚至没有碰到敌军。在坚持 6 天之后隆维的要塞也沦陷了，安特卫普也没有撑过两星期。当然，德国人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还有比进攻法国和比利时要塞时所使用过的更远射程的大炮，所以在三四天之内便可摧毁这些工事。

如今战争的结果证实，要塞仅仅只是固定住了那些原本应当作战的士兵们，它们提供的藏身不过是迷惑和陷阱罢了。看似坚不可摧的华沙和科夫罗，因为华沙包围有30多个工事，科夫罗作为俄国后撤的最后一道防线，装配有最先进的现代防御设施，也具有强大弹药储备，德国人在此处缴获了400多架大炮。

现代战争中要塞的时代虽然已经终结，但是战壕的时代开启了。战壕是露天的要塞，而且假如部分被攻下或摧毁，还能转移到其他地方。对战壕的防守仅需很少人员，但是相比于构造最为科学的要塞也要坚固很多。战壕常常使守方比攻防要占据很大优势，因为想要冲破战壕防线的话，没有比普通战场上高出10倍的士兵和炮弹储备的话是不行的。

假如你费了很大力气攻占了其中一个战壕，而敌人又在后面挖了好几个，于是你又不得不发起新一轮的进攻。这也是战壕如此坚固的原因之一。

战壕不但终结了从前的战略部署，也意味着滑铁卢之类决定国家命运的战役的消失。

现代战争体现战壕新颖性的是它的范围、重要性和加固方式，而并不是它的使用方式，因为战壕在以前的战争中就被使用过。在以前的战争要塞工事的四周总是平行地挖出一些战壕，法军在1640年围攻阿拉斯时就是这么做的，在后来的1658年包围敦刻尔克时，这种方法同样被使用了。

战壕在很久之前不仅被用于进攻，也用于防守。正如大家所知，惠灵顿通过双重战壕包围通往里斯本的路线迫使马塞纳撤退，并分割成两段——前一段长30英里，后一段长7.5英里。该战壕由25000人用一个月的时间挖掘完成，宽度为7.5英里。在很多现代战役中战壕也得到过使用，特别是在特兰斯瓦和日本战场上。

尽管战壕的重要性早已在军事教材中阐述过，但是在抵抗德军侵略的初级阶段，法国并没有使用战壕。关于此事我想指出，在1906年10月24日出版并于1911年10月28日修订的步兵陆地工事指南中，都有提到过战壕，而

且还收录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战壕，既有露天的，也有上部有所遮盖的。

现代战争中的战壕有两大新颖之处。一、通过部署了重火力使其真正具备了工事的题中之意。二、战壕本身能绵延长达300英里或400英里。这一延长本来是因为马恩河战役后的临时需要：德法两军都要尽力包抄对方，又要避免暴露在对方的火力范围之内，战壕便是唯一适合的掩体。所以德法两军都沿着整条战线挖掘战壕直至海边。然而仅仅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300多英里的地下掩体就组建完成了。

想要一连几个月待在战壕中，没有不懈的耐心和勇气是不行的，因为士兵们不得不处在敌人机关枪的扫射和脚下地雷的危险当中。下面这段对战壕的描述是一位亲眼所见的军事作家所写的：

请想象这样一条沟，有一人身高之深度、两人前后并立之宽度。士兵们就站在沟底开火，火药筒和其他装备碰撞着一面沟壁发出响声，另一面沟壁上掘出些台阶，以便轻松出入。根据地势不同，战壕的长度也各有不同。

如果有一枚炮弹落进战壕，便足以使里面所有人都丧生，因此士兵们发明了弹片屏障。这些屏障是一些土制的墙体，厚度足以抵挡炮弹碎片，并将壕沟分隔成若干相互连通的部分，每个隔断都留出容纳一人通行的空隙。从上空看下去，壕沟就像一个耙子，弹片屏障便是一个个耙齿，每两个耙齿之间足以容纳三至四个机枪手。如果场地允许，在壕沟一侧或背后还能挖出一块更大的空间，让暂时空闲的士兵稍作休息以恢复精力。这块空间顶部覆盖着厚厚的树枝和泥土，底部铺着稻草。每两个壕沟之间常有走道连通，以便成百上千人在其中来回穿梭——正是通过这种地下工事，敌对两军争相发起进攻。

想要夺取战壕必然是相当危险的，但是更加危险的常常是往后的防守。这是因为在此前的战争中那些战壕往往已经被炮弹炸毁了不少，而战士们必须在敌人的炮灰中快速修补。一名炮兵回忆说：

“我记得在一次进攻中，由于前期火力工作很彻底，受命攻占一组战壕

的兵团仅仅花费了13分钟、牺牲了80人便取得胜利。但是之后，他们遭遇了敌人的11次反击战，虽然守住了战壕，却花了整整六天六夜，并牺牲了1500人。”

不得不承认，真正无坚不摧的战壕是很难做到的，构造合理、防守有力二者必须有机结合。战壕对俄国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战争不久法国将领便意识到：要想防守要塞，必须得把大炮架到要塞前方适当的战壕里。体会到这一点之后，法国很多要塞就能更好地抵挡住德军的攻击了）。而俄国人却完全没有理解到战壕的原理（俄国的一份军事报纸的评论文章把战壕的缺陷归为所有要塞失陷的原因。很显然，这只不过是其能力不足的一个借口而已），没有办法抵御德军胜利的步伐，后来竟然沦落到实施焦土政策，无情地烧毁自己的家园。

《泰晤士报》在1915年9月3日描述了俄军为了暂时不让敌人前进而进行的焦土政策的一系列做法：

“俄军后撤的沿途已俨然成为一片火海，路边的房屋都被焚毁，绵延有数英里。克莱罗夫的每条街道都在燃烧，当匈牙利人进城时，整座城市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火盆，因此他们无法通行，只能绕道而走。当他们抵达弗拉基米尔—沃林斯基时，那里也在燃烧，他们从那里还看见韦尔巴镇和远处的所有村庄——统统都在燃烧。科韦利的整片平原已化为一片熊熊火海，周边所有村庄都在燃烧。没有随俄军撤退的滞留居民惊恐万分，已经说不出话了。”

被烧毁的不只有村庄，大城市也不能幸免。原有四万人口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在焦土政策后已变得一无所有。俄军似乎特别重视能延长德军几个小时的行程这一事实，在撤退的一路上把所有的东西都烧毁。

4.弹药与军需补给的重要性

在战争爆发时，人们往往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作战人数。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出这一结论：能获得军需的数量更为重要。虽然俄军的人数比敌人要多很多，但由于军需不足造成俄国战败的种种战役让我们不得不意识到获

取军需的重要性。正如一位英军将领所说的：抵挡一个旅的攻击，两个人和若干机关枪守卫战壕足矣。想要夺取一个有大炮和机枪以每分钟600发射击频率守卫的战壕，没有铺天盖地的榴弹炮轰炸是不行的。

虽然现在看来好像异常明显，但是弹药补给的重要性却在很晚才被意识到。这一理念被法国、英国、俄国所认可是在经历了6个多月的战争后，正是因为明白得太晚，导致很多的战士为之牺牲。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没有一个法国将领意识到这一重要因素：必须大规模地制造子弹。1914年9月，工厂日产量不到7000枚，但是到了1915年5月，日产量已达80000枚，但是这一数目仍供不应求。

法军将领如此忽视弹药供给的重要性，在宣战时以至于兵工厂的多数工人统统被送上战线，后来又分别被抽调回来，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月时间便被浪费了。如今，我们已然意识到少数人和大量弹药的结合具有的价值远远超过多数人和少量弹药的结合。

5. 人数因素的重要性

虽然说现代战争中足够的弹药和军需补给占主导因素，但是人数的优势也不可小觑。德国人始终重视人数的作用，虽然他们也非常小心翼翼地指出其限制。下面是伯恩哈迪的观点：

“我们必须永远记住，道德和智力一直是主导因素，在一些可变范围内要强于人数要素。毫无疑问，在一些案例中，道德力量本身便足以抵消其他一切缺陷。个人杰出品质将能提升全军甚至全民族的能力水平……在一场不确定的对抗中，如果双方实力相当，实力的效果便会逐渐下降，显示出最高道德和最强牺牲精神的那一方才能最终获得胜利。如果双方的道德水准相当，能够保证财政支持最长时间的那一方将获得胜利。”

所以，相比于人数，军队的稳健更加重要。同一位作者还写道：

“1870年和1871年时，法兰西共和国派出的大批军队，尽管人数占据优势，

照样被勇猛的普鲁士军打得落花流水。另外众所周知，日本的军队人数虽然远远少于俄国，却能不断战胜俄国。美国内战也同样如此，南方军队虽然人数占优，却一直输给北方军队的稳健。”

虽然这样，在双方其他方面实力相当时，人数的重要性又会凸显出来。

“理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即便是天才面对绝对人数优势也会无能为力；此外，规模够大的群体只要正常发挥，也会战胜一切智力与道德占优势的对手。因此，天才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对抗多数优势，因为当多数优势到达某一特定程度时，将显示出势不可挡的影响。”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队人数代表了不同国家的全部有生力量，所以那时的军队人数非常庞大。有些军事作家估测，德国当时有900万武装力量。毋庸置疑，这样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在历史时期的任何阶段都不曾出现过，因为这场战争不仅仅只涉及各国军队，各个国家整体甚至全世界一起都被卷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战争初始阶段，德军由于采取突然袭击战术和大规模编队，以至于损失严重。但是马恩河战役战败后，德军改变了战术，即先选好合适的防守位置，等敌人实力不及开始慢慢减弱时反戈一击，也就是所谓的防守进攻战术。自从马恩河战役后这种战术一直被使用到现在，但是丝毫没产生显著效果，这是因为参战各方基本都实力均衡，战争一般不会出现任何变化，除非其中某方在弹药、人数、指挥上占据优势，并且能撒开数英里的缺口在敌人前线。假如防线在某个特定位置被打开，整个防守很可能垮掉。

6. 海战与空战

由于战争慢慢地倾向于在海底进行，却不在海面上，所以海战比起陆地战争明显要经历了更多发展。至于那些花费几百万英镑建造的军舰可能在几分钟之内被一颗水雷或者潜艇鱼雷炸沉，未来战争中很有可能会被淘汰。

由于潜艇不仅为敌人制造破坏而使其物质损失，也通过引起恐惧而发挥

心理的影响力，所以潜艇在海战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正是由于心理上的恐惧带来的威慑，令其最大的军舰都不敢轻易地驶出躲避的港口。

假如德国拥有够多的潜艇，完全可以对英国形成有效封锁，但是，至今为止部署大型军舰更被专家看好，潜艇却置于次要地位。这一偏好实在是无章可循，因为潜艇的重要性早就已经被预见到。1905 年时，当时的英国海军第一上将费舍尔称，潜艇将为海上战争引来变革。珀西斯科特上将在战前几周也曾写到，潜水艇的引进让水上舰船变得毫无价值。他说："潜水艇将把军舰逐出海洋，就像汽车将马车赶下公路一样。"

曾经的一位海军总工程师建议，把潜水艇改装成既能在水下导航，又能不露痕迹于水面，只露出包括烟囱、发动机和大炮部分的军舰与驱逐舰的集合。这样一来船体只在水上部分有装甲护面，因为潜艇周围水的密度完全可以保护水下部分免受炮弹攻击。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如今不稳定状态下的现代文明中我们可以期望出现更多的其他变化。

第二章新型情感和新型人格的出现

1. 新型人格的出现

这场使欧洲陷入长久动荡不安的战争，属于有能力影响人们心理因素均势的基本事件之一。它可以导致：人格发生多种变化（在其他章节中已提及）——某些人的反常行为会让其熟人都惊讶不已，甚至当其本人恢复到先前环境中的原有人格时，自己都会感到惊讶。

这种变化一般都伴随有引发事件。在某一阶段，热衷于奢华和安逸的人们肯定不会想去继续过着危险和贫困的生活，也没有准备好日日面对死神的邀请，数以万计的人却可以变得和古时最具威望的勇士一样英勇无敌，对他们来说英雄主义很是平常。人们可以发现，那些在文献中读到名字的在战场上显现出无限英勇的人，在公民生活中却是无比和平的人。

所以，我在其他书中提出的一个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再次被证明了：那些表面上持久不变的人格仅仅来源于持久不变的环境。由于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不同性格潜质，在不同环境的压力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所以我们在普通生活中认识的人有可能与之前变得完全不同。因此，没有人能够宣称其自己完全地了解自己。

几乎所有旁观者都为那些军队中的不同社会阶级成员心态的变化而印象深刻，其中一个法国人这样说道：

“我们的士兵们正在形成一种奇怪的心理，环境经常将他们提升到英雄主义高度，他们自愿牺牲、充满狂热并完全无私，却极度厌恶不必要的交谈。

在火线上，喋喋不休者是不能被容忍的，因为法国人再也听不进多少好话了。但是，士兵之间极其团结，当需要发动非常危险的突然袭击时，根本不需要寻找志愿者，因为人人都准备好献身。职责与战争使得每一个士兵都变得崇高。我认识的一个军官原先曾是个猎人，他指挥的士兵是巴黎的一群混混，但如今他们都是出色的军人，在同僚眼中，他们过去的劣迹早已一笔勾销。”(《泰晤士报》，1915 年 7 月 27 日)

这种新的心态显现出特定情感的变化发展，接下来我会指出其中所包含的最主要的。

2. 爱国主义的提升和种族精神的影响

对自己祖国的热爱，或者爱国主义，促使个人有必要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自我利益。种族精神在历经几个世纪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利益后变得更加稳定，爱国主义情感也渐渐增强，因为个人保全的直觉远远没有集体保全那么重要了。

种族精神即是真正在战争中参战的一方，其存在越是受到威胁，就会更加英勇地捍卫自身。爱国主义是一种遗传品质，它是一种神秘主义，是非理性的。所有仅仅处在理性阶段的爱国主义都是极其差劲的，因为这种爱国主义不可能会持久。Chevrillon 说过：

“如同宗教和道德，爱国主义并不关于理性，而是关于生活。它是一种直觉，是一种随着生活发展而不断形成的幻觉与情感，它所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并完善自身展示形式。它部分为保全个体，部分为保全群体，部分为保全种族。因此，如果有人称爱国主义非常愚蠢，是为了死后再无关联的事物牺牲自己，根本没有必要与其争论，因为其论点本身基于‘只有个体才能存在，个人存在的意义和目的都仅限于其自身’这一错误前提。与之相反，正如一片树叶的生存依赖于并服务于树，一个人的存在也依赖群体并服务于群体，其部分——无疑是主要部分——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从这

点来讲，爱国主义是符合逻辑的。当一个人为某些不属于自己的事物而牺牲时，并不是错误或是误判，而是出于集体生活对个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平常时期是潜在的，却可能突然苏醒。”

由祖先传承而具有的爱国主义情怀是长久累计的最高作用之一，总会在关键时刻产生力量。战争开始当天，将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等各派战士召集在一起的正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情怀发挥了潜意识的推动作用，致使各界人士抛开了所有理性论争，一致团结地为其服务。

这种情感的惊人影响力在许多小事情上都表现了出来，这里面最典型的一个事例：在1899年一名士兵从军队逃离，安安静静地变成了一名农夫，并娶了一位德国女子为妻，还成为6个孩子的父亲。显然，他对兵役非常憎恶，所以他才为此大胆逃离。但是，当战争打响时，他却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冒死组建的新家庭，回到法国参战。

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事件，这里面最令人感动的可能就属：一名国务大臣虽已年届花甲但却报名成为一名普通战士参战，最终因被炮弹碎片击中而牺牲。

3. 莽撞和冒险精神

人性的一部分也包括热爱冒险，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比如：狩猎、散打、探险、赌博等。

一个国家的征服者或者开创者只有把自己多次置于命运的赌桌上，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是因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用来形容战争尤为贴切。但是，成功的可能性比起失败的概率并非差很多，所以一定得对各种可能性有清晰的认识。

为了统一德国俾斯麦经历了很多冒险。因为如果换作其他人，可能会对是否攻打看似强大的奥地利犹豫不决，更会犹豫继而攻打法国。

考虑到很小的成功概率的冒险就是鲁莽，这种形式的勇气既很危险，又

无好处，并且已经让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几千人的生命。下面的内容是一位炮兵军官（M. deB）从前线给我写来的信件，后面我还会继续引用他的有趣的观点：

“在英勇与鲁莽之间存在许多不同，后者必须绝对禁止和受到惩处，因为后者将害得我们损失整个军团。在德军不屈不挠的攻势面前，我们如此骄傲地鲁莽行事，却经常损失惨重。因为鲁莽，我们失去了一些最好的士兵，军队的战斗力被大大削弱。”

4. 法国宗教情感在战时的复兴

战争给法国带来了很多神秘主义的表现，但是这种表现与德国在政治上的神秘主义截然不同。

上帝封德国皇帝为其在世间的最高统帅，从而得与世俗事务保持距离，这是德国人特有的神秘主义理念。现在德国人已被上帝选定，派其来改造世界，并因此把所有的优秀品质赋予德国人，他便可以不再操心。

德国人的神秘主义理念相信自己时时都得到上帝的庇护，并不用刻意地向其祈求。然而法国的神秘主义理念对这种庇护却不太相信，所以要通过不断地祈祷来努力获得。在主要报纸上一位知名学者曾发表文章声称：“法国遭遇的这场灾难是对我们所犯下的所有罪过的惩戒。所有宗教派别都一致认识到了这场灾难的赎罪意义。”

那位学者认为，为了使上帝平息愤怒，必须得发动公众向其祈祷，所以政府也收到了如此的请愿。当然，这一要求被断然拒绝了。因为那样一个仅仅被可怜祈求就能有所打动的上帝，对现代人来说太过残暴。即使这样，战争还是被这种宗教理论所影响。1914 年 12 月 26 日谢菲尔斯将军在《高卢报》上发表文章称：

“我们很容易理解全能的上帝为何不允许战争拥有我们预期的速度与破坏性，因为这场战争是脱胎于重生，而重生意味着必将有坟墓存在。上帝为

法国安排了一场漫长、艰苦、血腥的磨难，从而促使法国人的灵魂得以重生。这是战争如此持久的真正原因，它由于超自然而变得最为真实。超自然的力量一直主导着宇宙万物，这无可置疑。”

毋庸置疑，对真正的信徒来说，神秘主义精神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源泉，但是有些时候也少不了给他们带去一些怪异的理由。

虽然在前线宗教感情出现了明显复兴，但在法国的另外一些地方却并不明显。这是因为教皇和一些中立国中天主教派的敌意，再加上一些神职人员断言上天是为了惩罚法国，所以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被深深地伤害了，对天主教也慢慢变得反应冷淡。

5. 公众情感在战时的进展变化

想要讨论公众情感在战时的变化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即使每个社会阶层的思想和情感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其最终形式却依然不可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战争的继续或是停止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公众建议，因为相对于人们如何看待它们而言，事物本身如何远没有那么重要。一个认定自己必定失败的人不久就会看到失败的真正来临。如今，世界被集体观念所统领，这种集体观念形成缓慢，一经被完善便会发挥不可估量的效果。所以，德国在赢得民意方面大费周章，但由于德国把事实扭曲得过多，以至于人们对其陈述不再信任。虽然这样，关于最终胜利的神秘主义信念在德国人的意念中并未减弱也不会减弱，除非感到德国被战争之神放弃了。

一个人可能把发现不同国家间真实民意的尝试给放弃，因为媒体只能报道各国政府允许的内容——可能英国除外。我在这里节选了一份匈牙利报纸的文章内容，只是拿来做参考资料，并不做任何强调：

“在这场已持续 8 个月的可怕战争期间，公众情感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中，全民都充斥着狂热情绪。到了第二阶段，人们的脾气发生变化，公众渐渐对战争无动于衷，无人对胜利欣喜若狂，也无人对失败激动万分。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公众情感的第三阶段，一种极端的紧张与兴奋取代了先前的无动于衷，产生了极强的反应。公众情感会对任何刺激产生反馈，并被最小的事件所触动。人们的悲痛从未像现在这般深刻，对逝者的缅怀从未像现在这样令人心碎，对所有事件的感触也不像现在这样丰富。这一切已远远超出了精神上的兴奋，几乎成了一种病态现象。”（《匈牙利日报》,1915 年 4 月 4 日）

这章和下章将会给我们讲解，我们将怎样把关于人格始终如一的旧观念做出大大的调整。我必须重申，构成人格各种要素的集合只是因为日常生活和社会环境的稳定而维持稳定。由于遗传而积累的影响构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心理内核，不确定的周围环境却可能为他们带来一些不同的因子，然后改变人格，把个体改变成完全陌生的人，不单单让同辈人惊讶不已，更让子孙后代为之困惑不解。

第三章作战勇气及其起源于形式

1. 不同形式的勇气

虽说生命是人的珍贵财产，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中人却心甘情愿地献出，特别是当追随祖先号召的冲动超越自我保留的天性时。勇气可协助对于危险的天然惧怕做出反抗，其包含不同元素，并形成一个不同层面上的整体组合。勇气或许是偶然的，所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实践。但倘若想要让勇气持续不断地保持下去，除非习惯已把勇气列入潜意识的一部分，否则会很困难。

就勇气这一主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机会能够进行许多有意思的思考，尤其在不同战场上的观察记录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我在从前线收悉的众多信件中挑选了下面这封来自炮兵军官 M. deB（上文已提及）的信件：

关于英勇这一概念，战争已使我对之前总是混淆的诸多有关品质做出区分。首先，我开始意识到西班牙语中为何有这样一句话："他只在今天勇敢。"关于英勇，最值得钦佩的是一个人能够离开安全地带，不受战斗的刺激，冷静地投身经过完全估计的已知危险之中。

真正的勇气是谨慎的，严格限制于必要，更不会威吓或咆哮。除非人们开始动摇，必须跟随榜样的力量。

一个人的勇气完全取决于环境，这对于耳根子软的法国人尤其适用。换作是德国人，肯定会在这方面少些波动。

士兵对于司令官的信心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因素，因为仅仅由于不同的领

导方式，同一拨士兵可能在相同情况下成功，也可能失败。

自战争开始以来，法军的勇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改善了所有鲁莽和冲动的缺点——它们使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起初，战士们听命于指挥官始终如一的过时的战术指导，把自己完全暴露在了敌人的火力当中，并疯狂进攻敌方，使得敌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胜。毫无疑问，这种过时战术与法军将领的无能一同为德军的胜利做出了不小贡献，使法军连连惨败。

一名德军将领在1914年10月5日的《费加罗报》的访谈中强调了这一点：

“你们的步兵值得表扬，但他们有非常严重的缺点——其中最危险的便是他们的勇气。你们的步兵不做任何保护便暴露自己，似乎很乐于让自己成为攻击目标，因此瞄准他们并开火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的所为当然十分英勇，却也十分荒谬。你们法国人认为勇气总是有益的，确实，勇气在攻占要塞或白刃战中至关重要。但是太多勇气常常更加麻烦，而不是优点。

“你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确是事实。你们似乎不知道，若要攻克目标，首先必须隐藏自己、在伪装中靠近目标、尽量不向敌人暴露自己、在地上挖个坑并藏身其中、利用乡间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处坑洼、看得见敌人但不要让敌人看见自己。或许你们某天终将从我们这里学到这一切。在战斗中必须冒险，但是在战争之外不要做无畏的冒险。”

最终，这一切指挥官们在和平时期忘记传授的知识，让士兵们通过亲身实践学到了。在1914年11月29日的《Eclair》上一名法国军官发表文章总结了法军的变化：

“我们关于勇气的概念已经发生转变。我们的勇气并未减少，却变得更加温和适度、更加有所保留、更加小心谨慎——总而言之，更加讲道德。我们原来的勇气与杰出、高贵相挂钩，勇敢的人总能凸显于整支队伍。从第一刻起，他们便被视作军中之花，也明显在队伍管理中受到特殊对待。但是，当群体不存在时，例外也不存在了。在战壕中，一个士兵的勇气只有两个见证者——这相当于没有。战壕中的勇气不会带来荣誉，而且通常是不自觉的

表现。这种勇气几乎完全等同于保持冷静，以便允许头脑和意志充分发挥功能。那些伊普尔战役的幸存者将会感到足够光荣，因为他们毫不疯狂，也没有露出任何疯狂的潜质。

“这是我们迄今为止赢得的荣耀，这并不得益于少数人受性格或环境激发而展现的品质，而是由于我们全民族的共同品质。”

以上所述清晰地向我们展现：一种持久、深思熟虑、谨慎的勇气已然取代了间歇性的、莽撞的无畏，这种勇气将在现今发挥更大作用。

在战火中发现的事实一直都尤为有趣。下面是祖里维（Dr. Jolivot）写给我的信，其中对将领们所起到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看法：

“在重火力的影响下，士兵们变得像受惊的马匹，但还能够盲目地听从长官的指令，如果指挥官们不在了，这些士兵都会很快崩溃。在阿尔贡战役中，我看见一支连队在受到第一次攻击后便迅速溃败，而其他仍然有指挥官的连队却保持稳定运转。这些人或许能够再次集结，但除非长官们能够用声音和行动传递信心，否则一切都是徒劳。这些士兵可能抛弃枪支和行军袋等最有价值的物品，其中部分人还有可能发起暴动。”

2. 英雄主义

残酷、血腥的现代战争必定会导致失败或英雄主义。所幸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所见到的是英雄主义——然而它是非常普遍的，可以说应该是一项基本品质。向英雄事迹簿上长长的名单上一瞥，都会让人对此毫不怀疑。下面是我随机抽选的一些事迹：

126 步兵团的一名预备役士兵首先歼灭了德军所有机枪手，然后只身跃入由 20 名德军守卫的战壕，击毙若干，并与剩余一些人展开白刃战。

第三轻步兵团的一位士兵和三名战友受命于 1914 年 10 月 8 日侦查敌军位置。他发现埋伏在篱笆之后的 40 名德军，杀死其中 18 名，其余敌人侥幸逃脱。

第四骑兵团的一名下士尽管只身一人，却凭借冷静和勇猛俘获了德军一

名上尉和23名士兵。

一名海军士兵，为了掩护同伴撤退，他独自坚守战壕，面对上百名敌军，且只有若干沙包作为防卫。尽管他的一只手臂被刺刀扎伤，却成功地拖住敌人并重新返回了队伍。

319步兵团的一名士兵，单手杀死4名德军，俘获8名。他两度受伤并被送往后方，却未等伤势痊愈便主动返回队伍。

这样的英勇壮举不胜枚举，在所有社会阶层的士兵中都存在着，因为英雄主义是不分等级的。但是，这些都是间接性英雄主义的事例，现代战争中的战壕却需要更多的持续性英雄主义，并对应下文中提到的勇猛。

一篇刊登在1914年11月29日的《Eclair》上的文章中，生活在伊普尔战役的战壕中的一名军官说道：

“24日晚上，我们突然被派往伊普尔附近火线上的一条战壕中，我们在那里蹲守了12天13夜，我在第13天时负伤了。我们全身都是泥土，被夜晚的雾水浸湿，久坐到全身麻木，那些子弹与炮弹却像冰雹一般，日夜从未停止袭击，甚至从未停过一刻钟。

“……我们要向所有戏剧性的英雄主义梦想说再见了——势如破竹的进攻、用敌人的血染红刺刀……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与此相反，我们被炮弹爆炸的浓烟呛到、被其巨响震得双耳欲聋、被掩埋在弹片中；我们听到伤员们的惨叫，却无法移动过去救援他们；我们的脸溅上了一个战友的脑浆，看到另一个人的手臂被炸飞，扶起双脚粉碎的第三个人，又搬走胸腔破碎的第四个人。我们不得不目睹和听见所有一切，我们尽管会战栗，却绝不会畏缩。尽管命运最终将让我们躺进坟墓，对我们而言这进程似乎加快了——因为我们此刻便如同被活埋，并为这地狱般的折磨日夜祈祷。”

莱昂·布诺瓦（M.LeonBourgeois）把战壕中的生活总结如下：

“他们的双脚在冰冷的水里，他们只能在黑暗中沉默地忍受，听着夜晚最微弱的低语，一直不能睡去。他们的双手紧握步枪，时刻准备战斗或死去。

一夜接着一夜，一连数百英里——他们都是警惕、冷漠的。他们的指挥官们就在附近，也同样保持沉默。但是当战争打响时，他们便见不到指挥官了，那些指令只能通过电话从远处传达到他们这里。子弹在呼啸，大炮发出突然的轰响，这些强大的破坏物落在战壕上，将它淹没。当一轮袭击风暴过去后，他们便列好队伍，清点剩余的士兵。没有一刻的迟疑与困惑，沉默的士兵们与指挥官们迅速再次就位。

“当次日的军中公报描述这场战争时，会用一些直白、简洁的语句概括整场英勇斗争，没有人会告诉我们这些士兵或指挥官的名字。从最高到最低级别，这些军人的脑海里从未出现过荣誉。”

3. 习惯针对勇气的影响

持续的勇气是现代战争所需要的，而习惯在其起源中发挥了突出效果，因为持续性的勇气正是通过重复经历相似的危险而形成的。经过习惯，士兵们最后由间歇性勇气变成持续性勇气。

因为出于不同习惯，看待事物的角度会有所不同，所以当我在描述战壕生活的艰苦时，不可以做任何夸张。一个整天在阳光中生活的人若展望矿井中的生活，脑海中浮现出那些黑暗的，存在的持续爆炸的危险，就会觉得：失去阳光、宽敞的环境而只能生活在爬行前进的黑暗洞穴中，就好像离开天堂走进地狱。但是假如老矿工退休后，有可能会怀念以前在地下的生活，对他们而言，相比于黑暗的洞穴阳光下的生活才是地狱。

在习惯的力量下，战壕中的士兵们才会斗志昂扬，并不显示出任何疲惫。习惯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他们的心上，当他们离开战场回到农田、工厂或者办公室时，将不止一人会对这些致命战壕表示怀念。

赫里欧（M. E. Herriot）对士兵们在战壕生活中的快乐做出了以下由衷的表述：

“这些泥泞的沟里铺着湿稻草，住着我们的士兵。他们确实已到达人类

苦难的最大限度，这种苦难包括疲乏、严寒、日复一日的紧张以及没有尽头的危险。但是必须承认，一个人关于事物的概念有时可能比事物本身要糟糕。另外，人能够逐渐习惯任何事物。我从未听过任何人抱怨，这倒不是由于腼腆，因为我们的士兵毫不腼腆。尽管战壕里的生活条件艰难到了极点，我不仅没听到任何抱怨，而且所见的人们都非常愉快，这种愉快源自我们国民性格最大的几项优点——自信、乐观、坚定。”

我们必须得记住以上那些战壕中士兵们的精神支柱的几个词，那也是那些指挥官们的主要支撑——他们比谁都清楚其重要性，也使用不同办法予以培养和维系。对于这种可怕生活，战壕里的所有人都可以很快适应，在相似条件下生活很久的一个士兵这样说：

“要习惯战壕生活并不算非常困难，至多要花上不超过一个星期。到了最后，士兵们都是如此适应敌军轰炸，以至于如果炮弹响声停止，他们可能会因为过于安静而失去听力。我们每天都能注意到，士兵能随着炮弹的声响入睡，一旦响声停止却会惊醒。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形成习惯，自从开战以来习惯的形成速度快得超出人们预期。”

从前线寄回的所有信件中士兵们都显示出是怎样快速地适应了新生活。下面内容证明了习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显示了法国士兵们在适应这种战争环境时是多么的轻松：

“此刻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沮丧，无论子弹和大炮如何呼啸，我都不会像一开始那样失去镇定，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当最初几场战役打响时，我们冲锋过早，因为我们所想到的只有白刃战，最终我们由于过于仓促而被子弹击中。现在不同了，当我们进攻时，我们肚子贴地向前爬行，并利用哪怕最小的土块作为掩体，从而得以随心所欲地向德军开火。有些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子弹来自哪里。上次行动中，我们处于一个几乎难以防守的位置，同时需要抵抗来自侧翼和正面的袭击，但我们没有一个人退却。”

此处并不适合讨论习惯的心理成因，习惯来自于调整适应的能力。如若

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调整自己，便不能形成习惯。

依据时间的长短，习惯可以组建临时或永久的自发神经反射系统，请参见下面一位遭遇夜间突袭的军官所提交的报告：

“专业训练的自动作用是多么珍贵啊！几秒钟前我还在做梦——这是晚上唯一的消遣，现在我已站在士兵们面前，在他们的目光中感到某种神奇的力量。我立即成为了冷静沉着的指挥官，坚信自己的命令正确，并自信能够以自身的坚定激励那些软弱的人们。”

人们常常注意到，来自习惯的勇气出现在面对已知的危险时，并不断在类似情境下如此重复。比如：总是遭受炮弹轰炸的士兵可能不会再去害怕它们，但是假如投射物发生变化，士兵们则可能会感到莫名的小小恐慌，并不得不习惯这种新的方式来克服它们的干扰。

我以上阐述的很多事实，足以把习惯对于产生持续性勇气所发挥的作用向大家展示清楚。我们在战争时期的行为同和平时期一样，其中四分之三都受习惯所控制。

但是，对于不可预知的危险，产生持续性勇气的习惯便毫无效果了，所以，应对不可预知的危险的勇气显然另有来源——其象征着强大的意志，紧绷的神经很难持续。军官们在这个时候便开始发挥引领作用。

4. 心理感染的影响

心理感染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个很强大的因素，由于仅此一项便产生了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可或缺的集体凝聚力，所以对于士兵的生存更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如大家所知，心理感染这种现象可以促使个人放弃自身意志而根据周围众人的意志行事。它虽然对智力影响很小，但对情感影响很大，在它的暗示和操纵下，群体中众人的感觉和反应基本都是一样的。

很多像乐观、悲观、恐惧、勇气等这些来自各种情感组合的心理状态——

都有可能变得有感染性，某些想法理念当然也可能偶尔产生传染性，但由于一个完全理性的想法永远不可能具有传染性，所以这些都与其感性或神秘主义的内容成比例。

当一个人加入某种具备专业特征的集体时，比如军队等，心理感染便对其产生作用了。随后集体精神便会叠加在他的人格之上，自此他的感觉、思想和意见形成都会基于群体的意见，而不再是他作为个人的通常所感所想了。

塔布罗（Tabureau）上尉写道：

“由于某种令人震惊的奇迹，当一个士兵穿上制服时，他的心理状态突然改变了，他的个人感情弱化了，却获得了集体生活的全新感觉。他再也不是杂货商、铁匠或农夫，而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他的个人观点消失了，某种神秘的力量促使他和其他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如果他听见周围人说“敌人情况很糟，我们可以一口气消灭他们”，他就会确信敌人是软弱、可笑、可鄙的。但如果周围人告诉他一个可怕的秘密——“我们被出卖了”，他也同样会确信所有长官们都将他出卖给了敌人。

“当我们的士兵们正在战场上时，如果有人喊“各自逃命去吧”，那么他们也会丧失全部理智，像个疯子一样落荒而逃。根本不花片刻时间思考，也根本不去注意危险真实存在与否。”

谣言、意见的传播在心理感染的作用下变得尤其危险，特别是当一支军队的士气已被失败削弱时。下面这封我已经提到过很多次的炮兵军官的信即是例证：

“战争开始数日之后，我便发现有一件事证明了您的观点。8 月 20 日在斯特拉斯堡，有传言称敌人的火炮射程很远，我们根本无法保护自己不受袭击。这一传言让几小时前还热情高涨的一队士兵迅速成为一群犹豫不决的乌合之众。仅仅是敌人的火炮，便震撼了军队士气。突然一颗炮弹击中了我的马，我被抛进了一个弹坑中。我也不明白为何会想到您，但在残存一半知觉之际，我震惊地意识到这些士兵受到了心理传染的影响，我们这些炮兵未受影响，

是因为我们不属于他们的群体。五天之后，还是这群人，受到了某些战友事迹的激励，也受到我军在北方取胜传言的鼓舞，做出非常出色的表现。之前那群犹豫不决的乌合之众再次变成了强大的武器。”

不但这样，这位军官还提示我留意：如果士兵们再次回到以前的所属部队中时，他们会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但如果他们被编入其他的部队，情况则截然相反——只要一有时机他们便会离开新的战友并且狠狠地握住机关枪，因为在那生疏的环境中，心理感染激发的自信荡然无存。

第四章战争中由于缺少远见和心理学错误导致的后果

1．政治心理学的普遍特点——缺少远见与洞察力

大多数物理现象都可以简化为公式，但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却不能，因为后者包含了诸多不同的因素，无法按照某一简单规律来预见。

即使对于手头在做的事情，预测仍然是毫不确定的，因为我们的头脑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抓住事件发展的最近结点，就别提更远的结果了。而事实上，多数政治家甚至不能在最小的程度内预测某些重大事件的发展。

对未来的事件进行预测的难度显而易见，但是我们往往不能理解的是为何总会有少数人能够准确地洞察。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政府虽然保证了信息来源——驻外使节、军事专员、间谍和其他机构，本应便利地获得情报，但有时候连邻国发生了什么都毫不知情。例如：如果拿破仑三世知道 1870 年德国真实的军事实力，显然不会向德国开战，以至于法国损失惨重；如果法国了解 1941 年之前德国的军备状况和战略意图，就可能会及时修补他们此前暴露出的所有缺陷，为战争做好准备。政治家们经常会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们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成见对他人做出判断，并用同一标准衡量所有人的心理，从而往往对国民心理暴露出更加不同的洞察力。

伟大的政治家向来都是伟大的心理学家，虽然他们能够成功洞悉本国国民的行为动机，但是其他国家的人民的行为动机对他们而言却像是一本合上的书。

拿破仑虽然非常熟悉法国人的心理，却完全不了解俄国人和西班牙人，

也正是这种不了解诱使他发动战争，从而导致他的帝国的最终灭亡。

俾斯麦最卓越的成就之一就是：他不仅深刻了解德国人，对其他国家的人也有很深入的研究。他知道事情该做到什么程度、到什么地方该适可而止、该如何动手动员民众。他仅仅通过在电报中改几个词，就迫使法国宣战——并且推测在两到三天后，法国人会发现真相，但是就俾斯麦对法国人心理的了解，觉得他们不可能有这份耐心。

然而如果统治者不了解国民心理，通常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英国首相由于不了解布尔人的心理，从而将本国拖入特兰斯瓦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损失惨重，而且毫无用处，因为英国意识到它不可能征服这一个小国的灵魂，最后只好授予其全部自由，并消除征服该国的一切念头。

第二帝国时期的所有战争史，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缺乏远见和洞察力的政治特征，因为那一时期的每一场战争——尤其是克里米亚战争和墨西哥战争——都显示出了法国统治者的无知。他们的利益仅仅在于发动一场战争，再无其他，但是他们的目标本应是阻止普鲁士与奥地利结盟，从而削弱普鲁士的实力。如果他们那样做，法国之后遭遇的战争灾难就会幸免。

1870 年战争之前的一系列事件也在最大程度上暴露了政治家们缺乏远见和理解力。如果浏览 1865 年到 1870 年法国的报纸、议会演说、外交文件等资料，并研究从撒多瓦到色当发生的诸多事件，就会发现这里充斥着错误判断、可笑的预测和各种错觉，到处体现着盲目和无知，却丝毫没有任何洞察力的迹象。即使这些事件之后能够被人理解，也只是他们的后果已经定型，再不可能有什么问题了。

由于现代政治错综复杂，必须承认即便近在眼前的事件也难以预测。因此，不必感到惊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天晚上，法国某位最知名的政治家还能够写出以下内容：

“奥匈帝国非常安静平和。其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费加罗报》,1914 年 6 月 5 日）

我们既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又对其结果没有丝毫预知，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这主要是由于多数政治家将自己封闭在源于神秘主义或情感的政治理念中，并不从事件中推导结论，而是由结论构成事件。他们的理念通常只是情感和欲望的反映，与现实无关。

如果我们能够回溯到很多历史错误的根源，我们总能发现他们或多或少是由于缺乏远见、洞察力与对现实情况的了解。

在政治家所有可能犯的错误中，心理错误可能是导致损失最惨重的。因此，政治家的任务非常艰巨，一国的命运常常被他的远见或过失所左右。加富尔凭借超人的远见与判断力，促成意大利的统一，俾斯麦成就了日耳曼帝国。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法国仅仅因为统治者缺乏远见而失去色当，并遭受了入侵。个人的意志并不能完全左右历史的发展，却至少能够影响历史的前进路线。我们的鲁莽与过失所造成的恶果，最终还将由我们自己承担。

政治家犯错误通常是由于忽视了其国民的情感、神秘主义与集体作用力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许多这类错误的例证，巴尔干政策的失败便是较为突出的，尤其是当外交家们认为局势明显缓和时，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却嘲讽般地挑起了冲突。

人并不像棋盘上固定不动的棋子，他们不是在冷静的判断下理智地挪动，因为在思辨的过程中，人们由于过于自信往往不能理解起初的动机。

预见未来对政治家来说是一个成功的法宝，但对个人而言，并不凸显他的益处，克莱蒙梭曾经说过：

“根据长期观察，我发现看得太远的人总是不幸的，因为短视的同伴往往将其视为公敌。没有什么比有限的视野更容易助人在政治上获得成功了。历史上每一个坏政府的行为都反映了这一点。”

这些大而化之的内容暂且放在一边不谈，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不同国家在战前和战时常犯下的一些心理学错误。

2. 法国的心理学错误和缺乏远见

在法国犯下的许多心理学错误中，对和平的幻觉是最严重之一。所以，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忽视了对战争的准备，甚至反对通过三年制兵役的法案。在此期间，德国持续上升的威胁态势使得危险慢慢地向我们靠近。尽管这样，还没能引起我们大多数统治者的足够重视，他们坚信战火绝不会在欧洲的这一文明时期燃起，甚至到了宣战的紧要关头，多数内阁大臣还对三年制兵役法案投反对票。当德国的战备巩固得越来越强大时，法国人还在幻想着世界和平。

此外，法国统治者还坚信，即使战争爆发，战火也会很快熄灭，因为那些先进的现代武器——机关枪、大炮、炸弹——能够迅速地决出胜败。他们认为，征兵制会将18—46岁的健全男子全部抽调出来，这对社会生活和国家经济造成大大的损害，贫困将会威胁各个交战国。

历史事实表明，以上的推断是丝毫不切合实际的。战争往往不能迅速终结，而是更可能持续很久——就像英国外交大臣克松（LordCurzon）对英国的志愿兵们说的：他们还要在祖国外边过很多个圣诞节，尽管预测与现实有诸多的不符，人们也早已经适应了新的环境。老人、妇女和儿童勇敢地挑起了男人的担子，积极劳动为国家制造生存资料，尽管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慢了下来，但却并没有停止。

另外，法国统治者还普遍认为，仅仅通过一两场大的战役就能决定交战双方的命运，因为那将牵涉大量作战人员。然而恰恰相反，这一场战争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很少有大规模的战役，只有非常频繁的小规模冲突。

战争中的种种暴行很少被学者们预见，但在我看来，这些并非难以预料。很久之前，我已经在《政治心理学》一书中就这场正在迫近且避免不了的战争写道：

“我们不要忘记，这和许多载入史册的战争一样，是终极的斗争。同样，它也会使得交战国中的一方永远地消失。在这场战争中，将会涌现许多可怕、

残酷的行径，整座整座的村落都将被彻底毁灭，不会剩下一幢房子、一棵树乃至一个人。”

我坚信当时战争一触即发，于是在那本书中写道：

“让我们铭记这一切，以此教育子女、训练士兵，让我们不再相信那些关于和平、博爱和其他废话——当穆罕默德二世摧毁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时，那些拜占庭人正是那么夸夸其谈的。”

法国前外交大臣阿诺托（M. Hanotanx）也指出了数量众多的统治阶级自战争爆发以来犯下的心理学错误：

“列强有重要理由介入巴尔干局势。列强早在土耳其控制巴尔干之际，就对其进行削弱和牵制。土耳其从南部对俄国实施了陆海双重封锁，并威胁了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和印度的领地。非常奇怪的是，法国在外交上未对此表示警惕，也毫不掌握有关土耳其最终立场的准确信息，因此在开战数日之前还贷给土耳其两千万英镑。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法国在之后显然必须有所行动时，却并未采取任何及时有效的措施。我们在此犯下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目前的局势。”

3. 德国的心理学错误和缺乏远见

法国人的心理学错误非常严重，他们遇到事情常常会心理准备不足，从而导致灾难的发生。德国人也会犯许多错误，虽然不像法国人那样厉害，但也导致了巨大的灾难的发生。

由几年前对一位德国人的采访可以看出，德国人能够征服法国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法国的宗教与政治纠纷。

（2）法国国内反军事化倾向。

（3）法国已形成普遍的劳动者联盟并常常宣布大罢工，因此当战争爆发时，也可能出现军队“罢工”。

（4）法国人身体和精神的衰颓。

（5）法国陆海军组织混乱。

（6）法国人天性中的和平主义倾向。

事实已经表明，上面的推断是很荒谬的，这点毋庸置疑。他们可以做出这些推测只是转述了其本国内部的普遍想法，却忘记了最根本的心理因素——民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使人们在关键时刻万众一心、共渡难关。

还有另一件事德国人不理解：在对中立的比利时进行侵犯时，为什么会惹恼了英国人，并且英国国内长期对立的党派也因此而和解？不管怎样，德国人都预见不了破坏条约的后果，因为德国教科书中关于国际法的说法就与法国的完全不同。此外，弱小的比利时竟然会奋起反抗武装侵略，也是德国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德国此时又忽略了心理因素的巨大作用。

以上的各种事例都显示了德国缺乏远见，正因为这样，德国计划好的迅速进军巴黎的好事最终泡汤。

我们早就说过，诱导战争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德国错误地认为俄、英、法都不会介入。所以德国建议奥地利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并且支持其对塞尔维亚进行侵占。这也是本章提出的范畴涉及的方面。

德国对于意大利的心理学错误也相当严重，因为对这个盟友的态度太过傲慢，最终成了新的敌人。

德国人最严重的心理学错误之一就是：每侵占一个国家便对其进行没有任何必要的野蛮暴行。这使得所有中立国包括美国都与其保持距离，这个后果显然不是德国想要的，所以随后在美国斥资百万买断报纸、印发宣传册、四处演说，为的只是改变美国公众对其的态度。白里欧（M. BRIENX）清楚地描述了美国国内感情发展过程：

“一个对我而言最有趣也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亲眼目睹了美国民众民意逐渐向法国倾斜。在此我将以哥伦比亚校长巴特勒（BUELER）为例：在战争初期，他非常支持德国，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随着事态的发展，真相渐

渐变得无比清晰，如今他已经开始坦率地表达对法国的同情了。三个月后我回去时，他对我的态度比之前热情得多。

“我演讲的结尾，经常有年轻人冲到我面前对我说：‘我们是德国人，但是我们希望与您握手。您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所以不要让我们再做任何解释。’——我很清楚，他们那是表示对德国在各地暴行的愤慨。我在艺术学校甚至会受到学习绘画、雕塑和建筑的年轻人们交给我的五百多人的签名，用来抗议德军的暴行。”

德国人的心理学错误持续贯穿了战争的始终：学者们为否定一切显而易见的事实，签订了那份臭名昭著的宣言；教授们向中立公民鼓吹，征服并进一步治理那些小国是德国的目标；电报、小册子、宣传品全都是夸张与谎言，试图愚弄全世界，德国首相更是编造出十分无耻的理由，为自己的“条约不过是一张废纸”的言论进行辩护。

在上面的这些活动中，德国人很少有所收获。他们最大的成果也只不过是驱使土耳其对他的协约国开战，但那太简单了，因为对待土耳其政府只需亮出金钱和权威——这两样东西对土耳其统治者同样都很有效。现在人们都普遍认为，如果协约国在 1941 年 12 月初被允许一切利益，土耳其将会保持中立，协约国的舰队也不会被阻止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只要用几百万，就足以保证土耳其不会再制造任何的麻烦。

德国不仅仅在有关心理的问题上很少获得成功，而且在很多问题上他们都会犯错，这证明了冯布罗关于德国人在政治上的言论。这种无能也来自于他们对其他国家国民心理的不了解，因为德国人总喜欢用相同的标准来衡量任何人。

下面的段落是摘自德国的一份报纸，1951 年 3 月 29 日的《泰晤士报》也进行了转载，其中也表明，德国人自己曾承认犯下了许多心理学错误：

“我们这么多的计算都错了！我们原以为整个印度都会在欧洲第一声枪响时群起推翻英国人的统治，但是看看，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却和英国人一起与我们斗争。我们以为英国的殖民地统治会分崩离析，但这些殖民地却与英

国空前地保持一致。我们期望南非针对英国的起义获得成功，却只看到了惨败。我们期望爱尔兰发生骚乱，但爱尔兰却把一些最好的部队派来对抗我们。我们原以为主和派将在英国占据绝对上风，但是英国全民都狂热地支持对德开战，包括那些主和派。我们认为英国已经堕落了，不可能认真地涉入战争，但英国却成为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法国和俄国也同样如此。我们认为法国已经堕落，早已失去全民团结，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法国也是强大的对手。我们认为俄国将不会有所举动，因为俄国人对政府深深失望，不可能愿意为政府出战。因此，我们指望着俄国迅速崩溃。但是俄国的动作非常迅速，并成功地动员数百万臣民，形成了庞大的军事力量。那些诱使我们犯下以上所有错误和误解的人已经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每个国家的学者都对德国人的心理学错误印象深刻。一个意大利学者帕累托在 1915 年 3 月 1 日接受《科学评论》采访时指出：

“由于奥地利的残暴和德奥想将意大利置于其附属地位，意大利与同盟国的关系已经疏远。

“在另一方面，德法之间不可能形成同盟或持久和平，因为德国不仅占据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并对其居民进行了残酷迫害，通过不断动作想要抢夺法国的殖民地。德国人过于激进，未有足够耐心去采取渗透与瓦解手段。如果再等待一段时间，英法两国国内的反战派或许会占据上风。

“……英国和古代罗马一样，能够获得所占领国家人民的友谊，或将其完全囊括于势力范围之内。这便是罗马能够成功抵抗汉尼拔入侵意大利的原因，也是英国在当前保持凝聚力的原因。但是德国却不具备这种统治艺术，看看今天德国统治下的阿尔萨斯—洛林、波兰……”

4. 俄国的心理学错误和缺乏远见

俄国人与德国或法国所表现出来的缺乏远见是完全不同的。那并非缺乏

远见的，是源自俄国统治者神秘主义倾向的一系列心理学错误。在俄国加利西亚等地区这些错误非常不受欢迎：当这些地方被俄国征服时，由于宗教原因这些新臣民受到迫害，忘记了宗教信仰其实是一国最神圣的财富，武力手段永远都无法剥夺。对于俄国在加利西亚疯狂打压宗教信仰自由，我们没有具体资料证实，只能从一些国外报纸中取得，当时那大部分是客观的，因为他们都偏向于俄国。以下这段摘自 1915 年 2 月 16 日的《日内瓦日报》：

“根据 1914 年 9 月 30 日发布的法令，所有关于加利西亚的乌克兰语书籍，甚至包括祷告手册都将被警察收缴并销毁。假如有不遵守者，将被判处 3 个月监禁或罚款 3000 卢布。并且禁止使用一切乌克兰语的通信，包括私人信件在内。邮局、铁路等在奥地利管辖的两万名加利西亚员工统统失业，一下子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尽管俄国人不懂当地方言，这些空缺也全部由他们来填补。”

乌克兰议会代表主席在 1915 年 4 月 28 日的《日内瓦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加利西亚被俄国入侵这件事一举破坏了我们多年的努力，乌克兰语不仅禁止在官方使用，同时在学校和教堂内也不能使用。所有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报纸都受到镇压，图书馆被毁坏，俄国也运走了国家博物馆的收藏。解散了所有乌克兰社团，还有数百名重要人士被流放至西伯利亚。

在两百年前所有的东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加入“乌克兰的国教东仪天主教（在战前几乎没有人信仰东正教），如今却受尽各种镇压。被流放至俄国内陆的库尔斯克的教区总主教，还有许多教士被驱逐出境，在惊恐和饥饿中的教徒们被迫皈依东正教。开始将天主教堂改造成东正教堂的俄国人声称‘它们在两三百年前就是东正教的，现在理应回归东正教。’”

俄国的一家报纸报道，一位委员已经被教廷枢机议会认命，来监督俄国人在东加利西亚的宗教生活。沙皇的一份宣言也称：

“加利西亚的天主教和波兰人在经历一个世纪的统治后，终于回到了俄国神圣母亲的怀抱。”

因此，在俄国撤出受着残酷镇压的加利西亚人的国家时，加利西亚人是如此的欣喜若狂。

《一个法国人在德国的日记》在1915年的《巴黎评论》上发表，其中讲道：

“引起波兰人怀疑的唯一原因是俄国的迫害，这导致他们进一步地向德国和奥地利靠近。”

另一位该时刊的通讯员也在同年3月23日的文章中明确地提到俄国严酷手段对波兰人情感的影响：

“就我所看到的波兰人非常消沉……他们中有人跟我说：‘看看人民的所有自由是如何被俄国在东加利西亚的总督剥夺的。每一个人都开始怀念奥地利的统治，包括那些原本非常想要成为俄国人的罗塞尼亚人。无可厚非，这让人丧气。此外，德裔俄国人在新政府中占了一半成员，沙俄内阁还掌控在一群前普鲁士密党手里。他们在1905年曾违背过沙皇的诺言，如今还会再次这么做的。’

“……甚至在华沙也有许多人感到心灰意冷，因为禁令刚刚发到学校，迫害还将继续。任何有关沙俄王储的事报纸甚至都不被允许谈论。”

这些愚蠢的规定几乎将人类带回遥远的野蛮年代，也证实了波兰人的怀疑。波兰最高委员会的主席贾沃斯基（M. Jaworski）在1915年5月15日的《科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称：

“有人会相信以下我所说的一切吗？我必须先重复，所有，所有的家庭，在俄国占领的波兰全境内，都在为亲人们痛苦，他们的亲人只是太热爱祖国和自由了，才会因此或是被绞死，或是在俄国监狱里被活埋，或是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里度过余生。”

所有的爱国波兰人都深刻地了解到情况严峻，并因此确定了一条行动路线。由于他们知道波兰与俄国在文明和国家利益上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他们拒绝了俄国皇储的一切诱惑性的许诺。如果俄国胜利了，那么波兰必将走向毁灭。

俄国在加利西亚短暂的统治中犯下的那些严重又愚蠢的心理学错误是我一直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与我常常在书中提及的理论相吻合，神秘主义的心理学因素完全超越了感情和理性因素。在神秘主义的驱使下，个人会失去一切理智，全然不顾自身利益，也不会受到任何论证的影响。

第五章源于心理学错误的战略错误

1. 战略中的心理因素

所有伟大的将领都相信，战争既有战略成分，也有心理学因素。拿破仑曾说过："在战争中，士气便是一切。士气与意见的威力抵得上物质力量的三倍。"引起战略错误的可能是军需不足、意外事件等各种因素导致，但多数都仅仅源于心理因素。例如，我们从最高权威当局处了解到，协约国之所以在战争中表现不佳，完全是由于指挥官的懦弱和缺乏远见导致。正如之前提到的，在战争时期，诸如坚持、耐心、主动等心理因素至关重要。

如果起初在一场战争中便犯下心理错误，那么之后可能导致许多战略的错误。例如，德军在 1870 年的有生力量尽在法国政府的掌控之中，因为这些信息在许多文件中都已得到披露。尽管这样，法国依然做出了错误对比并导致了许多错误判断。纵然有杰出的梯也尔，法国仍然以为德国的军事力量绝对不会超过法国国民军，尽管后者当时主要由严重缺乏纪律性和军事训练的平民组成。

2. 法国由于心理错误而导致的战略错误

与之前所有战争无相似之处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不仅比先前有了出乎意料的新发展外，而且还揭示了一些普遍规律的运作方式。写《现代战争论》的伯恩·哈迪在书中清楚地展示了一些绝对重要的规律：

"战争同重大的社会事件一样，一些特定的规律和现象在其中总会出现，

而且原因和结果之间常常存在一些不可更改的关联。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永远都是那些特定的情况和原因，同时大多数特殊现象都在不断改变。”（vol.i.p.19）

我只能提及其中一些代价最为惨重的但却无法列举所有的错误，原本避免它们只需一些远见即可。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在1914年法国将领还不了解德国的军事手段。

但是我所称为“阶级虚荣心”的感情却不得不让法军将领们相信——第一场惨败便让他们知道——法军的作战方法更好，德军的作战手段无人能敌。在那时，法军既不懂得大炮的攻击威力，也没有意识到战壕的防御能力，但当法军意识到，这些都能轻松阻挡德军的入侵时，却为时已晚。在和平年代，这些事情必须作为前车之鉴。

我们必须承认，法军对于军事教育的重要性显得非常冷淡，我们得以见证，当45年前战争爆发时所有错误的重现，像缺少侦查、没能利用自然地势找好隐蔽地点、过远发起进攻又缺少火力支持等。还好我们这次够灵活，及时地改正了那些错误，但却损失了不少人员，以至于导致数场失利。如果我们的军官看过德军的大练兵，就应该会懂得所有的要点。如此重要的事情之所以会被这些人忽视，是因为他们头脑中已固有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不容许任何与之相左的观念。因此，专家们一向都只能接受自己的想法。如果你将这一规律代入周围某些朋友身上，很快就会发现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所有源于心理因素的战略错误中，我们可能说到对兰斯教堂的轰炸。法方之所以下令守军撤退，是因为只听信一些军官说兰斯周围的要塞已经保不住了。事实上，这些要塞只要稍作努力便可变得坚不可摧，因为德国人在攻占其后在此驻留一年多，并从此处向教堂大肆开炮。对于这次不可思议的撤退，下令的军官必将长期对此耿耿于怀，因为即便军方人士也不能给出解释。1914年10月初，谢菲尔斯（Cherfils）将军就兰斯要塞的重要性说道：

“由于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放弃了埃纳防线，也抛弃了毫无损伤的兰斯四处的要塞。那些野蛮德国人军事行动的坚实阵地都是这些要塞变成的，

他们从那些地方向兰斯进行轰炸，并致力于破坏其一切宗教、历史、艺术瑰宝……”

在战争初期，法军将领们还抱有非常奇怪的幻想。1914年8月25日，即法国巴黎被德国闪电入侵之时，法军官方公报称：

“我们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保留了利用铁路系统的自由，所有海域都为我们补给开放。我们的举动帮助俄国进入战斗状态，并直插东普鲁士的心脏地带。”

实际上，俄国离东普鲁士还差得远，更别说直插心脏了，事实却正好与这相反，俄国的心脏地带此时却被东普鲁士攻占。

法军的公报是站不住脚的，从心理学角度看。例如，12月5日的公报报道的“兰斯遭到极其疯狂的轰炸”。德国当然希望所有人都知道这一事实，但我们却不该告诉公众几千德军竟然摧毁了一百万法军，任由法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遭到他们的大肆破坏。

在法国战略错误中源于心理因素的，最严重的错误即：在战争开始时，法军将领从不质疑德军会取道阿尔萨斯。因此，法军所有兵力都向东集结，而事实上敌人却从北方发动了战争。法德两国的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论证德国将从比利时进入法国境内。直至8月中旬，《泰晤士报》的军事评论员还以地图说明，法国北部和西部已经集结了德军三十个军团，而在东部边境却只有三四个军团，但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这些错误概念的力量太强大，以至于法军将领无法撼动，其最终苦果便是沙勒罗伊的惨败。

3. 海战中的心理错误

在海战中对协约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是心理因素，因为协约国海军的糟糕表现完全来自胆怯这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再没有哪个例子能更好地来说明精神影响可以使物质力量毫不发挥任何作用。当然，协约国的勇士并不少，但却大大缺少做事果断与有魄力的人。战争伊始，当“哥本号”和“布雷斯劳”

号在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之前对菲利普维尔进行轰炸，如果协约国的地中海舰队能派出军舰紧随其后，我们早就能在君士但丁堡了，也不会损失那么多的军舰和人员去攻占达达尼尔海峡了。当时指挥舰队的将领本可以轻松穿过海峡的，但却没敢这样做。

对于这个事实，即便海军内部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协约国缺乏远见，还在海战中犯了许多战术错误。海军上将高伊（Degouy）在《巴黎评论》上说：

“首先，这是一场灾难，它将影响我们未来的所有行动。协约国舰队的战斗力未能全部释放出来，是因为一开始未能发起迅猛攻击。

“……在战争开端，我们失去了一个给予奥地利沉重打击时机的很好的机会，原本我们可以使其长期无法恢复战斗力的。

“有以下几点使我们海军没有准备好开展有力行动，其一，由于缺乏准确消息；其二，在我方和敌方交战时不清楚将采取哪些行动；其三，由于缺乏军事洞察力或政治智慧；其四，由于没有进攻性心态。我们不愿将谨慎称作懦弱，对我们来说更加自然与容易拥有的心态毫无争议地取代了敏锐、震惊、自信大胆这些成功的要素。”

这位作者还道出尽管英国海军比对手强大得多，但却在战争一开始就表现得胆小懦弱：“在这一事例中，强者对于弱者系统地采用了消极防守战术。”事实上，当战争爆发时，德国舰队仍处于非常危险的位置：

“在7月25日和26日，德军舰队正在远离基地的卑尔根附近，那时舰队必须回到基地更新设备、添加燃料、增加补给，才能为一场决定性的重大交锋做好全面准备。另外，对德国更加不利的是，英国舰队正是空前强大的时候。”

以上作者评论称，英国这样如此小心谨慎的原因是他无法理解的。

“英国的举动完全与那句名言相悖——‘敌人的海岸便是英国的前线’。当时，英国有足够的时间做好一切准备：组织潜艇防卫、核对潜艇与海岸的信号、装备辅助船只并集结作战单位、加强海岸防卫力量……但是这个机会却让英国白白浪费了。相同的情况还发生在波罗的海地区，英国还是毫无动作，

显得非常迟钝。”

内阁的犹豫不决或许就是导致英国海军懦弱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犹豫不决所造成的危险却再次证实了一点，对于一国统治者非常重要的是决断和远见。

英国政治家们通过目前的战争看到，其前任是多么缺乏远见。德军最重要的海军驻地之一赫里戈兰（Heligoland）岛，因为其靠近海岸，并保卫着汉堡的港口。因此，如果英国占领了这座岛，战争的整体格局便有可能改变。多年前，英国还没有拥有这个岛，但是索尔兹伯里爵士于1890年将其让给俾斯麦，以换取德国对英国在桑给巴尔管辖权的认可。他相信自己是所谓的抛砖引玉，但事实上却是得不偿失。这使得我在政治心理学中提出的一条结论得以证实：“灾难的制造者便是那缺乏远见的政治家。”

类似的心理错误俄国方面也犯过，我在上文中引述过的海军上将还说过：

“俄军有鱼雷艇、驱逐舰、布雷艇、扫雷艇和潜艇等等，数量上和法国英国一样。实际上，他们还有很多轻型舰艇在波罗的海，但那些没有价值的资源也从不利用，除了简单的防守。俄军发动攻击也许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没有做好更好的准备，也许还处于成见认为德军海军还和以前一样胆怯、保守、不足为敌，但德国海军的力量早已突飞猛进了，并还在德国造船业的推动下持续扩张……”

这说明我反复指出的那条规律得以证实：在战争中，心理因素是物质因素的灵魂，因为后者如果缺少强大意志的推动便是毫无价值的。

从上文所言中，请读者不要认为协约国舰队在战争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事实上，它们曾经胆怯地在港口的钢丝网后面寻求避难，但是它们真的上了战场，而且因为它们存在的本身便给予我们海权，阻止了德国舰队向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入侵，同时切断了德国舰队与他国舰队的交流联系。英国舰队虽然行动上稍显迟缓，但还是为了国家赢得海上主导权。

4. 德国的战略错误

德国人的对手在心理错误上非常严重，但是德国人的心理错误仍旧不少。就像我们已在上文中看到的，他们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判断。

伯恩·哈迪意识到了战壕的作用，在《现代战争论》一书中说道：

“我们当然不能藏身于土墙与壕沟之后，德国人的天赋不允许我们那样做。一个全力捍卫自身的人不会轻易牺牲行动自由，藏身于沟壕。”（Vol. ii.p.250）

尽管如此，德国人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进入壕沟。

德国最具名望的将领也在对未来的局势中做出了许多误判，一位瑞士作家写道：

“第一次做出预言的并不是冯德戈茨元帅。当1912年巴尔干联盟成立时，他还十分健谈。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土耳其军队，因为那正是他一手组建的，因此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英国甚至法国的众多记者都围堵在他的家门口。他口无遮拦地向记者们宣称：可怜的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黑山将会遭遇惨痛打击，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的土耳其军。每一个人都相信他，他的这番预言也主导了奥地利与德国的全部政策……随后在占领阿德里安堡、萨洛尼卡和约阿尼纳、科索沃与莫娜斯提尔战役等遭遇一系列惨败，证明这位伟大将领的预言是完全错误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为此倍感耻辱。”

开枪要比操纵心理容易得多。由于德国人不懂得操纵心理，为自己招致更多敌人，他们原本很容易避免这些的。无论如何，他们只重视恐吓这一点心理战术。这便导致了我们前面所见的结果。

德国人从未真正意义上了解过敌人的心理，这是他们战略预测经常失误的原因。费伊勒（Feyler）上校就此指出：

“在战争中，政府有15个月都在承诺那些从未实现过的远期目标。在6周内攻占巴黎是德军的原本计划，但却没有考虑到意外事件的影响：他们计划在秋天进军加莱，但却无法避开比利时军队的抵抗；空军本来计划轰炸伦敦，

却没有对伦敦造成太大影响，反而是破坏了空军的名誉；封锁英国本应是海军潜水艇的责任，却毫无建树；他们还打算在华沙、维尔纳、里加等地拦截俄军，却被俄军大肆进攻。”

卷六

德国在作战时用到的心理战术

对于统治者的意志，在其他地区，特别是罗马，它就是唯一的法则。踏平一座城市；杀光群众；活着的俘虏变成奴隶，就可以被卖掉；有可能的是，为了使臣民开心，还可以把俘虏在角斗场中被野兽生吞活剥。

第一章德军作战的心理基础

1. 战争的终极目标

毋庸置疑，德国人在战争方面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原因是，在战争中，德军懂得运用心理战术，但却常常故意用错了方法。一位德国作家在他的书中写道，所谓战争的目的，就是不择手段地摧毁敌方的意志，而且让对手被迫接受自己的意志。

“所谓胜利，就是使一个国家灭亡，使他的灵魂屈服。”

对于德军而言，道德效应包括物质和心理，终极目的就是征服对方的灵魂。而且，在德国人看来，战争不仅是控制对方意志的方法，也是显示国家道德优越性的重要方法。

黑格尔最先提出这个观点，后来不断有作家补充，进而现代战争学观点形成了。德国作家史伯格（HerrSeeberg）在一本论文——《战争的道德正当性》中做过评论，后来，在意大利《科学评论》的1915年5月刊中总结为：

“战争扭曲了历史价值，使之与力量的关系发生改变。一个国家的活动空间，也就是他能行使权力的范围，这是依据国家实力确定的国家地位分配的。战争促使人类早些揭开真理。在历史上，战争道德重要性就是如此，我们也需要发动战争的正当借口。想必大家都知道，战争不是纯粹的展现暴力，因为我们正面对的战争就是如此。

“战争不单单能炫耀武力，也可以是一个国家道德和文化力量的显示。战争是伟大的，足以对历史做出评价。也许一些国家会兴盛，也许一些国家

会灭亡，但战争对此的判断是公平的。”

我们将要探究影响德国人当前战争心理原则的原因，但在这之前，回想一下为了限制战争法则，文明国家试图做出的一些举动。

2. 在战争中遵守的原则

在历史上，讨论过战争法则的局限性的人并不多，大概只有瑞典人了。波利比乌斯说：“凡是战争，都会破坏现有的法则，但同样，法则也存在于战争当中。”

对于统治者的意志，在其他地区，特别是罗马，它就是唯一的法则。踏平一座城市；杀光群众；活着的俘虏变成奴隶，就可以被卖掉；有可能的是，为了使臣民开心，还可以把俘虏在角斗场中被野兽生吞活剥。以上这些都只凭统治者的心情。即使是当时的作家，也不敢反对，就算抗议，也只是毛毛雨。

这些观点一直都存在于古代世界。直到现在，人们不会把人都杀掉，也会救治受伤的人，其他观念和手段都有所转变。

在几年前的海牙国际法庭上，修订战争法则的案件出现了。而且，著名的几个法学家尝试着成立战争法，细细一想，他们的想法只是空中楼阁，实现不了。他们忘记了一点，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武力保证法律的实施，那么，这部法律就是没有意义的。《海牙公约》就是一个例子，而德国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德国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谎称遵守《海牙公约》，却要利用其限制敌人的行动。

德国人的做法符合大部分法学家的理论，一直以来，他们都认为制约征服者的意志是不对的。在他们眼里，征服者的意志永远是第一位的，除非你有能力反抗。

格劳修斯以后的作家对此都认同这一观点——任何国家都不会遵守战争法，除非自愿。吕德认为，为了迅速了结一段战争，有时候不得不要采用一定的恐怖手段——例如，可以毫不留情地对平民施以惩罚。在德国人看来，

阻止统治者屠城并抢夺金钱，这件事是不应该的。

在古代，观点与之相同。在敌国之间，没有所谓的法则，是否杀死伤员和屠杀犯人，只是由征服者的个人利益决定。所谓战争，不过是动物王国里强者和弱者的争斗而已，是无所谓的。赢者成为猎人，败者沦为猎物。因此，对于古时骑士精神的尽情践踏，德国理论学家一点也不在乎。对于我们说过的杀戮和毁灭，在德国人看来，只是遵守原则的一种应用，但是，德国军事作家的灵感和德军总参谋部的指令的来源就是如此，具体请参看下文。

3. 德国总参谋部下令的心理战术的原则

之前，对于德军一些引起众怒的做法，是德国人一直坚持的原则造成的，并不是个别士兵或消极的知识分子的放纵，展现了其暴力的本性引起的。由德国理论学家制定，再经由德国军事作家的宣传，进而日耳曼军官受到影响。在 1915 年 1 月 15 日的《巴黎评论》上，发表了其中的一些著作——由安德勒教授翻译的。

德军总指挥部声明：

“由于人文主义的作用，19 世纪的道德理念经常会从感性方面出发，因此，有效战争手段的研究并不符合战争的本质和目的。在不久的将来，战争手段的运用让我们产生无限的猜想……仔细地探究战争史，对于被放大了的人道主义理念，我们应给予批判。”

以下是哈特曼将军的言论：

“实用的军事理论是自己的，必将高于国际法律的科学要求……当战争手段需要一切资源的配合时，毫无疑问，集体的战斗力就会因为限制锐减……当战争遭到限制时，军事行动就不会顺利地进行下去……这是国际法律需要认清的事实。

“战争必定会对现有文明和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原则做出破坏，这就是战争的本质，原因是，所谓的原则会被战争所代替，武力和个人权力也会

符合法律。文明仅仅是实现权利和达到义务的最佳状态，凭借这一点保证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不会改变，让国家机构能够正常地进行。曾经，布伦奇里提到的‘文明战争’的说法，现在真是荒谬，因为文明和战争始终是一对冤家。

“唯有折磨和伤害能够在本质上彻底压制和毁灭敌人的精神。就取得的效果来看，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因此，要保证敌人的完全屈服只有依靠这种方法才得以实现。”

冯·布鲁姆在一本书中曾写道：

“所谓战争的意义，就是对敌人的摧毁……占领对方的领地是战争的首要，因为这样不仅可以使自己粮食充裕，而且还会使敌人的市场完全崩溃。”

哈特曼将军说：

“要为敌国的人民带去苦难，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有战争，无法避免。国家战争的意义就是：将战争进行到底……从军事角度来看，战争在打响的那一刻起，暴力就会作为作战的必要手段。”

而最先提出对战争征税的权力的，是克劳斯威茨。他说过：

“增加税收是为了战争，这是国家应该做的，但如果这个国家贫弱、趋于灭亡就会限制战争的进行。”

在这个问题上，德军将领有着更加清晰的陈述——

哈特曼将军认为：

“税收是对一个地区的全面掠夺，而不单单是储蓄军粮那么简单……

“为了战胜敌国，军队应具有军事行动的绝对自由，这一点是重要的。这说明国际战争法中任何想要对军事行动自由限制的条款都不再起作用了……”

德国人一点也不在乎类似于破坏人类遗产和历史文物的事，也不在乎那些抱怨，他们只是将其尽可能地运用到战争中。在1914年12月15日《世界双月刊》中摘录的一篇文章——一位德国将军撰写的片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士兵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合法的。对于所谓的法国建筑，它的

毁灭我们并不在乎……法国人认为我们不是文明人，而是野蛮人，我们也不在意。对于一些兰斯大教堂或者其他什么教堂和广场被破坏了的相关言论我们不想再听，外界也无须再说，因为只要我们的军队在战争中取得胜利，那么其他的都无所谓了。”

关于中立国家对他们的不满，德国人非常不能理解，原因是，在他们看来，遵循实用主义战争理论是自己的义务，他们在尽全力地遵守，而且，他们对于纵火和抢劫分不清，也不认为这样做是不应该的——在很久以前，腓特烈大帝曾说过：“抢劫和盗窃是不同的，这是两回事。”

4. 德军作战时的心理战术

在战场上，德国人会应用各种各样的心理战术，例如：恐怖袭击、夜袭和突袭等；但是，这些战术有着一致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一定要趁敌人不防备时攻击对方，从而，使敌军损失士气。对于这几种心理战术，我将在下面具体讲解：

恐怖袭击——对于德军，这只是最基本的心理战术，但也是导致德军大屠杀和纵火罪行发生的原因。研究这种心理战术的后果这件事，在另一章我再讲解，此处不进行详细解答。

德军在战争初期就努力吓唬敌军。致力于枪杀或折磨大量无辜平民，为了达到恐吓的效果，在最后，他们再屠杀一回，直到几乎没有幸存者。经过轰炸，城市的建筑消失，只留下一片废墟残骸。在对比利时的战争中，对于这个心理战术的开展，我们再清楚不过。所有人都被聚集到一个空地上，先将一些人枪杀，然后抢夺财物，并烧掉全部房屋。对于这些公开做法，德军做得很细致，德国军官们也为此感到骄傲。安德勒说：

“在8月22日那一天，在对当地政府的宣示中，冯•布鲁姆将军提到了德军对昂代恩的掠夺，他说：‘对于总司令的最后的命令——焚烧了全部的房子，并开枪扫射了百余人，我十分赞成。’”

德国指挥官的不文明行为，只是德国战争传统模式下的延续，在德军之间，这种行为非常正常。在20世纪，德皇腓特烈一世时期，剁去一只手是战俘的命运，米兰被烧杀抢夺了之后，他命令屠杀居民。在西西里，在他儿子的命令下，囚犯不是被剥皮，就是被弄瞎了双眼。蒂利屠于1622年在海德堡屠城，并焚毁了建筑物。而且，他还在1631年抢劫马格德堡，一千五百座房屋和六家教堂被毁，大量的民众被活活烧死。以下是萨瓦利特针对德国人野蛮行为的言论：

“德国人犯下的罪行如此恶劣，一定会遭到对手的报复。对于卢浮瓦对普法尔茨下达的命令，人们曾经坚决反对过，连莱茵河左岸都有回应，这就是对方对于德军残暴罪行的反击。实际上，卢浮瓦为此说过：‘如果德国人一直不会体面地作战，那我们就要更残暴，更灭绝人性，比德国人还没人性。’”

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德军总指挥部总在找理由，直至中立国不再追究。甚至，他们声称比利时的人坏透了，连神父和小姑娘都会挖出伤员的眼珠，即使这种说法不会有人相信，他们自己也不指望。

德国作战的基本原则之一——一定要在敌国领土上开展战争。如果要让这个原则变成现实，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必不可少。例如：修有一定战略性的铁路，或是对全部的调动与部署细节进行彻底的研究，等等。过分地急于进攻，这一点导致德国忘记了比利时处于中立国地位，即使这可能会导致德国与英国开战。实际上，在敌国领土上开展战争对自己有很大好处，原因是，对占领地区的烧杀抢夺便于开展，进而有更多物资用来补给军队。德国的一家报纸认为：

“整个军事行动围绕着一个原则，那就是军队补给，在这方面，德国耗资越少越好，掠夺对方的再多也不为过，如果能够把余下的物资运回德国再好不过了。

“三个月的军队物资，只有五分之一是德国本土供给的，其余的都是掠夺来的，就算这个城市提供物资的能力大不如前，但至少也得提供占我们西边军队的五分之三。大概算一下，德国的军费大大减少，仅一天就可以省下

300 万～ 400 万马克的钱。

“不仅如此，在与发达国家的战争中，我们能够得到的更多。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有着充足的资源，例如堡垒、谷物、羊毛制品、金属和木材等，我们可以将其运回德国。德国依靠睿智的商业头脑，在战争中获得非常多的好处，一天就可以达到 600 万～ 700 万马克，自战争开始，西线战场已积累了高达 20 亿马克的财富。”

总之，在敌国领土上开展战争对自己更有利，这一点不用说明想必大家就会明白。即使是这样，在过去的四十五年中，法国政治家的生活很安逸，并没有吸取教训，以至于没有防备。如果他们好好想过，法国北部边境就会戒备森严一些。以以往的经验看，一些本来能够展现更大本事的战壕，本可以长时间抵抗对方的进攻，因为在所有的外国军事教材中，战壕的重要性都被强调过，而在日俄战争时，战壕的作用也充分体现出来。

大范围进攻——为了达到征服对方国土并顺利吓唬敌人的目的，必须最先进入敌国，也是一定要动用武力。德国在入侵俄国和法国的时候，这些都成功做到了。在上文中，我提到对于侵略行动，要发起一次进攻，必须花费一定时间的准备，必须要有一支有能力的军队，还要有充足的储备物资做支援。到目前，我们没有确切的信息，但是，想要两百万德军集结在德法边境，这件事肯定准备了很久。

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尽管德国早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将大部队集结在进攻点这件事毋庸置疑。德军在第一次佛兰德战役中对战数以万计的战壕，但还能排着紧密的队形，并继续前行。这第一次世界大战术的使用，使 15 万士兵在几天内损失殆尽。但是，为了占领法国北部城市加莱，无论怎样都是值得的，只要取得胜利。

各种恐吓威胁的手段——德国总指挥部运用了所有办法，只要能达到使敌军士气削弱的目的，例如夜袭、窒息性气体、空投炸弹等。实践证实，用气球投掷炸弹的方法只会削弱敌方的士气。在英国舰队疏于防范的时候，利

用巡洋舰载着炸弹，并向英国沿海小镇投掷——这就是心理效果最显著的行动之一。其实，这种行动具有很大的危险，在路上遭遇英国战舰的概率很大，或是敌军发射鱼雷，将军舰击沉。但是德军依然采取了这一非常重要的行动。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可知：英国原计划向法国增援六十万军队的计划在这次袭击后破灭。

英国人其实被吓坏了，对于这种恐怖经历，他们从未领略过这种滋味，即使在拿破仑时期。他们担心本国的安危，因此将一部分准备派去欧洲大陆作战的军队留下来。所以说，少了六十万的敌军是几艘巡洋舰的损失风险换来的。

就是说，“卢西塔尼亚号”沉船事件与轰炸英国海岸一样，都是一场心理战，是同一性质的行为。但是，在击沉“卢西塔尼亚号”时，在死亡的乘客当中，绝大部分是美国人，这是德国始料未及的。因此，美国人对此十分愤怒，促使美国参战的原因大概就是如此，从而，德国失去了屈指可数的朋友——美国。

突袭——相比较于其他战术，德国人更喜欢用突袭，所以他们经常夜间袭击。

“强大的力量并不会让人感到害怕，让人恐惧的往往是那些未知的力量。现实存在的危险不会让人畏惧，怀疑才是人类畏惧的来源。黑天容易让人害怕，是因为在黑夜中，预料之外的事发生的可能性很高。”

这是一位军旅作家的看法。

相比之下，协约国却把突袭在军事战争中的重要性抛之脑后，特别是攻达达尼尔海峡的时候。假如，在土耳其宣战的第二天就马上开战的话，获胜就绝非难事，原因是，任何一个国家在遭受多国袭击时，都没有能力同时抵挡，包括土耳其。就哪个国家拥有君士坦丁堡这件事，协约国就耗费大量的时间，以至于他们没有同时袭击土耳其。做这么无用的事，只能导致土耳其得到了足够的时间准备战争。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一家英国报纸客观地报道：英国和法国对此并未上心。

另一种突袭方式——在两国正处于和平时期时，迅速进攻敌国，这种方法也可以削弱敌军的士气。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时，保加利亚对其盟国希腊和塞尔维亚的入侵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却失败了，因为保加利亚不仅对自己的实力估计失误，而且希腊和塞尔维亚军队的将军也积极应战，并发起反攻，这使保加利亚的进一步突袭受创，反而致使保加利亚的军队丧失了士气。相信自己没错，但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实力过大就会造成以上的那种结果。敌人的每一步都在预料之中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因为实际情况与设想有很大的距离。

就现代战争中心理战术这个论题，我就先谈到这里。在这一节，就使用心理战术所能达到的效果，我已向大家展示过了。再强调一下，在战争时，任何物质的运用都是为了心理战术做准备，以达到影响敌军心态的目的。

第二章德军在战争中的原则

1. 德国战俘日记中对德军烧杀抢掠等行径的证据

在这一章中，我要列举能够证明德军烧杀抢掠罪行的例子。

我们不容易描述事情的真实性，原因是，德国人对于这些持否定的态度。但是，来源不同的证据特别多，可以互相证明对方的真实性，因此，这些证据都是有存在价值的，不能完全否定。而且，在德军一名战犯的日记中清楚地记录着许多德军的罪行。

所以，证据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证据的来源。例如，在宫殿的浮雕上清楚地记录着亚述君主的罪行的场景——他令囚徒们挖出自己的双眼。同样的，德军战犯的日记也有着相同的作用，大概在当时，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判定他们罪行的依据。在未来，德军所犯下的罪行一定会被揭开，人们就会知道，德国对比利时牧师的指控这件事就是捏造的。

我们将详细了解德军的残暴行为，先来看看德军的日记本，我从中挑选了最具有说明性的事件。在1915年1月1日《巴黎评论》上，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

“1914年9月3日，在索姆（马恩河）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整个村庄被摧毁，法国民众连同所在的房屋被活活烧死，无一幸免。”

在一个叫撒克逊的日记中记录着：

“8月24日，我军焚烧了一个叫‘阿登’的小村庄，那个小村庄曾经非常美丽。我认为，不该这样做，村民是无辜的，他们什么都没做，但有一个

士兵说，骑自行车摔倒的那个村民是在骗我们，他想借机扣动来复枪的扳机，所以，我们对整个村子的民众进行扫射，之后又放火烧村子。”

还有一件：

“我们杀掉屋里的人，烧了房子。屋中住着两个男人和他们的妻子，还有一个 18 岁的小女孩儿，小女孩和女人都是被刺死的。他们什么都没做，他们是无罪的，我可怜他们！”

在另一本日记本中写道：

“8 月 25 日（比利时），枪杀了 300 个平民，我们命令那些还活着的人为死人挖坑，那些可怜的女人们！”

因为一些士兵没有残暴地对待他们的战俘，所以，在 8 月 25 日，第五十八旅的司令——斯坦格将军下达命令：

“从今天开始，必须杀死所有的战俘，从今往后，不管他们怎样，是受伤也好，或是武装人员也好，或是民众也罢，一概枪杀。就算战俘有一个大型军团那么多，他们也不能活着。绝不让任何人逃离我们的枪口。”

日记中的其他片段也曾刊登过。

“在 8 月 23 日那一天，有三个自称是狙击队的士兵被我军逮捕，他们站成三排，只需一枪就可以打穿他们三个。征服了默兹之后，我们摧毁了这座城市。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到处都是尸体，惨不忍睹，房屋也都不复存在了。一些人藏在角落里和修道院里，企图逃脱死亡，结果被我们发现之后无一幸免。”

保罗·哈扎德是一名翻译官，许多德军战俘的日记就是他翻译的，以下是我从中摘录的：

“在 8 月 18 日，大概有五十个村民死在我们枪口下。”

在另一本日记上：

“在 8 月 25 日的晚上，我们残忍地杀了几个平民。我们烧了全部的村庄，什么都没有了，那时的比利时惨不忍睹。首先遭殃的就是教区神父；而牧师们也都死了……”

这种罪行是由德国士兵口中说出，证据确凿，无法推翻，尽管德国始终不承认。

2. 德军残忍行径的其他证据

与上述的事情相比，虽然官方文件中记录的军事行动的来源不同，但也是可信的，所以我也会摘录其中的一段。以下是有关迪南大屠杀的官方报告：

“我们先抢夺了村民的财物，之后，又焚烧了村民的房屋。很快，这个镇子就变成红色的了。换句话说，迪南完全消失了，一千四百多户的小镇只剩下两百户了。

“……在迪南大屠杀中，被杀的人不计其数，但是大概有700个被杀的人的名字有记录，名单在委员会手中。其中，被杀的不只有成年人，还有73个女人和39个小孩子，他们最小的只有6个月，最大的也不过15岁。

“迪南大约住了7600人。每个家庭都至少死一个人，最惨的是，有的家庭竟然都死了，无一幸免。”

在1914年11月30日的《泰晤士报》上，德军在迪南的一些骇人听闻的暴行也有记录：

“一些人的全家都被枪杀了。而且，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上百名民众置于两挺机关枪的枪口之下，在露天之下把他们都杀了。”

不仅如此，德军在对待战俘上更是残忍，这是1914年12月31日《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

“9月6日，我们抓住了一个叫巴克兰德的骑兵。把他绑了起来，并剖开了他的肚子，用德军士兵的刺刀。在桑布尔维耶，我看见德军把一个法国军官绑在了一棵树干上，把他的四肢分别绑在四匹马上。一声令下，在马儿奔跑的同时，这个人被分成了四份！回忆当时的场景时，现场目击者仍然战栗不止：‘我目睹了他被分成好几个部分。’”

德军在比利时创造的众多罪行中，残忍的罪行不计其数，其中属对鲁汶

的洗劫和对其居民的大屠杀最为灭绝人性。对此有许多的报道，但一个名叫“福格利斯特”的瑞士民众的讲述最为吸引我，因为他那时就住在鲁汶。在官方文档中，记录着的德军一些残忍的行为，我们无法理解，大概只有变态的虐待狂才能理解。以下是从1915年5月5日的《日内瓦日报》中摘录出来的：

“德军筹划了大屠杀和大火，到了时间，一下命令，大屠杀就开始了。当时的情景非常可怕，让人无法想象，德军喝了好多酒，醉得像一坨烂泥一样，他们的行为令人发指。福格利斯特先生从几个军官的交谈中听到：‘……把一切都消灭，杀光民众。’我们没有明确的数据表明到底有多少人被杀，但在当时，在鲁汶居住了四万三千人，而现在活下来的就只有不到两万一千人。

“福格利斯特先生保留着一些能够证明德军罪行的依据。在鲁汶大屠杀中，从来没有过的恐惧萦绕在人们心里。”

关于官方文档中收集到的一些德军行为，只有虐待狂心理才能予以解释：

“在某地，德军枪毙了182人，还活埋了一个年轻人，他们把他的头埋在土里，把他的腿放在坟墓外。除此之外，他们还把一个比利时战俘的双手放在锅里煮了。

“德军想要寻找一个有利于进行大量屠杀的地方，就带着一群狼狈的妇女、农民和哭泣的儿童。一段时间后，他们还会停下，让他们以为已经到了要杀他们的时候了，以至于他们悲伤地告别拥抱。但如果德军不满意，他们就还得跟随着德军走。在走的时候，他们还遭到了普鲁士人的鞭打，被来复枪枪头指着走。到了最后，在一名军官的命令下，他们排队站好，旁边的士兵放低来复枪枪口，并瞄准目标，之后便轻蔑地说了一句：‘再最后看一下你们美丽的祖国吧。’”

德国人并不承认他们的罪行，为了替自己开脱，他们说是那些平民先开的枪，但是这种借口真是荒谬。瑞赞诺夫先生在他的一本书里清楚地记录了这件事，在1915年8月1日的《两个世界月刊》中，摘录了这本书的一部分。在书中，瑞赞诺夫先生并没有过多地说明民众对此的愤怒，反而，他讲述了

有识人士的看法，包含各个阶层，尤其是一些德国军官对他们行为的悔恨。

不仅是这样，德军士兵还会强奸女性，并且还是面对着受害者亲人，这时，如果亲人们反抗，哪怕只是一点行为，那他们就立刻被杀死。对于他们的做法，德国人是无法抵赖的。德国人人性的残暴虐待在这时充分地体现出来。

德国人具有无比残忍的天性，这一点在所有德国参与的战争中都有体现。惠灵顿将军所统领的德国军队曾经在英国担任要职，攻打过拿破仑，以下是1807年他对于德国人性的讲述：

“德国军队里的人都一样，从将军到鼓手。他们全部都是一帮人性丧失的人，完全的虐待狂，都是变态。他们到处抢夺、杀害并虐待平民。这一点我向你保证。”

所以，德军令人发指的行为源自德国人祖传的天性。说到德军入侵比利时这件事，这与十几个世纪以前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入侵如出一辙。在十几个世纪以前，德国人养育了过多的孩子，进而发觉自己的国土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出现了人口过剩的情况。所以，德国选择占领邻国的土地，以解决这个问题。曾经，罗马人几次大量杀害这些入侵者，但与这相比，还远远不够。在历史上，数万名德国人被普罗布斯大帝下令处死，但这对德国人肆意地毁坏高卢战争的宏伟纪念碑没有影响。而且，在一百年之后，德国人捣毁了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德国人还不仅仅满足于此，发誓要让德国的铁蹄遍全世界，就像以前侵略罗马帝国那样。

如果不是德皇威廉二世下令，鲁汶、兰斯和阿拉斯的宗教纪念碑到现在应该还是完好无损的。德国皇帝对天主教的怨念很深，这一点正好说明，在早年，他的亲戚改信了天主教，在给他的信中，德皇威廉二世对此就大肆不满。“我恨天主教，即便是你所信奉的，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会摧毁天主教。”

德皇威廉二世在他的一次演讲里说道：

“尽管别人告诉我对天主教要怀着无比敬仰的心，但是，在我看来，那些天主教教堂就是用来亵渎上帝的。他们是没有礼貌的，竟然忽视上帝，去

信奉所谓的圣人，在拉丁迷信中，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取代神祇的白痴。在兰斯大教堂，法国国王就是神，但是，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是通奸者。在兰斯大教堂的展厅里，这些皇帝雕像的位置居然高于上帝，真是荒唐至极。

“在德国的教育体系下，我们被教育要符合自己的民族身份，所以，当我们说到教堂时，就一定要憎恨那迷信的天主教。”

这刊登在1914年10月3日的《法兰西》杂志上。

所以，德国人对古代教堂的憎恨由此可以理解了。

3. 奥匈帝国部队的残暴行径

奥匈帝国在第一次入侵塞尔维亚时，奥匈帝国军队的行为就很残暴，与它的同盟国德国军队对待比利时的民众没有什么两样。对此，瑞士洛桑大学的瑞斯教授曾调查过，亲自赶赴塞尔维亚，在1915年4月7日刊载的《巴黎评论》上，发表了他的调查结果。其中描述了奥匈帝国士兵众多的恶劣行径，以下是选段：

“我看见了奥匈帝国士兵对平民的种种暴力行为：受害者死得很惨，有的人被枪毙，有的人被刺刀刺死，也有的人喉管被割开，有的人被先奸后杀，有的人被石头砸死，有的人被吊死，有的人被来复枪或棍棒殴打至死，有的人内脏被取出，有的人被大火烧死，有的人四肢被砍下，有的人被挖去双眼，有的人的皮肤被切成条状、与骨头分开……最终，一个只有三个月大的小女孩被奥匈帝国士兵拿去喂猪。”

这让人回想起了一件事——在巴尔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期间，他们曾遭到指控。但是，巴尔干半岛国家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他们是低下的种族，在那几个世纪中，他们都参与了战争，唯有土耳其人能够让他们友好对待彼此。但是，德军并不在这个观点范围内，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就算是最高尚的文明，人类的兽性也是无法彻底压制的。

4. 恐吓心理战术的负面影响

德军并不承认自己的残暴行径是错误的，还在为自己尽力辩解，在他们看来，只有给敌国平民制造恐吓心理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才能让他们丧失反抗的能力，跪下乞求原谅。

恐吓心理始终都是君主和革命家常用到的方法，以此来吓唬敌人，以儆效尤。而且，制造恐吓心理还符合许多人天性残暴的一面。因此，在历史上，对于相似的方法，我们习以为常了。不仅如此，就像在之前我提过的一样，亚述的浮雕确实说明：国王亲手将战俘的眼珠挖出，再对其士兵们下令，命令他们虐待的程度更高一些，例如将战俘的皮剥下，用来点缀城墙。

在上文中，我曾经讲过，早期的罗马人很像现在的德国人，在对于战俘的待遇方面，他们看法相同。他们同样认为，对入侵者来说，只要是有益的战争就都是应该的，战败国没有丝毫的权利，利益是专属于征服者，应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本国平民。

对于“残忍”“暴力”这两个词，罗马人始终都是所信奉的，但也不是不变的，原因是，在罗马的共和国后期，礼仪和风俗就改善了很多。在《埃涅伊德》里，并没有关于罗马人残忍行径的纪录，西塞罗对马赛勒斯锡拉库扎纪念碑的完好保存很是满意，但他却瞧不起弗里斯掠劫者的行为。

在历史上，德国人的残忍行为不止一次地出现，这种杀害、虐待和抢夺早就形成体系了。俾斯麦也是这样认为的。早在1870年，他就曾说过：

“战争的真正意义旨在打击敌人，而且对敌人不要手下留情。最大限度地给予目标城市以创伤，尽可能地削弱他们的意志，只有这样，政府在承担不起压力的情况下，战争就会快点结束。必须要告诫敌国人民——除了眼泪，其他的都将不复存在。

“让战争变得恐怖暴力就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且，还要逼迫可怜的平民乞求和平。”

我们已经见识了德国人是怎样信奉这个指导思想的，并始终保持着热情

的态度，包括用各种方式虐待平民、焚烧房屋，活活烧死妇女和儿童。但是，这些行径似乎没起到太大的作用。

如今，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研究它的合法性毫无意义，但至少，我们或许可以探讨一下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后果。不但没达到德国人预期的效果，而且还使德国遭到了其他国家的强烈指控与不满。

实际上，恐怖战术只在特定的状况下才有用，只在持续时间短的战争中奏效。当战争持续时间过长时，恐怖战术反而会起反作用。会使敌人的反抗意志增强。原因是，当被侵略的人们发觉一味地求饶并不起作用时，就会尽全力抗争到底，哪怕是最后一秒。不单单是这样，他们不但会反抗得越发强烈，而且会视之为耻辱，永远不会忘记。在战争之前，开战之前，比利时的大多数商业，特别是安特卫普地区，都由德国掌握着。而且，德国早已在比利时人民的心中有很高的地位了，这可以追溯到和平时期。假如德国注意到这些，就可能不会对比利时这个国家那么残忍。

5. 德国军队的抵赖

德国人完全抵赖对自己的控告，顽固地申辩，并想要以报复为借口为自己开脱，否定自己对比利时人和法国人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过。

对于德国总理在国民议会上进行的演说的内容，想必大家都知道，在其中，他控诉比利时小女孩儿挖出德国伤兵的眼珠——不仅是德国总理这样说，德国的媒体刊载了一些事，称比利时牧师也挖出过德军战俘的眼睛，并将他们的手指砍下。虽然这些听起来简直荒谬至极，但是，在德国总理和德国媒体报道下，这种情况也并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有一种事情发生了，让人大吃一惊，而就是因为这件事，这一切就看似是德国捏造出来的，德国人的控诉完全是无根据的。

德国的新教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关系一直都不好，新教教徒习惯地给天主教徒身上冠以不好的事，而为求自我澄清，天主教徒各地为此成立了调查领

导办公室，而这个办公室就是为了对天主教徒的胡乱指控做出澄清。

经过德国天主教的调查领导办公室的调查，这些所谓的对比利时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指控就会被推翻，毫不费力。

在这之后，德国人就会申辩，说是鲁汶的平民最先对敌军发起攻击，否则，德国就不会对这个手无寸铁的城市做出焚烧的行为。在他们看来，战争与这些平民无关。德国这样说是因为这并未对德国的利益有影响，当有影响时，就不是这样了。以下就是德国报纸上节选出来的一段，是关于俄国进入东普鲁士的问题：

“当敌人想要冲破德意志帝国的边境，我国人民将会进行强烈的反抗，为此，我国民众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打击这些入侵者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只要具有战争的能力就应该这样做，把他们打回自己的国家去。每个人都要拿起武器，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抢夺他们的军火，切断他们的物资供给，逮捕他们的侦察兵，并且要对他们的救护车和战地医院予以毁灭，在天黑前将其完全歼灭。”

6. 对于恐怖方法使用的反省

早在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德国和奥匈帝国已经使用过这种掠夺枪杀的行径了。这种行为灭绝人性，让我们想起了人类初期的兽类行为。

在读者眼里，如果他们天真地认为，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会变得越来越睿智，越来越有理性，就实在太天真了。社会会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一些国家野蛮兽性，但仅仅是压制而已，不会使之完全消失。一旦兽性大发，人的本性就会显现出来，从而做出惨绝人寰的事来。

这些国家中的人，都是野蛮的，无论其是否受过良好教育，原因就是，人的天性与智力并没有完全紧密的联系，不仅如此，教育在这里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当德国人的天性得不到压制时，就会展现其暴力残忍的一面。

越是文明进步的种族就越容易发生凶残的事件。这在历史上就发生过好

几次。在文艺复兴时期、莫卧儿帝国时期都曾有过。在那个时期，有很多的诗人、艺术家、学者，他们将繁星分类，测量黄赤交角的仪器也是他们发明，而同样的，将战俘的头颅堆得像金字塔这件事也是出自他们之手。

在未来的战争里，几乎全部的国家都会做出德国式的行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原因是，只有非常弱小的国家才会遵守所谓的《海牙国际公约》，像那些大国，根本就不把这些放在眼里。

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人道主义越来越形同虚设了。就德国军官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于凶残行为的看法，以及 1796 年波拿巴对军队下达的指令就可以很容易地知道了。

这么说，社会学、人道主义学、海牙公约，和那些想要提高国际关系友善度的说法都是无用的，丝毫不起作用。早就被人们舍弃了。

而且，这本书还能够防止战后德国从太平洋展开新一轮侵略。虽然这本书不足以完全切断我们与德国人的商业往来，但至少会一直提醒我们，德国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必须与它保持距离。如果这些凶残的行径是合法的，那这些言论必定会被写进书里，这样做还远远不够，还应让其后代拥有这些思想，将其列入初级教育之中，因为德国的邻国的民众会永远记得德国人曾做过什么，而这说明了什么。倘若我们早点对德国人残忍的天性有所了解的话，法国必将加强本国北部边境的防御，即使政府不这么做，法国民众也会促使加强防御工作。若是这样的话，法国的繁华地区就会依然繁华，而不会被夷为平地，遭到灭顶之灾。

第三章中立国家对于德国战争手段的看法

1. 德国的战争手段对中立国家的心理影响

对于德国热衷于屠杀和摧毁的战争手段，全球人民都予以反抗，这是因为这并不代表他们自己的意愿，仅仅是按规矩办事，因此，这种做法为中立国家带去了不小的问题，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当外界的抗议声越来越大时，以至于到了不能不理的事态时，德国政府才开始理会，但是德国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世界范围内，德国树立了太多实力强大的敌人。

英国对于德国入侵比利时这个中立国颇为不满，因此，德国一直在犹豫是否还要继续侵略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德国一定要残忍地对待战败国家的人民，要让他们产生心理上的恐惧，从而，让他们归顺德国，接受德国的文化与统治。

当德国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晚了。世界各国对德国的不满积怨已久，无论他们如何百般解释，罪恶的行为都不会被掩盖，尽管德国刊登文章、讲座和分发官方的宣传手册，想要扭转他国对其的看法。但是，他们的做法并没有多大的影响，由此可见《科伦日报》的一篇文章便知：

“我们明白自己的行为已大白于天下了，世界人民并没有站到我们德国人这一边来。我想说的是，德国人并不擅长心理战术。德国人想要借此让中立国理解他的处境，但这种做法实在是拙劣，而且他们不会这样想。”

我将于下一章简述德国遭到了世界各国的控诉。并警示一下他国，一旦他们也有相似的想法时，就会得到像德国得到的待遇，世界各国会纷纷向其

进行严厉的讨伐。

我们大概已经度过了高喊骑士精神的时期了，但一旦我们违背某些律条，最黑暗的时期就会降临，我们会亲身经历人类在没有理性的兽性时期，也许，在那时，能够救我们脱离的就只有公众的舆论了。

2. 美国人对此的答复

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领导人之一，在 1914 年 11 月 8 日刊登的《纽约时报》上说道：

“比利时的人民没有错，但却遭到了德国人的野蛮侵略，比利时的民众再也没有自由了。

“在知道海牙公约里明令禁止的行为之后，德国人还毅然决然地对比利时没有防御的城市进行轰炸。

“在《海牙国际公约》中的第 43 条和第 50 条明确地写着：不许进行民众的集体处罚。但是，德国人对此视而不见，在他们看来，这些条款是不对的，没必要这样规定，要不然，维斯、鲁汶、亚斯科特和迪南就会依然存在。德国人之所以对比利时人那么残暴，就是为了在比利时人心里制造恐怖，让他们害怕、求饶，而不是需要补偿。但这行为正是《海牙国际公约》所不允许的。”

艾略特教授在 1914 年 10 月 20 日刊登的《纽约时报》上说：

“德国的作战手段对民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美国人对于德国人的种种行为很是反对，他们认为，德国人所犯下的罪行不足以被原谅——竟然会对一个毫无防御的城市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还对珍贵的纪念碑和艺术珍品造成了破坏，而且，他们在北海埋水雷，借要杀死所有人来索要金钱，还抓了无辜的平民作为人质，用他们作为和平的交换，并在人们想要四下逃跑时杀掉他们。”

著名的卡内基研究所的校长丘奇先生曾收到过一封信，是一个叫作沙佩尔博士的柏林人写给他的声明，而丘奇先生在给他的答复信中写道：

“对于德国人一直希望与美国友好相处这件事，我对此感到悲哀。

“沙佩尔博士，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假如这种事发生在德国，别国的士兵趾高气扬地走在柏林大街上，柏林的人民目睹大家的房屋被烧毁，国人被杀死，面对这种情景，难道您和您的92位同事还会安之若素吗?

“……就算在未来1000年，你们对法国和比利时就像朋友一样，就算在这1000年里的每一分钟里，你们都在忏悔，都弥补不了德国在两个国家所犯下的鲜血淋淋的罪行，也无法承受得起两国人民流下的眼泪。

“……即使你们军用配备完善、国防实力强，但是天外有天，总有你们无法战胜的对手。你们做出了多少丧尽人性的事，尽管你们曾是一个有人性的国家，但是这已不复存在了，你们曾经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荣誉都已荡然无存了。”

德维尔先生——一位亲眼见到比利时遭到灾难的美国人，他凭借自己对此的回忆写了一本书，以下是节选的一小节：

“相比我曾经看见的可怕事实，我认为，在亚斯科特发生的事是我见过的最可怕、最恶心的。我实事求是地说，在亚斯科特，只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房屋勉强存留，但是，被无礼的德军掠夺过的痕迹还依稀存在着。证据到处都是……”

3. 瑞士以及其他中立国家是怎样看待的

瑞士毗邻德国，所以，从战争的初期开始，瑞士就始终支持德国，但是，当德国在比利时做出烧杀抢掠的事之后，它就立即转变了立场。

瑞士的一位联邦法官发表了一篇文章，以下是其中的节选：

“在1867年，即使德国郑重地说不会对卢森堡发动进攻，在这之前的1831年，德国也说不会入侵比利时，但是，它还是做了，即便是没有理由的。

“即使大海也无法洗刷他们的罪行。

“如果一个国家对国家之前契约毫不在意，那么，人们将无安全可言，

那在国与国的交涉时，还有谁可信呢？如果人们都漠视法律，谁实力强谁就有主导权，那条约不就形同虚设了？难道罪行就可以将胜利掩盖吗？尽管德国人现在披着胜利的外套，一旦他们觉醒过来，回忆起让他们骄傲的德国式忠诚，他们必定会觉得羞愧难当。”

在以前的章节中我曾经提到过，在这个时代，德国人想要对他们的整个民族进行洗脑，让人失去分辨是非的能力。以下是在 1914 年 11 月 6 日的《日内瓦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写道：

“一旦一个人认为自己做的事是完全正确，而不去反思时，那他就是顽固不化了，在他那里任何办法都不起作用。现在，德国给自己的思想构筑了一个完全密封的保护套，再强大的意念也穿透不了。德国的传教士之所以赞美和信仰上帝，全是因为德国是上帝的宠儿，德国的皇帝、大臣、军队和整个日耳曼种族变得不受污染、富有正义和心地善良都是上帝赐予的，所以，德国人充满了可怕的自信和虚伪的满足感。这样，德国人想全部摧毁与他们思想不同的人，而且还感觉自我良好。

“……而且，换一个角度看，在德国，所谓的最清醒头脑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只是对探究德国内部的书籍很熟练，对他们认为的事实丝毫没有怀疑。不仅是这样，当他们对德皇和大臣“赞美”时，竟然还把我们作为他的证据。他们与一群努力学习的小学生没有区别，并且对自己老师的话唯命是从，处于这样的情境之下，我们该怎样向他们讲述事情的真相呢？

“德国式的精神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精神相比，差别很大，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与德国进行交好。

“时间是治疗德国全民族疯癫病的最有效的良药。依据经验，这种病发作非常快，接下来就会转为极端的压抑。”

瑞士人曾经写过许多的文章，在这其中，在 1915 年 4 月 15 日，亨利·波吉博士在《两个世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此刻，我借用这篇文章上的一些言论，他写到瑞士人在战争的开始与德国人有着同样的心理感受，在

得知德国人在比利时的所作所为时，瑞士人转变了对德的看法。如果在战争之前，假如德国人读心理学进行了学习，那他们也许就会那么做，这种行为只会人精神上带给暂时的快感而已，在这之后，他们的快感就会消失，继而，痛苦会环绕在他们周围很久：

“在战争刚开始时，就算在德国国民议会上，德国总理进行了一场义愤填膺的演讲，就算比利时在被德国入侵时，在瑞士，有的人依然会持反对票。因为在那个时期，只有小部分瑞士人是反对德国的，就连瑞士当地的报纸都拥护着德国，原因是，他们的血统有亲缘关系，而且还是近亲，他们在经济上的合作也比较密切，双方世代交好，以上都是瑞士支持德国的原因。

“……但是，当德国在比利时和法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之后，德国占领并且摧毁了梅赫伦、卢万及兰斯大教堂，之后不久，德语瑞士地区的公共舆论和媒体在对德国的态度上就发生了转变，瑞士还举行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反抗行为。在那时，维特教授是最著名的泛德主义者了，他都写信指责德国犯下的罪行。”

在西班牙，对德国的态度不一。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西班牙天主教派声明：他们绝对支持德国的做法，关于这些，我之前都曾经说过。然而，西班牙的著名学者卡哈尔却不这样认为，他对德国的行为感到非常不满，以下是他文章的节选：

“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的先民如此肆无忌惮地烧杀掠夺，他们在对无辜平民实施暴行时，就没有考虑到人性的问题吗？更可笑的是，当今的入侵者还试图抵赖他们的罪行，替自己脱罪，不断地卖弄着他们的文学，竟然还宣告世界他们的种族是最高尚的，不容蔑视，所以，他们肆意妄为。”

在这位作者看来，崇尚战争的民族会一直存在，不会消失：

“被战胜国家的人会永远记住入侵他们国家的人，而且还会照搬侵略者用过的手段，并且，会寻找机会以牙还牙。这些孤儿在长大后，又会发生屠城那样的事。”

卷七

未知变量对战争的影响

战争就是那么的毫无人性，那么的惨不忍睹。这场战争导致整个亚美尼亚的西部地区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是一场就没有定数的灾难，这场战争的影响广泛而持久。

第一章现代战争的结果

1. 现代战争产生的当前效应和将来结果

战争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极有可能影响将来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1870年战争之后，法国的经济和社会一直受德国的影响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我之所以简要地说明这场战争带来的教训、代价、损失和后果，是因为在当前无法完全总结这场战争对欧洲的多方面影响。

在这么多的影响下，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我们都感到非常困惑，无法做出明确的区分。这是因为在历史的记载里，还从来没有任何战争能像这场战争这样涉及这么多的因素。

2. 多样因素导致多样结果

行军打仗是要对军队进行补给的，这在古代是很容易的事情。例如在古罗马的军队里，几乎每个士兵都会带上自己的武器和其他必需品，如面粉之类的，他们会在找不到食物的情况下自己煮饭吃。他们会就地取材建造投石机、塔楼等一切的攻城武器，以试图攻下一个城池。

而现代战争中，对于在前线作战的军队来说必不可少的是后方的庞大武器库，物质基础、装备、工厂、仓库、车间、邮电局、医院和驻扎营地等，这些相当于一个移动城市的许多设施。

对一支由45000名士兵、12000匹战马和2000辆战车组成的军队来说需要30英里的轨道和100列火车来运送。这说明现代战争的复杂程度和军队所

需对铁路和公路的运输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于运送物资和撤离伤员是极其重要的。

德国之所以能够打败在人数上占据优势的俄国军队，恰恰是因为德奥军队在调动军队和转移军队方面做得非常好，俄国的机动作战能力实在太差，所以交通部门是至关重要的。一支拥有50名军官，300个士兵，200匹战马和30辆战车的军队，必须时时刻刻听从来自总部的命令。

军队的指挥官都在上百英里的前线上，总司令通过电报传达命令。这需要每个兵团都独自作战的队伍，需要随身携带一周的口粮，后方还必须建立一个随时可以提供粮食和弹药的复杂系统。

法国在20天的军队部署和调动中用了上千次火车，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了火车的地位在现代战争中是非常重要的。

“6000列火车将70个师，运送到60～375英里之外”。这是在马恩河战役之后，法国军队试图包抄德军右翼的行动，用了相同的战术，将这场为期六周的战役以伊瑟战役结束。

运输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加上前方的军队需要大量食物和军需物质，这些都要后方的工厂来完成的，根本没有顾忌其他的余地，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出口大幅减少，国民收入也大幅下降。我们需要将几百万人的粮食和弹药考虑进去，这样国内外人民的生活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由于进口需要花钱买国外相当的产品，就会导致很大的开销，大量进口是这两个国家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只有进口没有出口，无法赚到钱，就无法让支出平衡。正常情况下德国的出口量是480磅，也是进口量，但是打仗的时候差不多是没有出口的，很多东西需要从外国进口。这就导致极大的贸易差异，德国不得不将黄金输出国外，并且四处举债，贵重金属的输出也不是长久之计，总有消耗完的一天。

我暂时就谈到这些关于战争对货物贸易的影响，再谈下去就和我的主线——战争的心理影响——偏移了。

3. 国民在战争中所受的影响

毕竟小战争只会影响到一小部分人，除了规模比较大的战争。那时候的通信手段少之又少，人们在不同的省份居住，几乎不常来往。而且打仗的时候只有少部分军队会参加，所有老百姓的生活几乎不受影响，除非是住在军队经过的地方。

以前的军队很少有超过10万人的，但是现在的战争动不动就是几百万人，几乎全国的交通系统都会瘫痪，法国境内虽然只有小部分地区受到影响，但是几乎都是废墟。据统计，他们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掠夺财产8000万英镑，这是德国人自己的估算，而美国亨利法院的估算师估算有2.16亿英镑。

如今的比利时穷困潦倒，因为德国从一开始就烧杀抢掠，残忍无情到不放过一草一木，直到将这个国家洗劫一空。

其实，不仅仅是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遭遇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注意，其他许多重要国家，如波兰、加利西亚和亚美尼亚也有如此的“待遇”。

下面是有关波兰在1915年6月5日《日内瓦日报》上的一段话：

“据说他们已经轰炸了5000个村庄和200个城镇，使这些地区不是火海就是废墟。奥德军队已经占领了三分之二的波兰领土，以及统治了1300万波兰人。战争已经波及了四分之三的地区。

“据医护人员说，波兰因为战争已经饿死的和病死的人比战场上的人还多。国内饥寒交迫，传染病到处都是。铁路没有了，贸易业没有了，波兰人引以为豪的煤矿、制糖、纺织业和加利西亚的采油业也没了。”

一名《晚间邮报》的战地记者从黑港口霍怕发来报道说：

“亚美尼亚整个西部地区都遭受了毁灭性的屠杀，漫天的哀号声，已经使人们感到无比的绝望，城市变成了荒地，拜占庭帝国之辉煌的特拉比松港口也被炸毁了，人们四处逃避。一场未知的巨大灾难就在眼前。”

战争就是那么的毫无人性，那么的惨不忍睹。这场战争导致整个亚美尼亚的西部地区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是一场就没有定数的灾难，这场战争的

影响广泛而持久。

4. 伤亡数据

人员伤亡数目在现代战争中的记载远远地超过了历史的任何一次大型战役。而且很难统计出准确的数据。以下是法军公布的人员伤亡数据：

2 月 15 日 5 月 1 日

死亡（人）：186541327000

受伤（人）：415863592000

失踪或被俘（人）：243321317000

有这些数据，我们就不难估算法国军队每年的伤亡人数，至少在 100 万左右。而且以上这些数据并不包括 1915 年 7 月阿拉斯战役的伤亡人数 113000 人，也不包括 1915 年 9 月香槟之战的伤亡人数 100000 人。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出什么呢？

更为严重的是德国人的损失，他们被迫双线作战，几乎都是大规模战争，伤亡人数估计超过了 200 万。

我们在这些数据的背后不难得出结论，600 万人是这场战争第一年总伤亡的数据。就在这可怕的战争中，欧洲无数年轻人的生命就这样没了。我们的这个数据还没有把囚禁在德国的 100 万士兵算上，这里面还有 60 万是俄国人。

莱比锡战役是法兰西第一帝国战役，这场战争也才死了 6 万士兵，耶拿和瓦格拉姆战役仅仅损失了 3 万人，这远远比不上 20 年的拿破仑战争带来的死亡数据。

以前打上两场战役就可以决出胜负，现在为了争夺一个小小的土山坡或者几条沟却死了 3 万人，离战争的结果距离却差得离谱。曾经那些称得上激烈的大战役，如今也比不上哨兵的轻轻一扫，虽然在官方的报道中只占微小的地位。现代战争就伤亡人数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可是取得的结果却比不上

历史上那些死亡人数很少的战役。

5. 钱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花费在历史上没有记载过的。

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20年的总花费是8.4亿英镑，克里米亚战争花了不到8000万英镑，布尔战争花了2亿英镑，可是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告诉下议院，英国每月的军费高达4000万英镑。

战争前的45年里，英国军费高达千万英镑，这只是所谓抵御攻击的保险费。数额很庞大，效果却很不好。这是因为战争开始后，德国的战前准备比英国和法国要充分很多。在德国的进攻下，法国的好几个作战部队失去战斗力，几百家工厂和几百座纪念碑被炸毁，这一切的一切说明了军费在战争中的开支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在战争中具有抵抗力和进攻力。

“1870年的普法战争军费总额比战争期间的一个月的支出还要少三分之二。”

这是时任德国财政部长赫弗里希在1915年8月20日的国民会议上说过的话。国民会议刚通过的8亿英镑借款马上就要用完了，德国只有再次到处借钱了。

现代战争的最大开销是火炮和弹药，一艘战舰全速前进每小时需要燃烧19吨煤，它的12架机关枪在2小时内发射的150发子弹需要花费20英镑。一门12英寸口径的卡农大炮发射一枚炮弹就价值200英镑，就连最寒碜的CZ75手枪一枚子弹还要24先令。

一个专家做了如下估算，这是刊登在1915年7月19日《蓝色晨报》上的数据：

据6月17日的《法国公报》，我们在阿拉斯背部的炮兵在24小时内发射了30万颗榴炮弹，这和德国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的是基本差不多的。

根据我们的估计，30万颗榴炮弹是4500吨，意思是我们需要用300辆大

卡车和6列火车来运输，如果是公路的话，也许需要4000多辆马车，总花费差不多要375000英镑。

现代战争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除了40万英镑的弹药费，几天的伤亡统计人数是113000人，在这些数字的背后，相信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清晰的解释了。

1914年10月，著名的化学家威廉·拉姆齐爵士提醒人们，德国每天制造弹药需要1000吨棉花。如果英国的大罢工可以坚持得再久一点的话，协约国就会因为缺少供给煤炭而休战了，所以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阻止德国进口棉花的途径，也许这场战争早在4月份就结束了。欧洲战争是难以预料的，也是多种多样的。

直到6月30日，战争爆发不到一年的时间，法国政府不得不为3253367个家庭提供救济金，因为这是战争的另一个严重的影响，导致大量的家庭顶梁柱找不到工作。这些家庭一共领取了1200万英镑的救济金，这和和平时期的法兰西年度预算的三分之一差不多。

1915年6月法国已经消耗了9.6亿英镑，三分之二用在了打仗上面，剩下的用来购买粮食和偿还公债。但是这些不过是战争中微小的部分数据而已，法国的几个很富有的区域被掠夺的财产更是价值不菲，这些数据是可以在战争的财政预算里看出来的。

1915年6月，德国占领了法国490万英亩的土地，影响了320万法国老百姓，土地价值在4亿英镑左右，还有那些价值不菲的建筑和工厂。

参战国不得不四处举债来支付各项开支。贷款可以一直使用到国民财富和贵重金属储备耗尽为止，欠债自然有偿还的时候，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这些参战国估计也就打不下去了吧。

由于经济因素的原因，这场战争是不能一直打下去的，自然也不会加入到“三十年抗战”和“百年大战”里面。这是因为现代战争几乎是在金钱的基础上进行的，每个国家的财富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样的话，只要

参战国的财富不能再支付战争的开支的时候，那么战争就被迫停止，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再次开战了。

6. 现代战争的时间消耗

土壕战已经无法使双方取得绝对的优势，只能比内力，哪一支队伍的预防战术能够坚持得更久那么就能赢得整场战争。以后的战争都有可能会取决于经济因素而不是军事因素。

当然，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之间的二十年战争不能够作为我这个观点的佐证，那时候的经济因素在战争中的影响力还没有那么大，那时候的战争消耗比较少，而我们现在的战争一年的花费和死亡人数就可以超过拿破仑时期的全部。

战事不断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1854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持续了两年，1899 年的布尔战争持续了一年半，美国内战打了 5 年，但是大部分战争时间要短很多，1870 年的普法战争仅持续了 6 个月，1904 年的日俄战争持续了 18 个月，1898 年的美西战争持续了 4 个月，1912 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持续了 5 个月，而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不到 6 个星期就结束了。

美国的南北战争是现代战争中代价最大的，也是最血腥的，这是可以和目前的欧洲战争相提并论的，也是唯一的战争。这场内战在 1865 年结束的时候，美国联邦还剩下 100 万大军，南方联邦还剩下 70 万，而双方的损失一共是 100 万人。这场战争其实赢的一方也没有多少好处，这在现代战争中很少见。美国北方各州债台高筑，最高达 5.6 亿美元。南方也差不多被消耗殆尽，负债高达 4 亿美元，不过他们是用这钱来偿还南方妇女的，在战争的时候，他们捐献自己的珠宝首饰，甚至还剪下自己的头发拿到欧洲换钱。

第二章战争报道的不可靠性

1. 官方的战争报道有的真正意义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战争的后果，但是我们的错误是对这些后果的解读和诠释。我们怀疑是否能从这些只留下文字的战役中把握每场伟大战争的细节呢？我没有要长篇大论地列举这场欧洲战争的主要战役，只是希望我们能够记住的是这场战争给我们带来的教训，还有就是战争中的不确定因素的重要性，这样便可以证明，我们几乎不可能从几千人目睹的事实中发掘战争背后的真相。

因为当前这场战争的官方报道是由几大强国在背后操纵，所以它们的舆论导向都是出于各国不同的心理原则，在此我给大家一一列举：

1. 消息的封锁或掩盖

2. 歪曲事实来制造公众舆论

第一种也叫沉默法，这一方法用在战事的开始，英国和法国曾用过；第二种被德国人经常使用；俄国是两种方法都用了，一方面，让人难以接受的都是事实的真相；另一方面，敌人总喜欢夸大胜利来掩盖失利。

例如，俄国的官方报道说已经俘获大批战俘，并且获得了很多机关枪，但是当读者们最后发现俄军已经撤离了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并且在打仗的时候一边打一边后退，那么，读者就再也不会相信他们的报道了。所以，读者极有可能从不同的报道中读到两则截然不同的报道，这就导致人们不会再关注过程了。

德国的报道也经常报道虚假的信息，所以最后不管他们说什么，中立国都不再相信他们的话了。1915 年 4 月 10 日《日内瓦日报》说道：

“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德国公报》在战争的一开始就没有说过真话，这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他们竟然可以瞒天过海。”

而法国呢，在 1914 年 8 月，法国人对前线的战况几乎一无所知。8 月 29 日，直到德国人打到家门口了他们才知道。但是直到 9 月 1 日法国人民才知道法国政府已经被迫撤离。德国的装甲部队正在穿越贡比涅森林。在战争打响的时候，他们的电报被无关紧要的新闻占据，等战争真正来临的时候却沉默过头了。

任何事物的本身都是有利有弊的，沉默的弊端就是纸包不住火的，真实的消息总会零碎地传到人们的耳朵里。比如说新闻里说的德国军队从某个村庄撤离了，但是却没有说德军占领这个村庄的相关报道，还有受伤的士兵，国外媒体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谈论的时候，一些重要的战役在公报中根本就看不到，很快，人们就可以发现政府在刻意地隐瞒事实的真相。所以，当人们认为本该在里尔的德军已经穿过了贡比涅森林来到巴黎的大门口，并且还迫使法国投降和烧毁巴黎，这个时候法国人才集体陷入疯狂，到处可见溃逃的百姓和军队，这是 1870 年的普法战争之后的又一幅景象。那些写新闻简报的人简直就无法称得上是心理学的行家。

虽然法国政府用政府手段阻止了媒体报道任何重要的战役信息，但是无法完全阻止各家媒体对城市的焚毁、妇女和儿童的受辱等一切残忍行为的报道。不过，这正合德军之意，这样法国的每个人就会意识到德军的残忍手段，他们就不会再有反抗的决心和勇气。要是法国人民一早知道事实的真相，估计就会慢慢地适应，不至于陷入这么混乱的结局。

德军虽然被马恩河战役暂时拖住了，法军也因此获得了一线希望，可是法国政府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战争的具体情况还是一无所知，根本不清楚敌人的情况，德军却清楚地知道双方处于何种状态，何种局势。那些

能够激起民众斗志的英雄事迹也没有得到有力的宣传，人们对拯救了法兰西共和国的英雄知之甚少，过去好长一段时间，法国终于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开始意识到精神的力量，于是，法国也开始对英雄进行宣传，那些被隐藏了很久的英雄事迹都被拿出来开始大力宣传，这样就可以抚慰民众了，利用之前的成就和胜利来驱赶人们心中的恐惧和悲哀。这就是英雄主义的开始吧！

由于法国政府担心公众舆论会对战争的进程造成不好的影响，媒体和报纸采用的沉默终于结束了。有时候，公众舆论也会导致很多灾难性的事件，如 1870 年的普法战争一样，巴赞元帅的任命、西班牙舰队被迫开往古巴圣地亚哥，可是后来还是全部覆灭在了美军的炮火之下。

之前的种种表述足以证明，要对战争的情况做出准确的报道有多难，而且官方的消息总是漏洞百出。

2. 战事报道的真正意义：第一次佛兰德战役在各国将领们身上出现的幻觉

我们想对战争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并且获取其价值，只要将不同的报道拿起来对照一下就可以很轻易地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战况和实际情况是相差很大的，这是因为每个将军都希望自己在报纸上看起来战功卓越，被人们所崇拜，正是这种心理导致了战局的变化。

1814 年 12 月 5 日，法国的军官和英国的军官对第一次佛兰德战役的报道描述完全没有相似之处。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在《三军官方公报》中是这样报道的，法国大元帅制订了作战计划，英军只是辅助，但英国的报道却是不同的。下面是我在法国的官方文件中截取的几段话：

“但是这需要时间，而英军不可能在 10 月 20 日之前抵达新的作战地点。

“另一方面，比利时已孤军奋战了三个月之久，可谓弹尽粮绝。总指挥官当机立断，下令立即前往支援。

“早在10月4日，他便委任福煦将军带领军队赶赴法国北部进行部署，10月18日至11月12日，法军不断集结，与比利时军队和一个英军军团形成了一支在达波将军统领下的法国军队，在利斯河和附近海域展开军事行动。

“在评论这场战役时，《日内瓦日报》称，法军当局在迅速调动大规模军队方面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这样的行动力是导致德军在佛兰德战役中溃败的关键因素。”

1914年12月1日，英国的《泰晤士报》中关于约翰·弗伦奇元帅的报道中写道：

“很显然，是我们的元帅最先命令驻扎在法国的英军抵御德军进攻的，也是他最先给予德军以迎头痛击的。在他的带领下，英军巧妙地转移到法国北部的埃纳省，截断了德军进攻加莱的队伍……我们的元帅对意志不坚定者的抱怨声和怀疑声充耳不闻，将士兵人数显著不足的军队部署在一条宽广的防线上……当然，我们必须感谢法国战友的可靠支持……达波将军、莫德海将军和卡斯特诺将军都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英雄。”

从这篇报道看来，法国不过是英国大元帅的得力助手。

到底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无从知晓了，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事实就是，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是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德国损失了15万士兵，英法联军损失5万士兵。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这场战争的真相了，总之，法国的报道是不完全准确的，法国《时报》记者评论道：

“当对当前战况进行评估时，我们经常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战略和军事部署的首要目标是在德军大肆侵犯兰斯、梅齐耶尔、里尔和阿戈讷之时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荣誉和生命，所以公报中体现出的乐观主义在我看来非常奇怪。

“除了几个小角落之外，德国人已经占领了几乎整个比利时和法国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后者从人口和财富方面来看占到法国的六分之一。即使按

最保守最乐观的估计，法国在土地、房屋、工厂、煤矿、铁路、公路和艺术作品各方面也至少损失了12亿英镑。那么侵略造成的死亡、耻辱和玷污呢？居然还有人说德国侵略法国并没得到任何好处。他还想怎么样？”

我们要感谢，感谢坚强的军队，感谢他们的勇敢和坚韧，是他们的顽强保住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忍受德国人的欺凌和惨不忍睹的行为。感谢他们为我们度过了一个黑暗的8月。

我主要是说明获取战争的准确性有多难，所以不会在战争的结果上多说什么的。战争之所以会有很多种类的报道，那是因为交战双方的将军都会从自身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自然也会出现很多对同一场战争不同的描述。对马恩河战役的不同战事报道就是另一个典型例子。

第三章马恩河战役假说

1. 战役开始后的第一次逆转

当时大量的军旅作家已经指出德国会先攻击法国的北部，可是为什么法国的参谋部会有德军从东面进攻的幻觉呢？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

其实，当时德军的整个作战计划都被列在伯恩哈迪的《现代战争论》中，所以，法国能够知道德军的作战计划是有根据的。

这样一来，德军的进攻意图就很容易被看穿了，德国就是想着利用大量的军队进攻法国军队最薄弱的地方，快速地拿下巴黎，这样就可以强迫法国谈判，然后再集中力量来攻打苏联。

就这样，德国进攻法国用了200万军队，而当时法国军队一共才150万，而且还被分散部署去防守在不需要加强的长达300英里的防线上。这样的错误法国人以前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就犯过一次，可是为什么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呢？真是让人无法理解啊！

由于法国总指挥部的错误预测，几乎让法国军队遭到灭顶之灾，当指挥部意识到错误为时已晚，在8月20日打响的沙勒瓦罗战役之后，法国一败再败，无法再战，一路撤退，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这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恐怖的记忆。

一名在此次撤退过程中幸存的士兵在1914年11月10日的《法兰西日报》中讲述道：

“然后我们就开始撤退，当时的情形真是糟糕透顶……我们一直在赶路，不分昼夜，从不停步，完全不知道在往哪个方向走。我们跟不同军团的人混

在一起；各路兵马冲撞到一起，有丢了战马的骑兵，找不着北的炮兵，还有骑着马的步兵。我赶了整整五天的路，最后发现我所在的团……”

德国人乘胜追击，9 月 3 日克鲁将军已经抵达南图—凯伊—桑利防线，这时的法国已经走投无路了。

2. 拯救巴黎

德国人攻占巴黎的计划既有心理依据，也有战略考虑。认为只要拿下法国的首都就可以冲击法国人民的精神，这样就可以立即停战要求法国人谈判，法国政府也会求和，他们也可以不用再花费大量的精力在法国，可以调离部队到对付苏联的战争中去。

从一位德国军官口中得知，德国会通过一切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会慢慢地摧毁巴黎城市，会慢慢地折磨法国人民，直到法国政府要求议和为止。所有人都同意这一决定，认为巴黎应当承受法国参议员特鲁约先生和拉维斯教授口中的命运。特鲁约参议员在 1915 年 4 月 2 日的《法兰西日报》上说道：

“如果法国拒绝投降求和，不配合敌军玩这个所谓的‘和平’游戏的话，敌军就打算一一破坏巴黎的七大区，但投降求和就意味着国家的彻底灭亡。敌军的目的就是让巴黎从地球上消失。”

拉维斯教授在《巴黎评论》上也说了同样的话：

“巴黎现在已经成了人质。看起来德国人是把巴黎分成了七个区，以此要挟法国政府投降，如果政府不同意讨论和平条约，德国人就炸毁一个区，如果政府还想拖延，就再炸掉一个区，依此类推。我们丝毫不会质疑德国人摧毁巴黎的能力，正如日耳曼祖先所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汪达尔人的领袖盖萨里克——‘我总是有一种一把火烧掉罗马的冲动。’”

德国的战犯解释说，德国人在当时没有其他的方法让法国马上停止战争并且要求谈判议和，签下和平条约。当时的德国是急需这样的结果的，因为他们需要立即返回另一个战场，所以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暴力破坏来强迫法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3. 马恩河假说

法国巴黎是有着千年历史的文化首都，它是法国道德的代表，它对世界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如果巴黎被德国焚毁，那么法国将被世界贬低到绝对底层。这就是一个国家不好好备战的结果，一个国家如果不在军事上有很好的准备，那么自然会遭到攻击。

但是命运虽然将我们引领到悬崖的边缘，但在最后的关头给了我们一个脱离险境的机会。那就是关于理应造成的死亡数字理论和历史是相互矛盾的，理论是取决于人们的想法，仅仅需要一个小小的事件就可以化险为夷拯救国家，帮助一个国家渡过难关。

德军当时已兵临巴黎城下。

当时的法军大元帅也是非常之为难，因为如果不下令撤离的话，法军很可能会被德军包围，而如果下令撤离的话这就意味着将巴黎双手奉上，任其自生自灭，这是让法军元帅最为难的战役。

法军大元帅当时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多重因素迫使他在马恩河战役与德军开战，最终，法军赢了这场拯救巴黎的战役。

简而言之，就是法军在马恩河战役取得了胜利。但是如果要一位历史学家来对这场战役进行研究的话，那么他的第一个问题很可能是为什么法国的大元帅没有坚定原来的计划下令撤离，反而向德军开战？第二个问题就是德军为何到了巴黎城下却不开战，却是跑到东边战败？

让我们先看看报纸上的官方消息，虽然可能不起什么作用。以下是从《法国三军公报》摘录的段落：

“到了9月4日，我们大元帅制定的撤退警戒界线上已经可以看到德军的身影，在这条警戒线上发生过的激烈作战越发清晰，这个从我们撤退过程中取得的少数胜利中得到证明。所以说，我们的撤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事先策划好的。部队可以自由调遣部署，霞飞将军在6日下令各部队进行反攻时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毫无疑问，每日的新闻美化了这场战役。一份日报在谈到法军大元帅的时候说道：

“从大元帅的作战计划可以看出他对马恩河战役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从9月5日开始，所有的作战指令均是他亲笔书写的，并且早在8月27日他就已经做好了部署。对战役的不同阶段他都做了分析和安排，它们就像是精密仪器上的零件，从一特定时刻开始像钟表一样运转。”

一般的老百姓都很高兴读到这样的报道。但事实上，法军从默兹河一路狂奔到马恩河绝不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事先策划好的。”即使是最粗心的人也不难发现这其中的漏洞。如此明显的夸张刚好证实了1914年12月18日《日内瓦日报》上做出的评论：

“真相总是难以大白于天下，即便是无从抵赖的事实。举个例子来说，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相信法军大元帅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把敌人引到巴黎附近，然后在马恩河再击败他们。对于一支刚刚遭受了一系列打击的军队来说，马恩河战役确实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华丽逆转。但它并不是法军总参谋的策划，法军不会傻到引诱百万德军入境，然后把最富裕的地区交出来给敌人破坏和毁灭。”

当所有占领区的人民口口声声说他们的撤退是自愿的时候，《日内瓦日报》不失时机地补充道：

“看来这场战争中的许多战役都是自愿打起来的，至少双方都是这么说的。比如，读奥地利的公报，就不难发现他们很多场败仗都是故意的。塞尔维亚军队自愿放弃贝尔格莱德，德军自愿从阿尔萨斯和佛兰德撤退；只要大致扫一眼《法国公报》，也可以不难发现诸如类似的自觉行动。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考虑到道德因素。”

由此可见，从报纸上我们很难形成准确的观点，一开始我们问自己的两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答。第一个是为什么法国将军没有按原定计划撤退到巴黎南部，反而向敌军开战？

现在的我们面临未知的领域，可能以后会有很多的写书人试着澄清这个

问题，但目前我们有两种假设。

一种是由于政府的介入，导致法军大元帅不得不放弃撤退。在9月1日大元帅下达第4号军令，指挥军队退守到巴黎南部塞纳河对岸的布雷镇。按原计划第五军撤退到诺让塞纳河畔。9月2日总指挥向军政大臣汇报：“按大元帅的提议，法军无法在马恩河沿岸组织起有效的防守。”随后大元帅通过第3463号军令宣布，他撤退的目的是为了将军队从敌军手上解救出来，以便做好准备，在撤退结束之前做好夺取蓬苏约讷、诺让塞纳河畔、奥布河畔巴尔区、布里安勒沙托县和茹安维尔沿线。另一种假设是法军想借着德国克鲁克将军突然转向去法国东面的机会进行突击。9月4日，他下令说：“我认为可以利用德国第一军来扭转当前的紧张局面，让他们来承受法军的联合力量。9月5日我们将做好一切准备，次日进攻。”

一个是政府介入的假设，一个是利用克鲁克将军调军的假设，这两个倒不是完全的自相矛盾，如果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就会非常接近真相了。现在剩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已到巴黎的情况下德国将军会放弃进攻计划？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

4. 猜想德军放弃进攻的原因

德军的突然撤军正是这场战役最大的谜团，当时大部队离巴黎只有两天的路程，最早的部队已经到了蓬图瓦兹。对于虔诚的新教徒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但也有可能只是出于战略和心理上的一个考虑。

首先，我们可以排除第一种假设，德军不可能会坚守在进攻一个设防城市之前必须消灭其防守力量的规则。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了法军的一举一动，知道法军收到撤退巴黎南部的命令，所以他们在进攻巴黎时不会遇到顽强抵抗。克鲁克将军非常确信自己可以顺利进入巴黎。既然这么顺利，他为什么会停止脚步呢？

答案只能通过猜测，下面这个假设的可能性最大。克鲁克将军可能认为

占领一个毫无防守能力的都城对于他的名声没有太大的好处，但他如果能把在贡比涅战役中大败而退的英军给一举歼灭，那就有可能是名声大震。

为了能包围英军的这支队伍，他便向东面发起了进攻，同时，法国莫努里将军也在集结一支包含多个军种的队伍向克鲁克部队进军的方向前进，但克鲁克对此一无所知。当克鲁克将军发现可能会受到来自侧翼的攻击时，出于自我保护，他便调派了一个军团驻扎在莫城北部。对于这次失利，德军解释说没有意识到这支军队的存在，所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1915年9月12日《死亡邮报》这样报道：

“克鲁克将军的计划从战术角度来看天衣无缝，如果不是因为来自巴黎和莫城北部的两支法军的阻挠，本来是可以成功的。这两支优质部队的突然出现实在让克鲁克将军难以预料。”

9月3日，巴黎省长加利埃尼将军知道克里克将军的先锋部队已经到达了南图，并正在向马恩河进发时，加利埃尼将军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下令莫努里将军9月5日进攻防守较弱的德军的侧翼，然后再从南特伊莱奥杜安进攻敌军后方。接下来四天，莫努里将军的部队和克鲁克将军的部队在乌尔克和南图进行了激烈的交战，而克鲁克将军很快地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这是这场战役的关键。莫努里将军收到克鲁克将军的威胁说要包围他的军队后，只好败下阵来，退守到南图北部。克鲁克的军队在9月9日和9月10日这两天内撤退了，至于原因，至今无人知晓。

从军事角度来看，克鲁克将军除了在接近莫城没能保护好右翼受到谴责外，他的调兵遣将无可厚非。当他发现莫努里军队在乌尔克驻扎下来，准备进攻德军侧翼时，克鲁克将军知道他的军队被包围了，随即派遣了两个军团为侧翼解围，来逃脱暴露军队后的灾难。可是经过了这场战役后，德军整体失去了组织，所以不得不全面撤退，克鲁克将军的侧翼前脚刚走，福熙将军接踵而至，把中心部队送入了巴黎玛莱的沼泽里。

德军并不是同时撤退的，莫城和塞扎讷附近的德军10日开始撤离，靠近

塞扎讷中心的德军 13 日开始撤离，而东面皇储的部队 15 日才开始撤离。

由于德军撤退得太迅速了，使得法国人在过了 36 个小时后才知道自己打了胜仗。如果当时法军能乘胜追击，说不定能一口气把敌人给赶出法国边境，就算追不了那么远，至少也能把他们赶到兰斯东面，这样法国就不会再遭到轰炸，兰斯大教堂也不会遭到破坏。

对于马恩河战役我不做详细描述，是因为我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估计目前为止也没有几个人了解具体的情况。只有未来才有可能解释法国的这场胜利。我能说的是战士的勇气，和掺杂的各种运气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一种是由于政府的介入，导致法军大元帅不得不放弃撤退。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马恩河战役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场伟大的战役。它在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内展开，全长 150 英里，从莫努里将军驻扎在莫城向北 15 英里的南图维豪杜因，到凡尔登以南。这个半圆形包括莫城、科罗米尔斯、塞扎讷、费尔尚普努瓦斯和弗朗索瓦。

作家马勒塞写道：

“我们得到了一切想得到的东西，我们可以为这些英雄事迹写上好几本书，有个人的，有集体的，它们都象征着马恩河战役的胜利。把这些事迹集中到一起，会不会觉得在这次命运的转变中，有些东西比军事战术来得重要？一支战无不胜的庞大军队，一路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却被一群饱受失败、撤退和饥饿三重折磨的士兵们打垮。即使士兵们已经精疲力竭，他们的心脏还在坚强地跳动。这就是奇迹——一个国家力量的奇迹，一个种族勇气的奇迹，一个法国军事传统的奇迹。

“在这次马恩河战役中，法国士兵多达 100 万人，而德军更多。从 9 月 5 日到 9 月 15 日，战争的十天里，德军损失了 15 万人，法军伤亡人数也不少。

“马恩河战役让巴黎免遭灭顶之灾，是法国编年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也再次证明了人类可以无止境地刷新战争伤亡人数的上限。”

第四章和平问题

1. 阻碍和平的因素

最初大部分人尚未意识到要实现和平会有重重的困难。为了让事实变得更明晰，只需认真思考一下对盟国最有利的假设。假设接受人类虔诚祷告的诸位，上天神明赐予了我们超凡的能力，能以每个月 100 公里的速度前进，能让目前驻扎在柏林和巴黎之间的 200 万或 300 万德军凭空消失，假设我们已经抵达德国首都并对其实施管控。所有的困难会就此消失吗？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在以上假设成立的情况下，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想即便是神明也不能预见得到。

就算把德国划分成多个省区，实施强制性的裁军，或是毁灭性的赔偿等，我们都会得出一个结论：要想阻止 7000 万人做出的任何报复性行为，我们必须无期限地维持强有力的军事管控，即便这样做，也很难阻止他们。就拿耶拿战役来说，当时拿破仑已经控制了普鲁士，当时他也面临跟今天一样的难题，但他没能解决这个难题。他自以为已经打垮了普鲁士，可是若干年之后，普鲁士的将军征服了巴黎。

如果没有一个出其不意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也可能只是一个长期对抗的开始。就像历史上那些经常发生的长期战争一样，期间会有短暂的和平时期。三十年战争和百年战争便是很好的例子，也许只有在未来才会出现比那些时期更残暴血腥的战争。

除非这些人的指导思想发生变化，否则欧洲国家显然只能享受到短暂的

和平时光。如果想要和平时光维持十年或十五年，我们就必须削弱他们的战斗力，让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发起这样的对抗。

由此看来，眼前这场战争可能会在某个参战国被完全摧毁后才能真正地结束。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不胜枚举，尤其是美国内战。正如W. 艾略特先生写到的：

美国人永远忘不了内战的那五年，交战双方都意志坚决，直到南方的人力和物资都耗尽，战争才结束。南方州的首府在那场浩劫中被夷为平地。

对盟国来说，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不稳固的和平比持续的战争更恐怖。对此有怀疑的人可以回想一下德国驻美国大使贝恩斯托夫伯爵假想的情况：

把在圣瓦勒里到里昂一线以东居住的1500万居民归到比利时的省区内，而比利时顺理成章将成为德国领土。同时德国还要求我们支付4亿英镑的赔偿金，取缔我们的国界，裁减我们的军备，并强迫法国抛弃英国和俄国转而与曾统治它25年之久的征服者为伍；而他们的一切做法就是想把法国削弱到葡萄牙那样的水平。最终，威廉二世将买下俄国，毁灭英国。

1915年5月20日递交给帝国总理的备忘录，上面不仅有德意志帝国制造业代表的签字，还有农业协会代表的签字，上面对德国所迫切追求的和平条件做了清楚的描述：

比利时必须在经济上属于德国。而且从比利时边境到法国索默河沿岸的地区，也都必须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德国将拥有老挝、法国东部边境的所有要塞地区，尤其是凡尔登和贝尔福。法国北部及加来海峡等产煤地区必须成为德国领土。在这些地区占有地产的人应该被驱逐，其土地归德国人所有。应把波兰和波罗的海各省从俄罗斯手中夺过来。

与此同时，又有一份由多名教授签署的声明书与之相呼应。在声明书里，竟提出了夺取法国殖民地的要求。德国的和平条件是建立在剥削和毁灭被征服地区的基础之上的，从德国总理和财政部长发表的最后几次演讲也不难看出这一点。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对这些演讲如此评价：

“从德国总理的演讲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德国凌驾于所有其他国

家之上，其他国家享受的自由只能在德国允许范围内。财政部长还补充道，那些德国想要标记为战争教唆者的国家必须在数十年内担负起数百万的沉重赔款。也就是说，德国想在接下来数十年里，让所有曾经反抗过德国的国家都必须辛苦挣钱，以战争赔款的形式向德国上贡。”

《福斯报》（《theVossischeZeitung》）对1915年8月19日帝国总理在国会上发表的讲话这样评价：

“作为一个最伟大的国家，我们有责任担当人类先锋的角色。服从于比我们低下的人，却是一种违背使命的罪行。”

1915年9月4日的《日内瓦日报》刊登了某位德国知名人士对阿尔萨斯战后命运的典型看法：

“战争结束后，整个阿尔萨斯都会匍匐在我们脚下。”

渴望和平的人士都应该注意到这些。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1915年7月14日德利斯勒的纪念仪式上更是一针见血地道破当前形势：

“对于已经被战火摧残得奄奄一息的城市，和平却时断时续，那明天又会是怎样的情况？我们已经筋疲力尽，还要雪上加霜地面临残酷的条约。在政治、道义、经济上我们将永远地臣服于我们的敌人。法国百姓的命运都会被掌控在扬扬得意的敌人手中，受辱的法兰西将从此意气消沉、自轻自蔑。

“……我们的敌人不应有任何误会！法兰西已经奋起，并不是为了签署一份岌岌可危的和平协议，介于一场始于无谓的战争和另一场更严重的战争之间的提心吊胆的和平；法兰西的奋起，也不是为了让自己遭到攻击、经历生存危机。”

2. 将来的担忧

不管达成怎样的和平，参战国最大的困难就是制约那些可能引发战争的情况，而这需要的是超人的睿智。

和平将会带来一系列的改变，例如民族原则取代以前的均衡值。它允许所有国家有选择自己喜欢的制度，理论上很完美，但实际却存在严重的问题，

对于那些有交集的民族，这一制度很难落实，比如说巴尔干半岛，当地的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对该地区内地点、名称一样的省区都宣称主权。这方面有难以逾越的困难。还有意大利城市特里斯特城，其周围的斯拉夫居民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就居住在此，他们是永远不会接受拉丁人的统治的。

除了欧洲本地有这么多的问题外，亚洲地区也有很多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侵占。在欧洲各国大战的过程中，位于太平洋地区的日本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侵占，其背后的历史故事值得心理学家进行一番深刻的研究。

也许大家都还记得，最开始法国的外交官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居然天真地认为日本天皇会派兵去帮助他们，这表示他们是多么的无知啊！日本人在亚洲的所作所为法国人一点都不了解，然而，这样的幻想也会得到媒体的大肆吹捧，其实稍微有点智商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日本人是不会干对自身没有利益的事情的，可是当时法国的大量媒体没有一家愿意刊登我的这一观点，却只刊登克莱蒙梭的想法。最终，跟我预想的一样，日本人利用欧洲的战争，在中国兴风作浪。

3. 欧洲的战后状况

战争开始之后，每个人都会对欧洲进行预测，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自己最满意的假设。欧洲即将会到来一片黑暗的时光，不同的民族之间都会有不同的假设，也很值得研究，但是几乎大家的预测都是大相径庭的，下面我选取了一些名人的预言。

柏林大学的教授爱德华·迈尔称：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想要世界恢复战前的状态是完全不可能的。战后的世界将截然不同于战前的世界，尽管很多国家的边界只有少许、甚至没有改变。很多新问题会浮出水面，等待我们去解决；而很多似乎已经解决的问题将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往往成为核心问题。

“这场世界大战最直接、最灾难性的后果之一——也是英国造成的‘多

么顽固的臆想'！将是日本力量的可怕增长，从而无可避免地导致一场争夺太平洋控制权的大规模对抗。正如以往那样，英国的盲目已经使得所有敌人中最危险的那个武力大增。"

迈尔认为德国有希望打垮英国，但他同时也补充道：

"就算我们政府征服了所有的对手，但我们也不能保证会不为其小小的成果而满足。英国便会抓住机会再次反抗。不管是什么样的盟军队伍，他们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这将是一场持久、血腥、激烈的战役。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场世界大战英国占主要责任，要为此负责！也是现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中很多的迹象显示现代文明将从此开始一段缓慢却无法扭转的下滑阶段，就像古迦太基战争之后那段历史一样。"

匈牙利前总理安德拉希伯爵（CountAndrassy）的一篇文章——《世界战争和自由》，文中他对俄罗斯极为恐惧：

"如果俄罗斯帝国突然增加大量的人口，那势必会成为自由生活、知识生活最可怕的敌人。因为其他的大国不会像沙皇政府那样阻碍知识的自由和高压控制。

"……俄罗斯的政体无法容忍自由，这不仅是由于其自大心理和维持统治的便利，也是由于俄罗斯文化和种族的异质性使其只能通过高强度的中央集权才能保持国家的完整。一个自由的俄罗斯将难以维持统一，因此被纳入这个国家的被压迫种族越多，国家统治就越发具有帝国主义特性，压迫便是一种迫切、基本的必要手段。

"……庞培被打败，接着，恺撒死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军团被奥古斯都和安东尼摧毁，从那时起罗马共和国的命运已经盖棺定论。奥克塔维厄斯和安东尼两个征服者之间的激烈对抗不可避免，但那只能决定谁来当世界的主人，而非自由是否得以存留。

"即便欧洲中央的各个帝国被打败，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即是由英国议会还是白色沙皇获取统治世界的主权。

"届时我们所渴望的和平将更加遥远，我们所希望的自由也将不复存在。"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日耳曼联邦都是普鲁士帝国的附属国，即使普鲁士战败了，他们的关系也不会决裂。德国在普鲁士的庇护下而军力大增，然而，如果他们关系决裂就难以恢复统一。

前比利时驻德国大臣比恩斯（BaronBeyens）曾公允地评价：

“德国的其他地区也很欢迎这场战争，尤其在慕尼黑的反响更为强烈。德累斯顿的暴徒们砸碎英国公使馆窗户的那股疯狂不亚于普鲁士首都市民。不管是谦逊的南部居民还是躁动的北部居民，他们所表明出来的态度可以很好地说明，德意志主义早已深入了民心。同时也表明了另一种态度，那就是他们都视日耳曼统一为民族自身存在不可或缺的条件。”

有一些神智还没有完全被狂热侵蚀的德国人清楚地意识到，想要缔造一个和平的世界是很困难的。下面是奥斯特瑞尔斯教授（ProfessorOsterrieth）某篇文章的摘抄：

“如果德国战胜了英国，或者说，盟国分裂德国联邦将德意志南部各国变为阶下囚。不论发生哪一种情况，这种局面能否持久呢?

“德国没有办法保障欧洲不会受到亚洲的侵略，也无法承担海上霸权的沉重负担；但如果盟国战胜的话，他们则更离不开德国这个面向亚洲的壁垒。要想保住欧洲的文明，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三个大国必须统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线。任何一个国家的存亡都将会影响到其他两个国家。在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下，他们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撑起欧洲的大局，欧洲的其他国家也都倚仗着这三个大国。

“从特殊的地理位置看，俄罗斯可以算是一个正统植根于拜占庭的独立王国。但它的力量一直来源于亚洲。随着知识和社会的发展，它不会因传统而聚合在一起，反而会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国家。所以，欧洲要全力以赴地抵御贪婪的俄罗斯，这个本质上的亚洲国家。”

一些意大利人也发表了看法：

“这场战争总的来说有两种结果：一是实现和平，那就是各个国家的力量悬殊，这样就很明显地达到休战的状态，这是很多人希望看到的；二是每

个国家彻底地胜利，那就意味着有一个国家彻底地失败。当然，也有可能是第三协约国获胜，但是，我并不觉得摧毁德军会真正阻止其再次强大，就像拿破仑在战败之后一样可以让普鲁士再次强大。其实，斗志会激起德国的爱国热情。如果中欧帝国胜利的话，他们也无法彻底地摧毁大英帝国的复仇精神，相反，这样的摧残只会使其更加坚忍不拔，而且，美国很有可能会帮助英国使其重建。”

还有一个意大利人，瑞格纳罗教授（ProfessorRignano）表示：

“盟国认为他们能够摧毁德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就算他们最后能取得胜利，可以向敌手发号施令，但是他们也要考虑到，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很快就可以走出战败的阴影。这一点，可从法国在1870年和1871年战败后迅速就恢复了元气得到很好的证明。”

由此可见，人们对未来是充满抗争和不确定性的，但是他们一直认为德国是不会改变的。德国的专制体制已经落后美国或者英国一百多年了，暂且不说会不会改变，改变是值得去怀疑的，就算改变了，德国也不会再发动侵略战争，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好事。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还有哪些可能出现的情况，这些情况和假设没有明确地说出来。

4. 用经验来谈谈作用

物竞天择这是自然选择学说，那么人类的冲突也是一个自然的法则。自然总是会淘汰弱者和劣势群体，人类世界也是一样。在很多人看来，战争也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毕竟很多的文明都是始建于战争、毁灭与和平年代。战争本身是会缔造一些和平年代无法缔造的成就，很多的精神都会在战争年代得到发扬光大，细胞之间也会战争，这样我们的身体才会越来越好。

在今天看来，这些看法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不过以往战争的毁灭程度和血腥远远不及今天的战争。现在的战争，除非是彻彻底底地摧毁整个国家，包括军队和人民，包括国家财富和一切可能让其有恢复可能性的事物，否则，

这将是一场持久的战役。

不知道将来的人们可否会意识到我们无法避免战争，但是我们可以减少其带来的毁灭性，我们不需要寄以很高的期望，但是也许各国之间可以找到最合适自身发展的方式。

和平不是正义的产物，可是很多和平主义者们总会有“正义必然获胜，和平由此降临”之类的无知愿望。我们必须要扔掉这些东西，从而更好地探索更适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

一个人思想的细微变化会影响整个人的心态和行为，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德国在工业经济都面临即将覆灭的时候，日耳曼的战士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1. 可能德国人并不是要摧毁和统治世界的人。

2. 将自己的邻居和他们的杰作以及城池付之一炬，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却需要消耗很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3. 在当代的战争里，征战国也许会在经济战争里获得很大的利润，但是所有的参战国都会在这场战争里元气大伤。

4. 跟敌人做买卖远远比摧毁敌人更有利可图。

5. 各国要想在当今的世界长期存活下来，那就得在各个领域彼此依赖，相互依靠，这是因为各国的气候地形，能力水平都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也许会相互憎恨，甚至会相互战争，但是这样的相互作用又是不可或缺的。

历史证明，我们必须要经过漫长的屠杀和毁灭的过程，才能真正地明白，理性真理是可以战胜某个感性或神秘的本源幻想之源。从十字军东征到宗教战争，世界已经多次卷入因为要捍卫某个思想而进行的战争，可是，那些思想在今天已经没有任何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了。这样的幻想就只能让时间来磨灭。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我们的行为潜意识的领域还没有认识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往往会在明白一件事物或者一个道理之前付出惨重的代价。

结语

在本书中我已经展现了欧洲战争的起源，也指出了其中所蕴含的心理层面的教训，但要深入探讨其政治、心理和社会影响，则需另起一册。

本书每章所得出的整体结论都非常具体，无法以一个总结进行简要概说，因此我尽量简约地谈一谈我自己对这些结论的看法。

此前，欧洲一直遭受巨大的震荡，那些欣然相信一切已经结束的人一批接一批地死去；然而，一个新世界从满目废墟中诞生。

从历史上看，当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似乎只有在这样重大的危机之时，才能继续前进，也许只有这些危机才能将这些国家从已经根深蒂固的旧模式中脱离出来，从业已深入骨髓的习惯和偏见中摆脱出来。

现在德国正以牺牲自己的财富和未来繁荣为代价来追求其他国家屈从于它的专横自大，我们诅咒它也完全合情合理；但如果没有发生战争，那么德国必然在世界仍保持漠然的态度时逐步将其可怕的霸权之梦变为现实，当其他各国终于感觉到日耳曼暴君带来的沉重压力并试图摆脱时，为时已晚，工业、科学、商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国家财富资源都将落入德国人之手。

和平能带给德国人的是那股巨大的狂热浪潮所无法给予的；但他们被梦想遮住了双眼，看不清真相，因为他们自认可以再建一个罗马帝国。但那是永远不可能的，即便德国军队能横扫所有的战场，能将所有城池夷为平地，那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太渴望自由，进行反抗的方式太多太多，任何恺撒大帝都无望将世界纳入其统治之下。

现代社会的心态已经不可能允许任何主宰世界的统治，尽管这样的想法曾令无数征服者为之倾倒。自我们今天的时代，大部分国家宁愿消亡也不愿屈从于凭武力施加的保全。这些国家对自己的能力有清晰的认识，不会让任何独裁者奴役他人的欲望得逞，尽管被侵略的国家无疑会遭到破坏，他们却不需担心沦为奴役。

***

伟大的欧洲各国的命运如何，我们无从得知，未来是一本人类智慧无法参透的书。但尽管无人知晓未来，我们至少可以回顾过往。现在源自过去，过去包含着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的因由，以及未来一切的因由。今之颓丧错漏、几近毁灭，皆源起于过往；今乃过往之后果，过往乃今之由来。

孟德斯鸠（Montestquieu）认为，罗马人之所以伟大，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总是能认识到敌人的优点，并随之改善自己的方法。我们应牢记这一点，认真地学习德国人的军事和工业体系。当然，我们不能全盘照搬，因为他们的心态与我们不同，但可以通过不同的过程，寻求相似的结果。

当今的德国绝不是其历史学家曾设想过的杰出民族。德国人是耶拿战争中被拿破仑轻松征服者的后裔。除了异常严格的记录和适应现代需求的严密组织，德国并无过人之处。

德国的神秘主义倾向并不妨碍其追求实际目标。不像法国大革命时的军队，德国军队并不是为了让某种能令被征服者追随的信仰获胜，而是为了赢得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获得商业利润。我们在这方面难以超越德国，但我们其他已经经受时间洗礼的卓越品质仍然会屹立不倒。

***

德国人计划的战争已经根据实际情况起了变化，但整个战事，德国始终意图谋求领土——首先是比利时和法国富裕的工业区，然后是波兰、立陶宛及俄罗斯的库兰地区，最后是君斯坦丁堡，如果有可能则进一步吞并苏伊士运河和埃及。

但即便德国能完成吞并计划的最后一步，德国人无法以此为战争的终结，他们在法国构建起一个防御工事以阻碍反击，那么在吞并其他区域之后他们同样需要保护自己的战利品，而不是从此清闲无事。事实上，只要英国卡住海上贸易的通道，德国便无法长存，他们所有的胜利都会立刻变得毫无意义；而英国可以一直封锁德国的海上贸易直到这一封锁不再必要为止，因为英国海军的战斗力无人可敌。

***

战争结束时，法国将有可能在人力和财力上所剩无几，但也避免了其在正常衰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幻想和错误。

当我们最后总结这一切时会发现，政治和宗教分歧大大弱化了我们的社会结构，这是令人悲哀的。我们必须牢记，那些无法解决内部纷争的国家早已成为历史而不复存在，内忧重重的国家难以抵御外患。

将弱化的社会纽带重新系在一起是个艰巨的任务，而我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将经历重大的改变。

其中最艰巨的工作之一便是让我们不再受恶意言语的欺骗：因为我们那些雄辩家只需大谈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关于进步、和平主义、社会主义和世界大同的公式化语言便会成功地掩盖事实，而那些沉重事实几乎让我们遭受灭顶之灾。

我们必须培养起责任感，目前已经或多或少地缺乏这种意识；我们应发扬团结精神，这方面我们缺失得更是厉害。这场战争给予了我们这些好的品质，在和平年代我们应该努力把这些品质发扬光大。

除此之外，我们应时刻高度关注社会法律和教育系统。

关于法国社会立法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读者可以参阅我的《政治心理学》一书，以了解社会立法将把我们引入怎样的深渊。

教育是所有改革的根本，在此我不做详谈。我只从我的《教育心理学》一书中选出一小段关于教师改革的内容：

“世界通过科技和工业发展而向前迈进的过程中，那些构成性格的品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主动性、毅力、精确、敏锐、活力、意志、自律以及责任感，没有这些品质，即便再高的智能也只会一事无成，而如果这些品质不能一以贯之地继承下去，教育本身也无法创造这些品质。”

我们的大学并不向学生灌输这些品质，而且更糟糕的是，压抑的学术体系会令那些已经具备这些品质的学生丧失这些品质。我们的教育方法需要来一次彻底的改变，因为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教育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这是我多年以来的看法，最近科学院的杰出人士M•H•勒•切特利尔(M.H.LeChatelier)，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当下一代人无法完成必要的变革，对此我持同样的看法。而我们何时才能有贯彻改革的坚定意志，并找到一批能力出众的教授来担当此任呢？

***

不论欧洲能从挫败德国霸权大梦的胜利中获取怎样的成功，这种成功不会延续太久，因为独霸天下的理想是素来难以磨灭的神秘信仰之一。一个受命于上天来征服并革新世界的国家是不会轻易放弃使命的，而德国在被反复击败之前是不会死心的。

文明国度现在要担心的远远不止是财富和国家精英的丧失，真正的威胁是丧失某些逐步修养而成的品质，那些人类文明因之灿烂、动人的品质，而今具备这些品质的人却面临怀璧之罪，这些品质似乎注定将会消亡。

忠诚、正直、亲切、信守承诺约定，或者换句话说，荣誉的各种形式，拥有这些品质的国家在鄙弃这些品质的国家面前显得软弱，也许这些优良品质难以继续存留下去，但等到它们全然泯灭的那一天，也就是黑暗暴力横扫一切、统治世界的时候，人类将沦入最野蛮蒙昧的倒退，文明的中心必然转移。

某位知名日耳曼学者声称，达尔文关于物种间无情斗争、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必须取代人们越来越熟知的友爱、平等和自由等精神：即德国历史学家所称的生物正义。

尽管自然主义者尚未接受这一血腥的法则，这一法则也许适用于动物世界；但科学的意义正在于保护脆弱的人类，让我们不再受制于残酷的大自然。

难道我们要抹杀文明，让这些夺去国家年轻一代生命、摧毁一片又一片城市、损毁过去珍贵文物的可怕的大屠杀永无止境地重复下去？难道残暴的武力注定像世界伊始之时那样成为各国的唯一统治者？难道人类必须屈从于奴役弱者的无情暴虐？没人知道答案。

如果人类赖以多次战胜自然的理性止于这场大战，也许我们会对这种理性感到失望。而倘若所有美好的存在都将被野蛮的斗争所取代，仅以肃杀的沉重的军营生活为例外，人类的未来将无疑是暗无天日。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会有那样的未来。自然法则无疑很强大，但志在支配自然的科学也非常强大。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应自以为是地谈论自然法则，因为我们对它们知之甚少。我们时时求助于自然，而自然是如此神秘。自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不以我们的尺度为标准。我们的知识是短暂而浅显的；而自然只奉行永恒的规律。我们最深重的灾难对大自然而言不过如同无垠海面上难以察觉的微澜。大自然令生从死中来，在她的无穷尽的威力之下，造就无数转瞬即逝的世间万象。

也许学者们不会受这些控制民众的幻想愚弄，并发现这些表象后面的真相，但他们之中还没有人看透这一切，悟出大自然的万物因果。

让我们心存过去光明岁月里培养起来的希望，因为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急速的变化，未来难以预测，今天的真理可能转眼成明日黄花。

***

我们可以用通达的哲学观来看待一切，但我们不应忘记当前的危险。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法国最繁荣的省份正遭受无休止的践踏，俄罗斯的军队被击退，波兰已经失陷，而其主要城市和要塞已经被付之一炬或者落入德军控制。

如果我们意志坚定地追求胜利，那么这些灾难都是一时的，因为占据一

个国家的领土是远远不够的。要主宰一个民族则必须毁灭其灵魂。

当汉尼拔在坎尼摧毁最后一支罗马军队时，他认为自己已经永远征服了曾经令自己国家恐惧的对手；但是他没能打垮罗马人的意志，最终从世界舞台上消失的，是迦太基。

德国所侵略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已经被德国击垮意志。这些国家都宁死不屈。

这样的精神便足够了，因为今天没有任何暴君能有如此伟力可控制不服从他的国民。拿破仑在西班牙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夺取了西班牙的城池，消灭了西班牙的军队，即使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士，也没能令西班牙屈服。

决定未来的关键，是我们持续的意志力。“征服或者死亡，但永远不会妥协！”这是所有德国将奴役的国家的简短宣言。不论是自然，还是人，抑或是命运本身，都不能与强大、坚毅的意志相抗衡。这个观点我曾多次复述，今天再次重申。